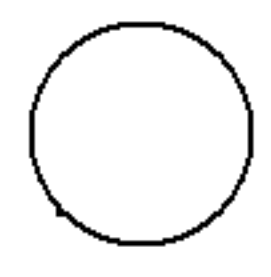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 QI



9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九期 ★

目 录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2)
-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7)
-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9)
-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11)
-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20)
-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25)
-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28)

☆ 五月九日出版 ☆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 来往的七封信

（新华社北京八日电）苏共领导今年四月三日公布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和苏联《真理报》四月三日的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企图欺瞒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瞒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的信件中通知苏共中央：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

下面公布的是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及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五月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的来信。

你们在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要“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但是，事实表明，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完全是骗人的。在你们发出这封信之前和以后，你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攻击。你们在几个月来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中，毫无例外地大肆宣扬和推行你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华活动。在三月七日信件的两个星期之前，今年二月中旬，你们就在有六千人参加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和通过了反华决议，要“大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了你们的三月七日的来信不过是玩弄两面手法的把戏。你们在所谓“对克服分歧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深深的关怀”的幌子下，加紧准备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高潮，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

我们已经多次地向你们阐明了我们对于公开论战的一贯立场。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顽固地挑起和扩大公开论战，对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大量的公开攻击，那么，根据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我们和其他兄弟党就有权利进行公开答辩。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

直到现在，我们的报刊，对你们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几十个兄弟党攻击我们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辩，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这样大量的决议和声明，



这样大量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又没有公开宣布撤销，怎么能够要我们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你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包括各种国际会议，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到处宣传和推行你们的那一套什么“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总路线，一心一意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你们硬要把你们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兄弟党，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对于这样重大的关系世界革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原则问题，怎么能够指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不公开揭露和反对你们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不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呢？

你们过去说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动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你们这次来信又说停止公开论战是“列宁的遗训”，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真的要停止公开论战，那么，你们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不是做错了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个错误呢？

从你们在今年四月三日公布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中，以及在这以后的一连串事实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你们提出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无非是要封住我们的口，好让你们放手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

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和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问题，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建议：今年十月间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准备；在这之后举行十七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准备；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你们在今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中不赞成我们的合理建议，并且攻击我们有意拖延。你们要求中苏两党会谈在今年五月间举行，兄弟党代表筹备会议在今年六、七月举行，全世界兄弟党国际会议在今年秋天举行。

乍看起来，你们是多么热心、多么积极呵！但是，你们提出这样一张紧迫的时间表，并不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是你们阴谋加快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骤。

你们早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就背着我们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你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我们的信件中透露，你们在那封反华信件中，号召对我们实行



“反击”，并且要“采取集体措施”。你們在今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决定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这就是說，你們已經把子彈推上了枪膛，准备发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們提出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会談以“尽快地調整現存的分歧”，难道不是十足的伪善嗎？

我們要問一問苏共同志：你們为什么那么急呢？你們是不是准备，在我們不同意你們在今年五月間举行中苏两党会談的时候，就以此为借口，悍然片面召开国际會議，实行公开决裂呢？

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立場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們始終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和恢复团结而努力。我們也清楚地知道，目前我們同你們之間的分歧，是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严重分歧。这个分歧，始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又进一步加剧了。对于这样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原則分歧，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这里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提出今年十月繼續举行中苏两党会談，当时的主要考虑是要留下七个月的时间，作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例如，我們要得到你們今年二月十二日給兄弟党的信件，了解它的内容；我們要領教領教你們揚言要使用的法宝，也就是什么“公开闡明观点”、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什么“最坚决的回击”、什么“集体措施”等等；我們要對你們的攻击进行答辯，并且要對你們新使出来的法宝作出反应。这些都需要时间。

遺憾的是，直到現在，虽然我們一再請求，你們仍然毫无道理地拒絕把你們今年二月十二日給兄弟党的信件給我們。要知道，那是一封攻击我們的信件，很多兄弟党都給了，为什么偏偏不給我們呢？我們有权利要求你們送給我們。現在，我們再一次請求你們把这封信送給我們，如果不給，一万年我們也要坚持这一請求。

至于你們的法宝，从今年四月三日起，你們总算拋出一点来了。看来，你們正在勁头上，似乎还有許多話要說。但是，直到現在，我們还不知道你們究竟还有些什么法宝，还不知道你們的“最坚决的回击”啦、“集体措施”啦究竟是什么。

請問，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談和各兄弟党国际會議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話好說呢？还不是吵架一場，无結果而散嗎？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嗎？难道你們决心要公开分裂嗎？

同志們，我們是反对分裂的。在你們揚言要拋出的法宝統統都拋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論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談和兄弟党国际會議只能导致分裂，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什么时候举行，这要看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参加这个筹备会议的成员，可以同各兄弟党协商确定，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提议的十七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兄弟党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我们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你们来信提出的把筹备会议的成员从十七国兄弟党扩大为二十六国兄弟党的建议。因为现在的情况同一九六〇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你们提出的名单中，有些国家就有两个党。例如在澳大利亚，就有一个以希尔为代表的党，还有一个以夏基为代表的党。前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后者是修正主义的党。在巴西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究竟由哪一个党参加，我们同你们显然是有分歧的。又例如在印度，丹吉集团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请问，怎么能够让丹吉叛徒集团参加兄弟党会议呢？如果要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正在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兄弟党。

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而绝不应当成为一次分裂的大会。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匆忙召开。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也是全世界许多兄弟党，包括一些同我们存在着思想分歧的兄弟党的共同态度。这个态度，过去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中，就曾经赞成要创造条件，使这个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决裂，你们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我们劝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



主义和分裂主义錯誤路綫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議，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話，那么，你們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責的地位，你們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責任，而把你們标榜的所謂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們願意干这种事嗎？你們願意走这样的絕路嗎？我們現在把这种誠心誠意，利害昭然的話讲在这里，勿謂言之不預也。

我們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議，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举行中苏两党会談，以及其他兄弟党的双边或多边的会談，举行兄弟党的筹备会議并达成一致的協議，等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准备工作，也許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我們的这些意見，是从深切关怀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出发的。我們希望，这些意見能够得到你們严肃的认真的考虑。

我們还請你們再一次考虑我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給你們的信件中提出的建議，即：中苏两党訂立一个协定，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評自己和自己批評对方的已經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虽然你們在今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中拒絕了我們的这个建議，但是，你們並沒有說出任何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你們片面地发表許多誣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論，但又不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看到我們的答辯文章，不讓他們了解我們的真正立場和观点，这才是蓄意煽动中苏两国人民的不和。如果你們真正相信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真正相信你們自己，那么，你們就沒有任何理由不同我們就这个问题达成協議。

你們今年二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和《真理报》今年四月三日的社論歪曲地透露了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中央內部交換信件的情况，企图欺騙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騙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为了澄清事实，說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換的信件，即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七日的信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五月七日的信件。我們希望你們也能够采取和我們同样的措施，在自己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 二十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們从許多方面获悉，苏共中央在最近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这封信，歪曲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論战的真相，制造謠言誣蔑中国共产党，并且进行煽动，要开展一个所謂“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別、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这封信沒有送給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保密。

必須严重指出的是，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爭論，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張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別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你們这种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完全破坏了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

你們发动这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的新的借口是，中共对于你們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还没有答复。但是，請問：为什么过去你



們对于别的兄弟党，劝你們不要把兄弟党内部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和停止公开論战的建議，可以长期拒不接受，一意孤行地自行其是，而中共就必须对苏共领导的来信奉为上帝旨意，必須迅速作肯定答复，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呢？为什么你們可以对我們发表数以千計的連篇累牘的攻击，而我們却不能弄清事实，辨明是非的答复呢？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問題是要一个一个解决的。你們的信，我們总是要答复的。你們說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們的頑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

这次苏共领导进行的制造分裂的严重行为，又一次暴露了你們一直搞的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的一貫立場是，坚决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并且坚持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维护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我們的这个立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們只服从真理，决不会拿原則做交易。

中共中央已在二月十八日下午，派政治局委員、書記处書記彭真同志，把我們的意見口头通知了苏联駐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我們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給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交給我們。我們將研究你們这封信之后，作出我們的答复。

此 致
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二月二十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你们这封信的特点，就是用满纸的谩骂，什么“不体面的”呀，“嫁祸于人的笨拙企图”呀，“粗暴的”呀，“可笑的”呀，来迴避我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给你们信件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实在不成样子。

你们骂我们是“贼喊捉贼”，其实，这一次，正是你们的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分裂活动，被当场捉住，而且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因而才真是要用贼喊捉贼的伎俩，转移目标，蒙混过关。可是，不管你们怎样支吾其词，强词夺理，赖是赖不掉的：第一，你们确实背着我们，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专门反对中共的信件。第二，你们确实背着我们，要采取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所谓“集体措施”，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在二月二十日的信件中，就指出你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采取“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你们有“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你们的这封来信，证实了我们对你们的批评是完全合乎事实的，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改善关系，维护团结吗？如果真有这种愿望，那么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还是老老实实的好。这是唯一的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别的诀窍是没有的。

你们的来信，居然在一开始就说，对于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有权利根本不回答”；而你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我们已经一再说明，总是要答复的，不过因为对你们大量的攻击还没有答复完，劝你们不必着急，你们就勃然大怒，好像我们犯了大罪。请你们平心静气想一想，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兄弟党吗？

你们不但不根据列宁的教导，以郑重的态度，检查自己的错误，公开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却反咬一口，抹煞事实，颠倒黑白，诬蔑我们进行派别活动。你们甚至扯出一九六〇



年六月的貝利紹娃事件，作为一个了不起的证据。可是，你們正好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我們同兄弟党的負責同志交換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見，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正常的，无可非議的。而你們在貝利紹娃問題上所作的勾当，却是見不得人的。你們把貝利紹娃作为顛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領導，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工具。阿尔巴尼亚同志已經揭露了你們的这个阴謀，正确地处理了貝利紹娃的問題。

如果說到“最真正反对另一个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別活动”，恰恰是苏共領導自己。早在貝利紹娃事件之前五个月，即一九六〇年一月，你們就派米高揚同志会見阿尔巴尼亚領導同志，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談中，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卡博同志当着赫魯曉夫同志的面，指出了你們这种幕后的派別活动的事实。

你們在来信中还摆出“威武一时的騎士”的架势，說是要“公布文件”，要“公开闡明自己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你們还宣布要對我們进行“最坚决的回击”。其实，你們的这类把戏，玩得还少嗎？你們透露的东西还能算少嗎？要列举的話，我們可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实中，举出很多。这是你們自己很清楚的，不必我們多費笔墨了。現在你們又放这种空炮，老实說，它只有可能吓唬那些神經衰弱的人。在我們看来，你們这样装腔作势，不过是紙老虎，是銀样鐵枪头。你們的百宝囊中的所有法宝，什么“最坚决的回击”呀，“公开闡明观点”呀，什么对中共的“集体措施”呀，这样那样的文件和材料呀，还是統統公开拿出来，讓我們見識見識的好！

如果你們不怕真理，不怕群众，并且相信苏共黨員和苏联人民是有政治水平的，是有辨別是非能力的，而不是把他們看作阿斗，那么，我們建議两党訂立一个协定，双方在各自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評自己和自己批評对方的已經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

你們說，我們犯了一个錯誤：我們“要求”你們，而不是“請求”你們把二月十二日的信件送給我們。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詞儿的习惯用法，並沒有像你們所說的那樣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們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你們二月十二日那封反对中共的信件交給我們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我們現在遵从你們的意思，請求你們把你們二月十二日发給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也发給我們，是为至盼。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二月二十九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这封信给你们，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从来把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

各国共产党人的联合，不是俱乐部式的联合，而是以共同的理论为指南、为共同的理想而战斗的革命的联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只能以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

我们同苏共领导之间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的问题。要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加强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必须解决这一系列的原则问题。

我们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給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我们在此前后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中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完全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

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就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意见。

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经过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解决以前，应当维持边界的现状。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双方在边界上本来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

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



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撥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誘騙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中国的邻国，只有苏共领导和印度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故意制造同中国的边界纠纷。中国政府不仅同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邻国，而且同印度以外的民族主义国家，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等邻国，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

我们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谈判。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苏联政府进行友好的谈判。如果苏联方面也能采取和中国政府同样的态度，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中苏边界是可以真正成为永远友好的边界的。

● 第二，关于援助问题

我们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我们从来认为，苏联人民的友好援助，对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有益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过感谢。

近年来，苏共领导惯常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最近，在今年二月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十四周年的时候，你们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宣传机器，又在这个问题上大吹大擂。我们至今还没有在报纸上系统地公开答复你们。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谁也不能认为，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例如：

到一九六二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大豆五百七十六万吨，大米二百九十四万吨，食用植物油一百零九万吨，肉类九十万

吨，等等。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锂砂十万吨，钹砂三万四千吨，硼砂五万一千吨，钨砂二十七万吨，压电石英三十二点九吨，水



銀七千七百三十吨，鋇錳砂三十九吨，鉬砂三万七千吨，錫十八万吨，等等。这些矿产品中，有許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軍事物資的。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朝鮮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負担最重，損失最大。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也承担了重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軍事費用。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长时期来，我們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貸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額。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无偿援助。

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

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終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絕大多数苏联专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有帮助的。我們对他們的辛勤劳动，一向給予很高的评价。我們至今还是怀念着他們。

你們应当記得，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們曾經郑重表示，願意挽留苏联专家繼續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

但是，你們却不顧我們的反对，背棄了国际关系的准則，在一个月的短时期内，悍然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毀了三百四十三個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廢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項目。

你們清楚地知道，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經濟、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門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設計、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試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們强迫苏联专家中断自己的工作，撤回苏联，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学研究項目被迫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你們这种背信棄义的行动，破坏了我国国民經济的原定計劃，給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們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驟，完全違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你們的行为，充分說明了你們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援助的原則，把派遣专家当作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它們的内政，限制和破坏它們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工具。

現在，你們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問題。坦白地說，中国人民信不过你們。中国人民剛剛治愈了你們撤退专家所造成的創伤。往事記憶犹新。在苏共领导采取反华政策的情况下，我們不願意上当了。



我們认为，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应当根据真正平等的、互不干涉內政的、相互援助的、国际主义的原則，来处理派遣专家的問題。一切关于派遣专家的協議和合同，絕不允許片面地廢止和破坏。如果違反的話，应当按照国际慣例，賠償对方的損失。只有这样，中苏两国之間，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之間，才能平等互利地相互派遣专家。

順便說一說，我們从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互相援助的国际主义原則出发，很关切苏联現在的經濟情况。如果你們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給你們以帮助的話，我們將乐于这样做。

第四，关于中苏貿易問題

近几年来中苏之間貿易額縮減的真正原因，你們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們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結果。

你們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許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設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口成套設備的需要。試問，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們买下这些东西擱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嗎？

何况，你們从一九六〇年起，在經濟和貿易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实行限制和歧視政策，在两国經濟和貿易談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者拒絕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資。我們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資，你們就大量給我們；我們很需要的物資，你們就卡住不給或者很少給我們。几年来，你們也利用两国的貿易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这怎么会不影响两国貿易額的縮減呢？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国連續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災害，我国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向你們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造成的。你們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攻击，責怪我国縮減貿易額，是毫无道理的。

老实說，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努力，中苏貿易額还要縮減得更多。就以今年而論，中国方面已經提出一个从苏联进口二亿二千万新卢布、向苏联出口四亿二千万新卢布的貨单。但是，你們一直采取无理的拖延态度，一面繼續把我們需要的貨物卡住不放，一面又想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硬塞給我們。你們在来信中說，“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們感到兴趣的商品”，但是，你們的言行是不相符合的。

你們經常攻击我們“单干”，而吹嘘你們自己是主張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經濟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們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們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經濟。

你們欺負經濟比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們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們永远处于农业



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你们欺负工业比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们还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你们公然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中苏两国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

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我们过去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你们硬要把它公开化。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你们破坏了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把公开论战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说这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的。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了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在这场大论战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感到兴趣的人们，觉悟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亮，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公开论战的结果，走向了你们原来愿望的反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指挥棒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这样，它就必然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历次大论战一样，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序幕。

当你们要发动公开论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时候，你们就说这种公开论战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是“有利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而当你们在公开论战中越来越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你们又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停止公开论战是“最明智的”，“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你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原则性呢？你们究竟叫人相信你们的哪一套呢？又叫人服从你们的哪一套呢？

讲到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看来你们是忘记了，越南劳动党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就提出



来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議。我們当时就响应了这些建議。但是，你們却把这些建議当做耳边風，不但沒有停止，而且不断扩大了公开論战。为什么你們一提出这个問題，別人就必须立刻接受呢？

看来你們又忘記了，我們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給你們的信件中提出，停止公开爭論問題，“需要我們兩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討論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協議”。可是，你們一直不理會我們的建議。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在中苏兩党會談結束的時候，我們又主張在會談公報中，写上“我們兩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論战的協議”。我們的建議，再一次遭到你們的拒絕。

你們的來信說，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之間有分歧的問題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熾烈的激情冷靜下去，讓時間去檢驗”。看来你們又是忘記了，早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日，我們在二十六个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員會上的書面發言中就指出：“有些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問題，留下来比勉强解决要好……時間会幫助我們消除分歧”。我們的这个意見，当时遭到你們的断然拒絕。你們在一九六〇年各国兄弟党會議期間散发的十一月五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中說，“如果我們要等待‘历史的判決’，……那么，我們就要犯下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惨重后果的严重錯誤”。你們在这个問題上，現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忽然說什么要把分歧放一放。你們的居心何在呢？老实說，你們不过是想在大罵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后，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剝夺我們答辯的权利。

你們不顧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当中苏兩党正在莫斯科舉行會談的時候，为了討好美帝国主义，同它达成壟断核武器的協議，竟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你們发动了空前規模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報刊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到十月底就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統一社会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領導，在你們的影响下，也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們來信說，“分歧和尖銳的論战給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損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請問：你們不觉得应当責备責备自己，应当反省反省，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多次发动这样大規模的誣蔑攻击呢？

你們來信又說，应当考虑其他兄弟党的困难。对于其他兄弟党的各种困难，我們历来是充分关心的。我們曾經多次劝苏共領導不要把爭論公开化，也正是为了照顾其他兄弟党的困难。但是，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例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士、丹麦、芬兰、瑞典、奥地利、西德、希腊、葡萄牙、英国、美国、加拿大、智



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巴拉圭、烏拉圭、澳大利亞、錫蘭、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的黨的領導，以及印度無產階級的叛徒丹吉集團等，在他們追隨蘇共領導的時候，發表許多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文章，有的還通過決議，發表公開聲明，發表告黨員書，甚至在自己的黨內，不擇手段地打擊和開除那些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的同志。在他們這樣幹的時候，考慮過自己有什麼困難嗎？在你們支持他們這樣幹的時候，考慮過他們有什麼困難嗎？

這些兄弟黨攻擊我們的文章和材料，是那樣多，但是，我們一直保持很克制的態度。我們除了曾經答復過法共、意共和美共領導的一部分攻擊以外，其餘的都沒有答復。我們只保留答復的權利。我們並沒有擾亂他們，怎麼會給他們造成困難呢？他們如果有困難的話，那也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就是在你們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來信以後，你們和你們的追隨者的反華宣傳也一直沒有停止過。你們《真理報》的《為什麼要迷惑人》、《蘇中條約十四年》，《消息報》的《重要文件》，《在國外》雜誌的《世界一周》等等文章和材料，都是指名攻擊我們的。最近，你們還出版了《政治問題講話》、《我們列寧主義的政黨》、《使大氣層……健康化的條約》、《關於黨的列寧主義學說和現代共產主義運動》、《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和對外政策》等等反華書籍，全面地、集中地攻擊中國共產黨。你們還利用自己的駐外使館和國際群眾團體中的代表散發攻擊中國的小冊子。至於你們的追隨者在這個時候所發表的文章和材料，我們在這裡就不多讲了。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後，你們還在世界和平理事會華沙會議上，在世界工聯執行局布拉格會議上，在國際民主婦聯執行局柏林會議上，在國際學聯執委會布達佩斯會議上，以及在其他一系列的國際會議上，都提出了尖銳的爭論性問題，挑起了爭論。當我們同其他國家的代表一起，在這些會議上，積極促進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的鬥爭，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號召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的時候，你們却在那裡，硬要通过支持聯美反華的三國條約的決議，贊美美帝國主義，製造分裂。

所有這一切，完全證明了：你們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你們叫嚷的停止公開爭論，完全是假的，是騙人的。

你們發表了那麼許多反華文章和材料，我們到現在為止，才發表了七篇答復你們公開信的文章。我們對你們在公開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沒有答復完，對你們在其他反華文章中提出來的問題還沒有答復。我們的文章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怎麼能夠說，是“動搖着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人民的友誼和團結”，“削弱着反帝戰綫”呢？用你們所說的這些話來評價你們的大量的、不講道理的、造謠誣蔑的東西，不是正巧合適嗎？

你們用一切惡毒的語言來攻擊中國共產黨，給我們扣了一大堆帽子：什麼“教條主義”，



“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新冒出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有战争瘾”，“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等等，总之，在你们的口中，中国共产党肯定地百分之百地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那么，请问：你们这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好人，怎么能够同被你们当做比敌人还可恨的坏人讲团结呢？你们究竟准备怎样收场呢？你们是准备自己站出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你们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都是造谣诬蔑，把你们扣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帽子一律作废；还是要我们承认你们的判决书，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向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呢？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要不要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问题。例如，

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宰吗？

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利益，究竟是应当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美苏合作？

当印度反动派进攻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谴责印度反动派的挑衅，还是用军火援助印度反动派去打苏联人民的兄弟？

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究竟是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究竟是积极支持，还是不准他们革命，反对他们革命？

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赌棍？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等等。

这些问题，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必须弄个一清二白。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马马虎虎地混过去呢？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没有区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托洛茨基主义就没有区别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你们现在经常拿“最坚决的回击”来吓人。其实你们所玩的硬的、软的、苦的、甜的各种把戏，人们都领教得够了。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军事、经济、政治压力，断绝邦交，撕毁协定，断绝贸易，是你们干的。对中国毁合同，撤专家，断援助，搞颠覆，也是你们干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既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低头，拿原则做买卖。如果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发动什么像样的“最坚决的回击”，什么“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呀，什么采取“集体措施”呀，什么别的东西呀，那么，就请按照你们要做的做吧！

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竭尽自己的努力。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提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以来，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公开阐明了他们对已经展开的争论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所持的立场。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对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本论点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我们不隐瞒，我们同许多兄弟党一样，不论他们所持的立场如何，都对下一事实感到严重的忧虑：已经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加深，争论问题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尖锐的公开论战采取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相互关系所不允许的形式。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兄弟党的力量和注意力不能集中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不能集中去进行反帝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而且再一次重申，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正在拆散共产党人的力量，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力图利用矛盾来投机，利用现有的困难来达到他们的反共目的。

当然，像领导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的苏共和中共这样的党，就是在论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也能工作。我们同意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两党来讲，正如你们对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所说的那样，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害。我们也没有权利不去考虑那些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进行反帝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这些党公正地认为，他们既需要同苏共友好，也需要同中共友好。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中吸取力量去克服困难。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求行动的一致。他们是对的，因为行动不一致，我们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将会困难许多倍。

在目前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是，防止事态不适宜地发展下去，使它从危险的界线转向正常化，加强所有兄弟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团结。现在，列宁的下列指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现实：每一个党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负的崇高的责任，都应该准备好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苏联共产党坚定地遵循体现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一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尽自己之所能来加强团结。

当然，我们了解，为了消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产生的困难，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作出重大努力。在这封信里，我们想谈谈关于我们两党对解决这一任务可能作出的贡献的一些想法。

我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尽管存在着严重分歧，对于改善苏共和中共之间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讲，仍然有着客观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在支持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在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任务。

不能不看到，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我们在下述一些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有着客观上的共同性，如：阶级斗争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胜利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正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表明，是为了粉碎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反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势力。虽然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我们同你们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深信，如果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棄一切非固有的、偶然的東西，那么就会发现不仅可以保持而且可以发展和加强我们在许多方面合作的广泛的可能性。

现在，当苏共和中共以及其他兄弟党，都已阐明了各自对争论问题的观点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熾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我们相信，生活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我们可以在具备有利条件的领域中发展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对苏联和中国，而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具体地说，尽管存在分歧，我们建议以下述一点作为我们相互关系的中心：发展合作，以利于加强苏中两国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协调在各种国际团体中的行动，以利于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

在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方面，有着特别巨大的可能性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联系。



在这封信里，我們願意提出一些实际建議，实现这些建議会有助于加强我們两国之間的友誼的事业。

苏共中央期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将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具体步骤，特别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在他不久前同外国活动家和报界代表的談話中，曾經表示中国願意发展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表示中国对发展貿易和其他經濟联系很感兴趣，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和平共处五項原則。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說，中国方面将防止帝国主义利用現有分歧来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結的企图。这种看法是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多次声明相吻合的。

因为双方都感兴趣，可以作出結論：現在就已經可以談談調整苏中合作的具体步骤了。

例如，在最近即可着手制定中苏之間共同商定的初步換貨計劃。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們感到兴趣的商品，也可以增加从中国进口我們两国經濟都感到兴趣的商品。

大家知道，按照我們两国政府簽訂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議定书的規定，明年就應該恢复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成套設備的談判，这些成套設備的制造曾經根据中国方面的請求延緩了两年。如果你們方面有兴趣，我們认为，可以商談在建設工业企业方面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技术协助，例如可以討論在对我們两国都有利的条件下协助发展石油工业、建設采矿工业以及其他部門的企业的可能性。

我們再一次重申，如果你們认为必要的話，我們願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苏联专家。

目前，苏联正在編制一九六六到一九七〇年的五年計劃。中国也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計劃。因此，現在就来討論发展我們两国間的貿易关系和其他联系的可能性，并且为此在两国的国民經济計劃中規定相应的措施是适宜的。当然，加强苏中两国的合作这件好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为迟，但是最好現在就来着手进行。

毫无疑问，我們两国都会从扩大科学技术合作，以及从发展多方面的文化联系中得到好处。我們认为，这些問題可以成为苏中两国的有关机关之間彼此商討和談判的对象。在提出这些建議时，我們自然准备认真研究你們对于扩大苏中两国間的經濟、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的一切意見。我們当然注意到，如果你們认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联系和合作才能得到发展。我們方面确信，这无论对中国或苏联来讲都是互利的。

大家清楚地知道，經濟联系是各国人民都特别关心的一种合作。甚至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关系來說，經濟联系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联系为实现和平共处原則創造有利的条件，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因社会制度相同和目标一致而联結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各国更需要广泛的經濟联系。这种联系是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是利用社会主义国际



分工的优越性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加强兄弟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有助于联合一切革命的反帝力量。发展这种合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苏联都有好处，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好处。

当然，我们了解，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除了该国人民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在该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同样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并且会加快每个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将有助于加快苏中两国的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有助于为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对于发展苏中两国的合作，有着极其有利的前提。我们两国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大家清楚地知道，苏中经济合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以及对苏联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多么良好的影响。所以，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近几年来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越来越缩减了。

经验表明，贸易、经济和其他联系的发展会改善相互关系中的气氛，有助于解决其他一些决定我们两国关系的问题。很遗憾，这样的问题是有的，需要加以解决。

你们大概会同意，近几年来苏中边界某些地段上形成的局势不能认为是正常的。苏联政府已经建议就核定某些地段的边界线进行友好协商，认为这样作的结果会消除引起目前误会的原因。最近你们也表示要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将向你们发出有关文件。

近来中国出现了一些关于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言论。当然，我们不去为那些专横地划定同邻国的边界的俄国沙皇辩护。我们也相信，你们也不打算为那些以武力侵占了不少别国领土的中国皇帝辩护。但是，我们在谴责俄国和中国当时执政的剥削阶级上层的反动行为时，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现在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边界。任何忽视这一点的企图，都会成为误会和冲突的根源，而且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现在，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而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共产主义，它将使国界逐渐失去从前的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为地制造领土问题，简直是不明智的。我们有一切可能完全消除边界上的任何磨擦，给各国人民做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友好关系的范例。

我们也应该创造有利于改善党的关系的条件，避免可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更加严重的一切。我们清楚地了解，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重大的努力和时间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在这方面一步一步地前进，对在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表现出列宁式的关怀，不允许能够破坏团结的任何行动，给派别分子和分裂主义者以反击。



在我们看来，甚至在目前的复杂情况下，也有可能不使已经扩大的论战发展得不可控制，使事态向加强中共和苏共之间以及所有兄弟党之间的团结一致的方向发展。苏共中央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停止公开论战。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一月七日我们又重申了这一建议。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在这封信里，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停止公开论战以及其他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行动。我们不是建议根本停止就世界发展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意见交换应该采取一九六〇年兄弟党声明所规定的形式，即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

苏共中央提出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这些建议将有助于加强信任，有助于为准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近，苏共和中共也同许多其他兄弟党一样，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举行这种会议。现在，我们仍然重申自己的这一立场。同时，我们要再三强调，所有党的义务是，促进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这就是我们关于为了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一些想法。

请你们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写这封信完全是出于关心加强团结。我们对这些或那些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对社会发展中的个别现象的评价可以有分歧，而生活会纠正那些犯错误的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共产党人的崇高义务——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反对资本的整个战线。各国人民信任共产党人。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信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加强合作扫清道路，并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苏共、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友好的感情，愿意加强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情谊。苏共中央决心尽一切可能使事态好转，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苏共一贯遵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坚决维护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我们的列宁的党正在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为和平、民主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整个反帝革命战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斗争，这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苏共中央呼吁中共中央从自己方面采取实际步骤，以便在争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兄弟党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尼·赫鲁晓夫（签字）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二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的信。

你们在这封信中对苏联共产党采用的粗暴的语调和不体面的侮辱性的手法，使我们在道义上有权利根本不回答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仍然认为回答你们是适宜的，那么，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杜绝进行任何投机的可能性和杜绝把不明真相者引入迷途的企图。

你们对于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给许多兄弟党的信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事，装模作样地表示愤怒，并且几乎把这描写成好像是企图向你们隐瞒这封信的内容，说成是“苏共的宗派主义的”和“派别的活动”。

事实真相如何呢？我们没有把今年二月十二日的信给你们，这并非偶然。仅在最近几个月中，苏共中央就不止一次地向中共领导提出口头的和书面的建议：采取共同措施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不认为有必要答复我们的建议。你们对苏共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提出的关于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议置之不理。你们没有回答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这封信中包含着消除现有分歧的具体行动纲领。苏共领导人通过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刘晓同志和潘自力同志向中共领导不止一次提出的口头呼吁，也同样没有得到回答。

如果你们愿意阅读上述文件和材料，那就会很容易确信，在这些文件和材料中所谈的问题，正是苏共中央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致兄弟党信中扼要阐述的问题。

你们没有回答我们的信件，同时却展开了一个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大规模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中急剧地加强了分裂主义的派别活动。《人民日报》在今年二月四日的文章中，公开号召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表明中共领导不愿意回答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信中包含的积极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并且希望阐明自己的受到中国报刊诬蔑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中央二月全会上审议这个问题，然后公



开闡明自己的观点。苏共中央决定把这个情况通知給兄弟党。

我們当时应该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們的建議沒有得到中共領導人的任何肯定的反应，中共領導人繼續加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針的进攻，扩大分裂活动。我們声明說：我們同意所有真正站在宣言和声明立場上的兄弟党的意見，即必須給予分裂主义者以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来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基础上的团结。我們曾再一次表示，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是适宜的，关于这点，你們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說过。

我們的信譴責了中共領導要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拥有特殊政綱的派別集团的意图。

这就是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信中所談的問題。

我們对于在二月十二日信中談到的所有問題的原則性的立場，在我們向兄弟党发出这一呼吁很久以前你們就已經知道了。在給他們写这封信以前，我們不止一次地試圖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討論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問題，而所有这些試圖都沒有結果，这并不是我們的过錯。既然你們頑固地不答复我們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說成是我們軟弱的表現，那么二月十二日的信給你們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沒有益处的。

在这一切以后，你們声明說，似乎苏共“背着中国共产党”“在策动反对中共的新的运动”，实行“两面派的做法”……“进行分裂活动”，这只能使人惊奇。不难看出，中共領導竭力誇張今年二月十二日的信这件事和歪曲苏共中央这一步驟的真正意义，又是一个嫁禍于人的笨拙企图，即企图把完全由于中共領導的过錯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的責任轉嫁給苏共。

正如我們民間所說的，这意味着使用众所周知的“賊喊捉賊”的手法。

如果要寻找真正的两面派和“背着兄弟党”进行活动的分裂主义分子，那么应当說是那些許多年来进行派別活动的人，应当到那些公开論证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是必要的，甚至宣称分裂是“合乎規律”的人那里去寻找。例如，有这样一个事实：还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刘少奇同志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談話中就誹謗苏共，故意歪曲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企图唆使阿尔巴尼亚的活动家反对苏共。中国領導的这种行动，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成員的理所当然的憤慨，他們向中国同志公开声明了这一点，并告知了苏共中央。

这正是最真正的反对另一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別活动。

可以举出无数事实，而且如果需要，可以公布文件，来揭露中共領導几年来进行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幕后活动。关于这一点，兄弟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和莫斯科會議上已經向你們直接談过。

至于苏共，那么我們不向任何一个兄弟党，其中也包括中共，隱瞞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我們不止一次地向中共代表解釋了我們对所有重要問題的观点和立場。

苏共中央行使了任何共产党都享有的权利——就这些或那些它所关心的問題进行协商的



权利。尽管你们在二月四日的文章中对我党及其领导进行了荒谬的毁谤，但是苏共中央不受这种挑拨，没有走上“针锋相对”的对骂的道路。我们认为对你们的分裂活动必须给予反击，所以决定通过党的途径再一次同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商量，让它们知道我们预计采取的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步骤。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间相互关系的原則和准则的。

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给兄弟党去信，是出于我们党对消除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不正常情况的深切关怀。这样做反映了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利益。

至于你们玩弄像“大国主义习气”、“唯我独尊”、“蛮横无理”、“老子党的恶习”、“上帝旨意”等等字眼的企图，那我们应当告诉你们，采用这样的说法只能证明你们立场的软弱，证明你们希望以这种方法来掩饰你们自己的、企图加在我们头上的行为。

四年来，全世界的兄弟党都在呼吁中共中央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对待事物，放棄把自己錯誤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但是中共领导不仅不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且抱着越来越大的野心把自己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唯一继承者，装成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高法官。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中共领导企图指使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什么时候应当开始革命和通过什么道路实现革命。正是中共领导作出了不得上诉的判决：哪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不是。正是中共领导给许多党戴上“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帽子，并且喜欢谁就称他们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其他人就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者”。

你们的大国主义习气还表露在你们最近的这封不长的信中：你们要求苏共中央将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送给你们。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请问，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难道你们以为，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即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这令人看来不仅是粗暴的，而且简直是可笑的。

你们的信和信中故意使用的粗暴腔调，使我们再一次考虑：发出这封信的目的何在？要知道，谁也不会相信，发出这封不体面的信，是像你们为了欺騙本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无休止地向他们說的那样，为的是巩固同苏共的友谊。任何人读了这封信都会看到，这封信旨在加深分歧，加剧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

如果中共领导人真的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错误道路，停止分裂活动，同世界所有兄弟党站到同一个行列中来。

苏共中央永远愿意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我们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表示愿意继续为同中共的



关系正常化做出努力。

苏共中央表示坚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克服现存的困难，将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将在争取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此致

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来信。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应当坦率地对你们说，你们的信使我们感到很惊奇。在信里，你们又慷慨地使用了诸如“分裂主义分子”、“派别分子”、“宗派分子”之类的词汇，企图借助这些词指责我们党进行什么反对中共的幕后活动。

近来，你们越来越经常地企图把产生分歧和斗争尖锐化的过错加在苏共身上。所有这些企图的用意，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清楚的。这就是：你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加剧分歧。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声明，我们对既成的局面不负任何责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过去和现在都竭尽全力，以便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苏共中央对你们党的态度，从来都是从不让分歧加深这一点出发的。最初我们认为，几年前产生的分歧是偶然的。不愿意相信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同志在我们背后进行活动并执行一条使斗争尖锐化的路线的情报。我们始终力求使我们的关系成为最兄弟般的、最可以信任的关系。

苏共中央很好地理解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



的意义；它們之間的关系，應該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基础上。我們不止一次地給你們写信，并且不止一次地向你們表示，就像我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駐苏联大使刘曉同志一九六二年十月离开莫斯科时所表示的那样，我們真誠地期望使苏共和中共的友誼能像一九五八年以前那样好。这是我們最热烈的願望。但是很遺憾，現在我們看到，这些希望並沒有实现。

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建議加强公开論战。你們建議簽訂一个关于双方都发表相互批評的材料的规定，实际上是想使两党的論战把我們两国人民也席卷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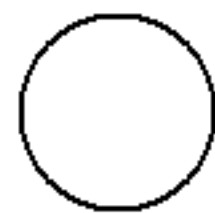
同志們，你們應該理解，如果发表你們的文章，而在这些文章中有那么多不公正的論断，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有那么多的誣蔑，直到硬說在苏联发生“資本主义复辟”，說它已經“同美帝国主义勾結”，那么，所有这些只会引起苏联人的理所当然的憤慨。自然，苏联报刊不会对这些攻击不作回答。这样就不是沿着加强苏中两国偉大人民的友誼的路綫前进，而是沿着煽动他們不和睦、不信任、不友好的路綫前进。

要知道，你們所进行的論战，早已超出了思想爭論的范围，已經被你們变成了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工具。你們大肆誣蔑我們党和我們国家，你們实质上是采取那些企图把人民同党分开、把党同领导分开的苏維埃国家的敌人所采取的策略。这种行动是不能允許的，而同这种行动相联系的打算簡直是幼稚的。你們对拥有同托洛茨基分子、同右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經驗，拥有同国外敌人作斗争的經驗的苏共的攻击，只能促进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团結在自己战斗的共产主义先鋒队的周围。

我們在向党說出你們的破坏活动真相的时候，从来都保持着克制，采用平靜的語調，不允許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任何侮辱。現在，請你們想一想，假如我們也走上你們的道路，用你們罵我們的話来回答你們，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那結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我們走上这条道路，那我們还成其为什么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还成其为什么負有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任务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信徒呢？共产主义不是煽起民族間的敌視，相反，是不分民族、肤色和語言把它們团結在一个兄弟的家庭里，为反对剝削者、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苏共中央正是根据这些考虑，才在自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再次建議停止公开論战，并且提出了改善苏中关系、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設性綱領。同时，在苏联报纸杂志上已經停止发表論战性的材料。所有兄弟党都把这些行动看做是苏共善意的表現，并且期待中共领导支持我們的倡議。

令人遺憾的是，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們有意拖延對我們信件的正式回答，实际上你們是用加剧論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誹謗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們的信。这个运动在《人民日报》和《紅旗》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的文章



中达到了极点。在这篇文章中，苏联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被宣布为人民中国的“主要敌人”，文章中包含着对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不能容许的诽谤。二月四日的文章企图为分裂活动制造某种理论基础，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宣布为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个可耻的文件也和其他类似的材料一样，大量散发，并用俄语和其他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应当说出中国领导的言论和真正做法的全部真相，以便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和衡量既成的局面，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在讨论了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进行的斗争的问题以后，有六千名党的积极分子出席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一致赞同了中央主席团的路线。

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相互关系的原則，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义务通知兄弟党：我们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全会的有关材料，对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给予回击。

完全可以理解，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没有好处的，即使是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中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早在此信之前我们没有向中共领导谈过的东西。然而，你们却决定利用这封信作为指责苏共进行“幕后”“反华”活动的借口。首先应该问一问：难道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没有权力给它认为需要写信的人写信吗？难道我们要求中共中央就它的信件来往提出报告了吗？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我们已经向你们说过，这种指责，特别是来自几年来真地进行反对兄弟党的幕后颠覆活动的人的这种指责，是何等荒诞无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中共中央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策动建立反党分裂集团，企图把他们联合起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

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寄给它。当我们有礼貌地解释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应当允许自己使用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的语言同另一个党谈话的时候，你们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这两词之间似乎没有差别。

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常有这样的事，同一个词，却可以谱出完全不同的曲。顺便说一下，当人们想要用“请求”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中文里也找到了这个词吗。我们希望，最后通牒式的话语，今后能够从我们的关系中永远排除出去。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兄弟党呢？为什么你们二月二十七日来信以及在此以前的各次来信，都使用了极为粗暴的放肆的口气，满篇都是谩骂和侮辱人的词句呢？莫非是为了激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原则性的思想立场和共产主义立场而“在井边上互相对骂”吗？看



来，你们的意图正是如此。

你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直披着主持平等的“骑士”的外衣，同时却要使别人相信，似乎苏共硬要充当“老子党”。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由于他在我们党内和对于兄弟党滥用权柄，消灭了那些持有己见的人们，他丧失了人们的信任，毁掉了自己的威信。在战时和战后，看来，斯大林自己也感到，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各国党了。这也是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之一。

我们党在斯大林死后老老实实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一切做了分析，采取了措施来纠正既成的局面。苏共中央主动地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恢复了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平等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我们从过去驻有我们军队的国家，包括从旅顺，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取消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合营经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提醒以下一点并非多余：过去中共中央曾经完全赞同我党的这些步骤，并且给了高度评价。

我们现在仍然站在这些立场上。现在，局势已经不是，比如说，一九一九年那样了：现在列宁已经不在，而且现在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家庭。无视别人的意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且给所有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戴帽子，这种企图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效果。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然呼吁你们反复地考虑考虑自己的立场，好好地权衡一下，这种立场会把你们引到何处。正是因为如此，尽管你们不间断地攻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耐心，愿意尽一切努力，使局势正常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下述观点：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利益，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现在最好是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我们再一次建议，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从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出发，在兄弟党的会谈中，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讨论争论问题。在讨论中，要有分寸，不失尊严，要懂得自己的行动的全部责任，以便使争论不至导致分裂，不给最神圣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弗·伊·列宁的遗训，他告诫说，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和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列宁说：“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就会使共产党人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这已经成了同我们敌对的世界的口号。这一点我们丝毫不应当忘记。”（列宁全集，中文版，三十二卷，一五八页）

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共产党人国际队伍团结的加强，那么你们早就应该接受我们的建议，倾听理智的呼声，考虑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意见。你们越是顽强地硬要加剧论战，进



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一切进步力量就有越多的根据确信，中共中央遵循的絕不是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是被不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自私利益。

我們本来可以逐条地駁倒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信中随意提出的对苏共的誣蔑指責，但是我們不认为現在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你們不願意认真地探討問題的实质，相反地你們只是把一堆一堆的誹謗傾加在我們党的身上。这样我們列举論据还有什么用呢？

我們不上任何挑衅的当，我們將同全世界共产党人在一个家庭中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苏共中央再一次表示，它相信中国共产党早晚終將找到同这个家庭团結起来的正确道路。这种情况出現得越早越好。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將为所有兄弟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性文件——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結而斗争。

我們也收到了你們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从这封对我們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的迟晚的复信中清楚地看出，你們拒絕了我們的旨在根本改善苏中关系，加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的友誼与合作，团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的一切建議。信的整个精神表明，中共中央感到焦虑的不是改善我們两党两国的关系，而是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責。我們坚决駁斥你們对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誹謗性攻击。

苏共中央对你們的信將予以答复，將說明你們歪曲我們党的思想政治观点和它的实际活动的真正意义，并恢复真相。

但是，在这封信中，我們就认为有必要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感到不安的問題，即关于克服分歧、达到兄弟党团結一致的途徑的問題，闡述自己的立場。

我們确认：中共中央在經過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擱之后，同意了我們的关于必須繼續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談，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意見。

苏共中央对这个事实給予肯定的評价，并且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尽一切努力来在預計的会談和討論过程中，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促进兄弟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上的团結。

同时，我們无法理解，你們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的时间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現在，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你們加剧論战和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別活动而蒙受的損失，已經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了。需要討論的問題已經完全确定了，会談的目的也是完全清楚的。此外，还不能不考虑，大多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越来越坚决地提出必須召开国际會議的問題。

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談，更是无法解釋的。第一次会談已經过去八个月了，你們却建議將第二次会談再延迟这么久。然而，改善我們两党两国关系的事业，团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民主和革命力量来加强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却要求尽快地調整現存的分歧。对我



們两党來說，非常重要，不陷入无休止的爭論，而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去解决我們面临的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我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巨大任务。

你們建議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談，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會議，至少推迟一年，从而拖延分歧的克服，并且使分歧更加尖銳化。我們认为，这只会給兄弟党，給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害处。

我們也不理解你們在建議召开仅由十七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鮮、古巴、蒙古、波兰、羅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代表参加的筹备會議时所依据的理由。

我們认为，由曾經参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员会并共同准备了声明草案的所有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鮮、古巴、蒙古、波兰、羅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参加筹备會議，是适宜的。

这样的組成，包括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过去是所有兄弟党都贊同的，并且正如經驗所表明，它帮助了一九六〇年會議的順利进行和會議文件的制定。不言而喻，負有召开国际會議职责的我們党，将同所有的党进行接触，并且同它們协商。

根据这一切考虑，苏共中央建議：

- 一、一九六四年五月，在北京繼續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談。
- 二、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會議，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召开。
-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一九六四年秋举行国际會議。

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須停止公开論战，必須放棄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我們希望中共中央能够同意我們提出的这些建議，并对准备和实行拟定的步驟作出自己建設性的貢獻。我們所建議的措施，是出于对克服分歧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切的关怀。这些措施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工人階級、各国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符合共产主义的利益。

致以

同志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



红旗

HONGQI

10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期 目录 ★

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蜕化施东向 (1)

是“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还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代替了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高踞于“工人委员会”之上的经理层——南斯拉夫的工人重新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社会所有制”其名，国家资本主义其实——铁托集团向帝国主义卖身投靠意味着什么？——苏共领导为铁托集团辩护的目的何在？

论人的因素第一本刊评论员 (20)

我军指战员怎样学习毛泽东著作肖华 (27)

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应用王承放 (35)

挤和钻.....苏思本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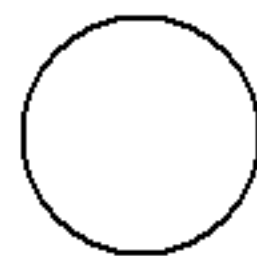
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华东地区在工业战线上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几点体会韩哲一 (39)

学术讨论 { 关于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 (4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杜雷 吴俊光 (50)

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何祚麻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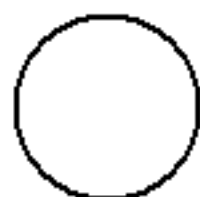


☆ 五月二十三日出版 ☆



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蜕化

施 东 向



铁托集团控制的南斯拉夫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家？这个问题，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争论的一个尖锐问题。

前一个时期，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为了辩护他们所谓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断，曾经煞有介事地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企业，没有私人资本家。近来，有人有的时候虽然还在重复这种滥调，但是，他们唱得远不像过去那么起劲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简直像魔法师一样，一种咒语不灵了，又再三念叨起另一种咒语来。说什么南斯拉夫的工业和商业都是社会主义成分，说什么“南斯拉夫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的”。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反华报告的时候，还装腔作势地说：“如果不是从主观主义观点出发，而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出发，就不可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

南斯拉夫的经济，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南斯拉夫的工业、商业，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明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却偏偏一口咬定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他们的居心何在？

这些问题，《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已经作了回答。我们这篇文章，准备用更大量的材料，进一步作些具体的说明。

一 是“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还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人们知道，在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南斯拉夫确实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

但是，在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事情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铁托集团对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对内为资产阶级服务，使南斯拉夫人民通过革命战争建立的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政权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在



企业里推行“工人自治”，从生产、流通、分配各个方面，彻底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

铁托集团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究竟是一种什么货色？他们怎样通过“工人自治”，一步一步地使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呢？

一九五〇年六月，南斯拉夫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工人自治”，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并且规定企业有权决定经营的方针，有权自行分配企业的一部分积累，有权自行招收和解雇职工。

企业实行“工人自治”，直接冲击着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一九五一年底，铁托政权正式颁布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令》，宣布废除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

由于企业的收入是靠在市场竞争中获利多少来决定，职工工资也就不能不随着企业收入的多少而改变。一九五一年底，铁托政权废除了原来由国家统一制定工资标准的制度。从一九五二年起，实行所谓新的工资制度。这个制度规定：由企业（实际上由经理）自行制定工资标准；把工人工资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利多少联系起来，实行所谓“分红”制度；企业亏损，就要减发工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铁托集团颁布《关于创办企业和店铺的条例》、《关于停办企业和店铺的条例》。宣布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所谓“合伙的公民”，经过国家批准，都有权创办企业，企业可以自行联合或分离。当企业无力上缴利润和偿还债务的时候，除了那些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加以“扶植”的以外，就要被“强制清点”，勒令关闭，拍卖财产。

同时，还颁布了《经济组织固定资产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企业在保持固定资产原有价值和保证缴纳固定资产利息的条件下，有权以买卖或租赁的方式使固定资产“自由流通”。并且规定，经过联邦国民经济国务秘书长的批准，可以把固定资产出卖给私人。

对外贸易制度的改变，是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一九五三年又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外国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这样，就为南斯拉夫企业直接依附国际垄断资本，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商品侵入南斯拉夫，大开方便之门。

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的过程，是由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铁托集团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所以，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铁托集团实行“工人自治”，特别鼓励企业“自由化”，鼓励市场竞争，放手让企业追逐利润。

这种企业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给南斯拉夫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面对着这种情况，铁托集团所关心的不是阻止资本主义的“自由化”，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只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他们对“工人自治”企业的控制。



从一九五四年开始，他们在各行各业建立经济协会，加强铁托政权对各地方、各部门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对物价和工资实行管制，用降低工人收入的办法增加企业利润。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把各企业的利润中的绝大部分以税收、利息的形式，归于铁托集团所控制的国家手中。

在铁托集团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之后，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实行卖身投靠的政策之后，他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一系列对内对外的现代修正主义政策，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召开的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臭名远扬的南共联盟纲领。

铁托集团在制定这个纲领的时候，虽然也塞进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句，并且堆砌了许多模棱两可、难以捉摸的用语，但是，只要剥开这层画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规定：

第一，“工人自治”是为南斯拉夫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的独立的和更自由的运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的企业。

第二，“工人自治”的企业“在自己的计划内”，对生产和流通、基金、投资、生产能力的利用及其定期更新和替换、工人个人收入、同其他企业联合以及自己的业务范围中其他比较重大的问题，“独立地作出基本的决定”。

第三，“工人自治”企业这种“劳动集体”，在劳动和经营中，“享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

第四，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能使人的个人幸福服从任何‘更高的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个人幸福”，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刺激，“是他们活动的一种根本的动力”。

第五，“自发势力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一种自由活动”，应该鼓励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应该“保证人在创造和使用财富方面有最大可能的自由”，而不应该妨碍“个人和企业的主动性”。

第六，南斯拉夫的“计划经济（而同它一起的还有社会主义）不应该意味着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机器”。这也就是不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①。

此外，这个纲领还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和管理是“官僚主义”，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巨大危险”，发展到极点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这个纲领，应有尽有地包罗了铁托集团从一九五〇年实行“工人自治”以来的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策。铁托集团宣称，纲领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

^①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8页。



这个綱領的所有規定，都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對抗的，都是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原則完全對抗的。这个綱領中所吹噓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規律”，同一九五七年宣言所总结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九条普遍規律，也是完全對抗的。

这个綱領的通过和发布，表明铁托集团現代修正主义路綫的定型；表明他們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表明铁托集团已經死心塌地地要破坏社会主义經濟，使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表明他們不但不願意回到社会主义陣营里来，而且决心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別动队，妄图使他們的路綫在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瓦解整个社会主义陣营。

恩格斯說过，“一个新的綱領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①从上面的事实，人們看得很清楚，铁托集团的綱領，正是这样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这个旗帜，就是复辟資本主义的旗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旗帜，反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旗帜，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反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旗帜，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总之，这是一面彻头彻尾的現代修正主义的旗帜。

在铁托集团树起了这面現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以后，他們对内更加紧推行資本主义复辟的政策，对外也更进一步实行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在南斯拉夫的工业和商业方面，铁托集团在一九六一年又实行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在企业内部，把車間、甚至生产者小組作为独立核算的“經濟单位”，各个“經濟单位”，“完全按照市場上形成的关系”，“按照市場价格”进行交易^②。同时，增加捐稅，进一步实行地方財政自理，让各个地方政府“怎样賺錢就怎样过活”^③。

在对外貿易方面，統一外汇率，进一步放寬进出口的限制，允許許多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費品“自由进口”，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寬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

經過这次“改革”，南斯拉夫的經濟在資本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愈陷愈深了。南斯拉夫經濟更进一步地被納入世界資本主义体系，成为它的一个从屬部分。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頒布了新宪法。卡德尔在新宪法的报告中說，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綱領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組織方面的具体化”。实际上这就是用国家宪法的形式，来保护資本主义复辟。用国家宪法的形式，来推行現代修正主义綱領，宣布一切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綱領、反对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力量和他們的行动，都处于非法的地位，以便于铁托集团利用他們手中的国家机器，进行鎮压。

以上这些，就是一九五〇年以来，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綱領公布以来，資本主义

① 《給奧·倍倍尔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頁。

② 伏克曼諾維奇：《新关系的核心寓于經濟单位》。1961年4月30日、5月1日和5月2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托多羅維奇：1960年12月13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工业协会管理委员会會議上的講話。



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事实”和“现实过程”。

正是从上面这些“事实”和“现实过程”出发，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纲领公布以后的“事实”和“现实过程”出发，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这种判断同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铁托集团所控制的党和国家的性质所作出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

苏共领导也明明知道这些“事实”和“现实过程”，但是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中，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一九五七年以后，“这样的事实，这样的过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在这里，我们借用一句他们自己说过的话问问他们：“难道这种主观主义和专横行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二 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代替了 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南斯拉夫的企业，实行“工人自治”以后，它们的经济活动的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南共联盟纲领的推行以及一九六一年的改革，更加深了这个变化。

第一、企业的生产，不再是以满足全社会每个成员的需要为目的，而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第二、企业产品的品种、产量，不再根据国家统一的生产计划安排，而是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定。

第三、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根据国家统一的物资分配计划调拨，而是通过市场自由买卖。

第四、企业产品的价格基本上不再由国家统一规定，而是在市场上自由形成。

第五、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再由国家统一安排，而是在市场上自由雇佣，并且可以自由解雇。

第六、企业所需要的信贷资金，也不再按照统一计划投放，而是由银行采取投标的办法，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

把这些变化集中起来，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代替了国家统一计划的调节。

对于这一点，铁托集团自己是从不隐瞒的。卡德尔就曾明明白白地说过：在南斯拉夫，“企业在自己的活动中是自由的，任何管理机关都不给它规定政策，它在市场上自由竞赛。”^①南斯拉夫的法令也清清楚楚地规定：企业“应当在营业中保持健康竞争的原则”，各个企业之

^①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1955年1月1—3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間必須保守“业务秘密”，任何机关都“不得限制竞争自由”^①。

铁托集团极力隐讳的是这种变化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诡辩说：这种变化，是他们“及时地认识进一步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并为消除阻碍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积极行动。”并且说，这种“改变”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②。

为了揭破他们的这种欺骗，我们最好还是先看看他们实行这些“改变”以后，在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实。

在南斯拉夫，各个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相互之间展开了十分激烈的竞争。

当市场上某种产品销路好、利润高的时候，原有企业就拼命扩大生产，新的企业也纷纷出现。在一九五九年感到需要农业机器，那时就一下子出现了过多的制造农业机器的新企业^③。一九六〇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砖瓦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好像金矿一样，有些地方价格上涨了两倍！”于是许多制砖企业就纷纷扩建，兴建新厂，造成“大量积压，没有主顾，流动资金冻结”，“整个行业因此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④。一九六二年有四百多家铸造厂，“造成了市场上的‘拥挤’，首先是不忠实的竞争，不履行合约，从而给生产带来了混乱”^⑤。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报道，“今年春天，南斯拉夫铁路在两年没订货之后，订购了三千个车皮，铁路车辆的生产者像饿狼一样地抢生意。”

有竞争，就有兼并，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南斯拉夫报刊报道，南斯拉夫的五家自行车工厂，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有两家已经垮台了。剩下来的三家，一九六三年争夺市场销路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⑥。仅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不完全材料，近几年来，经过法院正式判决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竞争必然形成垄断，而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像现代交通运输这样集中统一的行业，也出现了各霸一方的奇特现象。铁路曾被划分为二十九个独立的企业进行管理^⑦，它们为了保持对于各自管辖地区的垄断，在竞争中，一个企业经常使另一个企业的车皮空着回去。

为了垄断市场，南斯拉夫各个“工人自治”企业之间，争夺技术力量，保守技术秘密，更是屡见不鲜的事。它们还在报上、广播中互相攻击。生产缝纫机的巴加特工厂，利用广告攻击别的企业所经营的进口缝纫机是“三等货”，吹嘘自己的产品“质量是缝纫机生产技术成就的最高峰”。受到攻击的企业跟着在报上登广告反击^⑧。

① 1962年《调整市场营业关系法》。《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1962年第30期。

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③ 参见1961年6月21日南斯拉夫《经济评论》。

④ 1962年2月2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⑤ 1962年9月25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⑥ 1963年1月18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⑦ 参见1962年5月19日南斯拉夫《经济政策》周刊。

⑧ 1960年8月31日南斯拉夫《新闻晚报》、1960年11月23日南斯拉夫《解放报》。



南斯拉夫的物价是随着竞争和市場供求变化而波动的，非常混乱。不仅在各个城市和各个地方，而且在同一地方的各个商店里，甚至是从同一生产者那里买来的同类貨物，价格都有很大差别。企业为了追求暴利，完全不顧生产和社会消費的需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

南斯拉夫报纸报道，在一九六〇年上半年，投机活动的狂热“席卷了建筑材料市場”，許多企业采购、囤积建筑材料，造成市場上建筑材料奇缺的现象。結果使木材的价格猛漲一倍到一倍半，鋼筋的价格漲了三分之二^①。罗維尼亚“米尔納”漁业企业，为了保持高价，有一次竟把一万二千公斤鮮魚倒进大海^②。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南斯拉夫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物价更加大幅度地上漲。

据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一期报道，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五九年相比，商品零售价格平均上漲了百分之二十八，其中农产品漲价百分之六十二，生活費用上漲百分之三十九。另根据官方材料，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二年同期相比，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六，其中农产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六。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說：在近几个月中，漲价物品的单子太长了，除食品外，还有衣服、各种紡織品、家具、建筑材料以及供制造各种物品用的其他許多材料。这种漲价，从原料到产品，从工厂到商店，“連鎖式地发展着”。

关于南斯拉夫市場的混乱情况，《經濟評論》曾經写道：“行情、瘋狂、冒險、投机等等，这些就是說明一切商业部門特点的概念。”^③

铁托集团主管經濟的托多罗維奇也說：“黄金的狂热席卷了一切——个人、集体、企业、預算机关、城乡小私有生产者以及暗藏的投机分子等等。”^④

不仅在国内市場上，而且在对外貿易方面，南斯拉夫的企业之間，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外貿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擇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賺錢”。它們彼此搶生意，搶顧客，互相排挤，爭夺交易对手，它們的行为好像是“来自两个国家的”。常常是“二、三十家南斯拉夫外貿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場上”。“在同一个外国对手那里，出現了六家南斯拉夫企业，都向他推銷同一个南斯拉夫企业的同一种商品”^⑤。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在一篇題为《五百吨蘑菇，二十家出口商》的报道中說：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現的蘑菇出口商，都想“获得一些外汇，不惜在蘑菇价格上有大量損失，这些損失可以通过高价向国内消費者出售其他产品来弥补。”“他們以投机的狂热动摇了同外国商人的傳統联系，并在收购和出口方面造成了真正的混乱。”

① 1960年6月5日南斯拉夫《新聞晚报》。

② 1963年11月25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1956年8—9期南斯拉夫《經濟評論》。

④ 托多罗維奇：《两条路綫的斗争》，1954年。

⑤ 1962年1月17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1962年1月19日南斯拉夫《世界报》。



上述种种事实，究竟有哪一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现象？有哪一点又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现象？

恩格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又说：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间，南斯拉夫的经济曾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开始代替了“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一九五〇年以后，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同前一个时期的变化完全相反，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又重新代替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显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消除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而恰恰是消除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开辟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列宁说得很好：“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②又说：“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③

南斯拉夫的经济，不正是这样实现了“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吗？

三 高踞于“工人委员会”之上的经理层

铁托集团宣称，企业实行“工人自治”以后，企业是由工人委员会和工人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工人在企业中是“真正的主人”，还说什么企业经理必须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议。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里，“真正的主人”是代表铁托集团的经理。工人委员会、工人管理委员会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兰科维奇承认：“一些人在经理和管理委员会的周围结成集团，形成了所谓‘上层’，他们力求掌握企业中的一切权力”^④。南共联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鲁洛维奇说：“管理事务不是由自治机构，而是由一些领导人来进行，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只不过是让这些领导人在形式上批准各项决定而已。”^⑤铁托也说：“经理与地方政权的某些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并在自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5、241页。

②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4页。

③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2页。

④ 兰科维奇1956年3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中全会上的报告。

⑤ 1961年5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己的企业中决定一切”^①。

当赫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殷勤地表示要学习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的經驗的时候，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曾經发表評論說：“不要以为南斯拉夫的工厂真是由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的，它是由国家任命的經理来管理的，虽然也接受委员会提出的意見，而且有这种組織参加作出某些决定。”“总的說来，人們也許可以怀疑，工人委员会的影响是否比西德董事会中的雇員代表，或美国雇主必須与之談判的工会交涉人的影响来得大。”

南斯拉夫企业經理們的权利，是铁托集团給予他們的。根据有关“工人自治”的法令的規定：第一，經理有权制止“工人委员会”任何決議的执行。

第二，如果“工人委员会”申請撤換經理，当地政府不同意的时候，必須改选“工人委员会”。

第三，經理可以像一般資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經理一样，任意处置以至开除职工，甚至可以开除不願意和經理一个鼻孔出气的南共联盟在企业中的書記和“工人委员会”的委員。

这些，就使南斯拉夫的經理們在企业里处于至高无上的专制地位。

兰科維奇說，“由于批評企业和个别領導人的工作的錯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或其他工人受到懲罰、被开除出企业，或者不断地被排挤到工資較低和艰苦的劳动崗位上去”^②。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刊載的伏克曼諾維奇的談話中說：一九六三年中向他提出申訴的人一多半都是控訴劳动組織的領導人員非法解雇和虐待行为，“这种行为在某些地方具有广泛的規模”。他还說：“企业中的領導人或者互相勾結，或者在地方机关里有‘强有力的靠山’，所以，他們的錯誤通常都受到掩护，而专橫行为却仍然受不到懲罰。”

南斯拉夫报刊上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更是举不胜举的。

《战斗报》說：有的企业經理“願意接收誰就接收誰，并解雇那些批評他們的人。人員流动很大。虽然确定了工資基数，但是，到月底，經理却在一小块紙上确定誰得到多少”^③。

《劳动报》报道：“某些領導人訛詐自己的集体和管理机构，迫使它們解雇那些正当地批評企业中专权、官僚主义、裙带关系、濫用职权、濫用領導地位、不正当的特权和其他消极現象的工人。有些領導人坚持搞掉‘不如意的’工人”^④。

《新聞周报》說：貝尔格莱德“斯拉維亚”飯店經理，“通过巧妙地挑选管理机构人員，使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完全受自己的束縛”，“凡不同意他的行为的人都得离开企业，不管这个人多么正确，也不管这个人用什么論据来維護自己的观点。如果这个人自己不想走，那么有各种排挤的办法，在三年当中就有三百四十二个人离开了企业（該企业約有五百人）。差不多整个集体在这一期間被改換了。”^⑤

① 铁托 1962 年 5 月 6 日在斯普利特群众大会上的講話。

② 兰科維奇 1966 年 3 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中全会上的报告。

③ 1963 年 11 月 2 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④ 1962 年 1 月 6 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⑤ 1963 年 11 月 24 日南斯拉夫《新聞周报》。



据一九六三年第五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透露，在南斯拉夫，被解雇的人员年年增加。在一九六〇年是二十九万四千人。一九六一年是三十四万七千人。一九六二年达到三十七万九千人，相当于经济部门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

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企业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集团。这个集团，掌握“企业中的一切权利”，“在地方机关里有强有力的靠山”，他们可以采取各种专横手段，“虐待”职工。

南斯拉夫的企业，在实行“工人自治”以后，剥削和被剥削的资本主义关系，又在经理层和工人群众之间重新产生了。

在企业里，按照铁托集团的规定，经理和高级职员“正常收入”已经很高。加上他们利用特权，在特别津贴、特别奖金、差旅费以及“礼金”等等名义下，取得大量收入，使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落到了经理层的手里。

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一封信中承认，企业中极少数人的“个人物质特权有很大增长”。企业的“高额奖金”发给了“非常狭窄的领导人小圈子”。“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铁托承认，有的企业“在已实现的赢余中，工人只获得二千第纳尔，而另外却有人获得八万第纳尔。”这里所说的“另外的人”，当然就是享有种种特权的经理层。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报道，一个企业经理御用的“工人委员会”决定，在他行将离职的时候，一次就给他数达一百万第纳尔的奖励，大体上相当于五、六十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

《战斗报》曾经报道，一个工人写信给经理说：“你们分掉的钱是我们的工资”^①。《政治报》也报道：“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是‘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②。

贪污盗窃、接受贿赂，更是企业经理们的一项大财源。铁托自己就承认，“在避开本国的企业而到国外去（购买货物）的这种作法后面，经常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贪污受贿行为”。各种“自私自利分子，即某些来自旧贸易机构的分子，或者那些利用诡计、贿赂或买贵卖贱来同外国人分肥而个人取得令人不能容许的个人利益的分子，都钻进了我们的对外贸易部门。这些诡计都是在各种所谓送礼的幌子下进行的。”^③

南斯拉夫的报刊透露：“经理在生活水平方面，是属于生活得最好的几千个南斯拉夫人之列”。吮吸工人血汗的这一小撮人，平时，他们“在酒吧间和咖啡馆内放荡”，“购买手饰，供

① 1961年3月17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② 1961年9月25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③ 铁托1955年11月27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中全会上的报告。



养情妇和情夫”，“也用贪污的钱买住宅、小汽车、昂贵的家具，有时还买土地”^①。

南斯拉夫的经理层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决不是像铁托集团所说的那样是偶然发生的“消极现象”，它是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现代化的大企业，不能没有权威，不能没有经理和工人之间的分工。

如果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经理就是生产上的指挥员，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劳动者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

如果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理就不单是生产的组织者，而且是剥削者。马克思说过：“如果资本主义的指挥在内容上是二重的——因为他所指挥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二重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形成一个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它在形式上却是专制的。”^②

南斯拉夫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经理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曾经一度是不受剥削的劳动者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但是，在实行“工人自治”以后，企业就变成了追逐利润、进行竞争和投机的独立的单位，而在这个单位里，经理是独断专行的。于是，这些人就只顾他们的私人特殊利益，变成了剥削者和压迫者。

他们和私人资本家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他们是铁托政权的代表，享有资本家的各种权利，又不承担资本家破产的风险。因此，这些人更具有冒险性，在竞争中更是为非作歹地扼死对方，贪得无厌地用各种方式强占工人的劳动果实。

四 南斯拉夫的工人重新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

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根据官方的统计，除了大量流亡国外的劳动者以外，历年的失业人口数字是：

一九五三年	八一，六〇〇人
一九五四年	七六，二〇〇人
一九五五年	六七，二〇〇人
一九五六年	九九，三〇〇人
一九五七年	一一五，九〇〇人
一九五八年	一三二，〇〇〇人
一九五九年	一六一，六〇〇人

^① 1960年10月15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一九六〇年	一五九, 二〇〇人
一九六一年	一九一, 三〇〇人
一九六二年	二三六, 四〇〇人
一九六三年二月	三三九, 〇〇〇人 ^①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南斯拉夫的失业人口又在增加。据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报道，一九六四年一月份，仅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就有十三万名失业者，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

另据一九六三年一月联合国《统计月报》材料，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失业人口占全部工人的比重，大大高于英国、西德、日本，而一九六一年以后甚至已经大大高于美国。

南斯拉夫的失业工人逐年增加，而且增加得这样快，失业工人占全部工人中的比重这样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队伍，从下列两个方面得到经常的补充。

一方面，南斯拉夫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泛滥，两极分化的加剧，使许多贫苦农民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被迫流入城市，寻找职业。

另一方面，城市中各个企业之间疯狂地进行竞争，一批一批失败的企业被无情地清除，它们的职工不断地被抛入失业工人的行列。

这个经常得到补充而且越来越扩大的失业队伍的存在，使南斯拉夫企业的经理们，有可能按照他们苛刻的条件，挑剔地选雇那些苦于找不到职业的工人，同时又有可能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随时地开除那些“不合意”的在业工人。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被解雇工人的数量超过同期失业工人的数量，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南斯拉夫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对于南斯拉夫的在业工人，正是一种难于抗拒的强大压力。

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膨胀了工人阶级中后备军的队伍；反过来，这个后备军由竞争对就业部分发出的加大的压力，又强迫后者不得不过度劳动，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的命令。工人阶级一部分因为其中别一部分过度劳动而被迫得无事可做的情形，以及反过来情形，成了资本家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同时又适应于社会积累的进展，按相应的规模，加速产业后备军的生产。”^②

南斯拉夫的情况正是这样。

由于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经理们有可能在物价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使广大工人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南斯拉夫《经济评论》的统计材料，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到十一月期间，南斯拉夫整个工矿业中，就业工人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在一万五千第纳尔以下的，占

① 见1963年第3期、第5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9—700页。



在业工人百分之二十点九，每月平均收入一万五千到二万第纳尔的工人，占在业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两者合计，占在业工人的百分之四十六。按照铁托集团的官方意见，在南斯拉夫，每人每月平均二万第纳尔的工资是很难过得去的。

而且，就是这样低的工资，也常常不能够如数拿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南斯拉夫《政治报》透露，塞尔维亚扎耶加尔县罐头厂女工米连科维奇说：“我的工资是一万七千第纳尔，但是已经有四个月我每月得到六千第纳尔，上个月只得到了四千第纳尔。越来越少……这将达到何时为止呢？”

南斯拉夫工人的收入这样少，他们的支出情况又是怎样呢？

南斯拉夫报刊透露：租私人房屋住的单身工人，仅房租一项的支出，就占他们工资的三分之一^①。有的占收入的一半^②。一个每月工资一万二千六百第纳尔的工人，他的支出情况是：伙食费五千五百第纳尔，房租（住在私人房屋的过道里）四千第纳尔，偿还分期付款二千第纳尔，只剩下一千一百第纳尔作为其他开支^③。

《政治报》所报道的塞尔维亚扎耶加尔县罐头厂，女工腊马丹诺维奇对记者说：“从七月以来我们每月收到六千第纳尔，而最近这个月总计只得到三千第纳尔。只够买面包的！要是我一个人的话，……可是还有孩子们，孩子们。”

女工约万娜哭着说：“我心上有什么呢？压着一块石头！冬季食品我还没买，燃料也没买，也没有给孩子们买些暖和的衣服穿。我得了三千第纳尔，先用到什么地方呢？我还给一个妇女一千第纳尔的债，用一千第纳尔买了最必需的食品，另外的一千第纳尔留下买面包。……我们的收入为什么这么少呢？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干得非常多……”。

最近，南斯拉夫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陆续下降，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南斯拉夫《劳动报》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以《普遍抗议涨价》为题刊登了一篇对贝尔格莱德三家企业的一百五十名职工生活情况进行调查的材料，调查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生活得更坏了”。这家报纸说：“绝大多数职工对物价不稳定，特别是对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感到愤怒”。

由于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使经理们有可能任意增加在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报道，“在一家著名的纺织厂中，工人实际上不能工作十年以上”。“在贝尔格莱德一家著名的企业中有一百个劳动能力减弱的工人。调查表明，在一百人中有八十人来自农村。他们很多没有自己的住房，每月不得不付出五、六千第纳尔去租房住。”“所有这些人都不不得不在早上三点钟起床，以便及时上班。在企业中停留到十

① 1959年7月4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② 1962年7月15日南斯拉夫《新闻周报》。

③ 1959年1月14日南斯拉夫《青年报》。



四点钟，接着又去赶火车，直到傍晚大约十八点钟才回家。显然，他们没有休息时间。此外还应补充说，调查表明，这一百名工人中七十五名每天只吃一顿饭。”“据某些材料，在这些组织中大多数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人已经完全丧失能力，不能从事生产了。”

由于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得到铁托集团支持的经理们，根本不关心改善在业工人在劳动中的保险和安全，使工伤事故多得惊人。

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报道：“工业中工伤的百分比，南斯拉夫是世界第一”。

这就是南斯拉夫工人（包括在业工人、失业工人在内）现在的劳动条件。这些和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的劳动条件，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担负某一部分社会所必需的工作，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藏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①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是“对于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大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挥霍现象的消灭；失业现象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劳动权，即每个公民领得有保障工作之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等等。”^②又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简单地宣布劳动权，而是要用消灭失业的办法，来保证劳动权。

南斯拉夫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工业和商业等部门的生产资料，除了一部分掌握在私人资本家的手里以外，都掌握在铁托集团及其在企业中的代理人的手中，工人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九六三年通过的南斯拉夫的宪法中写道：“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于南斯拉夫工人阶级来说，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铁托集团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作为剥削工人的工具。他们不是采取措施来消灭大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的现象，反而通过所谓“分红”、“奖金”等个人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培养一个掌握种种特权、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剥削集团。他们不是采取措施来逐步消灭失业，保障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反而是通过那种助长农村两极分化的政策，鼓励企业疯狂竞争的政策，使工人失业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像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为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保留一个可以自由处置的产业后备军。

南斯拉夫工人由于已经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由于劳动权利没有可靠保障，他们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1页。

② 《论苏联宪法草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808—809、812页。



已經根本不能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按等量劳动領取等量产品”。他們实际上已經变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只能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一样，按照劳动力的价格，取得工資。而这种价格是經常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的，对許多工人來說，已經无法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

铁托集团的“理論家”說，他們那里的“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人与人之间之間的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① 这句话本身是没有什么可爭論的。問題是，在南斯拉夫那里，人与人之间之間的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是什么样性质的关系？

从上面种种事实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铁托集团及其在企业中的代理人之間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早已經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关系，而是雇佣和被雇佣、剝削和被剝削、統治和被統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关系。

五 “社会所有制”其名，国家資本主义其实

铁托集团宣称，他們的企业实行“工人自治”以后，国家所有制变成了“社会所有制”，变成了“直接的社会占有”，并且說，这种“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②。

他們还說，在这种“社会所有制”的企业里，“生产者成为管理生产的社会职能的承担者，同时，也成为社会产品分配职能中的积极参加者。作为政权的国家愈来愈少地在直接生产中出現。”^③

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騙。

第一，从前面的材料和分析中，可以看出，管理生产的社会职能，社会产品的分配职能，都完全掌握在企业經理的手中。而这些經理，按照铁托集团的說法，在企业里“是作为‘国家的’因素出現的”^④。

第二，企业經理在名义上是由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招聘的，实际上，却必須由当地政府通过以后才能任命。企业經理的撤換，有的时候虽然可以由“工人委员会”提出申請，但是，撤換或者不撤換，却完全由当地政府决定。

第三，铁托集团，一方面，把这种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經理主宰一切的企业，装扮成所謂“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的企业。說什么，这种企业的“社会财产”，“不是作为法律上的所有主的财产，而是作为直接加以集体享用的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财产。”^⑤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法律却赤裸裸地規定，铁托集团的国家，有权用捐稅、利息等形式，取走工人所創造的

①⑤ 博格丹·奥索尔尼克：《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政策》，1963年11月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② 《铁托演說和論文集》第5卷，薩格勒布进步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

④ 馬尔科維奇：《南斯拉夫經濟关系的发展》，貝尔格萊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絕大部分剩余价值。例如，根据对薩格勒布市百分之五十的工业企业的調查，在一九六三年上半年，铁托集团通过捐稅、利息等形式，拿走了企业百分之七十九点五的“淨产值”^①。

第四，铁托集团，一方面，向这类企业的工人們約許，他們有权用“分紅”、“獎金”等形式，自行分配企业的一部分积累。說什么生产者和劳动集体在企业“某些基金分配中，应享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②。另一方面，却用法律的形式硬性規定，如果某些企业不能按时按数向铁托集团的国家上交捐稅和利息，国家就要关闭这些企业。工人們不但得不到額外的“分紅”，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工資，甚至会被无情地从企业中抛到失业工人的队伍里去。

第五，南斯拉夫的主要企业，都是各級政权出資建立的，亏损的企业，如果是同铁托集团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的，都由国家实行財政補貼。補貼的形式很多，除了联邦政府的補貼，还有降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利息，勾銷“收入上交”，以及从地方基金和預算中給予直接和間接的補貼，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說明了什么呢？它說明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絕不是像铁托集团說的那樣，是生产者“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的“社会所有制”，而是铁托集团的国家所有制，“生产資料的代表者仍然是国家”^③。

那么，这种“国家所有制”是什么性质的呢？

根据前面的分析，不論从企业与企业之間的相互关系来看，还是从經理与工人的相互关系来看，都不能說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而是資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

这里需要特別說到的，在南斯拉夫，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蜕化为資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是同南共联盟由无产階級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階級的政党，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权由无产階級专政蜕化为资产階級专政，这个极端重要的事实密切联系着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南斯拉夫的国家資本主义，并不是无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而是资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是道道地地的資本主义經濟。

在苏共領導看来，铁托集团一方面鼓励企业之間的瘋狂竞争，另一方面，又強調国家对企业經濟活动的控制和干預，是互相排斥的。他們故意制造混乱，用铁托集团的国家对企业經濟活动的控制和干預，来证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陣地正在加强”。

稍为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經濟学常識的人，都不难揭穿这种詭辯。因为就是在一般資本主义社会里，竞争和国家干預也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苏共領導看来，铁托集团一个时候強調分散經營，另一个时候又強調統一管理，也是互相排斥的。他們故意制造混乱，用铁托集团的統一管理来证明他們“已經改正錯誤”，正在加强“計划性”。

① 1964年4月4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

③ 烏約舍維奇：《南斯拉夫經濟制度的特征》。《南斯拉夫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貝爾格萊德1961年版。



只要真正从南斯拉夫的“事实”和“现实过程”出发，就不难看出，分散也好，统一也好，共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

总起来说，铁托集团鼓励疯狂竞争，实行国家干预，支持分散经营，加强统一管理，都是为了经过他们在企业里的代理人，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企业拿走尽可能多的利润。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的各个企业之间，就是像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把自然界生存斗争的规律，“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铁托集团的国家是从不干预的。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的企业经理们，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一样，作为“吸血鬼”贪婪地吸吮着“活劳动的血液”，工人倍受欺凌，饱尝贫困，铁托集团的国家也是从不干预的。

恩格斯在说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①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说，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分析南斯拉夫的大量“事实”和“现实过程”，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六 铁托集团向帝国主义卖身投靠意味着什么？

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同铁托集团向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卖身投靠这个重要事实，交织在一起的。

自从一九四八年，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铁托集团帮助希腊反动派扼杀希腊人民革命以后，美帝国主义看中了铁托集团，接着就用重金收买。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止，铁托集团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获得了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的“援助”，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为三十五亿美元。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0页。



在美国的三十五亿美元的所谓“援助”里面，大约二十五亿美元是经济“援助”。如果除去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四亿多美元，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三年一月，美国对铁托集团的经济“援助”，共计二十亿多美元。其中，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九年共计十亿多美元，平均每年约一亿美元；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三年初，五年多共计十亿多美元，平均每年约两亿美元。

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公布了，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发展速度特别加快了，美帝国主义给铁托集团的奖赏也就随着成倍地增加。这就可以看出，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美帝国主义经济“援助”的增长，是紧密配合的。

美“援”，决不像叛徒铁托所无耻辩解的那样，是什么“完全新型的特别有利的经济援助”。美国《哈泼斯杂志》主编约翰·费希尔，在写给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福勒·汉密尔的一封信里，曾经非常露骨地说过：“美国在援外上每做一件事（或每拒绝做一件事）都是为了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所以我相信，你会在每一角银币上都系上一根链条。如果这个银币不是为清楚地规定好的美国利益花用，你就会死劲勒紧这根链条。”

美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死劲地勒紧套在铁托集团脖子上的美元链条，迫使铁托集团同它们缔结了一连串的卖国条约，签订了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向美帝国主义一批一批地出卖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从而使铁托集团所控制的南斯拉夫，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铁托集团出卖了南斯拉夫的主权，美国取得了控制南斯拉夫军事、外交和内政等权利，包括促使南斯拉夫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权利以后，美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就源源不断地涌进去了；执行美国侵略政策的军事人员、情报人员和其他各种人员，就像苍蝇一样地嗡上去了；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南斯拉夫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种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势力，进入了南斯拉夫的国土，就必然加强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势力，推动他们同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一度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势力，进行誓不两立的斗争。引狼入室的铁托集团，被“美援”链条勒得愈来愈紧，也就同美国垄断资本势力更加狼狈为奸，加紧向社会主义势力进攻，卖力地在南斯拉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所说，南斯拉夫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买办性的国家资本主义，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产生的剥削阶级，不仅是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完全正确的。

七 苏共领导为铁托集团辩护的目的何在？

近几年来，苏共领导已经成为铁托集团最卖力的辩护士。他们辩护得最起劲的，是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性质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居心何在？目的何在？



《紐約时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的社論，透露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这篇社論說：“南斯拉夫采用的西方的主張是这样多，因而它可以起一种傳送帶的作用，把西方經濟主張傳給东方”。

苏共領導为铁托集团辯护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傳送帶”，陰謀把苏联引上南斯拉夫的道路，使苏联人民面临着資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險。

苏共領導已經死心塌地同铁托集团合伙。但是，又想不让人家說他們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朋友。

苏共領導一心一意向叛徒铁托集团学习。但是，又不想让人家說他們是叛徒的学生。

这种想法和作法，使他們处在一种十分尷尬的地位。

苏共領導声称，他們和铁托集团都“屬於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論为指南”。人們不能不問，这个“思想”和“理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是現代修正主义的？他們索性公开背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掩盖铁托集团叛变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实，說什么南共联盟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苏共領導強調，在他們和铁托集团之間，有必要“相互学习彼此的經驗”。人們也不能不問，这种“經驗”，是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还是資本主义复辟的經驗？他們就拚命掩盖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事实，說什么南斯拉夫是在“具体建設社会主义”，并且說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的“經驗”，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貢獻”。

他們滿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尷尬的处境。

但是，无数的經驗证明：一切搞陰謀詭計的人，愈是用他們自以为得計的方法来欺騙人，結果总是更加无情地暴露出他們的真面目。

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的命运，不能不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论人的因素第一

本刊评论员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便是人们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是人们创造和运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的历史。人和其他动物的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自觉地创造和运用各种工具，改变自然物，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人们在生产中，向自然界作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地改善在各种条件下运用的工具，这就发展了生产技术。劳动工具，是人手的职能的延长，是人自身能力的扩大。人们历史地变化着劳动工具，也历史地变化着自身的能力，并促进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四个第一”的原则，首先提出的是，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时，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说，在人和物的关系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实际上，不但在处理军队中人和武器的关系时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从事其他一切工作时，也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讲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的时候，这样说过：“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如果工人阶级决心作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善于用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那就可以解决任务。大家都来解决这个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决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胜一切的因素。”^②

关于战争的问题，列宁也同样地指出：“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③“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認識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認識是取得胜利的保证。”^④

① 《論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②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5页。

③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6页。

④ 《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7页。



一九一九年，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談到国内战争的經驗时，这样說：“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剝削者真正喚醒，就会有极大的本領，就能創造奇迹。”^①

由此可見，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的观点，正是列宁主义的观点。

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对于一切正在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对于那些正在夺取革命胜利和正在建設自己国家的革命的人民，認識这个真理或者不認識这个真理，認識的深刻程度如何，是否能够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都坚持这种認識，关系到他們斗争的前途，关系到他們革命和建設事业的成败。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統治阶级，总是拥有殘暴的镇压机器和精良的武器装备。面对着这样的敌人，革命的人民是恐惧退縮，还是敢于起来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当帝国主义和反动統治者进行暴力镇压和武装侵犯时，是逆来順受，妥协投降呢，还是敢于拿起武器来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敢于击败敌人的侵犯呢？

目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民族革命胜利的国家，多数原来都是經濟、技术比較落后的。面对着这种情况，革命的人民是丧失信心、甚至卖身投靠呢，还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設自己的国家呢？

在这样的問題面前，革命的人民只有坚持“人的因素第一”这个原則，并且按照这种認識認真地去組織和部署自己的行动，才能开辟光明的前途。

在战争中，武器虽然給予战争的进程、战术的改变以重大的影响，但是，战争的最終結局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战争的实践不断地駁斥了各种片面地夸大武器的作用而貶低人的作用的論点，以为依靠某些新式武器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論点。

以前的不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战争，像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一七九一——一七九四年的法国革命战争，都表明人的作用居于首要地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军队是用劣武器去抗击武器精良的英国殖民军的，起义军队在初期虽然訓練很差，装备不良，但是他們懂得为独立而战，为正义而战，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們發揮了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英国军队。法国革命也是以装备不良的民兵式的军队，来对抗联盟国訓練和装备良好的雇佣军队。一七九二年，普魯士和奥地利在英国和沙皇俄国支持下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当时的法国革命军队大部分是由志願军組成的，但是他們为卫国思想所鼓舞，受到人民群众中巨大的爱国热潮和革命热潮的支持，终于把干涉者的军队驅逐出国境。

^①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1頁。



到了十九世紀，步槍技術不斷有所改進，出現了射擊效果相當好的新式步槍。當時有些人就認為這種武器是決定一切的，任何人的勇敢、人民群眾的力量，在這種武器面前，都將無濟於事。但後來的戰爭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根據當時一些戰爭的經驗，“軍界的輿論改變了；人們重新開始認識到贏得戰鬥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槍”^①。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人馬罕曾經提出一種所謂“海上武力決勝論”，認為海上武力是決定國家歷史的主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人杜黑又唱“空軍決定勝負論”；英國軍人福勒爾則提出只要有坦克和機械化武器就可以對戰爭構成百分之九十九的勝利，而其他戰爭因素充其量只能構成百分之一的勝利。所有這些論調，又都在戰爭的實踐中一一破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了核武器。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者，更大肆宣揚這種武器的威力，認為它對任何戰爭都起最後的決定作用。他們滿以為用這種大規模殺人的武器就可以嚇唬住革命的人民，使他們不敢進行反抗。但是，自出現原子武器以來的近二十年的歷史，又無情地宣告這種論調和企圖的破產。恰恰在這個時期，越來越多的被侵略、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起來進行英勇的解放戰爭，用劣武器、短程武器戰勝了擁有現代化武器的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古巴人民以七支步槍發動起義，阿爾及利亞人民起義的時候也只有五百支陳舊的獵槍，當時面對着他們的，都是數以萬計的擁有現代化裝備的反動派軍隊或殖民軍。起義的軍隊最終戰勝了他們。美帝國主義者不能不承認：“占壓倒優勢的核實力制止不了游擊戰爭。”美帝國主義在南越戰爭中打算依靠直升飛機和水陸裝甲車這類武器消滅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裝，但是，他們的這種企圖也正在不斷地遭受失敗。

起義的人民為了戰勝敵人，當然需要不斷改善自己的武器裝備。但是，人民軍隊解決武器問題是依靠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依靠正確的战略戰術，在很多時候是從敵人手里去奪取的。事實上，人民軍隊所擁有的武器，即使到了最後決戰關頭，在質量上也往往比不上反動軍隊。就是說，許多人民戰爭，如果單就武器一項來說，它們自始至終沒有占上風。它們取得勝利的秘訣在於人，在於贏得人心和人力。

有些人民的武裝鬥爭暫時失敗，原因也主要不在武器上，而是常常出於战略戰術方面的錯誤使人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所以他們只要能夠在這方面接受教訓，總有一天是會轉弱為強、轉敗為勝的。

一切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應當努力使自己的軍隊現代化，努力掌握和精通一切現代化的戰爭技術和業務。軍隊愈現代化，軍事技術愈進步，人的作用不是降低，而是顯得更加重要。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必須與軍隊的革命化相輔而行，並且以革命化為基礎。因為不管有

^① 《步槍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2頁。



怎样的先进军事技术，在战争中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人的力量，要看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如何。现代战争特别表明这一点：没有军队的革命化，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即使有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可能发挥它最高的威力。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力吹嘘某些新式武器的作用、贬低人的作用，是有它的阶级根源的。反动的剥削阶级脱离人民，和人民为敌，他们不得人心，当然不可能充分利用人力，因此，就只好迷信武器。但这样一来，优势武器在他们手里也就丧失了真正的优势，变成了吓人的纸老虎。他们即使在某种场合可能暂时取得一些胜利，但是最终必定归于失败。

以上是说的在战争中人和物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明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

历史上，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生产方式，都是由于在不同程度上解放了当时的生产力，主要又是由于解放了作为生产基本力量的劳动者，使他们有可能创造、或者有兴趣运用较进步的劳动手段，或者虽然使用一样的劳动手段，但是有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效能，从而创造出高于过去的劳动生产率。

在剥削制度的社会，劳动者创造出生产技术、各种劳动手段，这些东西为剥削者占有，反过来奴役劳动者，成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技术、劳动手段奴役人的现象，宣告结束了。“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①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能动作用，人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很大的、前所未有的发挥。在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下，在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创造出各种人间奇迹，也能够创造出一切最新的生产技术，运用它们来为社会生产财富。

社会主义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点之一，在于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的精神状态极大地改变了，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力量。他们没有奴隶相，没有依赖心理，有信心凭借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自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②

俄国也曾经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纷纷说：俄国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人们穷得不得了，没有起码的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纯粹是空想，是胡闹。列宁当时对于这一点答复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8页。

② 《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第3页。



驅逐地主，驅逐俄国資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①

推翻地主，推翻資本家，这就是首先驅除劳动者身上的压迫，使他們成为社会的主人，把蘊藏在他們身上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解放出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战斗。这就是說，首先解放劳动者的力量，爭得人心和人力，投入为社会主义的战斗，然后創造出必要的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消除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

大家知道，在列宁随后是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的苏联人民正是这样做了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經驗同样地证明：在建設中，决定的因素也是人而不是物。只有具有无产階級革命精神、无产階級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并且决心作出自我牺牲的人，才能建設社会主义，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去建設共产主义。丧失无产階級的革命精神，只知道追求个人物质刺激和高薪，滿脑袋装着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并拿这些观念去腐蝕无产階級的意識，麻痺人民群众，这是不可能真正建設社会主义，更談不上建設共产主义的。

无产階級政党領導人民进行建設，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十分重視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作用，充分挖掘蘊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力量，把他們“要干、要革命”的这种精神和力量統統調动起来，組織起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是从这样一个目的出发的。我們党关于建設工作的各項具体方針、政策和措施，也是根据党的总路綫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制定的。

当然，不能认为人們能够不顾客观物质条件而任意行动。人和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立的統一。人駕馭物，物則提供人的活动以某种条件。人們不能超越这些条件許可的範圍期求事情的成功，但在客观物质条件所提供的限度內，人的能动作用却有极广闊發揮的場所。在这个限度內，政治、思想、人的革命干劲，可以造技术，造其他物质条件。无数事实表明，具有大体相同的物质技术条件的部門，由于人們的觉悟不同，主观能动作用發揮不同，有的工作成績就好，有的工作成績就差。重視發揮人的作用，即使是比較落后的技术装备，也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而先进的技术装备就可以發揮出更大的效率。反之，如果不重視發揮人的作用，即使有先进的技术装备，也会把生产搞得冷冷清清，沒有生气，甚至会把生产搞坏。

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社会主义企业除了要求在技术方面繼續逐步地实现現代化，还要求广大职工群众思想的革命化，使他們具备无产階級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只有广大职工群众思想的革命化，真正具有无产階級的意識，企业才有最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促进企业在技术方面的繼續現代化，并且使一切現代化技术發揮最高的效能，創造出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企业以奴役工人为前提。現代修正主义者对待社会主义企业，是用资本主义利潤原則来敗坏企业，

^① 《論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5頁。



用所謂“个人物质刺激”的思想来腐蝕工人。这样，实际上就不可能真正發揮人的作用。現代修正主义者口头上說“关心人”，实际上是企图扼杀人們的革命精神，使社会主义企业蜕化变质，使社会主义經濟基础蜕化变质。

我国人民正在傳頌着大庆油田的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从根本上說来，大庆精神就是企业建設上的无产階級革命精神，就是“人的因素第一”的精神。

大庆油田是我国新建的一个現代化石油企业。这个企业的建設，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的。器材設備严重不足，交通运输条件很差，甚至沒有机修工厂，許多用品常常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大庆职工发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傳統，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絲毫不計較个人的利益，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終于征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短短的四年內，多快好省地建設起一个現代化大企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重大貢獻。

大庆的建設表現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完全能够凭借自己劳动的双手，建設好自己的国家。

大庆职工的高度革命干劲是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結合在一起的，他們懂得在战略上要藐視困难，而在战术上要重視困难。例如，在油田勘探和建設中，大庆职工为了判明地下情况，每打一口井，都要取全、取准二十項資料和七十二个数据，保证一个不少，一个不錯。几年来，那里的地质研究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根据大量的第一性資料，反复地进行了无数次的分析、化驗和計算。而这一切是在沒有像电子計算机这一类先进的計算設備的条件下进行的。

大庆油田这个高度現代化企业建設的胜利，当然要依賴于解决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技术問題。但是，从他們的經驗看来，首先的和决定的，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是在于貫徹执行党的旨在調动人們积极性的总路綫，在于发揚人們的革命精神，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灌輸人們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这就为自力更生地解决重大技术問題提供了前提。正像大庆的同志們自己所說的，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坚信党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如果不是在党的总路綫和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沒有一股頂得住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闊劲，今天的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

大庆油田的領導方面，为了調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企业中开展群众运动，在政治上、經濟上、生产技术上充分发揚民主，不断改善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等等。这里有重大革命意义的，是領導干部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大庆的領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同組織生产、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相結合的。他們参加劳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七种：（一）跟班劳动，进行調查研究；（二）带着問題跟班劳动，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三）住在比較落后的班組，跟班劳动，帮助落后；（四）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跟班劳动；（五）在最紧要最關鍵的地方，跟班劳动；（六）生产上遇到复杂情况的



时候，跟班劳动；（七）在人少需要突击生产的时候，跟班劳动。

事实证明，领导干部下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和群众同甘共苦，直接倾听群众的意见，能够不断地改进领导，改善企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启发职工群众的革命觉悟。这样，就不但更有可能避免官僚主义，也更有可能防止修正主义思想的侵蚀。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运用“四个第一”的原则。大庆油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同自己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而在促进职工群众思想的革命化、发挥人的作用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摸索出一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办法，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有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把我国各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歪曲说成是要使全国各个部门都“军事化”。让这些入随心所欲地去嚼舌吧！中国人民将像大庆职工那样，坚定不移地学习解放军，正确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作为建设我们国家的一个必要的推动力。

在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中，是否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这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从两方面歪曲人和物的关系：一方面，片面地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存在，这就产生“只见人不见物”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片面地夸大物的作用，认为人在物的面前，始终只能处于无能为力的被动地位，不能积极地掌握物质世界的规律性，从而改造物质世界，这就产生“只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时候，这样说：“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①

资产阶级统治者宣传“机器统治人类”，是企图凭借他们所有的机器永远保持他们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他们夸大武器的作用，则是为了使劳动人民不敢起来反抗他们的暴力统治。他们用这种没落的世界观来观察事物，同时也用这种世界观来毒害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中间，谁如果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谁就不可避免地会解除自己的精神武装，而成为没有志气、没有骨头、不敢有所作为的庸人懦夫。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既反对主观唯心论，也反对机械唯物论，认为人和物这两者是统一的，而人的作用占主导地位。这是科学的世界观，革命的世界观。革命的人民，只有用这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扫清庸人懦夫的世界观及其影响，才能使自己无论在革命中或者建设中，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概，去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将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33—1134页。



我軍指战員怎样学习毛澤东著作

肖 华

毛澤东同志的思想所以正确，所以經常保持生气勃勃的力量，就是因为他經常地、不断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革命实践結合起来，而从革命实践出发，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以毛澤东思想为建軍、作战和一切行动的指針，努力学习毛澤东著作，从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傳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扩大會議，根据林彪同志的提議，又向全軍发出了“高举毛澤东思想紅旗，把毛澤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号召。全軍聞風而动，立即掀起了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热潮。几年来，全軍在毛澤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四个第一，发揚三八作風，开展創造四好連队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热潮。全軍指战員学习毛澤东著作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經常，越来越有成效，形成了規模宏大、持久不懈的群众运动。一九六三年，宣傳和学习雷鋒、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活动，更使广大指战員清楚地看到，雷鋒和好八連的成长，就是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的結果，因而更加提高了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积极性。“人人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成为广大指战員的自觉行动。从前方到后方，从內地到边疆，从机关到連队，从干部到战士，到处都在认真学习。平时学，战时学，上課学，业余学；在軍营里，在工地上，在行軍途中，在舟車道上，以至休假探亲，很多人都是“毛选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工作多，挤不倒；文化低，难不倒。全軍上下，对毛澤东同志怀着无比敬爱，对毛澤东思想怀着强烈的无产階級感情，从毛澤东著作中找武器，学本領，改造自己，改造客观世界，使全軍指战員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使全軍各項工作蒸蒸日上。

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广大指战員学习毛澤东著作，用毛澤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使我軍在非常无产階級化、非常战斗化的建設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全軍指战員，特别是連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澤东著作的主要收获是：

第一，进一步促进了全軍人員的思想革命化，提高了广大指战員的政治思想觉悟。毛澤东同志对革命者所提出的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站穩无产階級立場，分清敌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拣重担子挑，毫不利己，等等要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所向往、所追求、所身体力行的目标。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鋒，用他火花四濺的一生，实现了这个目标。千万个雷鋒，



数不尽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犹如山花烂漫，万紫千红。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广大青年战士正在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了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甘愿贡献出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他们以艰苦为荣，以助人为乐，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他们不光看到身边的事情，而且“站在连队里，看到全世界”。

第二，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时期所提出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更深刻了。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面前，在国内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南京路上好八连，十几年来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艰苦奋斗，永不褪色，是为人熟知的一个例子。还有，解放军“钢八连”和公安部队“红色前哨连”，也是这样。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头脑，击退了阶级敌人糖衣炮弹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始终坚守了自己的战斗岗位。毛泽东思想把我军锻炼成一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的人民军队。可以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战士们反映：“毛主席著作真正好，字字句句都是宝。战士读了觉悟高，立场坚定站得牢。台风刮不动，霹靂震不倒。”

第三，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越来越落实，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越出越多。凡是四好连队，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学得好的连队；凡是工作做得出色的干部，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学得好的干部；凡是五好战士，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学得好的战士。

第四，练出了硬功夫、真本领，打仗过得硬，什么困难都不怕。连长郭兴福，在训练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战士带着阶级仇恨、带着敌情观念、带着英雄形象、带着任务摸爬滚打，把一个个战士训练得像生龙活虎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各部队贯彻了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进行训练的精神，练出了像鲍寿根那样的空中神炮手，打出的炮弹跟长了眼睛一样；练出了像袁西乐那样的神枪手，掌握了过硬的射击技术；练出了像硬六连那样的具有无产阶级硬骨头作风的连队；练出了大批被称为考不垮、难不倒的“铁优等连队”；练得像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那样，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既有二百米硬功夫，又有高度的政策观念和纪律性。

第五，提高了领导水平，改善了工作方法。凡是毛泽东著作学得好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作风就好，方法就对头，工作就能做到节骨眼上。他们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善于抓住两头（上边的东西及时向下传达，加以具体布置；下边的东西很快反映上来，加以具体解决），没有疲沓、散漫、松垮、拖拉的现象。许多这样的机关，有的被称为“战斗作风好的司令部”，有的被称为“面向连队的政治处”，有的被称为“送东西上门的后勤处”。

第六，使我军科学技术人员走上了又红又专的道路。我军科学技术人员学习了毛泽东著作，提高了阶级觉悟，就有了排除万难、攻克尖端技术的坚强决心，树立起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就在军事科学技术战线上大出成果，大出人材。

全军指战员，特别是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行动



的實踐，給我們一些什麼啟示呢？

毛澤東著作，具有高度的理論性，然而深入淺出，講得透，講得活，容易為廣大幹部、戰士所理解，所接受，所運用。廣大指戰員把毛澤東著作學好了，把毛澤東思想掌握了，就能夠更好地理解毛澤東同志怎樣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就可以啟發我們更好地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精神實質，更好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自己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學習毛澤東著作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捷徑。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按語指出：“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已經證明了的，是任何人也不可能抹煞的。毛澤東思想受到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歡迎，他們從中國革命的經驗中，從毛澤東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中，獲得了革命的武器。這是很好的事情，只有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不高興。”事實正是這樣。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我國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指針，也是我軍建設和一切工作的指針。學好毛澤東著作，用好毛澤東思想，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務，是四個第一落實的主要標志，是培養三八作風的思想基礎，是創造四好連隊的根本保證。政治掛帥，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抓住學習毛澤東著作，運用毛澤東思想，就抓住了我軍建設的根本環節。

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在全黨全民全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思想鼓舞着全黨全民全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善於運用毛澤東思想來回答和解決部队的現實問題，是最高明的政治工作。

總之，毛澤東思想，是“糧食、武器、方向盤”。學習它，運用它，放在哪裏都准，用在哪裏都靈。違背了它，千言萬語，離題千里，我們的什麼工作都做不好，我們的革命事業就會失敗。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一個單位、一個人的思想狀況如何，工作狀況如何，首先要看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是不是舉得高，毛澤東著作學得好不好。要學得好，就要對學習毛澤東著作，有充分的認識，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有堅強的決心；在執行任務、處理問題的時候，要想到運用，而且要學會善於運用。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這是軍委和林彪同志的號召，也是廣大指戰員從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親身體驗中得出的結論。

二

我軍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方法，就是林彪同志提出的“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



林彪同志提出的这种活学活用的方法，是“理論和实践統一”的原則的具体化。毛澤东同志說：“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就是要我們从国内国际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现实需要出发，带着問題向毛澤东著作請教，需要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学什么，使毛澤东著作的学习同当前的斗争任务紧密結合起来。学习有无成績和成績是大是小，主要看我們会不会用，用得怎样。活学活用，就是要求广大官兵比較深刻地領会毛澤东著作的精神实质，运用毛澤东思想解决实际問題。采用这种学习方法，就可以一扫理論学习中的沉悶空气和书生派头，充滿生动活潑的革命精神。干部、战士普遍反映，这样学法，“学得快，学得懂，記得住，用得上”。过去有些人曾經感到学了理論不能解决实际問題，常常是由于他們沒有把学和用結合起来，不是活学活用，学用一致，而是讀死书、死讀書。

实践证明，带着問題学，活学活用，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是把毛澤东思想变为广大官兵手中武器的正确道路。凡是按照这条路子走的，学习效果就好；离开这条路子，学习效果就差，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雷鋒的“問題——学习——实践——总结”，廖初江的“带着問題学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想問題，碰到問題找毛主席著作”，丰福生的“五多一結合”（多讀、多想、多比、多用、多記，学与用相結合），黃祖示的“对照檢查，边学边做，反复学用”，等等，具体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体现了活学活用的精神。

带着問題学，带着什么問題呢？就是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各种問題，就是带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中所遇到的各种問題。对全軍來說，这些問題中有一些是带有共同性的，例如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任务中提出的問題，部队中心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問題，等等；也有一些是各个单位、各种业务部門和每个人思想上、工作上需要解决的特殊性問題。任何人只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学习，就总是有問題可带的。因此，带着問題学，是人人可用的学习方法。曾經有人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只适用于战士和理論文化水平低的基层干部，而不适用于中上层领导干部、知識分子和机关院校的同志。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带着問題学，是不是忽視系統讀書呢？不是的。經驗证明，越是带着問題学，对讀毛澤东著作越是如饥似渴。这几年，干部、战士对毛澤东著作讀的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今天带着問題学这些文章，明天带着問題学那些文章，日积月累，越学越多。不少同志就这样在不长的時間内閱讀了《毛澤东选集》，有的还讀了几遍。事实证明，这是閱讀《毛澤东选集》的好方法。带着問題学，虽然每次学的只是毛澤东思想的这一个部分或那一个部分，但是，从一个問題的学习中比較深刻地領会了毛澤东同志分析和解决問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就可以触类旁通，領会和解决更多的問題。这样，学得多了，就可以逐步系統地了解毛澤东思想。带着問題学并不是說不要系統地讀書。特別是我軍高級干部，不但应当带着問題多学一些毛

^① 《整頓党的作風》。《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7頁。



澤东著作，而且应当带着問題多讀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我們学习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是脱离实际，为系統讀書而系統讀書。如果脱离现实斗争的需要，无目的地去讀書，去追求什么“完整”、“系統”，根本想不到学是为了用，这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好的。这种使理論和实际相脱节的学习方法，是我們所坚决反对的。

下面几点，就是我軍指战員，特别是連队干部和战士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的一些做法。

从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

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做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具体說来，第一、从国内外階級斗争形势和党的政策出发，进行什么政治运动和重大政治教育，就学什么。第二、从部队的工作任务出发，做什么就学什么。第三、从部队和个人的思想情况出发，要解决什么思想問題，就学什么。不仅在問題发生以后学，而且預見到可能發生的問題，事先学，把学习毛澤东著作作为解决思想問題的銳利武器，是进行經常性思想工作的中心內容。这种做法的关键，就是领导机关要做好調查研究，确切了解实际情况，同时要发动大家根据各自的需要选学有关的文章和章节，摸准“的”，选好“矢”，确实做到用毛澤东思想之“矢”，来射实际工作和思想問題之“的”。每当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党和国家頒布重大方針政策的时候，部队中心任务轉換的时候，某种思想問題带有普遍性的时候，各級政治机关就要针对情况，及时下发学习提示，指出学习重点，介紹学习文件，指导学习。在这样做的时候，許多领导机关还經常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提出毛澤东著作中一些有关的論点，組織文化程度比較低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进行学习。許多連队和班、排，都有一块語录小黑板，駐軍挂在墙上学，行軍背在身上学，练兵摆在操場学，生产竖在地头学。大家体会到，学語录，学毛澤东同志的一些突出的、扼要的論点，有针对性，便于記，便于用，费时少，見效快，是文化程度比較低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澤东著作入門的一种好方法。

党中央、毛澤东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和我軍建設的方針、政策和指示，軍委和林彪同志关于我軍建設的指示，是理論联系实际的榜样。在多数情况下，全軍指战員都是把毛澤东著作同这些指示結合起来学的。这些指示一經下达，部队就聞風而动，及时傳達，认真学习，认真研究，认真領会，結合实际情况，訂出有效措施，全面地系統地貫徹执行。重要的指示，还由负责同志到連队原原本本地宣讲，让党中央、毛澤东同志的指示直接同广大群众見面，組織干部、战士联系实际进行討論，然后解答問題。这样学，能够使干部、战士及时地深刻地理解和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紧紧跟上党中央、毛澤东同志，并从中学到毛澤东思想的新內容，获得政治上、理論上的提高。

讀書、檢查、实践

学习毛澤东著作，对每个人的思想來說，应当是一个兴无产階級思想，灭资产階級思想



的过程，是思想领域里不断革命的过程。因此，要把读书、检查、实践结合起来，认真读毛泽东著作，在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并且把它运用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实践中去。这种做法体现了我们党的传统的整风学习的精神。好八连的“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概括。

要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必须养成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好学深思的习惯。许多同志的经验是要读、谈、想、写，尤其重要的是想。每读一篇文章，都要想想毛泽东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来分析解决问题的，想想它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想想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对改造自己、改进工作有什么启示，等等。

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把毛泽东著作当作镜子来对照检查自己。最怕的是“读书千百篇，思想不沾边”。怎么对照检查？就是看看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讲的，自己是怎么想的；过去是怎么做的，今后应该怎么办。有些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除了提倡同志检查自己的思想行动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外，还用先进人物、先进单位的事迹，对比自己，看看他们怎样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行动，找出差距，努力赶上。

实践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标准，又是学习的继续和发展。对照了，检查了，还得付诸行动。把读书、检查、实践三者结成一个整体，真正做到“看在眼里，印在心里，讲在口里，做在手里”，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进一步体会。读书、检查、实践，再读书、再检查、再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才能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抓重点，反复学

学习同打仗一样，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重点的东西要反复学，不反复学，就不能精通。林彪同志说：“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多实际运用，不要学一下就过去。”由不懂到懂，由懂得少到懂得多，由领会精神到实际运用，是一个反复学、反复用的过程。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也要通过反复学、反复用来解决。同是学习一篇文章，每次带着的问题不同，角度不同，学习的收获也就不同。实践经验、思想修养、理论文化水平提高了，学习的理解程度和应用范围也会有发展。学习一次，实践一次，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提高。

要反复学的重点东西，就问题和观点来说，主要是毛泽东著作中所阐明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无产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就同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关系最密切的文章来说，主要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和观点，大家都反复研究，这些文章，基层干部和战士总是翻来复去地读，十遍几十遍地读。他们把这些文章当作改造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的指针，当作一切工作和日常行动的准



绳。许多同志说：“我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所以我要学习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以党的历史为线索进行学习

我军各院校普遍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线索，来学习毛泽东著作。这种办法，有些部队也在使用。党的四十多年的斗争历史，最好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以党史为线索进行学习，能够更好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学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同志怎样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泽东著作，要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即以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形势和重大事件的基本情况，了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实质，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在同党内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不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了解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和作用。

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是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形成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生动体现。许多基层单位在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还组织大家阅读有关的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英雄事迹等辅助读物，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进行传统教育结合起来。这样学，既有理论又有形象，很受大家欢迎。

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结合起来学

我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在着重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还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一九六二年起，全军高级干部根据不同情况，开始了有计划地、比较系统地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几本、十几本到几十本经典著作。在这个学习中，又重新精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例如在学习《共产党宣言》的同时，阅读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在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同时，阅读《论人民民主专政》、《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把毛泽东著作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结合起来阅读和思考，能够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能够加强对这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同反面材料对照着学

近几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在一系列的革命原则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干部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时候，常常把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言论，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以及帝国主义者评价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拿来对照加以分析比较，看



看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爭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毛澤东同志、現代革命者、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讲的，新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者是怎样讲的。这样，才能够分清真理和謬誤，增强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信心。这是在斗争中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澤东思想的一种好办法，是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一种好办法。

三

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在学习問題上打破了少数人关在房子里讀書的观念。学习毛澤东著作，是全軍指战員自觉的迫切要求。学习毛澤东著作，就是学革命，干革命，就是在广大群众中进行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运动。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两种改造互相促进。因此，在领导工作上，决不能把这一学习停留在課堂上，停留在少数人中間，而要发动群众，因势利导，领导广大干部和战士进行学习。

领导广大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澤东著作，重要的一环，就是不断启发和增强群众的学习自觉性。有了自觉性，就会出时间，出毅力，出方法，出效果。启发自觉性，要靠宣傳，靠教育，靠結合实际反复讲解学习毛澤东著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又不能光停留在动员学习和一般号召上，而要說学就学，說干就干，从学和干的过程中，繼續提高群众的自觉性。事实证明，学有所得，从学习中得到了好处，就学进去了，学习的自觉性也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巩固。

学习既依靠自觉，又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建立制度和启发自觉是相輔而行的。問題在于，学习制度、学习計劃、学习組織形式，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应强求一律。以干部学习为例，有在职学习，有离职集訓，以在职学习为主；在职学习有的是規定每周学半天，有的是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学几天。有集体学习，有业余自学。学习的内容和文件，有統一安排的部分，有个人选学的部分，等等。总之，目的是使学习的組織领导处处符合客观实际，不是一般化的领导。这样，就便于貫徹活学活用的原則，学习也能持久。

学习毛澤东著作，是我軍建設中一件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大事。各級领导机关都做到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军委每年的工作安排，总政治部每年召开的政治工作會議，部队每年四好运动的总结評比，都把組織学习毛澤东著作放在首要地位。各級领导机关，特別注意抓团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对下面干部和战士的学习是一种最实际、最有效的领导和督促。还要注意大力宣傳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培养大批学习骨干，用活的榜样，把全軍的人員都带动起来。

总起来說，毛澤东思想的旗帜要举得高，要采取一套活学活用的学习方法，要加强领导。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学习毛澤东著作的几点主要經驗。今年，我軍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又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新阶段。全軍指战員，决心在全国大学毛澤东著作的热潮中，发揚成績，糾正缺点，虛心向地方学习，使我軍对毛澤东著作的学习，更加普遍，更加經常，更有成效。



学习理論的目的全在应用

王 承 放

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目的，都是为了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去射我們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的”，也就是为了指导实践，为了应用。

用，是学习理論的目的，也是檢驗学习成績的标准。“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贊，就算有了几分成績。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①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毛澤东著作的时候，不管你采取什么学习方法，也不管你先讀什么，后讀什么，讀多讀少，但是，学为了用，学了要用，却不能有所不同。

学結合用，能够打开人的眼界，使人看到真理的光輝，受到真理的哺育。从学得到，用得上，进而才能学得透，用得熟。这一条，对任何人并无例外，也不曾有过例外。

怎么用？要像列宁說的，把学到的原理原則，变成与工作直接联系的活生生的东西，变成实际工作的指針。要为了解决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当中的实际問題，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从毛澤东著作当中，去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解决实际問題，說的是要改造客观世界，要改造主观世界。用，是包括这两个改造在內的。改造主观世

界，經常用毛澤东思想去打扫我們思想上的种种灰尘，目的正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有革命化的思想，才有革命化的行动。思想朝气蓬勃，工作才能虎虎有生气。主观世界的改造沒有止境，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沒有止境。用无止境，学也沒有尽头。这样边学习，边改造，边应用，学用結合，活学活用，反复地学，反复地用，路子对了，就能每学一次，思想登上一个新的境界，工作登上一个新的境界。

学习理論，从不懂到懂，从知得少到知得多，这是一个过程。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原先以为已經都懂了的，經過一段实践应用，又发现过去懂的还很肤淺，很片面，甚至根本还没有懂。每一次这样的新的发现，也常常是进一步領悟真理的开端。这种領悟真理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同，可以有长有短。但是，看到这个过程很重要：一則不会因为开始的无知、少知而妄自菲薄，畏葸不前；二則又不会因为知的多而驕傲自滿，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这种領悟真理的过程，是学的过程，也是用的过程，是学用結合的过程。領悟真理，要从为了用开始，在用中再領悟，又在用中来檢驗的。如此反复

^① 《整頓党的作風》。《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7頁。



学，反复用，思想不断得到改造，认识不断得到提高，工作也就更有成效。

还要提倡思索。精神食粮只有通过思索才能消化，才能与自己建立起血肉的联系。领悟真理，一思二思都不够，还要“三思”，要深思熟虑。只知死背硬记，懒得思索，并不能使人的头脑得到武装，使人变坚强、变聪明的。思索又要结合应用，要为了应用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脱离实际的架空的思索，空空洞洞，是无济于事的。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分析，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出事物的特殊规律，提出解决的办法。这样才能耳聪目明，分析的结果也才会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如果以抽象的概念代替具体的分析，用一般规律代替特殊规律，就不能提出问题，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用，就成了一句空话。列宁说：“不用相当的独立工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①。这里说的独立的工夫，包含具体分析的意思。独立

^① 《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6页。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必须有两股劲，一股是挤劲，一股是钻劲。挤，是善于挤出时间来学习；钻，是刻苦钻研，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我们有许多同志能够经常坚持学习理论，并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总是不能坚持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曝十寒。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不是他们不知道学习理论的好处，二不是他们没有学习理论的愿望，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有时心血来潮，也订计划，学一阵子，但是

一遇到工作忙，有什么事情打岔，或者学习中有什么困难，就会松懈下来。

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人们还没有养成学习理论的习惯的时候，学起来免不了

会有点勉强，会感到是一种“额外负担”。问题在于要经过自觉的努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党章规定的义务，对于广大革命干部来说，是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做好革命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们应该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自觉地去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大家知道，马克思原来是研究法律的，对经济问题并不熟悉，他之所以研究经济问题，正是为了实践斗争的需要。他说：“一八四二——一八四三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

挤和钻

苏
思
本



的工夫，当然不是说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要不，现象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会坠到十里雾中，迷失方向，走上歧途。那离着应用，就更远了。

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有的放矢”，也要有一个过程。没有经过什么锻炼，一下子就想做到箭无虚发，矢矢中的，是不可能的。在分析当中，错了的时候也会有的，这并不是要紧，只要方向对头，勤学、勤练，射中率总是越来越高，不会越来越低。

学会分析，学会应用，并没有什么奥秘

处。奥秘感觉的由来，说到底，还是由于学习脱离了应用。当然也不那么轻而易举。轻而易举的想法，说到底，也是学用脱节所产生的一种误解。毛泽东同志说：“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上的误解就会消除。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学用结合上刻苦勤奋地用工夫。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71页。

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①在十九世纪初叶，列宁为了摧毁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冒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研究哲学上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透彻地研究了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本来不熟悉战争，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才逼着我们去研究战争的规律；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又逼着我们去学习经济建设理论。目前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

挤时间，首先要在工作中去挤。工作同学习理论究竟有没有矛盾？这要看怎样来处理两者的关系。如果我们善于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去学习理论，通过学习理论提高了认识

水平和工作能力，改进了工作，那末，两者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如果我们不善于结合工作、结合自己的思想去学习理论，看不到学习理论的好处，就可能把工作同学习理论对立起来，两者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在工作中树立紧张的作风，合理安排工作，就有可能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挤出一部分时间来学习理论；如果工作拖拖拉拉，秩序紊乱，或者陷入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就很难挤出时间来学习。事情全在于自己的安排。

要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要合理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在业余时间內，正常的文娱体育活动是必需的。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充沛的精力，不可能很好地坚持学习。但是，业余时间只有那么多，一秒钟也不能增加，理论学习和文娱体育活动又必须有个合理的安排。在安排中，我们应该把理论学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8页。



习摆在第一位。大家知道，列宁很重视锻炼身体，喜爱各种体育活动，很爱滑冰，又很重视学习各种外文，喜爱拉丁文课。后来，他发现滑冰和学拉丁文占去他过多的时间，影响他阅读有关工人阶级斗争的、有关革命的书籍，就把这两种爱好放弃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由人来支配自己的习惯，而不要由习惯来支配人。

一个人在业余时间，干什么，不干什么，多干什么，少干什么，往往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安排。如果在这种安排中，本来没有学习理论的时间，每天要挤出一两个小时，半个钟头用来学习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要经过思想斗争。既要同精神上的松懈和思想上的怠惰作斗争，又要同妨碍自己学习理论的旧习惯作斗争。这种斗争在开始时总会给人带来某些烦恼的。但是，只要旧的习惯破除了，新的习惯建立起来了，这种烦恼感自然就会消除。

学习理论，不但要挤，而且要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古董来欣赏，当做教条来膜拜。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但是，要真正做到能够运用理论，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前人的经验表明，只有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办到这一点。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世间有些事情可以请别人帮忙，自己少花一点精力。至于学习理论，却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依赖别人。这种努力，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不花费心血，休想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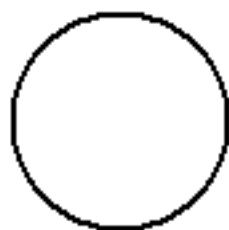
成效。刻苦钻研就是捷径，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就是捷径，反复阅读，耐心琢磨，直到弄懂为止，就是捷径。列宁谈到研究国家问题时，正是讲的这个意思。他说：“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①

列宁在这里谈到的“再三研究”，“从各方面思考”，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决不能把刻苦钻研理解为死啃书本，死记名词，不作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同独立思考是分不开的。熟读的过程，应该同时是深思熟虑的过程。熟读可以加深思考，深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所读的内容。读了不思考，就好比和尚念经，口中念念有词，其实什么也不了解。这种读法，我们当然应当反对。

挤和钻，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常挤时间学习理论，不断获得进步，对钻研理论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反之，钻研理论得到了收获，又会增加挤时间来学习理论的决心。如果挤出的时间，不能有效利用，读书像蜻蜓点水，心不在焉，或者在学习中遇到“拦路虎”便灰心丧气，半途而废，学习理论的良好习惯就不会形成。

挤和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革命自觉性的问题。每个同志，只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革命自觉性，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

① 《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8—429页。



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华东地区在工业战线上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几点体会

韩 哲 一

工业战线上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落后的群众运动，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出现了。这些年来，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比学赶帮”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范围越来越广泛。“比学赶帮”是在工业战线上充分地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效形式；是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好方法。工业生产中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消除一个差距，在新的基础上又会出现另一个差距。我们经常地、有意识地组织后进单位同先进单位比较，找出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就会激发广大职工不甘落后、努力上进的革命干劲，就会使广大职工认清干劲往哪里鼓，上游向哪一方面去争。也就是说，坚持开展“比学赶帮”活动，就可以迅速地和不间断地把落后企业提高到当前先进企业的水平，把先进企业的水平变为全社会的水平，使整个工业水平得到提高。

一九六三年六月以来，在华东地区工业战线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首先是从学习上海工业先进经验开始的。上海是我国一个老的工业基地，老工人比较多，技术基础比较强，协作条件比较好。上海工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在党中

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各兄弟地区的大力支援下，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近几年，又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结合生产，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工作，职工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广大职工中，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生产，钻研技术、遵守纪律、爱厂如家和勤俭节约已经形成风气；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一直没有中断，改造了一些旧设备，创造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制造了一些专用设备，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产品品种也有新的增加。随着工业战线上社会主义教育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很多地方纷纷提出要“学上海、赶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首先以上海的先进企业为标兵，组织华东各省部分企业，分期、分批地按行业由各省工业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领队，到上海各对口企业进行学习。

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中旬到十一月底，各省到上海学习的共有四批，包括轻工、化工、纺织、机械、冶金、手工业等行业的六百多个企业（上海对口厂共五百二十多个），六千



多人，学习的产品五百多种，学到了各种先进经验两万多条。这些经验，涉及到工艺、操作、配方、设计和管理工作的许多方面，绝大部分是不要花钱或少花一点钱就可以运用到生产上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学习到这样多的宝贵经验，解决了很多企业长期没有过关的技术问题，使学习的人树立了学先进、赶先进的信心。上海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给学习的人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通过这次学习，对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奋发图强、刻苦钻研、不断革新的革命精神和树立因陋就简、勤俭节约、重视质量、认真操作以及爱厂如家、遵守纪律的好风气，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下面谈谈我们组织华东各省到上海学习工业先进经验的体会：

第一，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自始至终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不断地找出跟先进企业及国际水平的差距，不断地克服骄傲自满、畏难保守思想，是组织好“比学赶帮”的根本保证。

这次学习上海工业先进经验的活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了普遍提高，强烈地要求改变部分产品质量次价高和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不论是学的人还是教的人，自觉性高，劲头很大，态度谦虚，刻苦认真，做到了包教、包学，出现了很多生动感人的事例；很多人，为了把先进技术学到手，每天起早贪黑赶三班；有些人，白天在厂内勤学苦练，晚上回到宿舍也是分秒必争，写心得、记笔记、练基本

功；有的人还把学到的经验，整理成系统的资料；有些年老艺高的老工人、老技术人员，也甘心当小学生，拜年纪轻的人为师。很多教的人，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学的人，不仅在工厂里教，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动到宿舍去教；有些老师傅对“新徒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不仅教他们练好基本功，还教他们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很多企业，专门调整了班次，抽出了备用设备，为学的人准备了便利实习的条件。这是主导的方面。

由于人们头脑中还残存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学先进经验就不可能没有思想阻力。在组织学习的时候，首先碰到的思想障碍是骄傲自满。这种思想，学的企业和教的企业都有。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学的方面来说：有的企业，夜郎自大，说什么它有“三不学”，小厂不学，新厂不学，不“成套”的经验不学。有的企业，故步自封，认为上海虽然先进，我们也差不多，说不上是“老大”、“老二”，也够得上是“老三”、“老四”。有的企业，唯条件论，强调“可比的指标不落后，落后的指标不可比”。还有的企业认为，产品质量虽然差一些，但是，在市场上还供不应求，这个地区销路不好，别的地区还能销得出去。有些企业提出，学上海可以，反正今天学不会还有明天，至于赶上海，那要慢慢来，短期内办不到。有的人说，要提高质量还可以办到，要降低成本就难办了。有些人，要他重新当徒弟，他感到难为情，放不下架子，只愿“称兄道弟”，不愿拜师学艺。还有一些人有畏难情绪，认为上海技术水平高，条件好，高不可攀，自己学不了。有的人怕别人不会真心实意的教，学不到真本事。



在教的方面：有些企业只看到自己先进的一面，把自己看成是“小西天”，洋洋自得。有少数企业存在着保守思想，生怕别人把它的“看家法宝”学了去，怕别人赶上自己，超过自己，总想留一手。

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克服这些自满、畏难和保守等思想，是扫除障碍，组织好学先进、帮落后的第一关。在学习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思想活动，例如，有些人满足于“一语道破”的经验，不愿寻根究底，不愿扎扎实实地练基本功。有些人急于求成，好高骛远，有些人“心挂两头”，想草率收兵。这些学的人和教的人的思想，集中起来就是肯不肯承认落后的问题；敢不敢揭开落后盖子的问题；愿不愿虚心学习先进的问题；有没有勇气赶先进的问题；能不能真诚帮落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应当如何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企业与企业、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为了解决这许多思想障碍，在开始学习之前，对参加学习的人要首先在省内集中学习几天，由省的负责同志向他们说清楚学先进、赶先进的意义，端正学习态度。特别指出，学先进、赶先进，缩短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改变我国工业落后面貌，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实际行动。组织大家反复地讨论，提高认识。这时，有一部分人还没有完全解决思想问题，他们中间有的人在指标上服输，但是，在思想深处还有保留，个别人甚至想到学习的企业里挑毛病。对这些人，是通过下厂对比，用事实来教育他们。事实打开了他

们的眼界，他们感到不是没得学，而是到处都是“宝”，到处都是“经”，学也学不完。在接受学习的企业里，也要反复向职工进行思想工作，除了讲清楚“比学赶帮”运动的意义以外，要特别强调，对兄弟单位派来的人必须热情接待，必须打破“留一手”的保守思想，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他们。同时，还要讲清楚，每个兄弟厂都有先进经验，必须趁兄弟厂派人来学习的机会，有组织地发动职工“借东风”，主动地向兄弟厂派来的人请教，请他们“献宝”，相互帮助，取长补短。

对学习发生的一些突出问题，更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例如，苏州安利化工厂和上海珊瑚化工厂，解放前，都是资本家办的厂子，在生产技术上各有所长，互相竞争，是冤家对头。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两厂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保守技术秘密这个历史“疙瘩”，一直没有解开。组织学习前，珊瑚厂曾派人到安利厂去学习生产有机玻璃的先进经验，没有拿到全部的技术资料。这次安利厂到珊瑚厂来学习，厂长把技术资料都带来了，但是，又顾虑珊瑚厂不肯把先进技术向他们公开，怕“吃亏”，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会同上海市化工局和江苏省轻化工厅的领导同志，分别反复地向两个厂的同志进行说服教育。向他们指明，互相封锁技术秘密，是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手段，同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志式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正是要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两



个厂在认识到历史“疙瘩”是旧社会所造成的，怕吃亏也是资产阶级“专利”思想的反映，在一次技术交流会上，双方都主动地把“技术秘密”公开了。

总之，“比学赶帮”运动，是一场以先进技术代替落后技术的斗争，是一场先进思想同落后思想的斗争，也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必须首先抓住思想政治工作，抓住活的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使学的人勇于承认落后，树立雄心壮志，敢于赶先进；才能使教的人大公无私，打破“行会”思想，诲人不倦，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才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第二，以产品为对象，分析对比，找出差距，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学习目标，是制定少而精的学习计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好办法。

如何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全区性的学先进、赶先进活动，是一个新课题。工作一开头，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各地、各企业提出的学习计划是比较笼统的、含糊的。比如：有的企业只是提出学习如何增加花色品种，有的企业要学习经营管理，有的人还要求学习如何当好生产副厂长，还有些企业想毕其功于一役，提出的学习项目多到几十个，有的企业提出学习的对口厂多到八、九个，但是，对口厂究竟生产什么产品还没有弄清楚。过去的教训已经很多，如果按照这样的计划学习，或者事倍功半，或者流于形式。

针对着这种状况，我们认为，要搞好这次学先进的活动，首先对学什么和如何着手学习的问题，必须有个统一的认识，必须有

一个具体对象。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当时的提法是：**以产品为对象，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重点。**为什么要以产品为对象？因为产品是否合乎需要，质量的好坏和成本的高低，同一个企业的技术水平、经营管理以至思想作风都有直接的关系。不可能设想，一个基础工作和基本功不好的企业，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也不可能设想，企业的领导人政治不挂帅，作风不深入、不扎实，能够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好。也就是说，以产品为对象，通过具体地分析研究产品好坏的原因，就必然会发现企业经营管理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围绕产品找出什么是好的，需要巩固和提高，什么是不好的，需要克服和改善。反之，脱离产品来谈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就往往陷于空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以产品为对象，应当从找差距入手，采取分析对比的方法。**对比，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对比，一定要比深、比透，既要与本厂历史上最高水平比，也要与先进的企业比；既要重点的比，又要全面的比；既要比后果，又要比前因；既要比技术经济指标，又要比操作、比管理；既要比思想，又要比实物；先进的企业还要和国际先进水平比。比的结果，就可以全面地暴露矛盾，从大量的矛盾之中，就可以找出主要矛盾，从而明确主攻方向，制定少而精的学习计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分析对比，找差距，不仅在学习开始、订计划时要这样做，而且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也要这样做。学中有比，比中有学，比的越深，学的越透。例如，南京有个无线电厂生



产的五灯收音机，交流声大，声音不真，防潮性差，返修率高，外表也不美观，这些质量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这次他们到上海一个无线电厂学习，通过全面对比分析，发现在工艺、操作、材料、配方、装配和检验等六个方面都存在着差距，但是，关键在哪里，不明确。这时，他们又按学习项目，逐道工序，详查细看，对比分析，找出了变压器电阻绝缘不好，是影响收音机性能的关键。但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解决，还是个问题。他们又进一步地搜集资料，并结合本厂的情况，进行反复研究，一步比一步深入，终于找到了解决关键问题的办法。

通过分析对比，还可以进一步克服盲目自满，激发学先进的热情。特别是对比实物，震动最大，真是“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目前，由于各地对产品的质量标准掌握不同，检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如果仅从指标上来分析，还不能确切的反映实际情况，尤其是一些综合性的指标，更是如此。例如：杭州有个布厂生产的棉贡呢正品率是百分之九十八，上海有个布厂只有百分之九十。从指标上看杭州厂先进，因此，杭州厂开始有些骄傲自满情绪，怀疑上海厂是否有经验可学。经过实物对比，杭州厂带来的两匹正品棉贡呢，按上海厂的标准检验的结果，一匹是二等品，一匹是三等品，这才大吃一惊，承认落后，积极学习了。

找到了技术经济指标上的差距，切不可就事论事，还要深入生产实践，蹲下来，钻进去，透过指标上的差距，进一步从思想作风上、经营管理上去找原因。经验证明，凡是这样做的企业，效果都比较好，真正地达

到了“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子。例如：江西有个电机厂，这次到上海革新电机厂学习，这两个厂都是中型的综合性电机制造厂，称得上是“门当户对”。通过对一九六三年第二季度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分析对比，江西的电机厂生产的电动机，不仅质量不好，其他各项指标都落后于上海革新电机厂。全厂总产值低百分之五十三，工人劳动生产率低百分之五十五，平均每台电动机成本高百分之三十八，上缴利润只相当于上海厂的百分之零点一。为什么差距这样大？江西的电机厂的同志开始十分苦闷，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深深地感到，指标上的差距来自思想作风和经营管理上的差距。他们总结出上海革新电机厂有五个方面比自己先进：第一，革新电机厂的工艺装备力量强，工艺方法先进，长期坚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制造专用设备、改造旧设备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第二，革新电机厂在职工中间不断地进行“质量第一”的教育，经常召开质量分析会议，为了保证质量，从原料、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整个生产过程道工序把关；第三，革新电机厂的职工普遍树立了勤俭办企业和多快好省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的观点；第四，革新电机厂职能科室的设置和整个生产组织，都能适应生产的要求，特别是生产准备工作紧密地与生产作业计划相衔接，下达生产任务时，图纸、材料和工、卡、量具齐全；第五，更重要的是，革新电机厂的思想作风好，领导干部处处发扬民主，并坚持下车间参加劳动，工人劳动纪律好，责任制度健全，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相互扯皮少。他们找到了



这些差距以后，对如何提高思想、改进作风、改善管理，有了深刻的认识，改进的决心也就大了。

从点的情况来看是这样，从面的情况来看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各省到上海来学习的四批企业为例，这些厂在与对口厂可比的五千七百多项技术经济指标中，质量、原料、材料消耗、单位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指标，都与上海厂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各省企业赶上上海企业现有水平，不仅产品质量可以大大地提高，而且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原料、材料，增加巨大的财富。各省企业与上海企业之间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差距呢？有些同志说得好：“千差距，万差距，归根到底是思想作风和经营管理上有差距。”这几年来，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无疑是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比如说，目前还有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有的只注意抓生产，不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也不善于通过生产去抓思想，通过抓思想来推动生产。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企业工艺管理混乱，技术监督不严；有些企业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思想；有些企业缺乏定额管理，原始记录不健全；有些企业的劳动组织不合理，非生产人员过多，效率很低。特别是还有少数企业的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不扎实，忙忙碌碌，拖拖沓沓，不钻研业务，甘当外行。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技术经济指标上的差距，是不可能缩短的。

第三，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跟班劳动，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学，是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真正把先进经

验学到手的有效方法。

过去，有许多企业到先进单位去学习经验，派出学习的人往往不配套，派了工人不派技术人员，派了技术人员不派工人，厂长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学习的很少，严格说来，只是一种参观访问。有的人说，过去来上海学习是“车间看看，科室跑跑，听听介绍，抄抄资料”，就算完了。有的企业，到外地学习还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厂，三分之一的时间玩玩逛逛。这种学习是花了钱，浪费了时间，又学不到东西。这一次，改变了做法，我们强调，学习先进经验必须组成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班子。在人员选派上一定要选择那些思想政治好，事业心强，业务熟悉的人。厂长应当是主管生产的，技术人员应当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工人应当是积极分子或生产能手，而且工种必须与学习内容相适应。这个“三结合”的班子，到了对口厂以后，也不像过去那样，厂长找厂长，技术人员找技术人员，工人找工人，而是结合在一起，跟班劳动，跟班研究，边学边干，下硬功夫，练基本功。工人都要拜师学艺，参加操作。厂长和技术人员都要按照工序，对照工艺，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问题。按计划内容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学，学习一项，小结一项，学好一项，再学一项。

实行“三结合”，干部跟班劳动，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在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中实行“三结合”，好处是：厂长跟班劳动，耳闻目睹，体会深刻，推广先进经验容易下决心；技术人员跟班研



究，理論与实际結合；工人参加操作，对先进經驗能說又能做，既能学到知識，又能学到实际操作本領；成套地來人，成套地学，回去之后就可以成套运用。例如：福建泉州蓄電池厂，为了解决蓄電池极板的缺口問題，一九六一年底曾派技術人員到上海蓄電池厂学习澆鑄极板的新工艺。学习回去以后，提出了保证极板的质量必須提高澆冒口的建議，但是，这样做費工，工人思想不通。由于厂长不懂得这项工艺的作用，就沒有支持技術人員的意見，新工艺也就沒有采用。这一次，他們組成了“三結合”的班子，到上海蓄電池厂学习，其中有个項目还是这个澆鑄极板的工艺，但是，工人动手干了，厂长亲自看了，对提高质量确实有效，認識才取得一致。徐州淮海皮革厂，在一九六三年三月，曾派技术科长到上海联合皮革厂学习把次山羊皮做成好革的經驗，由于只看看資料，学学理論，沒有参加实际操作，因此在推广时，工人提出原料发粘不好干，科长也沒有办法，只好另派工人去补课。工人学习操作經驗回来以后，由于厂长体会不深，支持不够，始終沒有推行开。这次，厂长同技术科长和工人“三結合”一起学习，学到了成套的先进經驗以后，厂长亲自主持推广工作。到十一月底，学到的十五項經驗，已有十三項运用了，山羊皮革十一个质量指标，已經有十个达到了部頒标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十六。有些指标还赶上或者超过了上海对口厂的水平。

这次組織学习，由于实行了“三結合”，特别是抓住了厂长跟班劳动、跟班研究这个重要环节，大大地提高了工人、技術人員的

責任感和积极性，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有的厂长說：“过去在厂里虽然也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但是沒有結合好，經過这次学习，才真正知道了怎样‘三結合’。”有的工人对厂长說：“如果在家里也是这个样子干，咱們厂子的生产早就搞好了。”

通过这次学习实践，大家对中央号召干部参加劳动的偉大革命意义，也有了切身的体会。进一步認識到实行“三結合”，干部必須参加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地了解生产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及时地同群众商量，通过群众路綫，解决問題。这是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搞好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干部又紅又专的具体途徑。

第四，工业管理部門的負責干部要参加学习，面向基层，为生产服务，是领导好“比学赶帮”运动的組織保证。

要提高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或者提高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不但要依靠这个企业本身不断地努力，各級工业管理部門也必須不断地改进领导作风，面向基层，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为企业創造必要的条件。从这一点出发，我們組織了各級工业管理部門的干部参加了这次学习上海先进經驗的活动。这种上下結合的办法，是一个好經驗，不仅加强了对这次学习的組織领导，鼓舞了职工的士气，增强了学习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使工业管理部門的干部，通过学习，具体地認識到自己的弱点，学习了別人的长处，进一步体会到提高工业管理水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学习的組織领导方面，这次突出的特



点是，各級工業管理部門的負責同志親自參加領導學習，組織領導小組，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通盤地安排學習計劃，具體地領導學習活動，以及保證學習任務的順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領導小組除了自始至終地抓思想政治工作以外，還認真地審查了學習計劃，凡是計劃訂得不具體、不落實的，都重新修改落實。在人員組成上，不符合“三結合”要求的，即使到了上海，我們本着一絲不苟的精神，也經過勸說、動員，進行調整。為了督促和檢查教學的效果，在學習的後期，領導小組的成員同對口廠的有關人員一起，特別認真地抓了鑑定和驗收的工作。鑑定、驗收，實際上就是“考試”，主要是檢查學到的先進經驗是否能夠運用操作，是否能夠有條理的說明技術原理，關鍵項目是否學深、學透，學習總結是否作好，貫徹先進經驗的措施是否切合實際，等等。鑑定、驗收不合格的，還要“留級”補課。

這次學習實際上也是一次大評比、大檢查、大摸底，對工業管理部門改變領導作風，提高管理水平，是一個很大的促進。很多同志体会到要把本地區、本部門所屬的企業办好，必須結合生產，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認真做好人的工作，充分地調動職工羣眾的社會主義革命幹勁和生產積極性；發揚艱苦奮鬥，勤儉辦企業的精神，加強經濟核算，講究經濟效果；堅持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自力更生，裝備自己；樹立質量第一思想，精益求精，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工業管理部門的負責幹部參加學習，對如何面向基層，如何更好地為生產服務，切

實合理地解決企業本身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比如，過去對下達計劃，固定生產協作關係，組織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定點供應，充實技術力量以及解決必需的技术組織措施費用等等，總是拖拖拉拉，不能及時解決。現在認識到這都是管理部門的經濟技術業務，應該积极主动地办好，為基層企業建立正常生產秩序創造條件。目前，各省工業管理部門正在積極着手解決這類問題，對鞏固學習成果，推廣先進經驗，提高質量，降低成本，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上面所談的，只是我們在組織學習中幾點初步体会。當然，這次組織學習也還有不少缺點，特別是對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工業管理方面的經驗，全面地、系統地學習不夠，在深入開展“比學趕幫”的運動中，需要補上這一課。

隨着“比學趕幫”運動廣泛、深入地發展，目前華東地區工業戰綫上，已經形成一個你追我趕、我學你幫的熱潮。今後，我們一方面要督促各省把已經學到手的經驗，因地制宜地採取有效措施，切實地加以推廣，使其在本省開花結果。另一方面，還要在組織好本地區的“比學趕幫”運動的同時，進一步有計劃、有領導地組織各省工業領導機關和一些企業，派人到全國各兄弟地區去學習好經驗、好作風、好方法。我們堅信，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認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比學趕幫”運動同有領導地開展羣眾性的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活動結合起來，工業戰綫上的增產節約運動，一定能夠掀起一個新的高潮。我國的工業生產水平一定能夠得到迅速的提高。



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情况

何祚庥在《红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谈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两年来，《学术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分别发表了杜雷、吴俊光、陶德麟等同志的文章，他们就讨论中的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何祚庥又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号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他们的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在讨论中，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科学理论经实践检验为正确以后，还要不要修改？**

何祚庥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

也就是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他又说：“即便是那些由于预言过新现象并得到实验证实的理论，也仍然可能由新的实践表明它们有一些不灵的‘预言’。”^①何祚庥以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

方程为例，来论证自己的看法。何祚庥说，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方程的正确性，是由于它对“位移电流”、“电磁波”等现象做了一系列的预言并经实验加以验证后，从而证明方程式的正确。可是当人们把马克斯威尔方程应用到电子绕原子核的运动时，那末马克斯威尔方程将“预言”电子会不断辐射能量，而最后就要堕入原子核中。何祚庥说，“实践却表明这种‘预言’是完全不正确的”。

何祚庥认为，实践验证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由个别来检验一般，由有限推出无限。他说，实践是个别的、具体的、有限的，理论是一般的、普遍的、无限的，“而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却决不是一两次的实践就能穷尽的。因而对于那些普遍理论来说，即使它们已有实践验证为正确，但是在理论的概括中，总是免不了‘内插’或‘外推’，或者说，总是有一个把有限转无限的过程。既然有了‘内插’和‘外推’，那末新的实践就有可能表明这种‘内插’和‘外推’是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也就产生所谓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了”。

杜雷和吴俊光认为，何祚庥关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论述，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实践的基础上，并经实践验证的自然科学理论，似乎仍然不甚可靠。“如果离开实践标准的可靠性来谈它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实质上就会否认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标准”^②。

① 《不能离开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见《新建设》1962年11月号，以下所介绍的何祚庥的意见，凡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② 《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所介绍的杜雷和吴俊光的意见，凡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他們认为，何祚庥的錯誤在于把限定在一定条件下經由实践檢证过的部分和另一条件下未經实践檢证过的部分混为一談。例如，对于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方程預言的正确和不正确，何祚庥也是把在一定条件下曾被实践檢证为正确和在另一条件下未經实践檢证为正确混为一談。

杜雷、吳俊光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提出这样的看法：“一切有限的实践都只能引起有限自然界的變化，获得有限自然界的認識。它只能在它的作用範圍內認識科学理論。验证科学理論，在这个範圍內，它是完全可靠的标准，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绝对的；同时，正因它只能在这个範圍內才适用，所以，它又是相对的，在这个範圍以外使用它，就会得出錯誤的結果。”

何祚庥在反駁文章中，不同意杜雷和吳俊光的这个看法，认为他們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論述，是以使用範圍来立論的，是抽去了“真理界限的可變易性”这一面，“他們不是历史地具体地来看待所謂实践檢证的作用範圍”。

陶德麟认为，关于实践到底能不能确切地证明某一認識是真理或錯誤的問題，何祚庥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承认实践是能够确切地证明某一理論是正确或錯誤，另一方面又說科学理論經实践檢证为正确后还要修改（陶德麟认为，何祚庥这里所說的“修改”，并不是通常所說的发展、深化等，而是指部分地推翻）。^①陶德麟认为，何祚庥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是：沒有把真理的客观內容同真理的适用範圍（或界限）这样两个問題区别清楚，因此，就不能正确地說明实践能

够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不能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陶德麟說，一种認識是不是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內容，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对象相符合，实践是能够确切地证明的。这是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的表现。另一方面，科学理論中确实还有不能为实践所确切地证明的东西，那就是关于真理的适用範圍問題。这是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相对性的一面。陶德麟认为，何祚庥的观点“是一种导致混淆真理和錯誤的界限的相对主义观点”，“实际上抹煞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在关于实践标准問題的討論中，还联系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应如何区分的問題。

何祚庥认为，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是認識上的两个环节，应当按照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或完善程度来划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②绝对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認識，它不会为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他說：“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人們的实践已达到高度的水平，而我們所研究的事物又是足够地簡單的話，那末或許可以认为对于某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是绝对真理”。例如，质量和能量的守恒定律，也許多多少少可以作为这种終极的真理的例子。何祚庥认为，相对真理也是基本上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識，但这只是不完整的、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識。这种知識将在科学往后的发展中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并日益深化、精确和具体。何祚庥认为，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① 《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几个問題》。見《新建設》1963年10月号，以下所介紹的陶德麟的意見，均引自此文。

② 《論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見1963年8月6日《文汇报》。



归結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不是十分确切的。“这便意味着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只是在范围上有所扩张”,“相对真理中不够完善、不够精确的部分也将进入绝对真理了”^①。何祚庠也不同意“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这种看法,认为是“脱离了历史观点,而把真理看作是某种不变化、不发展的东西”^②。

杜雷、吴俊光和陶德麟都不同意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看作两种不同的真理。他们认为,任何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杜雷和吴俊光认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都是同一个客观真理,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从不同的意义来考察。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总是具体的,总是从局部的有限的世界开始,每个局部世界的认识对全部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言,是相对的。而且,对于局部世界的正确反映,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这些意义上看,每个客观真理是相对真理。但是,具体事物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局部世界与全部世界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相对真理同时又是绝对真理,两者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③

陶德麟认为,任何真理,总是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某一具体过程的正确反映。这个具体过程本身是相对的,因而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的认识也是相对的。而且,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总不能把这个过程的一切都穷尽地反映出来,因而即使仅就人们对于某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来说,也是没有穷尽的,任何时候的认识也只是相对正确的。从这个意义来看,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真理。但是,作为真理的内容的某一个相对的具体过程,又是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的一个部分,又具有绝对物的本性。而且,就已经正确

地反映了的那些方面来说,认识同对象的符合也是绝对的。从这个意义来看,任何真理又都是绝对的,都是绝对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杜雷、吴俊光和陶德麟都不同意用全面不全面、完善不完善作为标准来划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陶德麟说,所谓全面和完善本身是相对的。任何真理,从它是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这一点来说,都是全面和完善的;从它还没有穷尽客观对象的一切,还需要深化和发展这一点来说,又都是不甚全面和不甚完善的。

杜雷和吴俊光认为,以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来划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必然陷入相对主义。他们说,有人认为发现原子内部存在电子,这就是绝对真理。但是,随着原子科学的发展,在原子核中还不断发现新的粒子。显然,电子的发现,又比较得很不精确了,那末还是不是绝对真理?这样,人们也就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的认识。他们认为,何祚庠的错误在于“把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正确与否混为一谈”。

在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所涉及的有些问题,同两、三年来学术界讨论真理同错误的关系问题是有联系的。一九六二年以来,《文汇报》、《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报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讨论了相对真理是否包含错误等问题。讨论情况可参见《新建设》一九六二年九月号和《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的综合报道。(展 麟)

①② 《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见1963年8月6日《文汇报》。

③ 《正确运用历史观点探讨真理的问题》。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

——与何祚庥同志商榷

杜 雷 吳俊光

关于什么是相对真理,什么是绝对真理,何祚庥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认识上两个不同的环节,应当“按照反映客观现实的完备程度或精确程度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正确地阐明“真理是一个过程,它要随着历史条件而不断发展”;同时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正确地阐明“这种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真理,仍然是客观事物在主观认识上的正确反映而不是歪曲的反映”^①。

我们认为,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不能以认识的精确程度或完备程度来区分的。人的一切认识都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认识的精确程度或完备程度是没有终结的。在我们看来,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它经由实践检验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就是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都是指这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认识。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总是从每个具体事物(即局部的有限的客观世界)及其各别的发展阶段开始,这种认识过程一个接一个地无限继续,便日益接近(不是穷尽)对全部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每个局部的有限的客观世界对于全部的无限的客观世界而言,是相对的。关于每个局部的有限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全部无限客观世界的认识来说,也是相对的,它将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就这一点看,正确的认识就是相对真理。同时,这种正确的认识是和绝对存在的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就这一点看,它又是绝对真理。承认认识的绝对真理性,不在于它反映客观现实的完备程度或精确程度,只在于它和绝对存在的客观世界相符合,它不会被推翻或修改,因此,它又是永恒的真理。但它仍要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不是终极的真理。

关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问题的争论,问题在于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何祚庥同志认为,由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也可能由“新的实践”证明它是不完全正确的,而要加以修改。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篇文章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实践在检验真理方面,究竟起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作了深刻的阐明。他说:“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

① 《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1963年8月6日《文汇报》。

① 《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1963年8月6日《文汇报》。



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①这就是说，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唯一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那末，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的认识，是否还有和客观实际不符合的部分呢？

何祚庥同志认为：“拿已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论来说，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只是相对正确的。”“对于那些已有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我们仍应持批判的态度。”^②又说：“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也就是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③在他看来，由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认识，还包含有不符客观实际的、将被修改的成分。

事实并不如何祚庥同志所说的那样。科学史证明，一种理论之所以被推翻或修改，不在于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没有真正为实践所证明，或未完全被证明。何祚庥同志在考察真理问题时，忽视了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那个理论创立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

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④如果认为经过实践甚至大量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那就谈不上通过实践，可以纠正理论的不完全性和错误，谈不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但是人们的理性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还要再回到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判明。在检验中，它的真理性不完全的，由实践纠正其不完全性；错误的，由实践纠正其错误。

但是，怎样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呢？

何祚庥同志说：“从逻辑上说，由实践来纠正理论上的错误，是比较容易符合逻辑上完备性的条件的。由三段论知识告诉我们，要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题，只要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行了。但是要由实践来证明一个普遍命题，却要复杂一些。因为一切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而理论却总是某种一般性、普遍性的无限的东西。”^⑤

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这是人类认识史告诉我们的，也是科学发展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理解的实践，经过实践

①④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281—282页。

② 《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红旗》1962年第2期，第23页。

③⑤ 《不能离开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40、39页。



檢驗認識是否正確，是否符合于客觀實際，這同形式邏輯的三段論式，同完全歸納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形式邏輯不能證明科學理論，相反，形式邏輯的前提是否正確，需要由科學來證明。其實，所謂“理論却總是某種一般性、普遍性的無限的東西”，這表明認識是處于理性認識階段，而不是實踐檢驗認識的過程。理論的真理性，還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因此，必須由實踐來檢驗其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錯誤。至于“要由實踐來證明一個普遍命題，却要複雜一些”，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討論的是實踐能不能確切地證明認識的真理性問題，而不是實踐檢驗認識複雜不複雜的問題。理論概括中包含有不符客觀實際的部分，是由于這些部分未經實踐檢驗，而不是由于實踐標準的相對性。

何祚庥同志還說：“問題在于在實踐檢證科學理論過程中，其基本內容是由個別來檢驗一般，由有限推出無限。而個別和一般、有限和無限之間的矛盾的解決，却決不是一兩次的實踐就能窮盡的。因而對於那些普遍理論來說，即使它們已有實踐檢證為正確，但是在理論的概括中，總是免不了‘內插’或‘外推’，或者說，總是有一個把有限轉無限的過程。既然有了‘內插’和‘外推’，那末，新的實踐就有可能表明這種‘內插’和‘外推’是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① 這段話令人費解。這裡說的由個別檢驗一般，由有限推出無限，顯然是理性認識的問題，不是實踐檢證的基本內容。而認識達到理性階段，只完成認識過程的一半，如毛澤東同志說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② 理性認識還須再回到實

踐去檢驗。既經實踐檢驗為正確，對於有限客觀世界的一次認識過程就算完成了。如果說還有什麼理論概括中的“內插”或“外推”，那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進一步的新的認識過程的理性認識階段。其中的“內插”或“外推”，當然仍將再回到新的實踐中去檢驗，證明哪些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哪些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大家知道，要求實踐檢驗窮盡理論概括的一切，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實踐能檢驗多少就算多少；那些當時不能檢驗的認識，終將由往後的實踐來檢驗，確證它是真理還是錯誤。因此，絕不能把未曾檢驗的認識當作已經檢驗的；也不能把當時人們錯誤地認為檢驗過的認識當作已為實踐證明的真理。何祚庥同志所謂“新的實踐就有可能表明這種‘內插’和‘外推’是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只不過是新的實踐證明這些認識並未真正被檢驗過罷了。所以，這個論斷是不能成立的。何祚庥同志的錯誤，在于把尚未檢驗過的理性認識當作已由實踐檢驗證實的真理，因而得出在被檢證過的認識中，還有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內插”和“外推”的結論。

在我們看來，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絕對性是實踐標準的兩個方面，它們和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具有同等的意義。對於全部的無限發展的客觀世界、絕對自然界的認識，只能實現于有限認識的無限繼續中。或者說，對於無限的客觀世界、絕對自然界的認識，只能依賴于有限實踐的無限繼續。一切有限的實踐都只能引起有限自然界的變化，

^① 《新建設》1962年11月號，第41頁。

^②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0頁。



使人們獲得對有限自然界的認識。因而，人們只能在實踐的作用範圍內認識客觀事物，驗證科學理論。在這個範圍內，實踐是完全可靠的標準，就這個意義而言，實踐標準是絕對的；同時，正因為它只能在它作用的範圍內才適用，超出這個範圍以外使用它，就會得出錯誤的結果，而隨着實踐的無限延續，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也就不斷發展（這個過程是無窮盡的），所以，實踐標準又是相對的。

何祚麻同志在論述實踐作用的範圍及其使用的範圍時，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所謂使用範圍是怎樣確定的？”^①這確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能否這樣說：人們可以在實踐作用範圍之外來檢驗人們認識的真理性？能否這樣說：由於這種超出實踐作用範圍以外檢驗認識，得出錯誤的結果，就可以肯定為實踐確證的真理（相對真理）包含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東西呢？不，我們認為不能這樣說。這裡的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東西，實際上是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認識，被人們錯誤地認為已由實踐檢驗過了。這種認識之所以不符合客觀實際，或包含錯誤，是不足為奇的。至於這個範圍怎樣確定呢？當然還是由實踐確定，或由進一步的實踐確定的。何祚麻同志說：“因為隨着實踐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認識也就不斷發生變化。而在早先人們曾經認為實踐已做了確切證明的理論，就可能在新的條件下來修正原有的結論，更精確地確定它的界限。”^②我們認為，這種修正，並不是由於實踐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人們認識的不斷變化發展，而是因為它被錯誤地認為已由實踐確切證明的理論。問題還不止於此。何

祚麻同志接着說：“正因為這樣，所以必須對歷史上一切自然科學理論（包括已有一定的實踐證明為正確的那些理論）持批判的態度。”^③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依我們看來，對於已有一定的實踐證明為正確的那些理論，如果還必須持批判的態度，那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足以表明客觀世界的可知性和作為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的東西，這在實質上就否定了實踐標準。

關於實踐標準問題，列寧說過：“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列寧接着又說：“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④這就告訴我們，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的認識，是不應當懷疑的。但是，也不能把已由實踐檢驗為正確的那些理論，當做僵化的、凝固的教條。何祚麻同志肯定每一歷史階段上的實踐總不免有局限性，因而它不能完全證實或駁倒所有的認識；也肯定今天實踐還不能證明的認識，在明天和後天的實踐中終將得到證明。我們完全同意這種見解。但是，何祚麻同志卻認為，那些已由實踐檢驗為正確的認識只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這就意味着還包含有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成分。這樣一來，就不是實踐不能完全證實或駁倒所有的認識，而是連一個認識也不能完全證實或駁倒了。這種看法，我們不能同意。

^{①②③} 《新建設》1962年11月號，第39、40、42頁。

^④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2—143頁。



实际上，所谓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对同一个实践而言，这里并不存在两个不同的实践。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有限的，有限对无限而言是相对的。它只确证有限世界的认识，因此，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同时，经它确证的任何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无限的东西的正确认识，因此，这种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在本质上是绝对的。对于这种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界限，何祚麻同志认为未免成为“空中楼阁”。如果按照何祚麻同志的这种看法，那就只有把同一个正确的认识看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包含将被推翻或修改部分的“真理”；另一个是不包含这些部分的真理。同样的，也只有把同一个实践标准看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检验相对真理的标准，只具有相对性；另一个检验绝对真理的标准，只具有绝对性。果真如此，那恰恰是以非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我们认为，凡经实践检验为正确的认识，都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不会有错误成分。人们通过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意义，就是指用实践来检验理论概括中，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那些已被证明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不会再为“新的实践”所推翻，不存在“内插”和“外推”而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新的证明。

恩格斯曾举显而易见的科学事例来说明实践检验真理的作用。他说：“氯和氢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受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合成气体氯化氢；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

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了上述的条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这件事情，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千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① 恩格斯在论归纳和分析时也說：“在热力学中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证明归纳法之妄图作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甚至占统治地位的形态的想法是如何地没有根据。从热当中能够得出机械运动，这点已由蒸汽机提供了最令人信服证明。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更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②

恩格斯举出的这两个科学例证，证明实践能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现在科学已发展到原子能时代，但对于氯和氢在一定条件下就会爆炸而合成气体氯化氢和一部蒸汽机证明从热当中能够得出机械运动的理论的正确性，依然是完全可靠的。如果像何祚麻同志那样要求实践穷尽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那么，不仅一二次实践，就是亿万次实践，也不可能穷尽的。

何祚麻同志认为，经由实践甚至大量实践充分证明为正确的理论，还会为新的实践表明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要加以修改。为了证明上述论点，何祚麻同志举出了牛顿力学、宇称守恒定律等科学史上的事例来说明。但从他自己的分析中，却不能证明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就牛顿力学来说，当人们能处理那些速度接近于光速的粒子以后，牛顿力学就发展成为相对论；但是，在物体运动速度缓慢的情况下，为大量科学实践确证的牛顿力学仍

^{①②}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5、190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然是永恆的、不被推翻的真理。新的實踐只是表明，牛頓力學未曾在高速運動的情況下被檢驗過。

就宇稱守恆定律來說，新的實踐證明，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是不守恆的；但是，在電磁相互作用過程內，曾經由大量實踐證明的宇稱守恆定律並未被推翻或修改。

同樣地，在“位移電流”、“電磁波”等等現象下，曾經由實踐確證為正確的馬克斯威爾電動力學方程，並不因新的實踐證明它應

用到電子繞原子核運動時的“預言”完全不正確而被推翻。

由此可見，何祚麻同志用來論證自己論點的一些事例，恰好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和可靠的客觀標準。相反地，證明何祚麻同志所謂“科學理論經由實踐檢驗並證明它為正確，而在以後又要加以修改的這種事實，也就是實踐標準的這種相對性——完全是歷史上合乎規律的現象”的論斷，是完全不符合於客觀實際的。

再談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實踐標準問題

——答杜雷、吳俊光、陶德麟等同志

何 祚 麻

實踐標準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如何體現和具體運用，是科學研究方法上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自然科學研究中科學的真理是怎樣形成和建立的。我曾在《論自然科學研究中有關實踐標準的若干問題》、《不能離開歷史觀點理解實踐標準》等文^①中，對於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討論。不久，看到杜雷、吳俊光以及陶德麟等同志提出不少商榷性的意見。^②現在，就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絕對性這兩個問題，再談談我的意見。

一 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

馬克思主義真理論曾經着重討論了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客觀真理是否存在，它可以

被人們認識，還是不能被人們認識。第二，人們如何認識客觀真理，它是一下就被人們完全認識，還是逐步地被人們認識。對於第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作了肯定的答復，認為客觀真理是存在的，並且是可以被人們認識的。對於第二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指出，人們對於客觀真理的認識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人有絕對的和無限的認識客觀世

^① 見《紅旗》1962年第2期；《新建設》1962年11月號。

^② 杜雷、吳俊光：《關於實踐標準的理解和運用》，《學術研究》1962年第4期；《正確運用歷史觀點探討真理的問題》，《學術研究》1963年第3期。陶德麟：《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幾個問題》，《新建設》1963年10月號。本文在下面引用他們的意見，只注期刊和頁數。



界的能力，能全面而完善地認識客觀真理；但是對於具體的個別的人來說，在認識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上却不能做到這一點，只能在一定近似程度上認識客觀世界的某一些片段、某些方面和某些範圍。隨着社會實踐的不斷發展，人們所認識到的這些片段、方面、範圍，便不斷地擴展，逐漸全面而又完善地認識客觀事物。恩格斯在論述黑格爾的哲學時指出：“真理包含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①。列寧也指出，“真理是過程。”^②牛頓力學曾經有一個時期被認為是力學上的永恒真理，而到了現代，牛頓力學已發展為狹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可是狹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不是什麼永恒真理，狹義相對論已進一步發展為廣義相對論，量子力學已進一步發展為相對性量子力學或量子場論。馬克思主義也是在不斷發展着的。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③由此可見，真理確實是不斷變化、發展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引進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概念。絕對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真理，它不會被後來的科學和實踐的發展所否定。相對真理是正在發展、變化中的真理，它也是正確反映客觀實際的真理，但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條件下反映客觀現實的真理，它要隨着科學和實踐的發展而不斷修改、補充並日益精確、完善。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是人們認識客觀真理的兩個環節。在認識發展的某一階段上，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可是在這種相對的

真理性中，總包含有絕對真理的顆粒，而全部相對真理的總和就構成了絕對真理。

可是，在杜雷、吳俊光以及陶德麟等同志的文章中，對於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概念以及它們的辯證發展關係，卻做了另一番理解。杜雷和吳俊光同志認為，不應就“反映客觀實際的精確程度”作為“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區分的標準”，如果作了這種區分，就意味着“相對真理可以允許包含部分錯誤的東西”，便會由於自然科學理論的不斷變化和發展而永遠達不到絕對真理，“結果必然陷入相對主義”^④。杜雷和吳俊光同志還進一步斷言，“相對真理的全部都是絕對真理”，“一切真理既是相對的，同時又是絕對的”^⑤。陶德麟同志也不贊成用全面和完美與否作為劃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標準，認為“用全面不全面、完美不完美作為標準來劃分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實際上也是分不清楚的。原因在於：所謂全面和完美本身就是相對的。”^⑥同時他也認為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並不是兩種不同的真理，任何真理既是相對真理，同時又是絕對真理。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這就取消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在質上的區別，因而就沒有什麼必要在馬克思主義真理論中引進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概念。第二，更重要的是，

①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頁。

②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5頁。

③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④⑤ 《學術研究》1962年第4期，第12、15、11頁。

⑥ 《新建設》1963年10月號，第93頁。



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真理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概念，然而这完全不符合于科学史发展的事实。

恩格斯曾指出：“关于事物的知识，在其本质上对于漫长系列的世代来说都是相对的，只是逐步的趋于完善，或者如宇宙论、地质学和人类历史，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①列宁也说：“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反映客观实际的完善、精确与否来阐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概念的。他们从来没有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看作是同一种真理，而是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当作是认识上的两个环节，认为人们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是通过相对真理而逐渐地接近于绝对真理的。列宁指出：“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③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④

可是，如果像杜雷等同志所宣称的“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的话，那末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概念上，就完全没有真理的精确、完善与否的区别，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也就没有这种由相对真理不断地接近于绝对真理的发展、变化了，于是这就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论中抽去了历史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可是，并不像陶德麟等同志所理解的那样，认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仅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或相对真理就是绝对真理。列宁曾指出，“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⑤。显然，所谓相对真理中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同列宁所说的相对真理中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是完全不相同的意思。由相对真理来构成绝对真理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上的积累，它同时也是内容上一系列的飞跃、发展的过程。这种变化、发展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它将愈来愈精确而完善地反映着客观现实；第二，它将有愈来愈宽广的适用范围，并且它所适用的界限也将愈来愈制定得具体、确切。但是，在相对真理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看到它在适用界限和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上变化、发展的一面以外，还要看到在真理发展过程中吸收和继承的一面。新的理论比起旧的理论在内容上虽然是大大扩展了，但是新的理论却总是概括着旧的理论作为它的一个特殊情况。例如，相对论就一方面比牛顿力学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而另一方面又概括着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殊情形，而当物体的运动速度较慢时，相对论就自动地还原为牛顿力学。

可是，承认牛顿力学可以作为客观真理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③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6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③④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179页。



而保留下来，是不是就像陶德麟同志所宣称的那样，这“就等于承认它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①呢？我感到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第一，牛顿力学并不是简单地被吸收到相对论的理论中来，由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还有一个批判和改造的过程，牛顿力学主张所谓“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而在相对论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就较牛顿力学中时间、空间的理论更为精确地符合于客观实际。第二，即便在物体运动速度较为缓慢的条件下，所谓相对论可以归结为牛顿力学，只不过是说牛顿力学的算式是相对论算式的第一级近似，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异仍然可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实际上，为相对论奠定基础的一个极重要的实验，——迈克逊、摩雷测量地球对于“以太”相对运动的实验，就是测量相对论和牛顿力学之间的这种微小差别的。

由此可见，所谓相对真理的发展、变化，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数量上扩展的过程。

杜雷和吴俊光同志认为，如果以“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来“作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区分的标准”，就意味着“似乎相对真理可以允许包含部分错误的东西”^②。我感到这是把认识中的错误和真理中的不完善性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正确的东西决不能说是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也决不能说是正确的东西。把真理说成是错误，或者把错误说成是真理，就叫做混淆了真理和错误、是和非之间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不赞成相对真理可以包含有部分错误的意见的。因为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的一个根本思

想，就是从真理的发展性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有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对立。承认相对真理可以包含有部分错误或个别错误，就意味着在这种“部分”或“个别”上对于相对主义或不可知论作了让步。

可是，承认真理和错误之间的绝对的对立，却并不意味着要否认真理有不十分全面、完善和较为全面、完善的差别。人们对于某一客观事物的认识还不够完善，并不等于说这就是错误的认识或认识上包含有错误。某一自然科学理论在定量关系上还不够精确，并不等于说这个理论有错误的部分。一个平面镜中的映象并不就是原来的物体，但是它和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中的映象仍有原则上的区别；由齐白石寥寥数笔所构成的画面，和现代派、未来派的“杰作”也不能不是原则上的区别。前者是客观事物的近似正确的反映，而后者却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了。在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过程中，固然不是剔除相对真理中的错误部分而逐渐接近于绝对真理，但是确实要不断修改相对真理的认识中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部分，而如果没有这种“修改”，就没有真理的变化、发展的过程。

对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概念做了如上的理解，也不会像杜雷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导致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结果必然陷入相对主义”。

列宁曾指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

① 《新建设》1963年10月号，第93页。

② 《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第12页。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辯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約的意义上,承认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对性。”①

为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承认“一切知識的相对性”,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承认不致于导致“否定客观真理”呢?这是因为:

第一,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間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发展前提,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发展的“极限”。在認識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人的認識虽然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是就認識发展的趋向來說,它却要一天天趋于完善、精确。正是由于人的認識具有这种日趋完善、精确的性质,因而这种十分完善、十分精确的绝对真理就作为发展的“极限”而存在着,这正如数学上无限发展的貫数,它要收敛于某一极限值一样。

第二,绝对真理并不脱离相对真理而存在着,在相对真理中間总是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人們对于客观事物的知識,虽然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在这种发展、变化的真理当中,却蕴含着不变的东西。在相对真理中哪一部分是绝对真理,已由实践檢证过的相对真理所适用的范围有多大,这都不是一下就能弄清楚的。但是,对于相对真理來說,只要它为实践所檢驗并证明它为正确,那末其中,就总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种绝对真理的成分就要作为宝贵的财产而继承下来。自然科学的进

一步发展,将能为我們指明哪些是完善的真理,哪些是不完善的真理。

第三,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人們的实践已达到高度的水平,而我們所研究的事物又是足够地简单的話,那末或許可以认为对于某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是绝对真理。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对于那些“多多少少可用数学方法处理的那种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于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偉大的字句的話,那么也可以說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的真理,是終极的最后的真理,也因为如此,这些科学被名为精密科学”。不过,在自然科学研究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远非所有成果都有这样的性质”②。

由此可見,承认我們所認識的一切知識的相对性,是并不意味着排斥了绝对真理的,而是否承认有这种十分完善、全面的绝对真理的存在,正是馬克思主义真理論同不可知論、相对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可是杜雷、吳俊光、陶德麟等同志却认为:到今天为止,人們还没有任何一次認識过程,不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倘以所謂完备程度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就没有什么知識可以看作是绝对真理。如果认为一切知識只能是相对真理,这样,实质上就是根本不承认認識绝对真理的可能,而这就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不可知論或相对主义的錯誤。而如何避免这种相对主义的錯誤呢?按照他們的看法,这只有承认“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136 頁。

② 《反杜林論》,第 89 頁。



对的真理”。其实，相对主义者或不可知主义者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而在于他们把认识的相对性和认识的绝对性看作是绝对不相容的东西，因而他们便从真理的变化和发展当中做出客观事物不可认识的结论。可是，简单地宣称相对真理就是绝对真理，这并不能真正驳倒相对主义。这是因为：第一，虽然杜雷等同志可以宣称人们所认识的一切相对真理都已经是“绝对”真理，但这种“绝对”真理并不因此就不随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变化，相对主义者就仍然可以从这种“绝对”的真理中做出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质的结论。第二，如果认为这种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相对真理已经是绝对真理，那末，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就要否认有那种十分全面、完善的永恒的绝对真理。

从我们看来，那种十分全面、完善的绝对真理虽然是不能达到的，却是可以不断地接近的，从人们认识的不断地趋于完善、趋于全面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十分全面、完善的真理是存在的。而是否承认这种绝对真理的存在，正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重要的界限。而按照杜雷、吴俊光、陶德麟等同志的理解，那末我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在形式上很明确但在内容上却是很模糊的一条界限。这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两种不同理解的后面所隐藏着一个极重要的差别。

二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杜雷和吴俊光等同志之所以对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作了不同的理解，是同他们不

具体地分析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分不开的。由实践来检验真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就人们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可以对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和错误做出确切的判断；但是如果只就某一历史阶段上进行过的某一些实验或某些局部性质的实践来说，那末这就不一定。它们有时可以做出确切的判断，有时就不见得能做出确切的判断。而且，即使那些科学真理经过实践检验以后，仍然可能由于实践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还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可是，从杜雷和吴俊光等同志看来，持有这种观点就要取消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他们写道：“何祚庥同志关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论述，有些地方却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实践的基础上，并经实践验证的自然科学理论，似乎仍然不甚可靠。……他认为实践标准所以有绝对性的一面，只是因为凡经实践验证的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作出这样的规定，仍是不充分的。因为根据他的看法，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绝对真理成分不会消失，但是，同样为实践验证过的相对真理的另一部分，当然就会消失了。这样说来，实践验证过的客观真理，似乎只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正确的，另一部分或小部分是不正确的。请问：已由实践验证过的客观真理，又用什么标准来验证其中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不正确的呢？如果当时的实践水平还未能验证其中不正确部分，那末，这正说明那些不正确部分是当时的实践水平未曾验证过的。这就不能把它说成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了。按照何祚庥同志关于实践标准



的相对性的論述，实践似乎还不是衡量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①

对于这个问题，陶德麟同志也作了类似的阐述：“经过实践验证过的客观真理当中只有一部分不会消失，而另一些部分却会消失！試問：这些会消失的部分是什么呢？是真理呢，还是錯誤呢？如果是真理，那就是說真理也会消失了，被实践证明了是真理的东西又会重新被证明为不是真理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就没有了。如果是錯誤，那就是說经过实践检验过并证明了是客观真理的东西当中竟然有一部分并不是客观真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也还是没有。按照这种說法，怎么能使人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可靠标准呢？怎么能使人相信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呢？”^②

我感到这些意見是不正确的。从他們所提出的意見中，可以看出，他們确实是把認識上的錯誤（这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歪曲的反映）和認識上不够完善、不够全面（这是对于客观事物正确的但近似的反映）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談，因而在他們看来，就只有正确和錯誤与否的問題，而没有真理是否完善、全面的問題。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因而也就不能辩证地理解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为了弄清楚在这个問題上的分歧，我們先来分析一下实践验证真理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人的認識活动是一个充滿矛盾的过程。人們在感性直观里所把握的是一些个别的有限的知識，可是在理性思維中却要求我們把

个别的、有限的感性材料提升为某种一般的、无限的东西。因此，認識活动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个別和一般、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而所謂認識，便是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这个矛盾。認識上的这个矛盾除了表现在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这一飞跃外，而且也表现在由理論到实践这一飞跃。人們在应用理論于实践、由实践来檢驗理論时，还将进一步解决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之間的矛盾。

实践验证科学理論的基本原则，是把理論应用于实践，看它是否能达到預想的目的。这样，許多理論的真理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檢驗而糾正了它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经过实践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从邏輯上說，由实践来糾正理論上的錯誤，是比較容易符合邏輯上完备性的条件的。三段論知識告訴我們，要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題，只要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行了。但是，要由实践来证明一个普遍命題，却要复杂一些。因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而理論却总是某种一般性、普遍性、无限的东西。在实践验证理論过程中，人們总是拿实践所給出的实际結果和由一般理論所抽取出来的具体結論进行对比，以便从中做出科学理論是否正确的論断。試問：人們为什么能从一个个的事例中作出一般的理論的結論来呢？

在一些較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人們掌握的感性材料已是十分丰富，而实践又表明它能滿足完全归納法所需要的条件，那末在这

^① 《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第14頁。

^② 《新建設》1963年10月号，第100頁。



种情况下实践证明了科学理论是正确的。可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完全归纳法的条件常常是很难满足的，于是人们就求诸一些典型的事例。这些事例都是单个的具体事例，但它又是某一类、某一属的典型，因而在这种个别现象或事例中已经体现着一般。假如实践表明理论在这个典型事件中是正确的，那末便由此类推出理论在这一类、这一属中都是正确的。实验验证理论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人们常常从理论的认识出发，纯逻辑地预测若干前所未知的新现象，然后再由实验来加以验证。应该说，在这类新现象的预测中，本身就是一般理论的产物。如果实践证明这种预测是正确的，就可以认为实践证明了理论是正确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它体现着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实践虽然是具体的、特殊的，但这种个别和特殊已经不是感性认识阶段上那种个别、特殊，而是和一般理论密切结合的这种个别、特殊。换句话说，在实践检验真理过程中，人们将个别、特殊和一般统一起来了，这意味着认识已经到了更高的阶段。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深刻地叙述道：“单凭经验性的观察决不能充分地证明必然性。……这种说法之正确程度，正如不能由太阳在早晨升起而推论明天也会再升起，并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于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某一‘在这以后’，那末它便和‘由于这’等同了。”^①由此可见，由实验来验证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它总是要设法造成某一

个“在这以后”，以便从而做出“由于这”的结论出来。

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就要求我们历史地具体地来对待一切现象，也要求我们历史地具体地来对待实践标准。人们的实践水平是不断提高的。随着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认识也就要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在早先人们曾经认为实践已经做了确切证明的理论，就要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相应的修改。这种修改将表现在下列两方面，它将使理论能更准确地反映着客观实际，或者更准确地规定它适用的界限。

譬如说，在过去的科学水平上，实践曾经证实理论的概括是满足“完全归纳法”的条件的，而现在却可能由新的实践表明所谓满足完全归纳法的条件原来它并不能满足。例如，在历史上曾经基于化学元素在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中不能相互转化的事实，特别是从“点金术”的失败当中而做出元素不能相互转化的概括。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已知元素来说，都没有发现它们有相互转化的事实，因而就基于这种事实而归纳出所有化学元素不能相互转化的判断。可是随着人们发现原子核的放射性现象和原子核反应以后，表明有一些元素能自动地衰变为别的元素，或者在某些外界条件影响下而转化为别的元素。这样，新的实践就表明这种完全归纳法实际上是并不完全的，因而也就要修正这个普遍的结论，而把它局限在一定的条件下。

又如，在过去的科学水平上，人们曾经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1页。



基于若干典型的事例而做出若干概括，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却发现过去所根据的典型的实验资料，原来却并不那么典型。这样，根据过去的经验所做出概括的范围就可能变化。牛顿力学的修正就是一个例子。在过去，人们曾经基于大量实验资料而作出牛顿力学是适用于一切物体的力学这个概括。可是随着实验的发展，却发现用牛顿力学来计算运动速度较大的一些物体运动时，计算结果却和实验有所偏离，而对于接近于光速的运动就不适用了。这样，对于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就要作修正，并且要代之以更准确的相对论的力学。

即便是那些由于预言过新现象并得到实验证实的理论，也仍然有可能由新的实践证明它们有一些不灵的“预言”。例如，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方程的正确性，是由于它对于“位移电流”、“电磁波”等等现象做了一系列的预言，并经实验加以验证后从而证明方程式的正确的。可是当我们把马克斯威尔方程应用于电子绕原子核的运动时，那末按照马克斯威尔方程将“预言”电子会不断辐射能量，在最后就要堕入原子核中。而实践却表明这种“预言”是完全不正确的。

即使那种曾经经过大量的精确实验加以仔细比较、精确测定，并曾经多方面地作出预言，而且得到实验证实的理论，也可能随着实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量子力学的定律就是这种例子。量子力学的定律曾经得到光谱学实验的精细的检验，并且能用来广泛地探讨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现象。但是用量子力学的理论就不能解释“朗伯能级移动”、“电子反常磁矩”等等更为

精细的实验结果。这时，量子力学就要进一步修改为量子电动力学。

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是正确地反映着客观实际，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

为什么在认识史上要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而理论却是无限的一般的东西，因而由实践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就总有一个“外推”或“内插”的过程，或者说，有一个由有限转化为无限的过程。既然有了“内插”和“外推”，那末新的实践就有可能表明这种“内插”和“外推”未必是不完全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①。为什么列宁要提出这样的告诫呢？这是因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总是具体的、有限的，而认识上的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的矛盾，却远不是通过若干次的实践就能得到彻底解决的。

也只有从上述观点出发，才能理解列宁所说的关于真理界限可变动性的一个著名的论点。他指出：“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小。”^①为什么随着知識的增加而真理的界限却反而縮小了呢？初看起来，这似乎是难于理解的，但假如我們看到实践檢证中有相对性的一面，那末我們就立刻可以发现所謂真理界限的时而擴張、时而縮小确是科学史上的事实。

如果我們將以上的分析，同杜雷、吳俊光两同志的論点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在他們的理解中恰是抽去了“真理界限的可变易性”这一面。他們认为，实践檢证有一定的作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来验证科学理論，它完全是可靠的标准，因而它是絕对的，而出了这个范围就不能适用，因而又是相对的。可是，由于他們不是历史地具体地来看待所謂实践檢证的作用范围，于是他們对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絕对性所划的界限，就未免成为空中樓閣了。試問在相对論发现以前，人們能够預先就規定牛頓力学只适用于运动小于光速这一范围嗎？而且即使在相对論发现以后，人們却又发现牛頓力学也不适用于微观世界，因而对于牛頓力学就又要規定一个新的界限，也就是說，它不能应用到由普朗克常数所表征的那些波动性质較显著的微观現象。誠然，从现代科学观点来看，我們會认为把牛頓力学推广应用到高速运动下的物体运动或应用到波动現象較显著的微观世界，完全是一种不正确的“外推”，它并没有实践的根据。可是，从当时的人們看来，人們会认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牛頓力学可应用到高速运动或微观世界，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說它們是不可用的，甚而还可能根本就沒有想到这里还存在一个“外推”的問題。而且，从当时的实验事实来

看，也似乎有一些迹象說明牛頓力学是可用的。例如，在劳倫茨关于电子的模型中，就是用牛頓力学加上电磁場的作用来解释高速运动下的电子的运动的。对于微观現象中的某些实验，如卢瑟福所做的 α 粒子对于原子核散射的实验，就可以用牛頓力学来加以解释，并和实验結果有高度的符合。因此，就当时的人們認識水平來說，他們对于牛頓力学应用的范围虽然不能做出确切的評价，但是，由当时的实验材料以及理論的一般原則看来，它們是具有应用到这些現象的可能的。正因为这样，人們也就不妨先用牛頓力学来对高速运动或微观世界加以处理，而留待实践来做进一步证明。

杜雷和吳俊光同志认为，“正确的实践千百万次并不比一次更能令人信服”^②。如果这里所指的是通过实践来肯定某一事实，某一現象的話，那末这句话当然是对的，因为把同一个实验重复了千百万次确实不見得比一次实验就会产生什么新的效果。但如果认为理論受到这种“实践”檢驗过，就已經足够证明它是普遍真理，那末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现的这种“真理”就会多得不可胜数了。

如果我們从自然科学的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以上所討論的問題，那末就更可以弄清楚双方的分歧所在。从我們在上面所論述的相对真理的界限是历史的有条件的这一論点出发，那末在自然科学的实践上便可以得出一个頗为重要的科学方法上的結論，那就是說，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必須极为慎重地对待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4頁。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 《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第44頁。



理論所适用的範圍的問題，如果把理論所适用的範圍估計得過大了，就將使我們導致錯誤；反之，如果把理論所适用的範圍估計得過小了，那又將失去作為理論概括所具有的普遍性質。正因為這樣，所以必須對歷史上一切自然科學理論（包括已經有實踐證明為正確的那些理論）持批判的態度。自然科學研究中的重大進展，常常是對舊有理論進行批判地審查的結果。這種審查可以包括兩方面，有些是擴大它們的使用界限，有些卻是縮小它們的使用界限。例如，現代的量子場論就是將量子電動力學的成就加以進一步擴展和推廣而形成的理論。而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理論，卻是對於舊有的宇稱守恆的定律作了一番徹底的審查的結果。正因為這樣，我們必須對於實踐檢證過的真理所适用的界限有清醒的估計，並且要善於用實踐來檢驗真理所适用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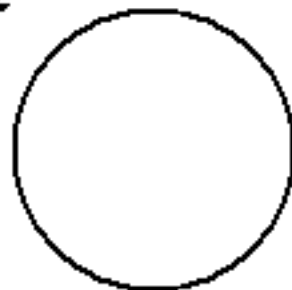
可是，杜雷和吳俊光同志卻認為，我所提出的，對於“已有充分科學根據的理論，仍然可以發現這些理論只是相對正確的，仍應持批判的態度，……”等等，是多余的“告誡”^①，陶德麟同志也反對我所提出的這個意見，認為“這樣來理解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實際上就抹煞了實踐標準的絕對性。”^②我感到，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批評。難道牛頓力學不是“已有充分科學根據”並經“實踐檢驗證明它為正確”的科學理論嗎？牛頓力學中關於“絕對空間”、“絕對時間”的這種“相對正確”的學說，不正是要修改為愛因斯坦的四度時空的理論嗎？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出現，難道不正是由於愛因斯坦對於牛頓力學進行了透徹的批判的結果？科學史發展的實際情況

就是這樣，為什麼要反對這些意見呢？問題在於牛頓力學雖然有大量的實踐根據，可是這種實踐卻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精確程度上來做出的，因而在這種實踐基礎上所建立的科學理論，也就不可能十分精確、完善。而當人們的實踐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時，它也就由適用範圍更為廣泛並且也更為精確的相對論所代替。

不難看出，在我們上述對於實踐標準相對性的分析里，它絲毫也不會像杜雷等同志所批評的，這就要導致對於實踐標準絕對性的否認，因為在這裡既沒有否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也沒有否認實踐標準的可靠性，只不過是指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踐的局限性，以及由這種實踐的局限性所產生的認識上的相對性。可是如果像杜雷、吳俊光和陶德麟等同志那樣，把認識中的不精確、不完善和認識中的錯誤混為一談，那就會看不見這種基於實踐水平的不斷提高而形成的真理的日益精確、完善的过程，使人的認識陷於僵化。人們的實踐是在不斷發展的，與此相應，真理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可以確切地鑒別認識中的正確和錯誤，這是實踐標準的絕對性的表現。可是，承認實踐標準的絕對性並不意味著要排斥承認實踐標準的相對性，這是由實踐標準的歷史的局限性所產生的，也是將由於實踐隨着歷史的不斷發展而逐漸地得到解決的。實踐、認識、再實踐，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也就將不斷精確、深化，這正是真理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

① 參看《學術研究》1962年第4期，第15頁。

② 《新建設》1963年10月號，第99頁。



红旗

HONG QI

11

一九六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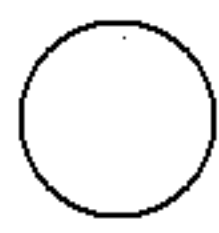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 ★

目 录



发扬革命精神, 粉碎现代修正主义

——五月二日在雅加达群众大会上演说的摘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 迪·努·艾地 (1)

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南斯拉夫农业.....施东向 (6)

土地改革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一度实行的
农业集体化没有触动富农经济——代表富农阶级的利
益, “给农业中的经济力量以自由的道路”——农村两极
分化日益加剧的几个标志——如此“社会主义成分”——
结论是南斯拉夫农村的资本主义愈来愈泛滥

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必定胜利.....林文山 郑公盾 (23)

- | | | |
|--------|--|---------------------------------------|
| 书
评 | | 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
——读《红色堡垒》.....黄秋耘 (32) |
| | | 大写社会主义英雄谱
——读《武钢建设史话》.....宋 爽 (34) |

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陶德麟 (37)

☆ 六月七日报出版 ☆



发 扬 革 命 精 神， 粉 碎 現 代 修 正 主 义

——五月二日在雅加达群众大会上演说的摘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 迪·努·艾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五月二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详细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意义。

这次集会是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召开的，有七千工人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鲁克曼、约多和苏蒂斯曼也参加了大会。

艾地说：“有些人问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停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做了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从一开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表示不同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公开论战。在公开论战发生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制止它。”

艾地说：“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动了公开攻击。那时，苏联共产党要求我跟着他们攻击阿尔巴尼亚。我说：‘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党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向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就会建立一个很坏的先例。这不是为了加强兄弟党之间的团结，而是为了分裂。由于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其他兄弟党发动了攻击，于是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跟着做起来了。这就成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表现。这是对莫斯科声明的违反。”

艾地说：“去年七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派遣了一个由我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访问苏联和中国。在我们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前几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后来，我们到了北京，会见了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等人。我当时表示希望，公开论战必须停止。中国同志对我们说，他们一向不同意展开公开论战，可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既然有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如果他们不回信，那是既没有礼貌、又不合理的。是的，同志们，问题确实是如此。要是你收到一封信而不予答复，这有礼貌吗？当时，我根据正义感认为，中国同志必须加以答复。因此，在我们



回国后，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公开论战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以科学的、讲理的态度和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热烈进行，我们党应当把公开论战看成是一所免费的、世界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努力从中学习。”

艾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立的角度来看，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的确尖锐。事情只能是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总是彼此对立的，这种对立今后必将愈来愈尖锐。修正主义头子是顽固分子。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修正主义头子曾经悔悟过。修正主义者毕竟是修正主义者。在历史上，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从来没有悔悟过。他们至死还是修正主义者。”

艾地说：“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回顾形势的时候，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正在一天天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正在向全世界扩展。

“在印度尼西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不仅是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是一致反对修正主义的。除了共产党人之外，还有其他革命者反对修正主义。所有的革命者反对修正主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修正主义者要修改和歪曲的是革命本身。在革命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地区，是没有修正主义的市场的。

艾地说：“我们知道，修正主义者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他们到处出洋相。在这里我号召我们的工人不要成为修正主义者，以免当傻瓜。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基本上说来，没有修正主义的市场。革命形势在继续不断发展。在拉丁美洲，有古巴和委内瑞拉。那里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古巴和委内瑞拉。在非洲，有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那里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在亚洲，有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等。在这里，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和南越。在受古巴、委内瑞拉、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等鼓舞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没有修正主义者的市场。”

艾地说：“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保持警惕。这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定将千方百计地挤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他们将竭力设法纠集一些人成立另一个所谓‘共产党’或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时存在。但是他们的丑恶面目将被彻底揭露。我们不当害怕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但是我们应当保持警惕，保持我们党的警惕、我们阶级的警惕以及我们国家的警惕。”

艾地说：“我们决不会宽恕修正主义者。我们对修正主义者关闭一切大门。这里最重要的是在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亚洲的其余地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发扬革命精神。”

艾地说：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肿瘤。“它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反映，它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他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



事实上是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之間矛盾而发生的淘汰、明朗化和巩固过程的一种反映——要求工人階級必須認真学习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們可以忠实地繼續完成他們的革命任务。尽管修正主义者接二連三地发动猖狂进攻，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仍然健全地屹立着，仍然忠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革命。”

艾地說，“去年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經驗教导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如果不与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进行，那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同对待帝国主义者一样，如果不去反抗現代修正主义者，他們将会变得无法无天，但是如果給予沉重打击，那末他們就会狼狽逃窜。在亚非工人會議筹备會議上和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讲坛上的經驗也是如此。关于反对現代修正主义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任务，而且是整个工人階級运动和全体进步人民的任务这一結論，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現代修正主义直接阻撓工人階級和进步人民粉碎帝国主义的斗争。”

艾地說，“現代修正主义者攻击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說我們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直在努力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据修正主义者的看法，这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們用这种罪名来攻击我們，这清楚地表明，他們已經拋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絕對必須同各国工人階級革命运动結合起来的原則，拋棄了工人階級‘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列宁語）的原則。”

艾地說，現代修正主义者誣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忠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他說：“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支柱，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不仅是印度尼西亚社会的組成部分，而且还是强大的国际力量的一部分。因此，它除了为本国的利益进行斗争和为执行爱国任务而站在最前列以外，它同时还一貫地忠于自己的階級使命，忠于自己的国际使命。”他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国际主义决不違反民族使命，正相反，这同时也是一項民族使命，党实行爱国主义也是一項国际使命。”他又說，“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是同真正的爱国主义結合在一起的。”

艾地說，“現代修正主义者还不断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說我們加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革命战綫的活动是‘分裂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活动。这显然是誹謗。大家都知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革命运动，是新兴力量的一部分。反帝斗争最高漲的恰恰就是在这些地区。同时，正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存在着各被压迫民族，他們正在为粉碎帝国主义及其合法的产儿种族歧視而进行生死斗争。种族主义只能存在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中間，而在工人階級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斗争的人民中間，根本沒有种族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

艾地說：“总之，在新兴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偉大斗争中，印度尼西亚



亚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巩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并且粉碎喜欢美化美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艾地在谈到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时说：“我们应该全力帮助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解放斗争。”他说：“志愿人员运动在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威力。它把这场斗争引上了全面对抗斗争的道路——一条革命的道路。苏加诺总统指出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沿着它前进的这条道路是三种形式的斗争的结合，即：国内强大的反‘马来西亚’统一战线，在‘马来西亚’的强大的反‘马来西亚’统一战线和强大的反‘马来西亚’国际统一战线的结合。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对抗的道路是多么的现实和正确。”

艾地说：五一节前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以‘纳沙贡’为核心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加强在亚洲和非洲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国际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坚决斗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作为恪守政治上坚持主权、经济上自力更生和文化上保持民族特点的原则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艾地说：“一致协议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是很重要的，因此这是对那些企图分裂亚非团结的人的一个答复。更加重要的是，人们迫切要求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以便广泛地巩固和发展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革命精神鼓舞的桑给巴尔人民的革命，对于非洲大陆人民是一个生动的榜样。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样，桑给巴尔人民的革命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日益高涨的斗争正在动摇和削弱帝国主义，最后将粉碎帝国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认为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只有那些已经抛棄了列宁学说的修正主义者才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这个斗争的重要性熟视无睹。”

艾地接着谈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农民运动。他说，“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已经通过它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农民结合起来。这样，工人阶级（主要通过共产党人）和农民的联盟已经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工农联盟的不断巩固，是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条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反映在所有的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的共同行动中，而且反映在诸如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阵线和作为革命的支柱的工农联盟这些具体形式中。所有这些，都不能同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分开，也不能



同农民願意在工人階級领导下参加民族和民主革命这一点分开。目前，农民为粉碎封建残余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的胜利，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的胜利。这清楚地证明，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照耀下，即工人階級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农民斗争已經构成无产階級的强大力量，这使得农村內的魔鬼們大肆叫囂。修正主义者不願意看到我們在农民当中忙碌着，便誣蔑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淪为农民党。讓他們去指手划脚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將繼續前进，同农民相結合。”

艾地說：“如果我把上面說过的話概括起来，并把它加上以粉碎‘馬来西亚’、粉碎‘农村惡魔’和粉碎修正主义的决心来庆祝五一节的标题，那么就可以看出，我同时也說明了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在当前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建設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在爭取彻底执行政治宣言和爭取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斗争中不仅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起了领导作用。”

艾地說：“为了爭取印度尼西亚国家建設的胜利，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运动，并不只是进行建立一个沒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和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斗争，它还为一个沒有資本主义残余和人剝削人現象的社会主义的印度尼西亚而努力。”

他最后說：“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工人統一战綫和繼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以便完成粉碎‘馬来西亚’，‘农村惡魔’和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艾地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將繼續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我們认为，必須举行兄弟党之間的双边会談来解决他們之間的分歧，这是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一个条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仍然认为，必須举行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間会的談，这是这两个党自己在去年七月的双边会談中决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將繼續努力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这应当被认为是駕凌于一切之上的。”

艾地讲话后，大会一致通过了若干決議，强烈譴責美国的干涉和顛复活动，要求美国政府把第七舰队撤出印度洋。決議还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美国駐印度尼西亚大使琼斯为不受欢迎的人。決議表示支持苏加諾总统关于加紧进行粉碎“馬来西亚”的斗争的命令和表示决心拿起武器和增加生产。

決議还譴責巴西政变当局不顾世界輿論的譴責，繼續迫害巴西爱国人士和中国貿易人員和記者的法西斯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六日电】



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 南斯拉夫农业

施东向

南斯拉夫经济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蜕化，从一个方面，提供了否定的回答。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否定的回答。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论证。在这以后，苏共领导继续为铁托集团辩护。但是，他们拿不出任何有力的事实，讲不出任何像样的道理，来证明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没有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事实，讲不出任何像样的道理，来证明南斯拉夫农业不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只好重弹老调，说什么现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农业中不是百分之六，而已经是百分之十五”^①。

他们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自己编造的谎言堆里。我们再次奉劝他们，还是把头伸出来看一看南斯拉夫的历史和现实吧！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究竟是“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愈来愈泛滥？

一 土地改革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地主富农经济在农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广大的劳动农民遭受着沉重的盘剥。

一九三一年，南斯拉夫农村的人口共有二百多万户，耕地面积共约一千万公顷。其中：

拥有耕地两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八，他们的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点五。

拥有耕地二公顷到五公顷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四，他们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拥有耕地五公顷到十公顷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五，他们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七。

拥有耕地十公顷到二十公顷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点八，他们的耕地占全部

^① 苏斯洛夫 1964 年 2 月 14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



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拥有耕地二十公頃到五十公頃的大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他們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三。

拥有耕地五十公頃以上的大农户或大庄园主，只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但是他們的耕地却占到了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点七^①。

上述农户类别的资料说明，拥有耕地五公頃以下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六十七点八，他們的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八。拥有耕地二十公頃以上的大农户大庄园主，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二点九，他們却占有了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战前南斯拉夫农村，一小撮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贫苦农民占有少量土地的情况，两极分化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一直到現在，我們还没有看到铁托集团結合土地占有以及耕畜占有、农具占有、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等各方面情况，具体分析农村阶级关系的系統材料。但是，从我們手头的一些零碎材料^②，可以看出，拥有耕地二公頃以下的农户和二公頃至五公頃的农户，絕大多数是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者和无产者。

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南斯拉夫贫农雇农的户数不断增加，一九三一年，占有二公頃以下土地的贫苦农户共七十一万一千户，十年后，即一九四一年，增至一百二十二万一千户^③。他們的少量土地日益丧失，耕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南斯拉夫农民群众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們在战争胜利后，迫切地要求推翻地主阶级的統治，解决土地問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南斯拉夫政府頒布了《土地改革和移民农垦法》。这项法令規定，总面积超过四十五公頃，或雇工耕种和出租耕地达二十五至三十五公頃的大地产，属于銀行、企业、股份公司、寺院以及其他世俗的或宗教的受捐贈成立的机构的地产，都全部沒收。这项

① 見《南斯拉夫的土地改革》，南斯拉夫出版社1961年俄文版。

② 这些材料是：

1. 瓦西奇的《南斯拉夫农业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貝尔格莱德劳动出版社1960年版）一书中說：拥有耕地二公頃以下的农户，沒有馬的占百分之八十六，沒有牛的占百分之六十一；拥有耕地二公頃到五公頃的农户，沒有馬的占百分之七十，沒有牛的占百分之四十四。

2. 斯巴索耶·梅德尼查的《作为經濟組織的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南斯拉夫文化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中說：在土地少于一公頃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八十一；拥有一至二公頃土地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五十九；拥有二公頃至三公頃土地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四十一；拥有三至五公頃土地的农户中，沒有农具的占百分之二十七。

3. 据1959年1月号《南斯拉夫一覽》材料，拥有耕地五公頃以下的农户，一般都是雇农。

4. 据1962年8月20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材料，拥有耕地二公頃以下的农户，他們的货币收入，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在外做工获得的。

③ 科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問題》。見1962年第5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



法令还规定，没收超过最高限额（二十至三十五公顷）的多余耕地。

根据这个法令，在土地改革中没收的土地共计一百五十多万公顷，约占拥有二十公顷土地以上的大农户和大庄园主全部土地二百四十多万公顷的十分之六。这些没收的土地，只有一半直接分给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到土地全部分配完毕的时候，一百几十万户占有二公顷以下土地的贫苦农户中，仅有三十一万六千户分得土地，平均每户分得二点五公顷。由此可见，贫苦农民耕地严重不足的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不论从没收土地限额的规定，还是从土地分配的情况，都不难看出，铁托集团实行土地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充分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实行土地改革的路线，不是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因此，战后南斯拉夫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富农经济，而且实际上还保护了一部分封建经济。

二 一度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在土地改革以后，占南斯拉夫农村户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农和雇农，要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铁托集团是怎样对待南斯拉夫农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这个问题呢？怎样对待广大农民的这个迫切要求呢？

他们不敢承认，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贫农和雇农仍然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竭力掩盖富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仍然占据农村统治地位的事实；完全否认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和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加剧。

铁托集团虽然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先后颁布了一些关于合作化的法令，着手组织了一些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丝毫触动富农经济，并且一再号召不要同富农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说：要使“富农”同我们的制度和睦相处，使他在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甚至在个人长远幸福的情况下，加入我们的制度中来^①。

铁托集团还攻击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说：“难道我们必须毁灭富农来满足那已经陈腐不堪的教条的残余吗？如果我们不经过阶级斗争就成功地使富农过渡到社会主义，难道是一种错误吗？”^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农村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而且要消灭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富农经济。

① 巴卡里奇 1947 年 11 月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贝勃勒（南斯拉夫副外长）1949 年 4 月 29 日的讲话。转引自克勒曼：《从托洛茨基到铁托》，英国劳伦斯—韦沙特书店 1952 年版。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道路，曾經写道：“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紀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貧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剝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①

列宁在这里所說的俄国革命的道路，实际上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共同道路。

铁托集团背棄这条共同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規律說成是“陈腐不堪的教条的殘余”，在南斯拉夫坚持实行他們那种保证“富农利益不受損害”的路綫，其結果既不是什么“成功地使富农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是什么富农和社会主义的“和睦相处”，而只是搞垮社会主义成分的經濟，使富农完全占領了南斯拉夫的农村陣地。

三 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給农业中的經濟力量以自由的道路”

列宁曾經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綫，应当是：“穩固地依靠貧农”，“善于和中农达成協議”，“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②。

铁托集团在土地改革后的南斯拉夫农村中所实行的阶级路綫，显然不是列宁所規定的阶级路綫，而是与此完全相反的另一条阶级路綫。

他們实行这条路綫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廢除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产品計划收购制度，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买卖制度。

一九五一年取消了馬鈴薯、肉类、油脂和干草的計划收购，一九五二年取消了粮食的計划收购，一九五三年取消了羊毛的計划收购。

铁托曾經露骨地表示过他对社会主义农产品計划收购制度的仇恨心情，他說：“我和我所有的同事們从内心深处憎恨这个制度，并且曾迫不及待地期待有一天把它取消”③。

他們实行这条路綫的另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保证“富农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一度实行农业集体化以后，进一步适应富农經濟发展的要求，宣布放棄农业集体化道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南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今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指示》，宣布放棄农民劳动合作社作为合作化的基本形式，开始解散所謂“不赢利”的合作社。这个决定，遭到了一部分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干部的反抗。卡德尔說，这些干部当时“力图无论如何全盤保持劳动合作社”④。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1頁。

② 参看《列宁和联合中农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0頁。

③ 铁托1953年9月27日在魯馬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④ 見1953年3月29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铁托集团不顾这种反抗，一九五三年，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劳动合作社的财产关系和改组的条例》。这项法令，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鼓励农民“自由退社”，号召他们带着自己的土地和农具退出合作社，准许合作社可以根据所谓社员的决定而整个解散。

这项法令的公布，是铁托集团彻底背叛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标志。从此，农民劳动合作社便迅速解体。据南斯拉夫一九六二年《统计年鉴》等材料，一九五三年，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减少到一千一百多个，一九五四年，只剩下八百九十六个，到一九六〇年，只有一百四十七个。这种合作社所拥有的农地在全国农地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五〇年有百分之十八点六，一九六〇年还不到百分之一。这些剩下来的极少数的合作社，经过“改组”，也变了质，完全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一九五九年，卡德尔在《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一书中说：“今天我们根本不再有原来词意上的，即作为集体农庄独特形式的农民劳动合作社了。”

在实行了这两个摧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严重步骤之后，他们在一九五四年，又颁布了《土地和房屋流通法》，正式宣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随后，又允许土地可以自由租赁，私人可以自由雇工。

一九五八年公布的南共联盟纲领，一方面，抹煞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什么“在个体生产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少了资本主义倾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区别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一律规定他们所谓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强制触及土地私有制”。

铁托集团在农村中摧毁社会主义阵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步骤，是他们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制度中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关于这一点，早在一九五三年，卡德尔就曾经很明白地说过：“我国合作化的内部困难的根源，与其说是在于这种或那种组织上的弱点，不如说是在于合作化的社会经济实质，即在于合作化目前的各个形式——特别是劳动合作社——与今天我们的合作社所处的一般经济条件相矛盾。事情确实是这样，事实本身就作了说明，一旦我们开始了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即取消了收购和其他行政强制性的农业计划，并出现了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自由市场的时候，在劳动合作社里就立刻出现了动摇。”他认为，南斯拉夫“其他经济都处于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条件中”，因此，“在农业政策中我们必须无保留地采取和保证不断推行的第一个原则是：使我国农业也摆脱行政领导因素，并使它的发展也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①

铁托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摧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背叛行为做辩护，曾经作了一篇又一篇的讲演，写了一本又一本的小册子。他们企图用谎言的迷雾来蒙住人们的眼睛，但是，心劳日拙，终究藏不住自己的狐狸尾巴。

①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见1953年第4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



让我们从他们的讲演和小册子中，随便挑几段话来看看吧。

卡德尔说：“不应该忘记，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教会他们只是通过经济算盘的角度来看问题，因而他们没有准备如此轻率地接受某些在经济上还未使他们信服的集体化的方案。对这种农民来讲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所以这种方法在我国就引起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劳动农民之间公开的冲突。”^①

科马尔说：集体化“在我国没有行通，因为它同我国的整个发展，特别是同财产关系、传统和物质发展水平发生了冲突，不论现在或将来，谁也不再指望这种解决问题的形式了。”^②

巴卡里奇说：“在农村中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即小商品生产者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利坚的’道路是痛苦比较少和比较迅速的，而我们的实践也肯定了这条道路。”^③

“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说得多么好听啊！但是，只要接触一下南斯拉夫农村的历史和现实，人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在这句话后面掩盖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被“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中，存在着富农同中农、贫农、雇农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农和雇农，他们在战前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八，土地改革中虽然分得了一部分土地，其数量也不过仅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七多一点；这些贫农、雇农，由于受着地主、富农等等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他们所拥有的这点少量土地，不但在战前日益减少，而且直到现在也还在继续减少；站在另一极的富农，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过去和现在都用各种办法，兼并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土地。

“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同南斯拉夫的“财产关系、传统和物质发展水平发生了冲突”。如果说“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说法，是一种欺瞒，那么这两句话，就是一种恐吓，一种诬蔑。谁都知道，集体化对于雇农、贫农和中农来说，不仅不是剥夺，相反地，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遵守自愿原则下，引导他们摆脱被富农剥夺的唯一道路，摆脱贫困破产的唯一道路，走上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集体化同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绝没有什么冲突。当然，集体化对于富农阶级来说，确实是一种剥夺。如果谁真想领导农民搞集体化，谁就不能不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对富农这些剥夺者实行剥夺。斯大林说得好：要实行集体化，必须在公开的战斗中击破富农阶级的反抗，“剥夺这个阶级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土地的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租用土地、劳动雇佣权等等）”。“否则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农村集体化，更谈不到全盘集体化了。”^④铁托集团拿“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这种话来吓人，其实，只不过是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不愿意同富农发生“冲突”的真面目，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代表富农利益反对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面目，更

① 卡德尔 1959 年 5 月 5 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② 科马尔 1957 年 4 月 26 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的报告。

③ 巴卡里奇 1954 年 5 月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60 页。



加清楚地暴露了他們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面目而已。

铁托集团发誓，“不論現在或将来”，他們“誰也不再指望”集体化“这种解决問題的形式了”。他們下定决心，走“美利坚的道路”。这样一来，什么“各种經濟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呀！什么“給农业中的經濟力量以自由的道路”^①呀！諸如此类的論調的階級实质和政治含义，都暴露无遺了。铁托集团在农村中实行的階級路綫的实质，也暴露无遺了。

四 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几个标志

铁托集团“給农业中的經濟力量以自由的道路”，是更加促进了南斯拉夫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还是緩和了两极分化？

铁托集团的回答是：不会而且沒有促进农村的两极分化。铁托說：“我們有些共产主义者害怕，如果我們給个体农民以支持，资本主义就会立刻在农村重新滋长。这是完全多余的。有十公頃土地的最高限額^②和有各个防止剝削劳动力的法令，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在农村加强的危險”^③。他們还說什么南斯拉夫“劳动农民今天更多提供的是經濟能力拉平和社会差別大大縮小的情景”^④。他們根本抹煞南斯拉夫的現实，胡謔什么：“今天不能說，我們的农村里存在着富农、中农和小农，像恩格斯过去針对十九世紀西欧资本主义条件所說的那樣。也不能說，存在被剝削的劳动群众，像列宁針对本世紀头几十年俄国情况所說的那樣。”^⑤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农村推行保护老富农、培植新富农的政策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富农的障地，日益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

土地占有的悬殊，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一个标志。

現在的南斯拉夫农村，存在着普遍的、規模日益扩大的土地买卖和土地租賃。卡德尔在一九五九年說：“在个体所有者之間的土地流通，規模是相当大的，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趨勢”，“近年来土地的流通显著地大于战前”^⑥。科馬尔在一九六二年說：南斯拉夫农村，每年进行土地流通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⑦。铁托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也承认：“我国农村的分化进行得非常快。大部分农民正在拋棄土地”^⑧。

在这种“土地流通”中，买进和租进土地的，主要是富农；卖出和租出土地的，主要是貧

①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問題》。

② 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法令規定，农户占有的耕地一般不得超过十公頃。

③ 铁托 1954 年 4 月 28 日在塞爾維亞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 弗·諾什科維奇：《論农村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見 1958 年 2 月 7 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⑤ 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問題》。貝尔格萊德文化出版社 1959 年版。“土地流通”，按照卡德尔自己的說法，包括土地买卖和土地租賃。

⑥ 見科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問題》。

⑦ 铁托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杂志主編罗伯特·謝罗德的談話。



苦农民。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在以《“典型”的农村正在消失》为题的文章中说，文科夫茨县有“一万九千九百多个农户，即几乎百分之五十九点二的农户不耕种自己的土地。这主要是些小所有者，……在一九五八年他们出租了一万九千零八十公顷土地”。这就使一些富裕农户通过租进土地，“实际上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增加了一倍”。有些富裕农户占有“比最高土地限额还多一倍的土地”。

南斯拉夫官方统计，在主要产粮区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买卖土地的农户，一九五九年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六户。在卖出的一万零五百四十公顷土地中，有百分之七十四是由拥有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卖出的。在买进的一万五千公顷土地中，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五是由拥有五公顷以上的农户买进的^①。

这个自治省租进租出土地的农户，一九六〇年共有十万零二千三百户，占这个地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其中拥有一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主要是出租土地，出租土地的共有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三户，占这类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九。而拥有十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则主要是租进土地，租进土地的共有四千六百三十九户，占这类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一点三^②。

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的过程，是大量土地在新老富农手里集中的过程，是广大贫苦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一九五九年，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而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③。一九六〇年，在伏伊伏丁那，拥有一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平均每人有地零点一二公顷，拥有十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平均每人有地二点六一公顷，后者等于前者的二十一倍多^④。科马尔在一九六二年也承认：“关于土地租赁和土地买卖的材料无疑地说明，存在着较大的农户扩大耕地面积的趋势”。“在产粮地区，某些农户甚至占有二十公顷以上的耕地。”^⑤

富农不但通过土地的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把土地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手段，隐瞒自己的实际土地占有量。南斯拉夫《农业和合作》月刊透露：有些农户“用各种方式玩忽法律，隐瞒田产的数量。超过十公顷的新土地不登记入土地册，而继续登记在原主人的名下”。“同样，有些现象是，买来的或继承的土地不转到户主名下，而是以家庭里某一成员（儿子、媳妇、孙子等）的名义开立新户头”，但是收获的东西，却“放在一个仓库里没有分开”^⑥。

这些材料证明，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制定的关于农户占有土地不得超过十公顷的法令，

① 根据1962年第1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的材料计算。

② 见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③ 见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1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④ 1962年第11期南斯拉夫《农业和合作》月刊。



在富农的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卡德尔在《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一书中承认，贫苦农民出租和出卖自己的土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曳引牲畜”，“没有足够的劳动工具”，“临时需要用款”，以及“由于赋税或者其他义务”而造成的困难，由于遭受残酷剥削而丧失劳动能力。这也就是说，富农所以能够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是因为广大农民处于贫穷地位，他们逃不脱因生产资料不足、欠债等引起的丧失土地的命运。

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二个标志。

一九五七年，科马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谈到农村情况的时候说，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农户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来耕种自己的土地，或者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约百分之五十的农户没有畜力。私有成分中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①

一九六〇年，在主要产粮区伏伊伏丁那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在占地两公顷以下的农户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九没有耕畜；而在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中，百分之九十五点二有耕畜，其中百分之八十三点七每户有两头以上的耕畜。拥有二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但是他们拥有的耕犁只占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畜力车辆只占百分之五点六，平均每十六户才有一辆^②。

富农不但拥有大量耕畜和普通农具，而且拥有越来越多的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农业机器。一九五六年，卡德尔承认：“农业机械仍通过各种非法渠道，首先是通过农场和合作社不断流到私人手中。例如，根据一九五五年的某些材料，仅伏伊伏丁那一地，……私人手中的拖拉机超过八百台。我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有这样的情况，两三个农民合起伙来，合买农业机器、拖拉机等，并用这些拖拉机为其他农民耕地。”^③一九五六年年初，南斯拉夫全国共有拖拉机一万二千零二十四台，其中私人占有三千二百六十二台^④。到一九六〇年，仅是伏伊伏丁那一个地区的富裕农户，就已经拥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⑤。

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缺少或者根本没有耕畜农具的贫苦农民，不得不出高额租金使用富农的耕畜和农具进行耕作，忍受富农的剥削。

雇佣关系的发展，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三个标志。

由于广大贫苦农民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村中的雇佣关系大大发展起来。南斯拉

① 科马尔 1957 年 4 月 25 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的报告。

② 根据 1962 年第 2 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材料计算。

③ 卡德尔 1956 年在合作社联合会总会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④ 见《1957 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英文本）第 59 页。

⑤ 见 1962 年第 2 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该报在引用这一材料后承认，在南斯拉夫农村，“还保留着特种‘阶级’关系”^①。南斯拉夫报刊还说，某些土地所有者“已经变成了剥削者和高利贷者。他们雇用那些没有土地或没有其它职业的人，并使这些人欠债。有些农业工人经常一再欠债，也就不断地以做工来抵偿债务”。“在杜比察地方，一个农民雇用着十个长期工人”，而且“这个例子不是个别的，据计算，约有一百九十个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但是自己不干农活”^②。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拥有两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货币收入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③。

现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他们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他们往往带领几十名、几百名失业者到农场做工，赚得大量收入。这些包工头“什么也不干，只是赌博、吃喝”^④。“这些高贵的职业介绍人，他们造了新房子，驾驶着机动车，带着一皮包、一皮包的钱”^⑤。以经营劳动力这种特种商品的买卖为职业的包买主的出现，说明了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雇佣关系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列宁说过，“使用雇佣劳动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特征”^⑥。他还说：“农业中雇一两个工人，哪怕只雇一个夏天也好，这已经不算少了。何况问题主要不在于多少，而在于正是最富裕、最殷实的业主才雇用工人。”^⑦现在南斯拉夫农村中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

高利贷者活动的猖獗，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四个标志。

恩格斯指出过：在个体经济条件下，“即使你依法保证农民有农具、牲畜等等不得转让的财物，你也仍旧无法将他们从绝境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为了获得瞬间的展期，必须‘自愿’把自己的牲口，并且把本人也统统卖给高利贷者。”^⑧南斯拉夫的贫苦农民，正像恩格斯所描述的，随着他们的贫困破产，愈来愈多地落到了高利贷者的魔掌中。

南斯拉夫报刊透露，有的高利贷者，放出了六百万第纳尔的现款，还放出了一千五百七十公升白酒、三千六百多公斤小麦和二千二百六十公斤玉米，因而在两年内获得了五百多万第纳尔的利息。同时在他家中还有六十万第纳尔的现款、一千公升酒、约四千公斤小麦和玉米、大量的纺织品，以及全部由别人为他饲养的一百头乳牛和公牛。他家就“好像真正的信贷机关一样”，“他根据偿还的期限来确定利率，利率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百，甚至更高。落

① 1958年2月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② 1962年10月29日南斯拉夫《解放报》。

③ 见1962年8月20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④ 1963年1月9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⑤ 1962年7月1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⑥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3页。

⑦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0页。这段译文略有订正。

⑧ 《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8页。



到他的高利贷网中的有七百八十户头。这些借债者主要是他本村和邻村的人。人们都怕他，因为没有一家不欠他值钱的东西”^①。在洛兹尼查地方的一个高利贷者，他借钱给贫苦农民的条件是，在借债期间，借债者要以五尤特尔（约合二公顷半）土地上的收入作为利息^②。铁托格勒附近的一个高利贷者，当农民还不起债的时候，他就赶走农民的牛、羊、猪。这样的高利贷者，并“不是唯一的高利贷者，他的债户也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们这种人还有的是”^③。

富农操纵农村市场，投机倒把，是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第五个标志。

科马尔也无法掩饰这样的事实：南斯拉夫农村中“真正的农村贫民和小农，他们既无法扩大地产，也无法在农业以外谋生”。这类小农户把自己的“剩余产品”，“拿去市场出卖的情况已经绝对和相对地减少了”。“在这种市场中，较大的农户已经成为主要的角色”^④。

科马尔提供了这样的材料：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在农民为市场提供的全部产品（剩余产品）中，占有二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和占有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提供全部剩余产品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占有八公顷土地以上的地产的农户（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和占有耕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提供全部剩余产品的百分之三十八至四十。”^④

操纵着市场的富农，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大肆投机倒把。科马尔说：“我们还看到无论在使用土地或劳动资料方面，都超过了平均水平的一个人数较少的阶层，他们从事加工，成批地饲养牲畜，搞贩卖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投机活动；他们获得大量收入，但这种收入唯独不是建立在扩大生产和亲自劳动的基础上的。”^④

上述土地、耕畜、农具的占有情况，劳动力买卖的情况，高利贷活动的情况，以及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情况，这一切都证明了，铁托集团所说的，南斯拉夫农村中，不“存在着富农、中农和小农”，不“存在着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一切都证明了，南斯拉夫农村，根本不是铁托集团所说的什么“经济能力拉平和社会差别大大缩小的情景”，根本不是铁托集团宣传的什么“中等化”，而是在剧烈地“两极化”。一极上，一个人数极少的农村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另一极上，人数众多的雇农、贫农以及中农愈来愈贫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日益沦为农村中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即一小撮老富农和新富农，是南斯拉夫农村经济生活中的统治者。科马尔说：南斯拉夫农村中“一种典型的”现象，“是较大的农户在投机基础上的加强”。“这些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基金的农户，在某些地区担任了土地收购者和生产组织者的角

① 1958年11月15日南斯拉夫《解放报》。

② 见1962年7月19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1959年6月16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④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色。他們租种了絕大部分出租的土地，利用或占有超过十公頃最高限額的土地，雇用劳动力，用自己的拖拉机、脱粒机或畜力提供服务，这样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把一部分农民束縛在自己的周圍”^①。卡德尔所說的，南斯拉夫“农村資本主义的发展已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真相，原来就是这样啊！

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广大的貧苦农民，則在富农的盘剝和铁托政权的直接压榨下，处境凄慘，求生无路。有些农民甚至被迫不得不卖儿卖女。南斯拉夫《青年报》报道：“男孩子在喧鬧的集市上像一头小牛，像一袋燕麦一样被出卖了。”他們在“被出卖”后就变成了“农僕”。在克罗地亚发现了七百七十八个这样的“农僕”，其中百分之七十三是在十五岁以下，而“沒有发现的农僕还要多得多”^②。

仅仅这些无可辯駁的事实，就足以揭穿铁托集团的真面目。南斯拉夫农村的整个情况比上述材料揭露的情况无疑是更加严重的。铁托集团叛变以后，南斯拉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蜕化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铁托集团口口声声說“支持个体农民”，“代表农民的利益”，其实，他們支持和代表的只是一小撮新老富农。这一小撮富农就是铁托集团統治农村的社会基础。

五 如此“社会主义成分”

苏共领导閉眼不看南斯拉夫农村发展的“现实过程”，閉眼不看南斯拉夫农村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大量“事实”，閉口不談铁托集团在农村所推行的代表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路綫和基本政策，一眼盯住了“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社会农場”，好像淹在水中的人抓住了几根稻草一样，反复叫喊什么南斯拉夫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現在“不是百分之六，而已經是百分之十五”。

現在，我們就来透视一下，在这种“社会主义成分”里面，铁托集团玩的是**什么把戏**，有的是**什么貨色**。

铁托集团在农村推行代表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路綫和基本政策的結果，使南斯拉夫的广大农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南斯拉夫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生产长时期內不能恢复到二次大战前的水平，同战前能够出口粮食的情况相反，长期要依靠进口大宗的美国粮食来維持他們国内的粮食供应。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南斯拉夫每年进口的小麦約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有的年份高达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口小麦占城市小麦消費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有的年份城市消費的小麦几乎全靠外国小麦維持。从美国进口的小麦，一般

^① 科馬尔：《农业进一步发展中的生产、經濟方面的問題和任务》。1962年7月在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② 1962年3月7日南斯拉夫《青年报》。



占进口小麦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多的时候达到百分之百^①。从美国进口大宗粮食，造成了严重的支付逆差，大大加重了南斯拉夫经济上的困境。卡德尔承认：“在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比例经常失调的逆差中，我国落后的农业所不能充分供应的食品进口起着主要作用”^②。

面对着这种严重情况，铁托自己撕破了所谓“支持个体农民”的外衣。一九五五年七月，他在对美国“埃迪·薛伍德”研究班人员讲话的时候说：原来的集体化道路不行，“今天的这些小农户也不行。”“他们（小农户）无力为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居民的食用需要提供足够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小农户不能很好地精耕细作，劳动生产率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出路何在呢？铁托集团认为，就是要像美国已经做过的那样，走大农场主吞并小农庄的道路。在同一次讲话中，铁托公开说：“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并在这方面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协议’的想法。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铁托集团走美国农业道路的办法就是，在极力扶持富农经济的同时，扩大他们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说，“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

第一，从扩大耕地面积的手段来看，“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采取的是兼并农民土地的办法。

铁托集团以“扩大和加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关系”为名，通过官方的农业银行，向这些“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提供大量的购买土地的贷款，以支持它们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一九五九年，通过的《农地使用法》规定，“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有权优先购买和租赁农民的土地，并且有权对那些无力按照官方规定的技术经济标准进行经营的贫苦农民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

卡德尔说：“全部实践表明，只要土地的价格使得购买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农场和合作社就可以而且应当比过去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购买尽可能多的流通中的土地的中心。”^③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在《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中进一步强调：“需要采取坚决得多的措施”，来兼并那些贫苦的和无力提供商品农产品的农户的土地。他强调，这些农户，必须“迅速地把自己的部分土地或全部土地出卖或长期出租给农业组织”。他又在一九六二年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说：“必须保证农业组织和其他组织所必需的有刺激性的贷款条件和其他条

① 根据 1955 年、1958 年、1960 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1963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1964 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科马尔 1962 年 7 月在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讲话等材料。

② 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



件，以便它们能够购买、租赁和合并这种土地，并通过长期合作等等来获得这种土地”。

在这种政策支持下，“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兼并农民土地的规模迅速扩大。据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南斯拉夫《经济政策》报道，一九六〇年“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土地由四年以前的二十万零二千公顷增至六十五万七千公顷，而“社会农场”则由六十三万六千公顷增至八十万公顷。又据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经济政策》透露，“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购买的土地，一九五九年为一万八千公顷，一九六〇年为二万八千公顷；租赁的土地一九五九年为五万公顷，一九六〇年为十一万六千公顷。“社会农场”一九五九年购买土地七千公顷，租赁土地二万一千公顷。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南斯拉夫《政治报》还报道，马其顿共和国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土地，近两年来由一万八千公顷增至六万公顷，其中“大量耕地是近几年从个体生产者那里买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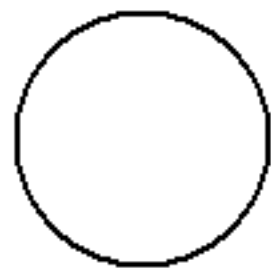
第二，从同农业工人的关系来看，“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对农业工人进行着残酷的剥削。

在“社会农场”里，经理把持一切，农业工人毫无权利，他们的工资很低，劳动时间很长，生活条件很坏。

南斯拉夫报纸说，有些农场经理任命劳动力包买主当工头、队长和组长。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南斯拉夫《青年报》说，“仅在阿帕廷农场，就大约有三十个组长。他们……基本上一点也不劳动，但是他们除了在算账时进行剋扣外，全都得到经常的佣金”。“他们在农村里招募工人，并在这种妙不可言的生意中赚到房屋和小汽车，成为‘出名的人’”。这家报纸对这个农场里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情况还作了这样的介绍：“最通常是‘从黎明劳动到天黑’，这意味着每天十六小时”。“经理的算法是这样：八、九个工人用八小时的劳动可以收割一公顷的玉米，而企业每公顷付出一万七千第纳尔。由此看来，每个工人每天应挣二千第纳尔。但是并非如此，虽然他们不得不‘从天蒙蒙亮劳动到天漆黑’，这个农场中某些组里的工人在十五天内只领到三千第纳尔，最多是三千五百第纳尔。组长每天剋扣每个工人多少——是可以容易地算出的。”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报道，一个包工头去年率领了九十名工人在一个农场工作，“几天内就‘赚了’一百一十八万六千第纳尔”，今年他率领着一百人。“同时在同一个农场中，还有一个带着一百五十名工人的工头，拿到了一百万以上的第纳尔”。

这些劳动力包买主常常勾结农场经理，共同榨取农业工人。据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报道，在摩斯塔尔，“几乎在所有的区里都已发现工头把葡萄酒、白酒、葡萄、烟草等作为礼品赠送给农场的领导人”。这些工头一下子“赚了几百万”，而“工人的住宿、伙食、工资……都非常坏”。“男工和女工一起按组睡在不像样的木棚和畜栏里”。

“社会农场”对农业工人的这种剥削，已经达到使农业工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有的农场工人举行了罢工。据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斯累姆战士”农场的一批



工人曾經在九月三十日舉行罷工。他們責問說：“我們靠什麼過活？靠空氣嗎？”這家報紙說，這個農場的“三百名工人已整整三個月沒有領到個人收入”。“農場的大多數工人都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其他任何收入”。

“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也大量雇用長期的和臨時的農業工人，進行剝削。據官方統計，一九六一年，各種“合作社”雇用的固定農業工人，有十萬多名^①。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勞動報》透露，被雇用的農業工人“經常受到最粗暴的剝削（勞動日長達十五小時），他們的個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居住條件和伙食也非常壞”，常常是一百人或二百人居住在一個木棚里。“這些工人幾乎沒有任何權利，而農業組織要他們履行的義務却是非常多的”。

第三，從經營方針來看，“社會農場”和“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執行的是資本主義的“最高贏利原則”。

南斯拉夫的“社會農場”同南斯拉夫城市中的“社會所有”企業一樣，也實行“工人自治”，以追求高額利潤為經營目的。

“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憑藉着鐵托政權給予的向農民收購農產品的壟斷權，在商業活動中，利用農產品價格自由漲落的條件，賤買貴賣，大做投機生意，謀取高額利潤，剝削農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農業減產，“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和其他商業機構就趁機哄抬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一九五九年的農業收成有所增加，“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就破壞同農民簽訂的收購合同，減少收購數量，不惜讓農產品爛在地里。在許多地區，“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銷售農產品的價格比收購農產品的價格甚至高出百分之二百到三百。

這種“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實際上是一種以追求最高贏利為原則的、主要從事商業活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它的業務範圍包括：供銷工業品、收購農產品、農產品加工、手工業、其他加工工業、為個體農民提供機耕等所謂“服務”。據統計，一九五七年上述各項業務收入所占比重是：供銷工業品占百分之十五點四，收購農產品占百分之二十八點一，農產品加工占百分之九點三，旅館飲食、手工業、公用事業及其他業務活動共占百分之十八點七，農業生產僅占百分之二十八點五^②。這種“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土地很少，據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工作報告提供的材料，一九六〇年在四千零六十七個“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中，有百分之十九根本沒有土地，有百分之三十四只有五公頃以下的土地。對於這種情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南斯拉夫《經濟評論》寫道：“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不斷地並且越來越多地恢復商業活動，而忽視農業和其他活動。歸根到底，這種合作社正在失去農業勞動者合作社的性質。”

為了謀取高額利潤，一方面，像一般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進行着劇烈

① 見《1962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鑑》。

② 韋利米爾·瓦西奇：《南斯拉夫農業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貝爾格萊德勞動出版社1960年版，第107—108頁。



的競爭一样，“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其他农业組織同富农之間也进行着剧烈的競爭。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又把富农和一些富裕农民看作为最有利的合作者加以支持。科馬尔这样說：“需要強調指出，必須使合作社和其他組織的活动也将刺激和发展比較发达的农户对增加生产和同农业組織进行合作的經濟上的兴趣，以便它們在这种合作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不應該忽視拥有五公頃以上土地的农户提供农民剩余产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他們是一部分最重要的个体生产者。目前他們自己的独戶經營的趋势，應該被引导到更密切地同农业組織进行生产合作的方向去。”^①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提供了以下材料：在奥西耶克县(南斯拉夫的粮产区)，“将近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占有三公頃以下的土地。明摆着的问题是：同非商品生产者发生合作的关系，合作社有什么好处呢？是否要在他們不可能正常維持生活的土地上免費保证他們的生存呢？这样对誰有利？”“核算表明，同比較稳定的农民进行合作是比較赢利和比較合算的，他們能够用土地为市場生产，并且对于他們來說，土地是基本的和唯一的收入来源。进行这种合作，合作社和生产者在經濟上都同样合算。”要同那些“比較发达的农户”合作，不要同那些“非商品生产者”合作，取决于什么样的标准呢？无非是能否“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已。

这就是說，这种“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經濟的发展。这些“合作社”，甚至直接操纵在富农分子手中。

《南斯拉夫农业問題》一书中說：从某些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們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們絲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說它們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只能說它們在发展和帮助資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这个自我揭露的材料，把他們的底揭得太清楚了。他們狼狽不堪，无法辯駁，只好耍賴。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南共联盟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周报发表了該报社长、南共联盟中央委員、南共联盟中央組織政治書記处書記奥索尔尼克的题为《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政策》的文章，特意挑出这个材料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的“文章中提到有一部貝尔格莱德出版的，据說题为《南斯拉夫农业問題》的书。中国作者不指出作者，不指出引語的出处，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完全是臆造出来的”。

他們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蒙混过去。

为了帮助讀者看清他們的无賴嘴臉，我們給讀者們提供这样一个有趣的材料吧：《南斯拉夫农业問題》一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由“教育”印刷企业印刷，貝尔格莱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教育”印刷企业設在貝尔格莱德朱雷·賈科維奇街二十一号。这本书的扉頁里注明，編輯委員共五人：布兰科·米約維奇、柳比沙夫·馬尔科維奇、米洛万·迪尼奇、斯維塔·波波維奇、斯洛波丹·格利哥里耶維奇。这本书包括四篇文章：米倫納·米奧德腊哥維奇的

^① 科馬尔：《农业进一步发展中的生产、經濟方面的問題和任务》。



《农业生产的特点和特殊性》，希耳米亚·哈萨纳吉奇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米路廷·伊万诺维奇的《南斯拉夫农业生产的状况和问题》，德腊哥斯拉夫·穆塔波维奇的《论合作化》。《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引用的和我们这篇文章从新引用的一段话，就是出自德腊哥斯拉夫·穆塔波维奇的《论合作化》一文，见该书第一百一十三页。

总之，以上三个方面的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斯拉夫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农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是建立在剥夺小农的基础上；这种农业组织同农业工人的关系，是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关系，是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这种农业组织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全部活动，都遵循着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这种农业组织是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农民的工具。

这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富农经济一样，是靠剥夺和剥削小农起家的。和富农经济不同的只是：第一，它披着“社会主义成分”的伪装；第二，它更加受到铁托政权的直接控制和直接支持。

六 结论是南斯拉夫农村的资本主义愈来愈泛滥

从以上的材料和分析，能够得出的结论，绝不是南斯拉夫农村的什么“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而只是南斯拉夫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愈来愈泛滥。

在铁托集团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现在在南斯拉夫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有两大势力，一个是一直保存下来并且日益得到发展的富农经济，另一个是由铁托政权直接控制和支持的“社会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加强这两种资本主义势力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是铁托集团“加强农业”的现行基本政策的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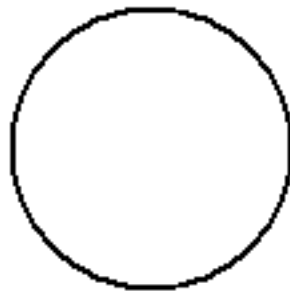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对铁托集团的这种政策，表示赞赏地说：“‘加强农业’政策同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的历史经验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它以自由市场中的竞争来迫使个体农民进行现代化改造，要不，就得放弃经营。”^①

铁托集团自己不願意说得这样清楚，他们含糊其词地说，在南斯拉夫农村实行的是，“给农业中的经济力量以自由的道路”。

赫鲁晓夫十分羡慕铁托的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他跟在铁托后边，要走美国农场主的道路。这大概就是这种“自由的道路”吧！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反复揭露过的资产阶级自由一样，铁托集团宣扬的这种“自由”，也是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压迫的自由，发财的自由，掠夺的自由；是劳动者受剥削的自由，受压迫的自由，丧失土地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挨饿受冻的自由，在死亡线上进行挣扎的自由。

^① 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纽约圣马丁印书馆、伦敦麦克米伦公司 1957 年版。



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必定胜利

林文山 郑公盾

奴隶贸易是资本的原始 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

远古以来，黑人在非洲的土地上生长着和生活着。黑人是非洲大陆的真正主人。他们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过显著的作用，对科学文化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果没有外来的侵入，他们将一步步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建设更加文明的新非洲。但是，自从十五世纪殖民主义者侵入非洲之后，非洲人民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的被贩卖、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生活。

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上半叶，正是资本主义开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原始积累。为此，资产阶级除了大力地用暴力在本地开拓地盘之外，还以更加残暴的方式对外掠夺。惨无人道的非洲奴隶买卖的利润，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资本家的巨大财产是建筑在黑人奴隶的血和骨上面的。工业革命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这宗买卖。

那时，海盗船只打着“耶稣号”之类的招牌，从欧洲载运廉价的工业品到非洲，用欺骗和掠夺的手法向非洲的首长们换取黑人奴隶，然后把黑人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各地，高价地卖给那些种植园主和矿山资本家，换取那里廉价的原料运回欧洲。然后，再把用这些原料制成的工业品，运到非洲去换取黑人奴隶。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三角贸易”。

殖民主义者在这个“三角贸易”中，特别是在买卖和贩运黑人奴隶这一交易中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美国，都干过奴隶贸易的勾当，并且不惜用战争来互相争夺贩运奴隶的控制权。在十八世纪初，英国是主要的从非洲贩运黑人奴隶的国家。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指出，到了十九世纪，奴隶买卖“最后主要是靠美国资本、由美国船只装运，在美国公民管理下、在美国旗帜下维持下去的”。

殖民主义者常常勾结黑人酋长和头目出卖本部落的黑人，而那价格，像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果》所描写的，“一些粗劣的棉布，和一些火药，打火石，三桶烧酒，五十支造得很坏的步枪”，就交换了一百六十名奴隶；然后，三杯烧酒又换去了三个小孩，一只厚纸做的鼻烟盒换去了六个剩下的奴隶。

殖民主义者鼓动沿海地区的黑人酋长去抢劫邻近地区的黑人，甚至自己也组织了所谓“猎捕队”，偷袭黑人的村落，往往一夜之间，就把那些和平安静的黑人村落糟踏成荒无人烟的废墟。

就这样，最少有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以上的黑人从非洲被劫走或在劫掠中被杀害。被劫走的黑人，都是最强壮的劳动力。奴隶贸易严重地破坏了非洲的生产力，阻碍了非洲社会文化的发展。不仅如此，殖民主义者还进一步地掠夺非洲的矿产、农业资源和土地，瓜分非洲，使非洲变成被他们长期剥削和奴役的殖民地。

那些用种种手法夺取来的黑人奴隶，被一批一批地从他们的故乡——非洲贩运出去。他们给加上了手铐脚镣，像“毳子般叠在一起”，被搁置在船仓里。贩奴者甚至要把他们的脚架起来，使他们动弹



不得。有些船的上下仓板間隔只有十八英寸高。美国贩奴船“龐加斯号”曾經把二百五十个女奴隶（包括許多孕妇）装在一間十六英尺长、十八英尺寬的船仓里。她們的“膝头都互相交插在一起，連向左右移动一英寸的余地都沒有”。一个贩奴船的船长說，黑人奴隶“在船上所占的面积，还不如一个人睡在棺材里的地方大”。仓里的悶热和臭气使人昏厥和窒息。許多黑人在航行的中途就被折磨死了。折磨死的和患上傳染病的黑人，被扔到大海里去喂鲨鱼。饥饿的鲨鱼为这种“美味的食物”所吸引，不断地追逐着贩奴船只。为了鎮压黑人的反抗，他們对黑人施加种种酷刑，輕則鞭打，重則砍手断头，或者扔到海里去。

进行奴隶貿易，給西欧和北美洲的资产階級带来大笔的利潤。在通常的情况下，販运黑人奴隶可以获得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一千的厚利。当时奴隶販子曾經做过这样的計算，他們只要在三船奴隶中有一船逃避开海盗和其他方面的劫掠，安然到达目的地，就可以发一笔横財。就这样，英国利物浦的一个販卖奴隶的商人，仅在短短的十年內，由于販运三十万零三千奴隶，就获得了二百三十六万英鎊的利潤。美国巴尔的摩的贩奴船“爱神号”，建造費为三万美元，第一次贩奴航行就賺得利潤二十万美元。用这种极殘暴的手段劫取到的財宝，流回母国，在那里轉化为資本，造起了工厂，使包括英国在內的欧洲国家和北美洲大大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

在奴隶貿易中，美国殖民者起着特別卑劣、特別无耻的作用。在十九世紀，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用更“文明”的方式剝削非洲人民，把非洲变成他們的殖民地，宣布了禁止奴隶貿易。之后，美国政府虽然也宣布禁止奴隶买卖，实际上却从来也沒有这样做。美国人这时控制了整個西半球的奴隶买卖。他們从中获得特別丰厚的利潤。奴隶販子为了逃避檢查，常常在危急关头把整船的奴隶丢到海里去。在这段期間，从非洲运出的黑人据說比过去多了三倍，其中三分之二是在公海上被杀害的。

建筑在黑人奴隶的骨和血 上的资本主义

奴隶貿易是資本的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奴隶劳动又是资本主义成长和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在北美洲表現得特別突出。比起奴隶买卖，奴隶制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

北美洲殖民地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同黑人奴隶的大量輸入分不开的。北美洲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只要一切价值的創造者——劳动力尚未具备，这些资源便依然沒法发掘出来，变成物质財富。劫掠来的黑人为美国資本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在北美洲南部，几乎一切主要工作都由黑人奴隶担任。在烟草的主要产地之一弗吉尼亚，一六五〇年只有黑人奴隶三百名（其中包括部分“自由”黑人）。为了发展烟草生产，种植园主在一六六〇年以后大量輸入黑人奴隶。一六七一年，弗吉尼亚的黑人奴隶就增加到二千人；一七一五年增加到二万三千人，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七六〇年更增加到二十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而弗吉尼亚的烟草生产，又正是在一六六〇年以后才得以大发展的。一七九三年，軋棉机发明以后，棉花代替了烟草成为美国南部种植园农作物的中心。种植棉花需要更多的黑人奴隶。美国南部黑人奴隶人数也就因而从一七九〇年的六十七万多人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将近四百万人。这些数字，清楚地說明了为什么奴隶买卖在十六世紀随着美洲的发现和开发而特別猖獗起来。

从非洲販运来的黑人奴隶，被迫用自己的血汗和眼泪把荒涼的北美洲开发了起来。在非洲被劫掠、在航船上被折磨的黑人奴隶，在这里并没有終止而仅仅是开始了他們苦难的历程。一部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黑人奴隶遭受奴役和摧殘的历史。

北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制，混合着古代、中世紀和現代各种剝削制度中最野蛮、最无耻的成分。它



不同于古代那种自给自足、主要为奴隶主的享受而生产的奴隶制，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向世界市场出售商品、谋取利润而生产的。但是，它又保有奴隶制中那种对奴隶肉体上的奴役。作为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种植园主，拼命地从黑人奴隶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利润。奴隶们被强迫每天工作十八小时甚至更长一些，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地倒下去为止。

此外，种植园主还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拼命加强黑人奴隶们的劳动强度。奴隶们经常处在工头和监工的监视之下工作，稍不小心就要挨鞭子。

奴隶们从事着过度的劳动，可是生活条件却非常糟。一个种植园主供认，每名奴隶一年的伙食费用是七元五角美元，这个数字还包括医药费和监工的伙食费；衣服、鞋子、被盖、采集棉花用的口袋等等物品，合计起来也是每名奴隶七元五角一年。这还是正常时期的开支。当经济萧条和危机临到这时，奴隶们的生活条件就更坏了，简直不如监狱里的犯人。

奴隶主将美国南部变成把人当作牲口饲养的牛栏。在这个“饲养场”里，为了找到更多的劳动力，奴隶主们力求黑人奴隶生儿育女，甚至规定了奖励办法，要不满十六岁的黑人女孩子生育，把十七岁的生子女多的女黑奴加以奖赏。他们甚至把身强力壮的黑人奴隶作为“传种黑人”，像牲畜一样从这一个庄园送到那一个庄园去“配种”。这些“传种黑人”可以受到最好的“饲养”。

黑人奴隶是人而不是牲口，他们会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会反抗，因此，奴隶主们对待黑人奴隶甚至比对那些不会思想、不懂得反抗的牲口更加残酷。对奴隶施行肉体虐待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一个名叫阿莫斯·斯托达德的美军少校在目击了这些虐待后写道：“残酷的、乃至于异想天开的惩罚，每天落在这些因饱受饥饿、劳累和鞭子摧残而体力羸弱的苦命人身上。……由道德败坏的奴隶主和总管——这些人大多数都表现为一种愚昧和邪恶

的奇异的混合物——所造成的创伤，折磨着过路人的情感，使他的心绞痛流血。”

沉重的压榨，使一个奴隶劳动力往往只能维持六、七年。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就会像一只挤干了的檸檬一样被抛弃，任由饥饿和死亡来迎接他们。

在美国摆脱英国殖民地羁绊的独立运动中，虽然宣布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独立宣言，但这对于被认为不是人的黑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奴隶买卖在美国各地照样盛行着，纽约就是贩奴的中心。奴隶仍然是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仍然拥有从鞭打到扼杀奴隶的一切权利。这一切权利，甚至还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中，北方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后，美国黑人名义上是“解放”了，但是，黑人实际上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只不过这种奴隶制度略略改变了一下形式罢了。就像列宁所说的，奴隶制度的经济残余同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至今还很大”，“闭塞不通，粗野无知，缺乏新鲜空气，好像一座对付‘解放了的’黑人的监狱，这就是美国的南部”^①。

资本，确实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黑人在美国历史中的卓越贡献

是黑人的劳动，把美洲荒原开发起来。他们给种植园主种植烟草、靛青、水稻和棉花。黑人的劳动使得南部几个州输出的烟草到十八世纪初就达到二千八百万磅，到独立战争前夕又猛增至一亿零二百万磅。黑人的劳动，使美国棉花生产从一七九〇年的年产三百万磅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年产三十八亿磅。黑人奴隶用自己的血汗生产出来的这些财富，喂肥了南部的奴隶主，成为北美洲殖民地取得经济独立的基础。

^①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13页。



棉花生产的发展，还同时促进了纺织工业、航运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使纺织工厂由一八〇三年的四家增加到一八四〇年的一千二百四十家，纺织工业的棉花消费量从一八一五年的五万四千包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八十四万五千包，使纺织工业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事情确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①南北战争以后，许多黑人从南方的农业区跑到北方的工业区，参加工业生产，担负了许多繁重艰巨的劳动，这也是美国工业生产得以从那个时期起迅速发展的一个因素。

在美国独立的革命中，第一个为美国独立牺牲的烈士是黑人克利斯普斯·阿塔克斯。五千以上的黑人在星条旗下英勇地参加了战斗。他们在革命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时，起了扭转局势的决定作用。就如目击长岛战役的哈里斯博士所说的：“如果他们（黑人）不忠诚的话，那末一切早就完了。”在他们当中，有着萨勒姆·普尔、詹姆斯·亚米斯特德、奥斯汀·达布内、普林斯……这样一批英勇机智的英雄人物，有着德波拉·甘内特这样一些花木兰式的女战斗英雄。

在南北战争中，黑人为了联邦的统一又作了英勇的斗争。黑人奴隶在种植园举行了多次起义，约有五十万人逃离种植园，成批地逃往联邦的防线，从而扰乱了南部同盟各州的后方。大约有二十万黑人参加了联邦陆军，三万黑人参加了联邦海军，二十五万黑人参加挖战壕和造堡垒。将近七万黑人士兵为此付出了生命，而没有一个黑人为保卫南部同盟放过一枪。最先攻进南部同盟首府里士满的是黑人联队，最先把美国国旗升起在南部同盟议会大厦上的，也是一名黑人。黑人战士是这场伟大内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黑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争取到受教育的机会，黑人在多么不平等的条件下取得工作的权利，黑人的创造力受到多么不合理的压抑和打击，

他们在科学文化的领域中仍然作出杰出的贡献，有过许多著名的人才。

黑人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近一百年来，他们的专利发明就有五千件，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在美国历史中，有着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班尼克尔，润滑技术专家伊利加·麦克埃，炼糖用的真空锅的发明者罗伯特·里厄，多种电器的发明者格兰威尔·伍兹，制鞋机的创造者杰安·麦兹利格，名著《细胞表皮的生物学》的作者、生物学家爱尔奈斯特·哲斯特，对于甘薯、花生和其他农产品的研究有着显著的成就，给南部增加了许多财富的天才学者乔治·华盛顿·卡维。而且，在这当中，又有着多少黑人的发明家，被奴隶主、资本家吞没了他们创造的果实！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那位发明漚麻机的哲而治的遭遇，就是这种情形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

在美国黑人中，有着威廉斯、杜波依斯、伍德逊等许多历史家。他们特别着重编写黑人的历史和成就，为增强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著作被译成了许多国家的文字。

在美国的黑人文学中，有着菲利斯·惠特莱这样出身于奴隶的才华优美的诗人，以及保尔·劳伦斯·顿巴、康第·康伦、朗斯敦·休士、杜波依斯等许多著名的黑人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个很有价值的部分。

黑人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被确切地称为“唯一来自美国本土和美国生活的艺术品”。在这些领域中的黑人艺术家有卓越无比的歌唱家玛丽安·安德逊，伟大的歌唱家、演说家和演员保尔·罗伯逊和舞蹈家约瑟芬·贝克。他们的艺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钦佩。

美国黑人更在体育运动方面以他们的辉煌成就为美国增添声誉。长期以来，美国的世界冠军有很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5、146页。



多都是黑人运动员争得的。在一九六〇年的第十七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黑人在男子田径赛中取得了六枚金质奖章，对美国的获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国际奥运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也不得不承认，要是没有黑人运动员，“我们就会降为第二流水平了”。

美国黑人为美国增添了这样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资本家带来了这样丰厚的收益；没有黑人，就没有今天美国人在那里大肆吹嘘的“先进的农业”；没有黑人参加的英勇战斗取得的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就没有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带给黑人的是什么呢？

歧视，歧视，奴隶和歧视！

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和得到的待遇，却正好同他们的贡献成反比例。

“最后受雇，最先解雇”的原则，大量黑人的失业，迫使黑人在为了免于饥饿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工作。黑人的工资从来都是十分低微的。据美国黑人组织城市联盟统计，目前美国全国黑人的平均全年工资只相当于白人平均全年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四，而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七。美国官方承认，在种族歧视特别猖獗的南方，一九六〇年黑人男子的工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男子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三。

黑人工人的工资低，有人认为是由于黑人受教育的机会少，得到熟练工作的机会少。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事实证明，受过同等教育的黑人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仍然远低于白人工人。相反，所受的教育低于黑人工人的白人工人，他们的工资却仍然比黑人工人高。而且，资本家们还往往把那些黑人做的最紧张、最危险、最不愉快、最不卫生的工作说成是“非技术”性工作，使黑人的低工资“合理化”“合法化”。

黑人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最大，但是黑人在农业方面所受的压榨又是特别残酷。从事农业

劳动的黑人绝大部分是分成制佃农和雇工。农业雇工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工资劳动者。住在耕地里的雇工，所得到的工资只是一所可容他一家人居住的小屋以及在种植园的供应店里除买口粮的权利，很少能得到现金。分成制佃农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分成制佃农的一切活动都得听种植园主的指挥，并由带着枪的走狗严密监督。他们全家大小成年累月辛勤劳动，但是，成果的一半以上要交给种植园主。此外，他们还受着种植园主的高利贷的残酷盘剥。至于那些小农、现金佃农，他们的遭遇比之雇工，分成制佃农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只能勉强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在危机和不景气的年头，他们就得被驱逐到雇工、分成制佃农的行列里。

就这样，通过种种的剥削和掠夺，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从黑色劳动者的身上，多榨取了巨额的超额利润。

在这个自称为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里，虽然宪法上没有缺少承认黑人享有白人享有的权利的条文，但是，黑人事实上被剥夺了种种政治权利：

黑人的选举权受到种种苛刻的限制；

黑人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迫住在特定的街区和移民居住地；

那些专供白人使用的饭店、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医院、旅馆等，禁止一切黑人入内。甚至在电车、公共汽车上，也给黑人划定了位置；

黑人事实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黑人一直没有取得平等的劳动权利。

总之，在美国，就如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所说的，“美国黑人是美国工人阶级中最受剥削和压迫的。他们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个所谓领导国家境内的被剥夺权利的殖民地人民”。黑人尽管没有了奴隶的称号，但是仍然没有取得人的身份。美国一个叫做哈利逊的牧师就曾经向一群三K党暴徒们说过这样的话：“在上帝眼中杀害黑人并不是罪恶，因为黑人无异就是狗。”因此，对黑人运用各种私刑，是美国统治阶级对黑人种族歧视中最残暴最



野蛮的手段之一。戴着面罩的三K党，是个专门杀害黑人的秘密团体，他们今天走到这里，明天走到那里，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成千上万的黑人。

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荒唐、更不合理的吗？

种族歧视不仅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黑色劳动者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们更便于统治和剥削白色劳动者的工具。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延长它的反动统治，竭力挑拨白人劳动者对黑人的仇视，造成白人劳动者对黑人劳动者的偏见，以破坏劳动人民的团结，转移劳动人民的斗争目标。

在经济上把黑人压在下面，也势必使美国南部忍受全国最低的工资水平。例如，素来排斥黑人的纺织工业的工资，越深入南部就越低。那道理是很明显的。一个便宜的、没有正当权利的劳动力特别后备军，自然是非常理想的压低白人人工工资的手段。包括白人在内的南方人，是美国吃得最糟、住得最坏、穿得最破、收入最少的人民。就是美国北部和西部，雇主们也在用把工厂搬到南方去等手段来破坏工人的罢工，压低工人的工资。

所谓“白人优越”，就是用包括白人工人在内的美国劳动人民的更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来的。

民族压迫，说到底不过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另一种形式。

总之，美国社会中对黑人种种野蛮无耻的歧视和迫害，归根结蒂，完全是为了适应垄断资本家、大种植园主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是美国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宁肯死为自由人，也不 愿活着当奴隶”

世界上存在着掠夺、奴役的现象，也就必然会引起反掠夺、反奴役的斗争；存在着野蛮的种族歧视，也就必然会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被掠夺、被剥削、被歧视的黑人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他们的斗争是一首壮丽的史诗。

长时期的斗争，使黑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自己的觉悟。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黑人为了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和自由权利，曾经作过各种尝试和探索。他们有的人主张黑人通过掌握技术，培养忍耐性，获得财产，挤进上层社会，从而使黑人获得自由；有的人提出“回非洲去”的方案，主张“在祖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黑人国家”。残酷的现实教育了黑人，把希望寄托在挤进上层社会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幻想。在美国进入帝国主义以及种族歧视日益加剧的条件下，黑人要挤进上层社会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主张实际上等于向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奉献一批受过训练、唯命是从的黑人劳动力，供他们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回非洲去”的方案也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计划，它不是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根本办法，反而会削弱、损害黑人在美国本土争取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斗争。

黑人在他们的斗争中也曾经采用过沉默抗议、静坐示威、上法庭同统治阶级“说理”等手段。这些斗争，在某一时期内、某个具体问题上，也曾经取得过一些表面的胜利。为了自己利益的需要，为了平息黑人的怒火，美国资产阶级常常对黑人许下“解放”“自由”的诺言。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州的统治者都答应在美国独立时给服役的黑奴以自由；在南北战争中，林肯宣布了废除奴隶制。在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美国政府都通过了对保障黑人公民权利作出明文规定的所谓“民权法案”。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诺言”、“法案”都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一九六三年肯尼迪政府所提出、由约翰逊政府接过来加紧推销的“民权法案”，也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地再玩弄一次早已被拆穿了的把戏而已。美国所有的统治机构，都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工具，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他们恩赐的“诺言”和“法案”。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黑人，他们开始懂得：民族压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资产阶级绝不可能取消民族压迫，就如他们绝不可能取消阶级



剝削一样。他們开始看穿統治階級所玩弄的伎倆，認識到，單純依靠法庭和議會的斗争，不能使黑人摆脱被歧視被奴役的悲惨地位。他們已經开始抛开幻想，團結起来，从法庭走向街头，进行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他們针对着統治階級經常玩弄的騙术，提出了鮮明的战斗口号：要求全面的自由，要求在社会、政治、經濟等一切方面廢除种族歧視制度，全面实现黑人的平等权利，而不只是仅仅某一项具体措施；要求立刻自由，“我們現在就要自由！”而不是遙遙无期的所謂“长时期逐步解决”。这些鮮明的战斗口号，是黑人斗争进入到新的阶段，黑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日益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又会反过来促使更多的黑人参加斗争，把斗争推向一个更加高漲的阶段。

一九六三年首先从伯明翰市掀起的黑人争取平等权利、反对种族歧視的斗争，正是这一新阶段的最显明的标志。

这一阶段斗争的明显特点之一是，越来越多的黑人参加到斗争的行列。南北战争以后，黑人有組織的斗争是从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从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中，黑人运动主要仍局限于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黑人中产階級。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这一时期中，黑人无产阶级也比較多地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来，因而扩大了运动的規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黑人无产階級的力量更加壮大了，全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进一步高漲了，美国国内的階級斗争进一步尖銳化了，这就使得黑人的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群众性斗争空前高漲的阶段。从一九五七年反对教育隔离的小石城事件开始，群众性的大規模的斗争更是日益高漲。一九六〇年为了反对服务性行业中种族隔离而举行的“入座”示威，就曾席卷南部各州，有二十多万人参加。而一九六三年的斗争，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长和斗争的尖銳程度，在美国黑人斗争史上是少見的。斗争此伏彼起，声势浩大，波瀾壯闊，从几十人发展到几十万人，从一个市、一个州而发展到十几个州，最后几乎席卷了美国每一州的每一城市。据美国官方統

計，从五月中旬到七月底，在美国三十多个州的一百八十六个城市里，至少爆发了七百五十八起黑人示威。八月，全国黑人的斗争更是进入高潮。八月二十八日，十个黑人团体发起的全国性的向华盛顿“自由进军”，共有来自全国各州以及从海外各地专程回到美国来参加示威的黑人代表二十五万多人参加。据美国《新聞周刊》調查，在全部美国黑人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参加过不同形式的示威，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对实行种族歧視的白人商店的抵制。

黑人斗争規模的空前强大，显示了美国黑人和美国劳动人民的新覺醒，显示了他們斗争的力量和决心。

对于黑人的斗争，美国統治階級除了采取欺騙的手法外，还同时用暴力的手段进行鎮压。

面对着美国統治集团的殘暴的鎮压和屠杀，黑人当中的一些上层分子竭力鼓吹用非暴力手段“解除敌人的武装”，“影响敌人的良心”。但是，随着黑人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扩大，随着斗争的步步深入，黑人开始懂得必需以暴力来回击反动政府、种族主义者的暴力。就如美国黑人領袖罗伯特·威廉所說的：“向压迫者的良心恳求，是不能解脫压迫的絞索的。要对种族压迫这样根本性的問題进行社会变革，就需要用暴力。”

黑人工人越来越意識到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同整个工人階級的解放的斗争的密切联系。尽管有着种种的阻难和歧視，黑人工人加入工会組織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目前，黑人的工会會員已經超过二百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一九六〇年五月，在底特律召开了全国黑人劳工代表會議，这标志着黑人在工人运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黑人群众性的組織，特别是黑人工人的組織，不仅是争取黑人民主权利的巨大力量，而且是工人运动的一支不可忽視的主力。正如已故的美国共产党領袖福斯特所說的：“一千八百万黑人是美国工人階級中最具有斗争性的部分”。美国黑人的斗争首先是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无产阶级反对壟断资产階級的斗争的一个偉大的組成部分。



同样，美国黑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斗争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同全世界人民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同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联系。美国黑人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思想正在增长，越来越多的黑人日益关心被压迫兄弟的斗争。例如：刚果总理卢蒙巴被害以后，纽约黑人在联合国大厦举行愤怒的抗议示威；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哈勒姆黑人区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伯明翰城示威的黑人，高呼着非洲人要求自由的口号“乌呼鲁”；七月，哈勒姆区的黑人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内举行静坐示威，反对美国用武器帮助葡萄牙独裁政府镇压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要求把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联邦政府驱逐出联合国。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得对：“广大的美国黑人必将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兄弟们在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团结，互相支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阻碍不了的。”

黑人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

美国黑人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

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白人参加和支援黑人的斗争。在美国黑人斗争中，曾经出现过许多黑人、白人、印地安人联合起来反对共同压迫者的事实。美国最早出现的废奴社这个组织，就是以黑人白人合作为基础的。远在十九世纪初，当大批黑人奴隶从种植园有组织地逃亡时，许多倾向民主思想的白人组成了“车站”（同情废奴主义者的家宅），让过路的黑人可以停留。为了黑人的解放，不少白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名的约翰·布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八五九年由于亲自领导了黑人奴隶的起义而被绞死。二十世纪以来，更多的白人劳动者同黑人劳动者团结起来，为反对他们的共同剥削者而斗争。在近年来的许多次大罢工中，他们都提出了取消在就业、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对黑人工人的歧视作法的要求。一九六三年的“自由进军”斗争

中，有不少白人参加了示威的行列。美国统治集团妄图分化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团结的阴谋越来越不得逞了。反动工会头目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行径越来越被识穿了。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在黑皮肤上打着火印的地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白皮肤上得到解放。”^①美国的白人工人、劳动人民以及所有正直的白人在自己的斗争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真理。

黑人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黑人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争取人民民主、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黑人的斗争揭露了打着“民主”、“自由”、“和平”的幌子的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它不仅大大提高了美国黑人的觉悟，而且也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美帝国主义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政策，是它对待国内黑人政策的继续。十九世纪，美国就曾经利用所谓“遣返”黑人奴隶的幌子，在西非建立了利比里亚，使它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现在，美国政府一方面在非洲大搞所谓“攀亲戚”、“和平队”等等的活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战士”，而美国统治阶级在国内却残酷地剥削和镇压黑人，甚至连非洲国家驻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也由于肤色不同而遭受歧视，这就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是十足的种族主义者，所谓“攀亲戚”、“和平队”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替代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而玩弄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而已。黑人在帝国主义的堡垒美国进行的这一斗争所取得的每一点权利，将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胜利，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的胜利。黑人的斗争，是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巨大支持，是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巨大支持。因此，黑人的斗争，一直得到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呼吁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2页。



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不仅代表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心声，而且体现了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热烈的欢迎和赞同。

在全世界人民坚决支持和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中，一心讨好美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他们不敢把黑人问题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联结起来，不敢把民族问题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尽量缩小美国黑人斗争对全世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他们不是去支持黑人的英勇斗争，反而同美帝国主义相配合，大肆散布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要求黑人在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中采取“忍耐”态度。他们大力为美国统治阶级的“象征主义”、“渐进主义”的欺詐手法塗脂抹粉，大力鼓吹“黑人利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进行革命”。他们说，现在在美国上空刮起了一阵“清風”，种族主义精神将被清除，黑人的代表有可能被选入管理机关、法院和州的立法机构，黑人将担任州长、議員。这样，“便将出现美国全部生活的普遍民主化”。他们甚至誣蔑坚决斗争的黑人是“种族主义分裂分子”，誣蔑支持黑人斗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挑撥黑人和白人的关系。

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述过，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决不会放棄种族歧视这一有利于他们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政策，作为垄断资本的走狗，不論是肯尼迪，在肯尼迪以前的杜魯門、艾森豪威尔，还是在肯尼迪以后的約翰逊，他们都不可能改变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政策。这是阶级的本质所决定了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美国帝国主义的需要，对于黑人的斗争发出如此恶毒的攻击，进一步暴露出他们只不过是帮助美国垄断资本掠夺和压迫黑人的奴僕。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发出响彻云霄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四十多年前，当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列宁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今天，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人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的声明，正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提出来的。这一声明表明，美国帝国主义越来越孤立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线越来越扩大了。

在这种大好的形势面前，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坚信，黑人必胜，美国帝国主义必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阻擋不了历史的車輪。他们是少数。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

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領袖福斯特在生前以极大的热情贊美了黑人的正义斗争。他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这些勇敢民族已经再接再厉重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一次斗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他们新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有着新的口号、武器和策略，并且得到世界上社会主义和民主国家自由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对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前途毫无问题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这是真正美国无产阶级的声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音！

非洲黑人的今天正是美国黑人的明天。自从殖民主义者侵入非洲的第一天起，四百多年来，非洲人民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经过多年的斗争，现在，反帝的浪潮已经席卷着整个非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获得了独立地位，接着，他们又为捍卫国家主权、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那些还处于殖民主义桎梏下的非洲人民，欢庆解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黑人的觉醒，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寿命告終的重要标志。非洲的彻底解放，将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失去它最后的殖民堡垒；美国黑人斗争的胜利，又将使美帝国主义从削弱而走向灭亡。这是历史早已給帝国主义安排好了的命运。



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

——读《红色堡垒》

黄秋耘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我们既需要进行革命前途的教育，也需要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

今天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对于旧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白色恐怖的严重，革命斗争的艰辛，知道得很少。他们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具备怎样的革命品质，怎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战士等等问题，都还不甚了解，或许有人懂得一些一般的道理，但也说不上有具体的体会和感受。因此，以某一个工厂的实际斗争为内容，编写一些历史性的资料，以生动、具体、真人真事的典型事例，系统地教育青年一代，是一

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

以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斗争历史为题材的工厂史《红色堡垒》（中共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委员会厂史办公室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阶级斗争的活教材。

《红色堡垒》从一八七九年上海有第一盏电灯开始，一直写在一九六〇年为止，它所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发电厂的斗争史，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

斗争。在解放前几十年当中，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者都先后当过这个发电厂的主人，他们疯狂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剥夺中国工人的权利，限制中国工人的活动，一个比一个凶狠，一个比一个残酷，一个比一个狡猾。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英勇顽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套适合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极其灵活而巧妙的斗争形式。不论是那个蛮不讲理的英国“强盗”诺登斯也好，还是那个假仁假义、口蜜腹剑的美国“老江湖”乔亨也好，不论是那个狼狗似的日本“萝卜头”山本也好，还是那个狐狸似的国民党反动头子吴开先也好，在英勇顽强的中国工人阶级面前，都束手无策，一败涂地。

在《红色堡垒》中，斗争的几个主要回合，都写得有声有色，奕奕动人。

在上海沦陷后的头几年，市中心的“租界”已成为日寇包围中的“孤岛”，在发电厂内，美国鬼子又订立了许多对付工人的条例，像一根根绳子似的把工人们捆得紧紧的。在这样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发电厂的工人巧妙地利用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站稳脚跟，团结群众，开展活动。不能做公开的抗日工作，他们就搞“节约救难”，把募捐得来的钱，一部分救济流亡难民，一部分秘密支援新四军。不能做公开的宣传工作，他们就蹲在厕所里读报，在驳船上“听听消息，讲讲六道”。不能组织工会，他们就办消费合作社，通过卖油盐酱醋，送煤球上门，搞熟人头，在工人兄弟中间做说服教育工作，把大伙拧成一股绳。结果，团结在党周围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革命力量也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鬼子占领了“租界”，拿下了发电厂，压迫越来越厉害，斗争也越来越艰苦。日本鬼子不但穷凶极恶，而且阴险无比。他们动不动就派出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如临大敌地威胁



工人，镇压工人，同时还利用工贼作钓饵，来寻找工人斗争的领导者加以迫害。针对着这种情况，发电厂的地下党支部，领导工人们巧妙地采取无组织形式的有组织斗争来对付鬼子；而且在斗争中“得到风，就转篷”，不硬斗下去。这种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鬼子强迫工人们进厂门时向门岗鞠躬敬礼，工人们就排成一条半里路长的长龙，一个挨一个慢腾腾地给他们“鞠躬”，把上工的时间捱磨过去，迫得鬼子只好自动收回成命。工人们闹罢坐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鬼子原想叫工人推出代表来谈判，然后下毒手逐个逮捕。但是工人既不派代表，也不回去工作。鬼子胡乱抓了十几个人。工人们就挤在广场上席地而坐，大声叫着：“不放人，我们不散！”鬼子偷偷派工贼混到工人队伍里，煽动工人推举代表去谈判，以便找出工人的头儿，可是工人们早就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索性推举这个工贼去当代表。这场“无头斗争”，斗得鬼子晕头转向，一筹莫展，最后只好低头认输，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宣布放人、加薪。

这一系列斗争的胜利，都是发电厂地下党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手订的沦陷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结果。正因为严格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事，他们才能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履险如夷，克服障碍，把不利的因素转变成有利的因素。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除了卷土重来的美国老板外，发电厂工人又增添了一个凶狠狡猾的敌人，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且当时美国老板已经改变了不让国民党官员在他的公司里插足的主意，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狼狈为奸，共同对付他们的眼中钉——中国工人阶级。

不过，在饱经考验的发电厂工人面前，国民党反动派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不论在选举工会委员的竞选活动中，还是在“九日入夜”的罢工斗争中，他们都显得完全不是发电厂工人的敌手。最后，连伪市长的住宅和伪社会局的用电都给发电厂工人停掉了，这些反动头子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要是罢工再扩大开来，就更难于收拾，只好

无可奈何地承认失败，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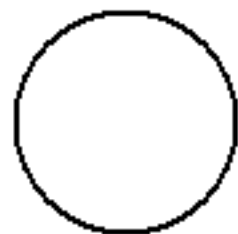
当然，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发电厂的党组织不是依照上级党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中间派，打击反动派，把绝大多数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斗争中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决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打退了美国老板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在《对垒》和《九日入夜》两章中，《红色堡垒》一书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地下党领导这场群众斗争的卓越的领导艺术。

《红色堡垒》不但写到斗争胜利的成功经验，也写到斗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一九四七年夏天，发电厂有六个工会干部在“富通印刷所”被捕。国民党特务组织准备以“富通事件”为借口，向上海工人阶级展开新的进攻。发电厂党组织在分析形势、估计情况以后，本来不主张“硬拚”，可是当时有个别党员工会干部却擅自违背党组织的决定，先是发动工人包围伪社会局请愿，要伪社会局长吴开先放人；后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威胁和谎言的欺骗下，又草草收兵，向工人宣布立即撤退。这一来，敌人就把主动权夺过去了，马上开始一个大规模的迫害，解散了原来的工会，下命令通缉原来的工会干部。发电厂的资方也配合行动，把被捕的和被通缉的职工全部开除了。

从这次惨痛的失败可以看得出来，任何革命斗争，只要离开了党的正确路线，就一定会受到挫折，遭到损失。

党组织总结了这次斗争失败的教训，制定了新的战斗部署。决定让已经暴露了的同志，暂时撤退；原来在第二线工作的同志，站到斗争的第一线。这时，共产党员王孝和挺身而出，打入了敌人新成立的伪工会，担任了委员的职务。王孝和同志利用这个合法的身份，积极而又巧妙地组织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王孝和同志由于敌人的野蛮镇压而英勇就义了，但他那高大的形象和光辉的一生，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红色堡垒》一书，给我们写出这个光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对广大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

《红色堡垒》在叙述每个阶段的群众斗争时，把党的



领导这条红线，贯串在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出党和工人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从而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

《红色堡垒》是杨村发电厂工人斗争历史的光辉纪录，是一本阶级斗争的活教材。由于它基本上是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的，在原始史料上做了不少艺术加工，语言比较清新活泼，细节描写比较细致生动，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突出，既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又具有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高尔基就提倡过编写工厂史的

工作，他亲自组织一些作家来参加这个工作，并且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表扬了两位积极分子。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出版了不少工厂史，有一些是写得很不错的，《红色堡垒》就是其中的一部。我们热烈地希望更多的作家、更多的工业战线上的业余作者来参加编写工厂史的工作。不妨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写，有的可以写成报告文学作品，有的可以写成经济调查报告，有的可以写成史料，把编写工厂史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写出更多的真实而又生动的阶级斗争教科书。

大写社会主义英雄谱

——读《武钢建设史话》

宋爽

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各地许多厂、矿进行了群众性的编写厂、矿史工作，陆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它们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和英勇斗争的历史。但是，以绝大部分篇幅，连贯地、广泛地描述社会主义工业巨大建设过程的作品，表现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写出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谱的厂、矿史还不多。《武钢建设史话》（武钢厂史编委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出现，为这方面的厂、矿史写作，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

这部史话的内容几乎包括了从勘探厂址、勘测、设计、施工到建成两座高炉、三座焦炉和其他一些生产单位投入生产的全部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许多斗争生活场景和色彩壮丽的劳动画面组成的。这部史话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由活跃在武钢钢铁公司建设中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职工

群众编写的。他们所写的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片断，都是在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自己的思想感受；有些以今昔对比的手法写下的篇章，也常常是一首新时代的赞歌。许多生活场景连结起来，构成了武钢建设过程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从这部史话里，我们所得到的教益，不限于对武钢建设的发展历史和概貌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十分亲切地感受到，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出来的英勇豪迈、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热情，和他们崇高的革命风格。

《武钢建设史话》在描述武钢这个新型的钢铁基地的成长过程中，记下了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光辉业绩；写出了他们蔑视困难，战胜困难，在困难中大显身手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

我们不会忘记，一九五四年严冬，勘察队员在冰天雪



地里的战斗情景。他們住在“既挡不住風，也遮不住雪”的茅舍里，“早晨起来的时候，屋子里就堆满了半尺深的积雪，被子上盖有寸把厚的雪花，大家的头发上都挂上了一层白霜”，根本没法入睡；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次日紧张的战斗。大风雪封住了道路、河流，电话线也被刮断了，出现了断粮断柴的危机，在这种艰险的情况下，他们就用裤子当粮袋，顶着风雪去背粮。风雪越大，斗志越高，他们经住了严冬的考验。一位勘察队员说：“严冬给了我们！”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我们不会忘记《神话将要变成现实》中描述的唐宝林这个人物。当他刚来到勘探队的时候，“连字还认不到几个，见到钻探机，光听到嗡嗡响，不知为什么响。老工人指着机器告诉他：‘不能靠近机器皮带，那有被卷在机器上的危险；不能到柴油机附近走，那有滑倒跌在机器上的危险，……’”这个危险，那个危险，没有吓倒他，只是使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掌握勘探工作中各种复杂的现代化技术。如何掌握呢？他“注意看着别人怎样操作，有时别人下了班，他还是盯着看。……他不仅要看它，而且要学着拆卸它。他一面拆，一面对图样看，这样很快就熟悉了机器的性能，掌握了机器”，而且学会了根据机器的响声，察觉与防止事故的发生，成为二十七号钻班班长。

我们不会忘记，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浪涛中涌现出来的征服困难的各种先进人物和先进小组。一个普通的木工王荣，冲破重重困难，没花一文钱就办了一座木材加工厂，而且先后制成了圆锯、截口机、多面刨等七八种机械。矿山工地上的爆破班长李英仁，经历一百零五次试验的艰难历程，创制了一种“防水炸药”，解决了雨天不能爆炸的难关，保证了武钢高炉的正常生产。钳工出身的技师吴绍秀，经过十几次试验，终于制成了活动筛条机。……所有这些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创造，都生动地反映出先进人物不计较个人得失，千方百计地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面貌。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他们心情总是不平静。他们心里有一股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热情，

要干，要革命。领导上对这些先进人物也大力支持，每当他们试验失败的时候，总是鼓励他们：“今天不成功，明天就会成功，要多给群众鼓励，要多替大家出题目，让思想开阔一些，解决问题就更快了。”工人同志们自己也认识到：“要革好命就得苦干实干，自动化的机器是慢慢试成功的，失败一次再来一次，有了教训才能够胜利。”每当试验失败，有人主张退却的时候，干部和积极分子也总是鼓励大家总结经验，更好地前进。

各种各样的先进小组和先进人物，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武钢建设工地上，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职工，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使许多工程的工期一再缩短和提前，保证了武钢建设以高速度向前发展。请看，为了争取提前建成一号焦炉、保证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出焦的斗争图景：“工地沸腾了。三十七度以上的高温，动摇不了建设者们的决心，狂风暴雨或夜幕降临，亦不影响上下交叉的立体作业。”工人们就像赛跑一样，你追我赶：“前面打好基础，后面就立起了支架，下面安上煤气管道，上面又架起了蒸气管网，一组工人跟着一组工人，一个工序连着一个工序。”这种群众性的竞赛运动，不但使一号焦炉系统工程提前全部竣工，也促进了其他工程建设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在这一浪高一浪的竞赛过程中，培养、锻炼出一支具有高度觉悟和能打硬仗的新的建设大军。他们苦干巧干，刻苦学习，勇于创造；在各单位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兴共产主义协作之风；做到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以集体为重，助人为乐……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的劳动热情。正是这种忘我的冲天干劲，不断地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果。

三

树有根，水有源。究竟一股什么力量，使武钢职工把这样一个近代化的、大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能以最快的速度兴建起来呢？这在《武钢建设史话》中，做了多方面的描写和说明。



从史話中可以看到，党对武鋼的建設是无比关怀的。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毛澤东同志亲手批准了在华中地区建立一座大型鋼鐵联合企业的計划，这使武鋼建設者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为这預示了祖国的第二个鋼鐵基地即将誕生，預示了祖国的工业面貌将发生又一次重大变化。当武鋼一号焦炉开始場地平整工程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的負責同志，就前来焦炉工地参加体力劳动。一号高炉出铁那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又亲自前来参观出铁，并和許多英雄模范見了面，使武鋼建設者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工业安装公司高炉女电焊工吳潤梅，在《最大的幸福》一文中，以激动的笔墨写出了这样的心情：“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最难忘的一天，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想起了毛主席，就有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我要把一切力量献给党，創造更大的成績”。岂止一个吳潤梅，武鋼好几万职工，在党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无不如此。

在武鋼建設的过程中，中央有关各部和全国許多单位，为建設武鋼展开了大規模的工作，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来支援武鋼。这方面的动人事例，在史話中也記載了不少，而且写得有情有景，有声有色。像《千里长空送器材》所描写的故事，就是一例。解放軍空軍某部，为了支援武鋼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出焦，十月一日出铁，特从哈尔滨給武鋼赶运一个五吨多重的减速器。在运送途中，他們冒了极大的風險，表现了极大的英雄气魄。《紅領巾螺絲釘》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却描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江苏省崇明县豐濱小学少先队员們，給武鋼全体工人叔叔写了一封信，还寄上了九元五角四分錢，信上說，他們开展了一次拾稻穗活动，一共拾得稻谷一百一十三斤，卖给粮食站得到这笔錢，經過大队热烈的討論，决定把这笔錢支援武鋼建設。信上又說：“工人叔叔，請你們收下吧！虽然这么一点点錢，也算表示我們全体紅領巾对祖国建設的心意，那怕是給你們买一些螺絲釘也好。”……各种各样的支援，大大小小的动人故事，表现了个人、集体和国家血

肉相联的崭新关系，鼓舞着武鋼建設者們一再向前跃进。

四

武鋼是我国第二个近代化的大規模的鋼鐵联合企业。这个鋼鐵联合企业的建設历史，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发揚革命精神，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偉大理想而奋斗的一頁历史。武鋼的建設者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的同时，又写出了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真实动人的史話，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

开国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工人阶级以奋发图強、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工业战线上持續不断地創造了輝煌灿烂的成就。这种成就，以及創造这种成就的上千上万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活的榜样，是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一代进行革命前途教育、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活的教材。

为此，我們应该运用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裁，大写社会主义英雄譜。我們需要創作更多反映这些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的、概括性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小說、戏剧、曲艺，也需要創作更多反映工业战线上的英雄人物的真人真事的、及时而生动的报告文学。要通过报告文学，形象地写出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輝事迹，写出他們的精神面貌、革命思想、革命干劲和崇高風格，让这些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广为傳播，生根开花。作家应当参加这样的工作，各厂矿企业广大职工群众热情地编写这样的英雄譜，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广大职工群众在描写了社会主义劳动的英雄場面，歌颂了本厂、本矿的英雄模范人物之后，必将促使他們更有信心，更有創造性地为建設祖国而劳动。编写这样的英雄譜，可以像武鋼那样有組織有計划地写成連貫性的大部头的史話，也可以写成单篇的报告文学或其他形式的作品。让报告文学在各地厂、矿企业中遍地开花，努力編写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譜。



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

——与何祚庥同志商榷

陶 德 麟

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何祚庥同志在他的几篇文章^①中作了论述，引起了讨论。我过去也曾就祚庥同志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初步的商榷^②。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再谈谈我的意见，并向何祚庥同志和其他同志请教，以便通过讨论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

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何祚庥同志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概念是这样解释的：

“绝对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认识，它不会为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相对真理也是基本上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识，但这只是不完全的、在一定界限内、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识。这种知识将在科学往后的发展中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并日益深化、精确和具体。”^③

“要把绝对真理理解为全面而又完善的真理，并把相对真理理解为不甚全面、不甚完善的真理。”^④

这种说法是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了解为两种不同的真理。与此相应，祚庥同志也就把真理分成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两类。例如，他认为像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这样的

真理，就属于绝对真理一类；而像牛顿力学定律这样的真理，就属于相对真理一类。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真理是客观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真理的，而是用来表示同一个客观真理的两重不同的属性的。我们不能说，某些真理只是绝对真理而不是相对真理，某些真理又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而只能说，客观真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来是绝对真理，从另一意义上说来又是相对真理。

从什么意义上说来客观真理是相对真理呢？

第一，任何真理总是对一定具体对象的正确反映，这个具体对象总是整个宇宙的一个部分或一个侧面，这个部分或侧面本身是

① 何祚庥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三篇文章：（1）《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见《红旗》1962年第2期）；（2）《不能离开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见《新建设》1962年11月号）；（3）《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见《文汇报》1963年8月6日第4版）。以下在引用这些文章中的话时，只注明刊物名称和页码，不注篇名。

② 见《新建设》1963年10月号《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几个问题》一文。

③④ 《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37、42页。



相对的，因而作为它的正确反映的客观真理也就是相对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①

第二，任何具体对象都具有无限多的方面和联系，具有无限多等级的本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获得的正确認識总不可能穷尽地反映出对象的一切，总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余地，因而，即使仅仅就一个特定的对象来说，人们的認識也只能相对正确地反映它，只能是相对真理。正如列宁所说的：“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認識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②。

从以上两种意义来看，任何客观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并没有例外。就拿被祚麻同志仅仅看作绝对真理的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来看吧，也是相对真理。一則，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整个宇宙的一切，而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特定的对象（各种能量形式之间的联系）；二則，它对这种特定对象的反映也并没有穷尽它的一切，也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余地（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过：“我們可以給它提供新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③）。

从什么意义上說来客观真理又是绝对真理呢？

第一，尽管真理的内容总是整个宇宙的一个相对的部分，但是这个相对的部分却是绝对永恒的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它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因而人们的正确認識也就具有绝对真理的本性，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

分。恩格斯說：“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認識都是对永恒的东西、无限的东西的認識，因而这种認識在本质上是绝对的。”^④ 列宁引证狄慈根的話說：“我們只能相对地認識自然界和它的各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相对的部分，然而却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具有認識所不可穷尽的自在的自然整体的本性”^⑤。

第二，尽管任何真理都不能穷尽地反映出对象的一切，都有待于深化和发展，但是它既然是客观真理，那么它在同它所反映的一定客观对象相符合这一点上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列宁說：“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⑥ 他在說到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論时說：“这个理論和实践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其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侖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个永恒的真理一样。”^⑦

从以上两种意义来看，任何客观真理都是绝对真理（确切些說，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也没有例外。就拿被祚麻同志仅仅看作相对真理的牛頓力学定律来看吧，这也是绝对真理。一則，它所反映的对象（宏观物体的低速运动）是绝对的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具有绝对的物质世界的本性；二則，它同它所反映的对象之间的符合也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②⑤⑥⑦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7、134、135、143頁。

③④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7、195頁。



由此可見，只有相对性而无绝对性、或者只有绝对性而无相对性的真理是没有的。任何客观真理都同时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同时既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正因为这样，我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沟”^①，为什么“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②，为什么“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③ 如果认为有些真理仅仅是相对真理而不同时又是绝对真理，就无从說明这些真理的客观性（因为“否定绝对真理而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④）；如果认为有些真理仅仅是绝对真理而不同时又是相对真理，就无从說明这些真理深化和发展的必要与可能。这样，就既不能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又不能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

何况，按照祚麻同志所提出的那些标志来划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实际也划不清楚。我們不妨簡略地分析一下：

（一）以“全面”和“完善”的程度为标志。

祚麻同志說，绝对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或“十分完善的”^⑤，而相对真理則是“不甚全面、不甚完善的”。这个标志是相当含混的。怎样才算是“全面而又完善”或“十分完善”，怎样又算是“不甚全面、不甚完善”呢？这条界限应该怎么划法呢？祚麻同志自己也說不清楚。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全面”和“完善”本来就是相对的。我們很容易指出一种真理比另一种真理更全面、更完善，但是我們永远无法指出哪一种真理就全面和完善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是被祚麻同志算作绝对真理的，應該是“十分完善”的了。可是祚麻同志也并不能

证明它就永远不可能再深化和发展。

（二）以是否“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为标志。

祚麻同志說，相对真理只是“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真理。这句话完全正确。不过我們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绝对真理是不是“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真理呢？如果也是，那么把“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这一点作为相对真理的特点而写到相对真理的定义里去就沒有意义了，按照这一点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就区分不清了。如果不是，那就是說绝对真理是一种超出任何界限、超出任何条件而反映客观现实的真理了。可是我們都知道，这样的“真理”是没有的。如果一定要认为只有这样的“真理”才算绝对真理，那就无异乎否认了绝对真理的存在。

（三）以会不会被“否定”为标志。

祚麻同志說，绝对真理“不会为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这句话也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們又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相对真理会不会被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呢？如果认为相对真理也不会被否定，那么把这一点作为绝对真理区别于相对真理的标志就不合邏輯了，按照这一点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也就区分不清了。如果认为相对真理可以被否定，那就是說相对真理根本不是真理了。因为正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同对象的符合是无条

①②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133、120頁。

③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84頁。

⑤ 《文汇报》1963年8月6日，第4版。



件的，是不会被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如果有一种“真理”竟然被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否定了，那就只能说明它根本不是真理。

仍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为例。祚麻同志论证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绝对真理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不再会被科学的发展所推翻”^①。可是试问：牛顿力学定律会不会被“推翻”呢？如果说：也不会被推翻，那就应当承认牛顿力学定律也是绝对真理了；可是祚麻同志不承认它是绝对真理，只承认它是相对真理。如果说：牛顿力学可以被推翻（全部地或部分地），那就应当承认牛顿力学全部是错误或者包含着错误了；可是祚麻同志又坚决反对相对真理全部是错误或者包含着错误的观点。这就真难办了！

尤其使人糊涂的是：祚麻同志甚至连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未来命运也似乎并没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怀疑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有着某种能量不守恒的过程，那我们也仍然是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来加以反对的。”^②这就是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在将来是否会遭到如同牛顿力学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以后所遭到的那样的命运，他也不敢断言。既然如此，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同牛顿力学定律在这一点上究竟有什么“质的区别”呢？祚麻同志究竟根据什么把一个仅仅叫做绝对真理，一个仅仅叫做相对真理呢？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把真理分为两类的做法，那么我想至少应该要求祚麻同志提出一种能够把两类真理区分开来的标志。可是如上面所分析的，当我们按照祚麻同志提出的标志来对真理实行分类的时候，我们却碰到一连串的自相矛盾，越分越糊涂。这说明

什么问题呢？我想，这说明了真理分类法根本行不通。

其实，如果仅仅是论述上的自相矛盾，那还是比较次要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改进论述的方法。问题在于：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祚麻同志确实认为相对真理是可以被否定的；不过不是全部被否定，而是部分地被否定罢了。固然，祚麻同志在字面上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写出“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这样的话，但是，从他的大量的论述和所举的例证来看，我们不得不认为他在实际上是这样看的。例如，他在论证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绝对真理的时候所持的理由，就是这个定律“不再会被科学的发展所推翻”^③，这岂不就等于说相对真理是不免会被推翻（至少是部分地被推翻）的么？又如，他说：“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都是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已有大量的科学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分也就越多。这种已经有大量实践为基础的绝对真理的成分，是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失的。”^④这不是明确地肯定了客观真理当中只有一部分不会“消失”，而另一部分却会“消失”么？这不是说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么？

说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或推翻，那就要对这一部分可以被否定或推翻的东西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说明。这一部分东西究竟是什么？是错误，还是真理呢？

也许是错误吧。这就是说，相对真理当

①②③ 《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43、43—44、43页。

④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3页。



中是包含着錯誤的，相对真理就是由绝对真理的成分和錯誤构成的。有些同志是这样认为的。但我认为这种意見是不对的。我們在这里說的不是一般的認識，也不是一般的科学理論，而正是真理。說認識中或科学理論中包含着錯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認識中或科学理論中完全可能既有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部分，也有同客观对象不符合的部分，前者是真理，后者是錯誤。但是，說相对真理中包含着錯誤就不对了。对于一个确定的客观对象來說，真理同錯誤的界限是绝对的。只有同对象相符合的認識才能叫做真理，同对象不相符合的認識就不能叫做真理。我們怎么能把同对象相符合的部分同不相符合的部分加在一起叫做真理呢？这样做，真理和錯誤还有什么界限呢？真理和錯誤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确定的涵义呢？事实上，祚麻同志也一再申明他并不同意相对真理包含錯誤的观点，他也說他认为相对真理“仍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不包含錯誤的真理。”^①

那么，也許相对真理中那个可以被否定或推翻的部分也是真理吧。但是这样一来問題就更大了。真理竟然被否定了。同某一个对象相符合的認識竟然与同一个对象不相符合了。这真是不可想像的怪事！列宁不是明明告訴我們：真理同对象之間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么？真理是不会被否定的，被否定了的就不是真理。这不是非常清楚的道理么？

可見，無論把这一部分可以被否定的东西說成是錯誤或者說成是真理，都是說不通的。那么究竟怎样理解这一部分东西呢？难道世界上有什么既不是錯誤、又不是真理的“中性”的認識么？

也許祚麻同志會說，这一部分东西是“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認識^①，但是，这也还是取消不了这样的問題：这种“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認識究竟是否同对象相符合？如果所謂“不甚精确、不甚完善”就是指的同对象不相符合，那么这种認識就是錯誤，那就还是实际上承认了相对真理包含錯誤。如果所謂“不甚精确、不甚完善”不是指的同对象不相符合，而只是指的不甚深刻，那么这种認識就仍然是真理（因为一种認識尽管不深刻，但只要它同对象相符合，我們就得承认它是真理），說这样的認識会被否定，就无异乎說真理会被否定。可見，“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概念仍然不能帮助我們摆脱上述的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像祚麻同志那样认为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那就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承认相对真理包含錯誤，或者是承认真理可以被否定。但是，这两种答案都很难令人同意。所以我认为，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說法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祚麻同志得出了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結論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对科学史上的复杂現象作了不完全恰当的解釋的緣故。

一切科学原理都在变化着。这是科学史上的基本事实。但是，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呢？这是需要具体分析。我的初步意見是，科学原理的变化（指前进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种基本的情况：（1）某一科学原理全部錯誤，因而在后来全部被否定；（2）科学原理中的錯誤部分被糾正；（3）科学原理中

^① 《文汇报》1963年8月6日，第4版。



的正确部分被深化；(4)科学原理中正确部分的适用界限被重新规定(扩张或缩小)。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被否定的东西是错误，而错误并不是相对真理或相对真理的组成部分；在第三种情况下，相对真理是变得更深刻了，但原来的比较不深刻的真理也并没有被否定；在第四种情况下，被否定的东西并不是相对真理的客观内容，而仅仅是前人对于相对真理的适用界限的规定，这种被否定了的规定恰恰不是真理，而是错误。由此可见，无论就哪一种情况看，都得出相对真理可以全部地或者部分地被否定的结论。

拿祚麻同志所举的牛顿力学发展为相对论的例子来看吧。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实际上包括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人们原来以为牛顿力学是适用于一切物体的运动的，后来新的实践表明它只适用于宏观物体的低速运动，而不适用于微观客体的运动或接近光速的运动，这就是说，人们发现原来对它的适用界限的规定是错了，需要重新规定；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牛顿力学的公式对于宏观低速运动的反映不如相对论的公式那么精确和深刻。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作为相对真理的牛顿力学全部地或者部分地被否定了呢？在我看来是不能的。因为从前一个方面说来，被否定了的东西并不是牛顿力学的客观内容，而只是人们对它的适用界限的规定(这个规定是错误，不是真理)；从后一个方面说来，牛顿力学的内容也并没有被否定，只不过是发现了它还不够深刻，因而把它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而已。祚麻同志也说：“在速度较缓慢的条件下，牛顿力学仍然作为客观真理而被保留了下来。”^①这不就等于说作为相对真理的牛顿力学并没

有全部地或者部分地被否定么？

由此可见，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说法，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也不符合科学史上的真实情况。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和相对性

祚麻同志对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看法，是同他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看法有密切联系的。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既有绝对性(或确定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或不确定性)的一面。这是我们都承认的基本原理，是没有争论的。可是，如何理解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呢？这就有分歧了。祚麻同志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这样说明的：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说：科学研究工作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确证只是相对的，它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的近似程度内，一定的意义上，确切地证明某一理论是正确或是错误，或理论中的哪一部分是正确，哪一部分是错误。”^②

“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也就是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③

“由此可见，对于那些已有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我们仍应持批判的态度”

①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3页。

②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2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

③ 《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40页。



度。問題在於人們的實踐總是具體的實踐，隨着實際生活的發展，盡有可能出現新的實踐條件，在這種新的實踐條件下，原來的理論就可能顯得陳舊。因此，我們在科學工作中必須看到實踐標準的這種相對性，不應抱迷信的態度。”^①

我認為這樣來說明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實際上就抹煞了實踐標準的絕對性。為什麼呢？因為祚麻同志雖然宣稱實踐能夠“確切地證明某一理論是正確或錯誤，或理論中哪一部分是正確，哪一部分是錯誤”，但是他卻又認為被實踐證明它為正確的理論在以後要加以“修改”。應當指出，這裡所說的“修改”，並不是通常所說的深化或發展的意思，而正是部分地被否定的意思。因為第一、用理論的深化和發展來說明實踐標準的相對性是文不對題的，實踐標準所涉及的是理論是不是真理的問題，而不是真理深刻到什麼程度的問題；第二、如前面分析過的，祚麻同志是主張相對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可見，這裡所說的“修改”就是部分地被否定的意思。但是，既然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理論中竟然有一部分在以後會被否定，會被重新證明為不正確，那麼所謂實踐能夠“確切地證明”云云，豈不成了空話嗎？“確切”豈不實際上成了不確切嗎？

如果再看看祚麻同志對於實踐標準的絕對性的說明，問題就更加清楚了。在他看來，實踐標準的絕對性表現在：

“凡是經過實踐檢证的科學理論都是客觀真理，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特別是那些已有大量的科學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理論，所包含的絕對真理的成分也就越多。這種已經有大量實踐為基礎的絕對真理的成分，是

不會隨着科學的發展而消失的。”^①

“在實踐檢驗過的相對真理中間總是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在相對真理中間哪一部分是絕對真理，實踐檢證過的真理所適用的範圍究竟有多大，所有這些都是歷史地有條件的。但是在相對真理中間，只要它為實踐檢驗過，那末在它們中間，總是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在科學的進一步的發展中，這種絕對真理的成分就要作為寶貴的財產而繼承下來。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將能為我們指明哪些是完善，而哪些是不完善的真理。”^②

這些話是很費解的。既然承認“凡是經過實踐檢證過的科學理論都是客觀真理”，那就是承認凡是經過實踐檢證過的科學理論都是同客觀對象相符合的了。這當然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緊接着又說，這樣的客觀真理當中僅僅有一部分不會“消失”，那就是說還有一部分會“消失”了。加在一起就是說：經過實踐檢驗過並且證明其為同客觀對象相符合的認識中有一部分將被新的實踐證明為同客觀對象不相符合！這怎麼好理解呢？還不止此。他還認為“相對真理中間哪一部分是絕對真理”也是“歷史地有條件的”，只有等待“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來為我們“指明”。這就是說，要想在一個確定的歷史條件下把相對真理中會“消失”的部分和不會“消失”的部分加以“指明”也是不可能的了。按照這樣的邏輯講下去，豈不是只好承認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斷定一種認識是不是同對象相符合嗎？這怎麼能夠說明實踐標準具有絕對性、確定性的一面呢？

① 《紅旗》1962年第2期，第23頁。

② 《新建設》1962年11月號，第43頁。



祚麻同志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说明。他说：

“当我们对前人的工作进行批判的审查时，必须对它的实践根据有充足的估计。假如我们的科学实践仍然处在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以内，那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个范围内推翻任何自然科学上的定律（除非前人工作包含有错误）。”①

乍看起来，这段话好像是更强调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就有问题了。因为他说的是“假如我们的科学实践仍然处在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以内，那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个范围内推翻任何自然科学上的定律。”那么试问：当我们的科学实践超出了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期望在这个范围（即“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内“推翻”自然科学的定律呢？按照祚麻同志的逻辑，当然是可以的了。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科学史表明，即令科学实践超出了前人实践的范围，也决不可能在原来的范围内推翻自然科学的定律（假如前人的工作没有错误的話）。例如，尽管今天的科学实践超出了牛顿时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即宏观低速现象的范围，我们也没有在这个范围内推翻牛顿力学的定律（至于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又根本谈不到什么“推翻”牛顿力学定律的问题了）。可见，祚麻同志的这段话，仍然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否定”的说法。它不但没有说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而且恰恰抹煞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所以，我认为按照祚麻同志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解释，是很难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进行无情的斗争的。

为什么祚麻同志作出了这种难以令人同意的解释呢？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有把这样两个问题区别清楚：（一）一个认识是不是真理？（二）如果是真理，那么它的适用界限在哪里？

一个认识是不是真理，就是说，它有没有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内容，它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对象相符合？这个问题，实践能不能确切地证明呢？我认为是能的。恩格斯说：“当我们按照我们所知觉到的任何事物的属性来利用这一事物的时候，我们同时就使我们感性知觉的真实性或虚假性受到准无差错的考验。”② 列宁说：“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③ 毛泽东同志说：“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的问题。——引者），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④ 这里说的正是“准无差错”，正是“证明着”，正是“完全解决”，没有任何保留，任何“但书”。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实践连认识同对象是否符合这件事情也不能确切地证明，那它就根本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否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牛顿力学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规律性相符合，是不是客观真理，这件事情，实践是能够而且已经“准无差错”地、“完全地”

① 《红旗》1962年第2期，第24页。

②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1页。

③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9页。

④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解决了的，是不会被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仍应持批判的态度”和“不应抱迷信态度”的问题。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或确定性的一面。

但是，如果一个认识是真理，那么这种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存在于何种范围之内呢？它的适用界限应该怎么划法才合乎实际情况呢？这个问题，实践是不能确切地证明的。列宁说：“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①正好说明了这种事实。我们当然毫不怀疑，每一次这样的“扩张”或“缩小”，只要是以实践为根据的，总是前进了一步，总是使人们对真理的适用界限的规定更接近于实际情况；但是，无论何种条件下的实践，都不能保证“准无差错”地、“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扩张”或“缩小”的情况。例如我们今天对牛顿力学的适用界限的规定，当然要比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以前的那个旧的规定更接近于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也仍然没有充分的根据说我们今天的规定就是“最终的”、永远不会再变动了的规定。如果在今后科学实践的触角伸进了我们今天还不知道的新的领域，以致将来的人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实践材料对我们今天所规定的界限再作一些“扩张”或“缩小”，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的一面。

正因为祚麻同志把认识是否真理的问题同真理的适用界限问题混淆起来了，因此他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实践能够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不能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例如，当他以普洛特假说的变化史和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史为例来证明“科学理论经由实

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今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说法时，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普洛特假说当中那些后来被“修改”了的东西并不是真理，而是错误；在牛顿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过程中被“修改”了的并不是牛顿力学的客观内容，而仅仅是人们对它的适用界限的错误的规定。这些东西都不是“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的东西，而恰恰是从来没有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这些例子正好说明了：凡是真正经过实践检验过并且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是只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而决不会被推翻的。

* * *

补记：本文写成后，又读到祚麻同志发表在《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期上的《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一文。祚麻同志在这篇答辩文章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是：（1）重申他过去的观点；（2）进一步否认自己认为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和相对真理可以部分地被推翻；（3）指摘杜雷、吴俊光同志和我“把认识中的不精确、不完善和认识中的错误混为一谈”，“取消了真理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概念”，等等。我认为，（1）祚麻同志过去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仍然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相反，论据和论点之间的矛盾比前几篇文章更多了；（2）他的关于相对真理不包含错误以及相对真理不可能部分地被推翻的申明同他的基本观点是互相矛盾的；（3）他对我们的上述指摘是缺乏根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再谈谈自己的意见，同祚麻同志作进一步的商榷。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4頁。



红旗

HONGQI

12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 ★

目 录

社論：文化战綫上的一个大革命 (1)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来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

——六月三日在阿里阿罕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 約 多 (5)

当前我国国内民族問題和阶级斗争 刘 春 (16)

种族問題实质上是阶级問題 張春汉 施哲敏 (26)

介紹一本揭露美国控制加拿大的书 思 慕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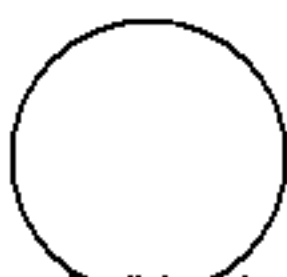
两种姿态, 一副肖像 郭 方 (38)

一件小事变成大好事 楊春旭 (40)

原則和規章制度 蔡 金 (43)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从一个化工厂三种試驗田的故事谈起 陆魁宏 (45)



☆ 六月三十日出版 ☆



——社論——

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

京剧改革是一件大事情。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以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京剧革命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开端的京剧改革，以及随着而来的戏剧、曲艺、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进一步革命化，是我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演出了许多革命的现代戏。这些戏的思想内容一般都是好的，其中有些是很好的，塑造了许多光辉的英雄人物形象，表演艺术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发挥了京剧艺术的特长。为了演好革命的现代戏，有些演员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方面，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有不少人正准备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一切表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在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和影响观众方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应当为京剧界的成就而向他们祝贺。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①。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在文艺领域中，戏剧是特别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京剧是有着广大的爱好者和观众的。因此，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一样，京剧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群众，用什么样的感情来影响群众，是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比之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里，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历史的总规律是无产阶级终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并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是有起伏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采取暴力的形式或者“和平演变”的形式，也可以是两种形式互相结合。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不仅使用暴力，而且往往企图用“糖衣炮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59、865页。



彈”的政策，企图通过修正主义，潜移默化地使社会主义逐渐蜕变为资本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又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以便散播反动的政治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毒害和溶化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从思想上为反革命复辟准备条件，开辟道路。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文艺是一个重要的争夺点；作为文艺的重要部门之一的戏剧也不例外。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包括他们的戏剧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大肆散播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等等，竭力反对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贩卖美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新奇”艺术，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用形形色色颓废下流反动的东西，去毒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使其思想堕落，意志消沉，道德败坏。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是磨灭和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志的文艺，是适应帝国主义需要，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的文艺。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文艺是什么阶级的思想阵地，宣传什么样的思想，不仅关系到文艺本身是否具有革命性的问题，关系到文艺有没有发展前途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不是去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热情地表现工农兵的革命精神，表现新时代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而是去散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它不但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文艺，而且由于它所传播的反动腐朽的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有着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不能不有利于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毫无疑问，这种离开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进行。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之一的戏剧，也有必要相适应地把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这就要求京剧艺术，必须根据推陈出新的方针加以改革。什么叫推陈出新？这就是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新。不仅要有适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内容，而且要有适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形式。表现现代斗争生活的、革命的、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创造的现代戏，在京剧舞台上应当占主要的位置，在其他剧种的舞台上也应当占主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我们的戏剧舞台这个重要的思想阵地，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时代前进了，文艺的内容必须随着改变。不能设想，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统治的舞台，也能够为“兴无灭资”的斗争任务服务。即使在某些传统剧目中，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思想，但是，它们也远不能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远不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至



于那些包含着封建糟粕的坏戏，则更是有害无益，而必须坚决抛弃。前一个时期，有人提倡在戏曲舞台上大演鬼戏，提倡牛鬼蛇神，还提出所谓“有鬼无害论”，为传播封建迷信的鬼戏做辩护，这是十分有害的，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它大大不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散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文艺，决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决不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而只会对它起阻碍和破坏的作用。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我们的文学艺术究竟是站在哪一边？是反映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的思想感情呢，还是反映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思想感情？是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服务呢，还是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服务？是执行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呢，还是搞现代修正主义那一套？应当指出，在我国文艺战线上，有的同志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有的同志却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五年的历史，我国劳动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有些文艺工作者却对此熟视无睹，缺乏热情，根本不願意或者没有很好地去歌颂、去反映这个斗争。相反地，他们迷恋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还是躲在“象牙之塔”里，死也不肯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不断顽强地表现自己，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其中极少数人已经开始糜烂，已经蜕化变质。也有些人原来就是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必须加以改变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革命的群众文化运动已经兴起来了。他们迫切需要革命的戏剧，革命的歌曲，革命的舞蹈，革命的电影，革命的诗歌，革命的小说，革命的美术。在这些方面，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已经开始动手干起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正用革命的文艺去摧毁反动的文艺。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有的同志开始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文化革命。这样，他们就面目一新，生气勃勃，用文艺武器去反映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也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他们在夺取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次京剧革命的现代戏观摩演出中，有些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演员，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整个文艺队伍中，不少人还没有这样做。对于这样一个革命的群众文化运动，有的人采取按兵不动的态度，甚至有的人采取抗拒的态度。因此，我们要大喝一声：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文艺这个武器，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扩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摧毁资本主义的思想阵地，这是在



我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件头等重要的任务。

文学艺术要革命化，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革命化。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①。这是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走向革命化的根本途径。

革命的文艺家，首先应当是一个革命战士。如果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认真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感情，对于反映革命的生活就会缺乏热情，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世界革命人民服务，就会漠不关心，而不能把它当作切身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② 很明显的，只有在工农兵群众的斗争中，经过磨炼，才能在创作上和艺术上获得突飞猛进，才能用文艺武器教育和鼓舞千百万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更加奋勇前进。

在这个文化革命的运动中，京剧开始演革命的现代戏，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有人说，演现代戏就是京剧艺术的枯萎和死亡。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京剧的开始革命化、群众化，革命的京剧现代戏不仅得到艺术界的赞赏，而且受到各方面群众的欢迎，不仅京剧的老观众喜爱看革命的京剧现代戏，而且过去不常看京剧的人们，也成了革命的京剧现代戏的积极观众。这样，演革命的现代戏，就使京剧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前途。当然，任何优秀的艺术，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革命的京剧现代戏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苛求它一下子臻于完美，也不应当因为有些剧目一时还比较粗糙，或者有些小缺点而轻易放弃。对于那些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的思想内容的剧目，我们应当以锲而不舍的毅力，在不断实践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使它逐渐成熟，逐步改进，逐步提高，日趋完美。至于那些内容好、表演好的优秀剧目，更需要加以推广，并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伟大的任务。各地党的组织和文艺领导部门，必须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认真加以领导，推动这个革命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以便在思想意识领域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彻底打败和消灭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文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来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

——六月三日在阿里阿罕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 約 多

随着印度尼西亚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涨，思想斗争，特别是哲学领域内的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

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这次大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从而引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兴趣，那么，中国的解放、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的发展，更激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对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学说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当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于在政治上、策略上和组织上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进攻时，就集中力量在思想上对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猛烈进攻，企图在他们之中制造思想混乱和动摇他们的信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的反动派竭力利用这种分歧，企图损害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使自己得到好处。

这一切要求我们在哲学方面重新进行自我教育，重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特别是同反动哲学斗争的历史，尤其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修正主义哲学实用主义进行斗争的起源和发展。

如果我们印度尼西亚革命者没有或者没有充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革命的前途就飘摇不定，并且可能是漆黑一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善于正确地运用它们来解决我国革命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而特别是我们必须彻底完成的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的这项历史使命，即完成第一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这项历史使命，就将可以并且一定得到实现。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合法的公民，它们甚至已成为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政治生活中具有最大影响的哲学。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完全还没有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印度尼西亚出现第一个工人组织的时候，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认识。直到一九一四年，印度尼西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立时，国内才有人开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也只限于革命的知識分子。

印度尼西亚古代哲学已经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某些因素。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印度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的排挤，这些因素得不到发展，因此，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运动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不是首先通过同印度尼西亚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相结合的过程，而是直接同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不断充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

起初，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时期，或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幼年时期，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只限于党的领导人。虽然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对它的党员群众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这种学习方法是片面的，因为事前还没有学习或者没有充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就直接去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了。

总而言之，当时印度尼西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远落后于欧洲。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运动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是因为当时沦为殖民地国家的印度尼西亚，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离起来，当时，连书籍都不容易找到。

这种情况基本上持续到日本法西斯垮台才终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在印度尼西亚所读到的社会主义理論书籍，由于语言上的原因或者交通上的原因，多半都是荷兰文的，而当时在荷兰本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譯本也有限，因此随同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一起，社会民主党书籍和其他的机会主义思潮，也输入印度尼西亚，如巴枯宁、考茨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及荷兰的社会民主党的作家，諸如罗兰、霍尔斯特和亨里特之流的作品。这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出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起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们說成“批判的烏托邦”和“保守的烏托邦”之类的东西那样。自那时候起，在印度尼西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除了同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斗争外，还得同各种歪曲社会主义的哲学进行斗争。

在很有名望的印度尼西亚要人中间能够找到印度尼西亚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接受馬



克思主义，但不是彻底的”或者“以修正或调节的方法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陈马六甲和苏丹·沙里尔，前者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同宗教结合，后者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各种唯心主义现代主义通婚。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尼西亚人民才获得他们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著作才从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输入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贪婪地阅读这些理论著作。《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就是在革命火焰高升时重新出版的，还有列宁著的《青年团的任务》、斯大林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季米特洛夫的《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在这个时候译出的。但是，实际上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未能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的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他们必须克服理论方面的落后状况，当他们学习革命理论时是那么紧密地同当时革命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这使他们的学习直接地为当时正在高涨的革命的实际斗争服务，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罕有的。这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这也使他们更快地成熟和成长起来。

更重要的是，在八月革命的期间，不但必须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外来的攻击，例如，艾地同志曾捍卫过《共产党宣言》不受外来的攻击（日惹《劳工》日报上艾地和苏罗多的辩论），而且，还存在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那些自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党、劳工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政治生活中时发生的矛盾，直到一九四八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后，才纠正了它在政治上、策略上和组织上所犯的错误。

在茉莉芬挑衅事件和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战争发生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动派之间以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仍然继续进行着。然而，由于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上还犯着教条主义的毛病，这一点反映在当时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纲领上。可以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九五一年一月重新建党引起了印度尼西亚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具有正确战略和策略的纲领第一次同正确的组织原则结合起来。印度尼西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解印度尼西亚了！

唤起、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废除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和反对哈达、纳席尔和苏基曼等历届政府而斗争的经验——成功的经验——是为概括革命经验提供最好的准备，由于有了这些经验，使一九五四年印度尼西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地制定了党纲，这个党纲自从在第六次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上再次通过后，至今基本上仍然适用。这个党纲的确具有它的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正确回答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基本问题的纲领。印度尼西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了解印度尼西亚了！

这个党纲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印度尼西亚具体情况的创造性的结合，而且它还教导我们如何在政治斗争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政策应当



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结果。党纲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它的政策建立在对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努力使党纲通俗化的同时，也就是说在争取使党纲能为群众掌握的同时，更精确地制定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理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同志后来在他为一九五七年七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批准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著作中，精辟地論述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問題。最重要的是，在这本书中，解决了和弄清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一切問題。

当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上来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問題越来越重視了。著名的莫斯科宣言也在一九五七年发表了。在这个历史文件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它們的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此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了实际的措施来拆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群众隔离开来的墙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深深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旦为群众掌握，就将形成巨大的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不仅共产党人可以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工人和受压迫的人民也可以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問題是如何找出最正确的方法，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千百万人民所掌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理論工作人員和领导人正在这方面作积极的努力。艾地同志曾在他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总报告中指出，必須更加經常地讲授和介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学习中把它們同活生生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举行的制宪會議上，有很多人在辯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基础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原則性的攻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議會党团成員，在制宪會議中除了保卫建国五项原則和为它而斗争之外，也坚决和有原則地保卫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党的学习和战斗的口号：“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这个口号简单而明了地启发印度尼西亚革命者把理論和实践結合起来。

这是艾地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論点的重大发展。这一指示希望我們調查研究“社会与經濟情况，以便由此能够确定斗争策略与工作方法”，不然，“对具体事物調查錯誤，将会使他們陷入空想与冒險主义”。

艾地同志的著作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一九五五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經驗教訓》（一九六〇年）、《列宁和印度尼西亚》（一九六〇年）、《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一九六二年）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印度尼西亚半世紀以来的工人階級运动的經驗，而且由于它們是根据具体的經驗，这为目前工人階級运动的策略提供了更完善的具体論点。

从大大小小的、令人愉快的或令人痛心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換句話說，使每一次进步或



后退、成功或失败的經驗教訓，對我們都有好處——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九五一年以來一直是這樣做的。他們今後將繼續這樣做。

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甚至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問題也是有用的，把它看作是一所國際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學，儘管有些人對這問題感到痛心和擔心。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真地研究一切材料，避免主觀主義，積極參加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原則上同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作堅決的鬥爭。

共產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印度尼西亞化的偉大過程”，這個過程日前還在進行中。要是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採取不謹慎的態度，那麼他們就可能甚至必然要犯大大小小的錯誤。相反，要是印度尼西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繼續採取熱誠、認真、謙虛和負責的態度，繼續把理論同實際結合起來，密切聯繫人民群眾並且進行自我批評，那麼勝利必將屬於他們。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反對實用主義

鞏固和擴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勝利的首要條件，是堅決反對反動的哲學流派以及工人階級運動中不忠於並且背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流派。它們是改良主義和其他機會主義的基礎。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說，在目前的條件下，思想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共產黨人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在思想戰線上展開堅決的進攻，力求把人民群眾從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精神奴役下，其中包括從改良主義的有害影響下解放出來。

如果人們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什麼，當然就談不上去捍衛它，反過來說，如果人們不懂得實用主義是什麼，也就談不上去擊敗它。當過去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發表有名的“七月八日聲明”，國家人員曾被迫員來沒收載有這項聲明的小冊子，但對這些國家人員並沒有講明小冊子的形狀是什麼樣。我們不應該鬧出這種事來……不論是採取某種行動或者維護某種東西，都應當弄清楚你究竟是對什麼東西採取行動，而你所維護的又究竟是什麼東西。

自從現代修正主義出現以來，特別是自從現代修正主義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主要危險以來，在哲學領域中也展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現代修正主義當然一步步地背棄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他們再也沒有用處，甚至對他們是一種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現代修正主義者當然需要用另一種哲學來代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實用主義伸出援助之手來的時候，現代修正主義者便欣然表示歡迎。現代修正主義就這樣同實用主義結了婚。美國哲學家赫里·威爾斯說，實用主義是“帝國主義的哲學”。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一本選集《帝國



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侵略和战争的鼓吹者》里还集中批判了实用主义。但是，你说怪不怪，历史的发展证明实用主义已经从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哲学变成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哲学。实用主义也是辩证地发展的！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文职官员军事训练班的讲课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作了扼要、全面、正确、通俗和清楚地讲解（有的已印成书，如《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印度尼西亚化》等）。列宁一向指望和鼓励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年轻的共产党党员成为“健康的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认为，人们如果不去学习艾地同志写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就不可能成为健康的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在这里，我不想对已谈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更多的解释，我只希望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给以重视，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把它们强调一下。

艾地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分，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艾地同志在另一场合里说，“哲学是党的一切策略、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在美国是风靡一时，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斯·詹姆斯。实用主义是一个哲学派系，它是以有无成效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凡是有成效的就是合理的，成效就是真理”。

阿伯尔·莱伊在他的《现代哲学》一书中指出，“能说明实用主义特色的是下面的看法：凡是成功的、这样的或那样的适合一定时机的东西，如科学、宗教、道德、传统、习惯、陈规旧套等都是真理”。

艾地同志在举例说明“金钱价值哲学”或者“大商人哲学”的实际行动时指出：“实际上，实用主义只承认主观真理的存在，而不承认客观行动的存在……根据他们的理论，对别人或者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剥削以及侵略战争，例如荷兰帝国主义者霸占我国领土西伊里安，只要对他们有利，就是真理！”

威廉斯·詹姆斯本人说过，“实用主义就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列宁一贯教导我们说，现今所有的哲学，和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都是有倾向性的。只有“从党的原则立场出发来进行观察”，才能认识实用主义的实质。

今天，实用主义的两个显著的特点是：一，他们接受了他们过去拒绝接受的东西，虽然客观条件实质上没有什么变化；二，他们的政策是使一切东西非政治化，使之同政治分离。

由于他们的实用主义观点和立场，现代修正主义者通常总要提出一些免不了闹出笑话的实用主义论点。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我问那里的修正主义者，物价、电车费为什么上涨。他们回答说：“斯大林是不懂经济的，他的错误在于每年都要降低物价”。我问为什么要解散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为什么要恢复私人土地所有制，他们回答说，“当我



們仿效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制度时，我們自己的粮食产量总是每况愈下”。当我問他們为什么学西方的样和喜爱抽象艺术和不三不四的舞蹈等等时，他們回答說：“建設社会主义那是白天的事，晚上是归跳舞的……”。

我們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說明修正主义者已經接受了他們过去拒絕接受了的东西。

当他們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而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們批評对思想教育的忽视，批評強調純粹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然而，正是这种“物质刺激”成了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經濟理論的“軸心”。

当他們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而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們在对外政策方面反对通过联合国解决一切問題，因为联合国的表决机器控制在美国手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沒有在这个組織里。但是今天，他們所鼓吹的是通过联合国解决一切問題，从而导致剛果悲剧。

当他們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而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們尖銳地批評了从抽象艺术直到疯狂的舞蹈这些资产阶级文化的表現。但是今天，正是这些甚至于在还没有完全独立和半封建的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遭到反对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表現却成了現代修正主义者生活中的享受。

我們可以繼續举这种例子，但是这些就已完全足以帮助人們看透修正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实质。

下面是非政治化政策的一些例子，

在經濟方面，現代修正主义者說什么“今天重要的是經濟，而不是政治”，他們甚至以“用于生产的时间更加宝贵”为借口取消工会、青年組織等的政治性會議。如果我們說，“生产和經濟决定于政治”，他們甚至嘲笑我們。

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們更多的強調美，而不是強調政治，认为美可以同政治分开。他們說，艺术家和文学家“首先是艺术家和文学家，然后才是政治家”，他們甚至譏笑我們的“政治是元帅或將軍”的提法。

在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上，他們說什么，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减少在外层空間的原子放射性尘埃”，他們把原子放射性尘埃同政治分开来，甚至嘲笑我們所說的“帝国主义的原子武器同社会主义的原子武器是不同的”这句话。

現代修正主义者走歪道已經走得那么远，他們不仅拋棄了馬克思学說的革命精神，而且也拋棄了馬克思学說。他們用人道主义来代替階級观点，用階級調和和階級合作来代替階級斗争。

按照他們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們一貫采取毫无原則的态度。他們有时向北倒，有时向南倒，这得看好处是在北面还是在南面！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識破馬克思主义叛徒的虛伪面目。利用他們自己过去所采取的立場来揭露他們現在采取的立場，是最好的办法，換句話說，就是用他們过去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采取的立場，来反对他們已經成为修正主义者以后采取的立場。



关于非政治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是新的。列宁在他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的文章中已赤裸裸地揭露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并重申马克思这个论点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当时明确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随后列宁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所谓“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而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统一起来”的借口，并且指出这不是辩证法而只是“折衷主义”。由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总是提到“逻辑根据”，因此列宁就指出他们的逻辑只不过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的确，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的《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和《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学校”和“机关”》的两章里，列宁具体而又明确地教导我们，如何区别“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如何区别“辩证法”和“折衷主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修正主义者通常也是卖弄学问和非常傲慢的。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理论家，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的意见，害怕批评。他们很容易发脾气。其实，他们是从象牙塔里看世界，即工人运动的象牙塔！

他们特别好为人师，但是，又最不喜欢学习，他们喜欢别人了解和尊敬他们，但是从来不肯了解和尊重别人。他们非常喜欢别人对他们报恩，但是从来没想到报答别人。他们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是一个对世界文明毫无贡献的“落后地区”。他们在编写这种或那种哲学、经济学和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总是忽视或者基本上忽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他们狂妄自大，仿佛自己是一个盲人国家里的独眼英雄。他们不懂得，在他们面前的世界人民并不是盲人，而是杰出的人民。他们不懂得列宁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的这句话：“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和列宁在那篇文章中加以斥责的相似。所不同的是，被列宁斥为“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的人是当时欧洲“当权的资产阶级”，而现在，一切落后和垂死事物和中世纪的事物的支持者，除了被列宁斥责的那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外，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教育群众要有自信心，而是教导人民依赖别人。他们不是鼓励人民要勇敢，而是散布恐怖气氛。

在“弱者”面前，他们就像狼在羊面前一样摆威风。但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他们就表现得像一只羊在狼面前一样！

他们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根据对他们是否有用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实用主义一出世，它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事物究竟是因为有用而正确的呢，还是因为正确而有用的呢？

在我们看来，正确的东西未必是那些马上能得到成功的东西。拿国际政局中的某些事情来做例子，老撾、南越、北加里曼丹、马来亚、菲律宾和委内瑞拉人民的斗争是正确的斗争，但这些人民的斗争还没有取得成功。拿古巴革命来做例子，古巴革命是正确的，而且已取得



了胜利。反过来说，荷兰帝国主义者对西伊里安的政策已彻底失败了，而美国帝国主义者也在古巴遭到了彻底失败，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是不正义的。然而，帝国主义者在伊拉克、在刚果和在巴西已取得了某些成功，难道这就是说他们是正确的吗？关于实际政治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依据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拿刚果问题来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谴责阿杜拉，而修正主义者却愉快地同他交谈。

对我们来说，除了同世界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哲学——实用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别的其他办法。

三、保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逻辑法的基础。它们是能够正确解释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能够正确阐明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唯一的哲学。

不可知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的敌手，它认为客观世界是无法认识的，“新消极主义”不同意有客观规律的存在和事物彼此是相互制约的，现代主义在哲学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例如“自觉存在论”认为一个人可以不受周围的环境所约束而“单独存在”，又如山塔亚纳的“德美哲学”认为“本体王国”是唯一现实的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可认识的，不可知的和不可理解的，因此，绝对真理是存在的，但由于一个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和出生关系，对每个阶段的认识也就局限于相对真理之上，也就是说，认识[○]和事实之间没有取得完全一致，或者像列宁说的，主观上的相对正确的客观反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实践中获取的。但是有两种知识，一是自然科学，它是从生产实践中获取的，另一是社会科学，它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取的。

一种知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是正确的，而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是没有用处的。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又如为恩格斯所赞赏的英国谚语说的：“布丁要吃了以后，才知道好坏”。

的确是这样，两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吃过榴莲，就对“榴莲的味道好坏”进行争论，那是毫无用处的！

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实践和事实，那末，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说：“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和研究所知的一切事实”。

前些时候，艾地同志说：“一个不重视调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始把自己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自从那时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到迅速的发展，秘



訣就在这里。艾地同志本人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他首先在西爪哇，然后在东爪哇和中爪哇对农民情况和农民运动进行了调查。首次的调查结果已经发表了，第二和第三次的调查结果将陆续发表。

号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所有干部，包括从事理论、艺术、文学、记者等干部下放，是为了让他们从亲身的体会来了解情况，因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使自己同被压迫人民打成一片，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亲身的体会就不可能对情况了解透彻。人们也可以从书本上或听人说来间接了解情况，因为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如此之多，因此我们不可能每了解一件事都得亲身去体会，但是一切经过亲身的实践而了解的东西，总比间接了解的东西可靠。

例如一个城市里的人在几天内亲眼看到贫农和雇农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吃的又不是米饭的情景，就会对这种遭遇表示“同情”，甚至可能由于感动而掉眼泪。但是这位城市里的人，如果没有体会到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吃的又不是米饭的时候，他的体会和感受是不会深刻的。

总而言之，一个人如果不投入战斗中，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战士，如果不投入革命斗争中，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在党的政治工作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并且用科学的方法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只有一个党把自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领导，敢于承认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并敢于纠正错误，经常向群众学习和汲取外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才能作到这一点。

艾地同志说过：“现在党已经具有明确的战略和基本策略，因此不容易再上左倾思想或投降思想的当了，也不容易再受煽动，更不容易因获胜而得意忘形。但是只懂得战略和基本策略还是不够的。我们的党要始终详细或较详细地了解正在发展的形势，确定以便对这种形势来确定我们的立场，采取步骤和采取有利于人民的行动，并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要加强对群众的情况和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是完全正确的……”。

在制订党的策略的时候，应该永远遵守“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正如艾地同志所说的，在某个时期“正在发展中的形势”或力量对比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的思想是“主观”的东西。如果我们所制订的策略不符合“正在发展中的形势”和不是采取进步的方式来改变这种形势，那么这策略是主观的。只有依据“正在发展中的形势”和采取进步的方式改变形势的策略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要通过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所阐明的那样“对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改变形势。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除了制定每个时期的正确的策略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群众所掌握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他们进行扼要明确的讲解。例如艾地同志所提出的公式“多、多、来、米、法”^{*}，它的重要意义我们是很难全面估计的。它使群众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解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作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自己崇拜的东



西。一个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自封起来和不考虑如何把它献给人民的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

馬克思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已經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經成为改造印度尼西亚的斗争中的主要趋向。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一个政治家不知道馬克思主义或不受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于，印度尼西亚的反革命分子，在发现要当公开的反动派分子十分困难之后，便設法穿上假革命的外衣，并同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又害怕这样做的深远后果的中间路綫分子一起宣称他們自己是“馬克思主义者”。“辯证法”这个名詞今天已經在印度尼西亚成了模特儿。有的人这样理解其含义，正如当时苏加諾总统提出总统方案时所說的“真理就是从不同意見的摩擦中产生的”，也有的人不知道“头尾”跟着人家說“辯证唯物主义，辯证唯物主义”。

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而且一定会对彻底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理想作出贡献，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不能算小的贡献。为此，我們应当繼續改进我們对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我們可以利用印度尼西亚文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澤东和艾地的著作。有些以“馬克思主义者”为名而修正主义者是实自封的“馬克思主义者”批評这些著作，說什么这些著作中至少有一部分“过于简单”。瞧！我說修正主义者同純是說大話和晦澀难懂的东西是一样的，可不是說得对嗎？加諾兄非常推崇的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去年冬季曾对我說：在她看来，当代世界上有三个革命領袖“用的語言是人民的語言”，他們是毛澤东、卡斯特罗和艾地。当然，也包括胡志明、金日成和野坂參三等同志在內。这些批評家批評他們的著作“过于简单”，但这些人又写了什么更高明的著作沒有？确也有人写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但人們讀了这些书后，确实无法弄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而斯大林著的《論列宁主义基础》讲得那么明确，問題的中心也說得很清楚，語言也通俗易懂，讀了就会永远記在我們心上。当然，人們应当进一步学习其他的著作，学习如何創造性地运用它們。如果想懂得农民、无产阶级专政、党、理論和方法这些根本問題，学习斯大林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在哲学方面，除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諾夫和列宁的經典著作外，还有斯大林著的《辯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毛澤东同志的《实践論》、《矛盾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面已經提到的艾地同志关于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闡述，已經收集在他的著作《論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印度尼西亚化》中。如果我們想成为像高尔基所說的是“真正的革命家”而不是“业余的革命家”，我們就应当学习所有这些著作，而且要一讀再讀。

讓我們以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来贏得我們革命的胜利！

【譯自一九六四年六月九日、十日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 本刊編者注：“多、多、来、米、法”即“11234”。这条公式的意义是，在革命中有一个先锋队，即工人阶级；一个主要力量，即农民；两个民族陣綫的基础，即工人和农民；三个革命的动力，即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就是说，所有的劳动人民；四个民族陣綫的力量，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見印尼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艾地的政治报告的決議）。



当前我国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

刘 春

民族问题是和阶级问题相联系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①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我们在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不论是对待国际范围内的民族殖民地问题，还是对待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不论是对待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还是对待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问题，都必须紧紧地记住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

民族是一个一定时代的历史范畴，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马克思说过：“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②。一个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压迫、剥削本民族劳动人民的同时，总是在国内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在国外争夺市场、原料出产地与投资场所，扩大自己的剥削范围；力图建立民族压迫制度和殖民制度，实行残暴的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把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剥削之下。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

存在，只要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就不会消除。

民族压迫，决不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剥削阶级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民族所有的人同另外一个民族所有的人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压迫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去压迫被压迫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压迫者是极少数，被压迫者是绝大多数。毛泽东同志说：“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③

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总是打着民族的旗号，宣称他们是为了本民族全民的利益。这是可耻的欺骗伎俩。他们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不

①②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③ 《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9页。



仅绝对不符合本民族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是完全违背本民族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从根本上反对他们的。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① 马克思在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指出，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敌视态度，“使自己变成了本国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② 列宁说：“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③ 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必须识破资产阶级的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这种欺骗手法，反对任何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马克思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所必需的。马克思在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写道，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問題，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④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列宁认为必须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⑤ 毛泽东同志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作出了极其崇高的估价。在去年八月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声明中，毛泽东同志有力地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⑥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他说，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⑦

在被压迫民族中，真正遭受民族压迫的主要的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在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侵犯到自己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能够同本民族

- ① 《論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0页。
- ②④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5、256页。
- ③ 《民族平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3页。
- ⑤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8页。
- ⑥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 ⑦ 1960年5月9日接見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时的談話。见196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的广大劳动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应该联合他们。但是，同时又要看到，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所采取的态度，归根到底是以他们的阶级利益为转移的。至于被压迫民族中的同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反动派，不仅不会反抗民族压迫，而且还会同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联合起来，作他们的走狗，共同压迫和剥削本民族的劳动人民。

由此可见，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实质就是反对压迫民族的压迫阶级的斗争，并且往往同时就是反对本民族的反动派和卖国贼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不把民族问题看作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解决民族问题是一个革命的问题，是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上，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问题上具有不同的任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总问题的一部分。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要想取得民族的平等和彻底解放，就必须坚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及其走狗的统治，并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二

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是我国革命总问题

的一部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是我国革命总任务的一部分。国内民族问题这一个局部问题的处理，必须服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只有在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解放以前，我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内各民族同样都遭受外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在国内，各少数民族又遭受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② 外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实质上是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国内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实质上是汉族中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汉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同样遭受汉族中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同时，少数民族内部又分别存在着封建阶级、奴隶主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汉族中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这就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它的阶级实质所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三大敌人。在这三大敌人中，帝国主义又是我国各民族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88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



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①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严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要求我国各民族必须实行最紧密的统一和团结。历史已经证明，我国各少数民族必须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三大敌人，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压迫，才能取得民族的平等和解放。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从我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这就是：实行民族平等，领导和团结各民族共同进行反对三大敌人的革命斗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在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围绕这个方针，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领导各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进行了多年的英勇的革命斗争。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了，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胜利地完成了中华民族对外争取独立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同时也彻底废除了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和区域自治。

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各少数民族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已经在我国取得了伟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部分，它不仅保障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团结了自治地方的各民族劳动人民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用以进行民主改革，保卫民主革命胜利成果，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是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用以进行敌我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武器。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并没有随之完全解决。这是因为，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着封建阶级以至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他们为了继续保持住剥削统治的地位，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挑拨民族关系，甚至发动叛乱，分裂祖国的统一，破坏我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事业，以达到维护和发展他们一小撮人的阶级私利的罪恶目的。在他们的统治压迫下，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还遭受着残酷的剥削，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来说，国家所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他们是无法充分享受甚至是享受不到的。各民族落后的生产力更得不到改变和发展。他们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没有得到阶级解放。而没有少数民族中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也就不可能有彻底的民族解放。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5—626页。



在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有两个根本的认识问题必须澄清。

第一，任何民族内部都是有阶级的。那么，什么人，确切地说，什么阶级是民族的主体呢？民族的利益应当是什么人的利益呢？民族的解放应当是什么人的解放呢？民族的平等和发展又应当是什么人的平等和发展呢？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民族观的一道分水岭。

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全民族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企图垄断“民族”的名义，宣布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和民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他们看来，民族的主体就是他们剥削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就是民族利益。对他们来说，只要是他们的阶级私利得到满足，“民族平等”、“民族解放”就实现了，“民族问题”就解决了。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看法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民族的主体，只能是在这个民族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对我国少数民族来说，民族的主体就是农民（牧民）、农奴和奴隶，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贫苦的、受压迫最深的农（牧）民、农奴和奴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①民族的利益，归根到底是这些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利益。民族的解放，必须是民族中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解放。民族

的平等和发展，也只能理解为民族中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平等和发展。民族问题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各民族中这些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问题。没有各民族中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平等和解放，就没有整个民族的平等和解放，也就谈不到民族问题的解决。

第二，民族问题依靠什么人来解决？少数民族中的剥削阶级认为，只要依靠剥削阶级中的少数上层分子，由他们采取一些改良措施，经过一些改良，或者投靠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仰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恩赐，“民族平等”、“民族解放”就可以实现了，“民族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他们根本反对群众和反对革命，当然不可能选择依靠群众实行革命的道路。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经过被压迫民族的被剥削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和发动各少数民族中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一切改良主义和恩赐观点都是根本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是无产阶级民族观同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又一道分水岭。

革命的问题，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最根本的问题，离开革命和阶级斗争，决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就是为了解决民族问题，革命进行得越彻底，民族问题也就解决得越彻底。那种认为不经过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3页。



斗争，不进行内部的革命，就可以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是不要解决民族问题，反对解决民族问题。这种观点，不过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一种表现。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在解放以后，国内的民族问题，无论就各民族间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少数民族自身来说，其根源还是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因此，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在少数民族内部充分发动劳动人民进行革命。不仅要进行和完成民主革命，而且要进行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总之，要发动劳动人民有步骤地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消灭产生剥削的私有制度。

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方针和政策，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用自己的双手推翻了封建主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接着绝大多数的兄弟民族地区又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牧）民积极参加人民公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同时，各少数民族地区，又同全国各地一样，大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使我国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近几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引导下，又克服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经济情况得到全面的好转。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从城市到乡村，从农村到牧区，从内地到边疆，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人口也在逐年增加。我国各

少数民族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一年比一年更加团结，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祖国的统一，一年比一年更加巩固了。

在整个过渡时期，我们党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必须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巩固祖国统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加强工农联盟，加强民族团结，保障民族平等和实行区域自治，领导各少数民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使各民族共同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还仅仅处在开始阶段。为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把民主革命（包括宗教中的封建制度的改革）进行彻底，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党必须团结各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组织和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坚决依靠这支阶级队伍来进行各项工作；要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培养和壮大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办好人民公社和生产合作社，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对少数民族中的干部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以及国际主义的教育，要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革命



化；要加强中央和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加强祖国各民族人民之间在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共同生活中的平等团结和友爱互助，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行同少数民族中的爱国的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决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作斗争。

我们党向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进行工作，把他们吸引到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中来，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统一战线来团结、教育和改造他们，按照六条政治标准，在党的领导下，反帝、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看到，我们党同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建立的统一战线，是为工农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必须使这方面的工作，更有利于少数民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

三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了民主改革，并且在绝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还有没有民族问题呢？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不是还是阶级问题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对任

何民族都没有例外。各少数民族中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又必然要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蒋介石匪帮以及各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处心积虑地在我国各民族之间挑起民族矛盾，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使封建制度甚至奴隶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复辟；各少数民族中被推翻的反动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地挑拨民族关系，进行各种破坏，图谋复辟；少数民族中没有改造好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站在原来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企图挑起民族矛盾，来保护或者恢复他们的阶级利益；有些少数民族中还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是产生民族主义的根源；各民族农民中都有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他们最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在少数民族中，在国内民族关系方面，所以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究其根源，都不外上面这些原因。很清楚，当前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实质上仍然是阶级问题，其根源依然是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同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民族观是根本不相容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一种必须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但是，近几年来，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很猖狂，他们同帝国主义者、外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国内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地



挑起民族間的矛盾，妄想达到他們分裂祖国的統一、恢复剝削压迫制度的目的。他們进攻的矛头指向的是祖国的統一、民族团结、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他們的口号是“反汉，独立，永不改革”。因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同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解放以来实际生活表明，一切打着民族旗号进行反对祖国、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活动的，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敌人。

一切民族中的反动派，都常常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实际上他們是民族利益的背叛者，他們所关心的不是占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极少数剝削階級的私利。为此，他們就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祖国，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他們用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来欺騙本民族的劳动人民，实际上准备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凶恶的迫害、最殘酷的剝削。解放以前，我国許多少数民族，在这些反动派的黑暗統治下，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遭受各种压迫和剝削，生活极端貧困，人口不断减少，民族本身已处于衰退和灭亡的境地。在临解放前时，藏族劳动人民的处境，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現在，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派所讲的“维护民族利益”，就是这种使少数民族走向貧困、衰退甚至灭亡的“利益”。各民族人民必須坚决粉碎这些反动派的破坏活动。

民族主义本来是资产階級的思想，現在被推翻了的封建主、农奴主和奴隶主階級，也利用它来作为同我們进行斗争的工具。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过

去、現在和将来都是害怕和仇視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統一的，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停止对我国各民族的統一团结进行挑撥和破坏，而一小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恰恰是在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策划和直接指揮下进行的，或者正是适应了他們的需要而进行的，作了他們进行顛复破坏活动的內应。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这种反动性。

在我国某些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現了一个新的突出的情况，就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在那里瘋狂地挑撥我国的民族关系，大規模地进行顛复活动，煽惑和胁迫大批的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外逃。現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国各民族人民无比的憤怒。我国各民族人民坚决反对并且决心彻底粉碎他們这种罪恶活动。

四

在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各民族实现了空前的統一和团结，但是，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間的隔閡，并没有完全消除。同时，我国各民族之間在經济发展上和文化发展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各民族还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等等。

我們在处理民族問題的时候，應該經常注意这些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把它們作为民族問題的重要任务来加以解决。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間的隔閡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們党历来是予以足够的重



視的。但是，我們党从来也不把民族間的隔閡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我們党认为，产生民族間的隔閡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在于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分裂被压迫国家的統一和民族团結的政策，在于压迫民族的剝削階級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也还在于被压迫民族的統治階級不断地对本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挑撥和欺騙。随着民族压迫的消灭，少数民族同汉族的隔閡，經過我們党的努力工作，必然会逐渐消失。因为在我們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少数民族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的貧农、下中农，是有很高的革命热情的。他們是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經濟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他們积极拥护实行民族平等、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团結。他們的利益和汉族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階級利益的一致，是最巩固的团結基础。事实也正是这样。十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劳动人民相互关怀，广大的汉族人民，从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对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兄弟般的帮助，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同样帮助了汉族人民。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間，經過长时期的共同的革命斗争，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一种完全新型的平等团結、友爱互助的兄弟般的民族关系，正在形成和发展。这就证明，在摆脱了剝削階級的剝削和压迫之后，有着共同的階級利益的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間，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是没有长期存在的根据的。

当然，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的残余，目前在某些人中間还有一定影响。而

且，由于帝国主义者、現代修正主义者、国内外反动派以及少数民族中的剝削階級，正在利用这种影响进行挑撥离間，这个问题就更加应该引起我們的注意。列宁說：“怎样消除这种不信任呢？怎样克服这种不信任而造成相互的信任呢？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同心协力地反对各国的地主資本家，反对他們的复辟企图，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維埃政权。”^①因此，要彻底消除这种影响，加强民族間的亲密团結，只有在各少数民族中加强階級教育，繼續进行階級斗争，开展对敌斗争，彻底粉碎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我国各民族間在經濟发展和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民族問題的一个重要內容。党和国家必須领导和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和文化，使我国各少数民族都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十几年来，党和国家对这个問題給予了最大的关切，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因此，在短短的十多年中間，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經濟面貌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牧业生产比解放前有了成倍、成几倍的增长；到处都修通了公路；不少地区兴建了铁路；各地普遍办起了学校和医院；各少数民族的人口都有了增加；大批的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和知識分子正在成长壮大。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在經濟、文化发展上的距离，已經大大縮小。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各民族之間在經

^①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3頁。



济上和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长期的阶级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完全消除的。在消灭了民族压迫以后，必须进一步领导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消灭封建制度乃至奴隶制度，消灭私有制，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才能最后消除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同时，也只有这样，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先进民族的帮助，使这种帮助真正有利于自己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以后，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必然会逐渐消除。这就是说，消灭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决不单纯是一个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它仍然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有不同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这些特点，同时也构成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在日益加强，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共同生活中，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觉悟正在不断地提高，在祖国各民族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必然会越来越多，而民族间的差别性必然会逐渐减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期内，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还将存在，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消灭了阶级以后，随着民族的逐渐消亡和

民族融合的实现，民族的特点和差别性才会消亡。

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因为这样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中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促进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民族之间的特点和差别性，可能各民族之间引起某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工作中去解决，或者经过必要的教育去解决。这些问题，都不是民族矛盾。所谓民族矛盾，是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反映。把民族特点、民族差别同民族矛盾混淆起来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如果夸大民族特点，制造民族差别，搞什么“民族特殊”，也是根本错误的。

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无论是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是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性，都不是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的原因。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各民族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其所以会出现种种不适当的和错误的观点，主要是由于不懂得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不懂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因而在观察民族问题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认真研究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联系，认清清楚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



种族問題实质上是階級問題

張春汉 施哲敏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接見非洲朋友時指出：“种族問題实质上是階級問題。”^①这一科学論断，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种族問題的基本观点。只有根据这个观点，才能找到产生种族歧視的社会根源，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进行种族歧視和种族迫害的罪恶目的；也只有根据这个观点，才能对如何彻底消除种族歧視这个重要的問題得出正确的結論。

人类分为各种不同的种族，这是一种自然現象。各个人种在皮肤的顏色、头发、眼睛的形状和嘴唇的厚薄上具有不同的特征，这是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这些特征带有适应自然条件的性质。人类在种族上的这种差別，同人的智力、心理和思維方式毫无关系。种族根本没有优劣之分。

种族不同于民族。民族是随着資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社会現象。斯大林說：“民族是人們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一个民族可以由不同的种族組成。一个种族也可

以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的种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还可能单独形成一个民族。現在美国的黑人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种族的差別本来是自然現象，属于人种学的问题，为什么会发展为种族歧視，从而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問題呢？对这个問題，只有用階級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种族歧視是階級社会的产物。早在奴隶社会，就产生了人类种族生来不平等的观念。当时奴隶主階級为了替自己无偿占有奴隶的地位辯护，便杜撰出所謂“人种优劣論”，說什么既然树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品种，那为什么我們不能把人区分为主人和奴隶呢？这种人类种族不平等的思想，在奴隶制的古羅馬得到了广泛的傳播。因为古羅馬的奴隶，主要是从被征服的異族中擄获的，奴隶主总是把異族人看成是劣等种族。到了封建社会，封建主階級为了替封建等級制度辯护，也竭力宣揚这种“人种优劣論”，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的血統和家世，夸耀自己的肉体来源于“优等”血統。

資產階級取得統治以后，发现种族主义

① 見1963年8月9日《人民日報》第1版。

② 《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4頁。



理論不仅可以为它在國內进行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服务，而且还可以为它对外实行掠夺和征服殖民地服务，因而資產階級学者竭力加以宣揚，使种族主义理論得到更广泛的流傳。如果說，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种族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一个国家內的剝削階級对被剝削階級的压迫和歧視，那么，在資本主义社会，这种歧視和压迫已由國內发展到国外，階級关系就常常被种族的外衣所掩盖。这时候，种族歧視就和民族殖民地問題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为了适应殖民主义者征服弱小民族的需要，欧洲資產階級的种族主义“理論家”硬說，人类各个种族和民族彼此在生理上和精神特性上有差別，說什么有的种族或民族生来就有“高度的智慧和天賦”，是“优等”种族，自然賦予它以主宰世界的使命；有的种族或民族生来就存在着“生理缺陷”，是“劣等”种族，命定地應該接受“优等”种族的統治。有个殖民主义的辯護士胡安·希內斯·德·塞普耳韦达在一五五〇年写道：印第安人不是有理智的人，他們“不同于西班牙人，正如猿猴不同于人或兽性不同于人情一样”。一七八六年，在英国一个哲学学会上宣讀的一篇論文中，断言黑人“比其他任何人种更接近于动物。”

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对于夸耀自己肉体来源的封建貴族曾經作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出生只是賦予人以个人的存在，首先只是賦予他以生命，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而国家的規定，如立法权等等，则是社会产物，是社会的产儿，而不是自然的个人的产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个人的出生和作为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

职能等等的个体化的个人之間存在着直接的一一，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像生出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生出王公貴族等等。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体系居然把具有自我意識的类的产物拿来冒充自然类的直接产物。……人的形体素质或人体的素质（說得更清楚些就是：肉体的自然的国家成員的素质）竟使特定的即最高的社会地位成为由出生所注定的特定肉体的地位。怪不得貴族要这样夸耀自己的血統自己的家世，一句話，夸耀自己肉体的来源。这当然是紋章学所研究的动物的世界观。貴族的秘密就是动物学。”^①一切反动統治階級的种族主义理論，都是建筑在这种“动物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欧洲資產階級就是在“种族优劣論”的掩飾下开始了他們的掠夺史。

自从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西方資產階級就为这块肥沃的土地垂涎欲滴。首先踏上美洲大陆的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他們为了要使自己成为美洲的主人，儼然以“优等”种族自居，誣蔑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劣等”种族，并对印第安人和其他土著居民进行大規模的杀戮，使当地居民由原来的一千八百万人銳减至一百万人。历时不久，西方其他殖民主义者也接踵而至，特别是来自不列顛群島的盎格魯撒克逊族侵入以后，更积极地参与了对印第安人的杀害。

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殘，美洲的土著居民显著地减少了，使当时在美洲积极发展种植园和开发矿場的西方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7頁。



国的殖民主义者极度感到劳动力缺乏，于是便开始了历史上最可耻的贩卖黑人的“三角贸易”。

殖民主义者从贩卖黑人的罪恶活动中获取了惊人的利润，成为西欧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时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转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都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①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在帝国主义国家和由它们控制的殖民地，这种野蛮的种族歧视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以标榜“文明”、“自由和民主”的美国来说，黑人在社会生活方面受到种种难以忍受的歧视。美国其他少数有色人种的处境也同样十分悲惨。印第安人布拉斯韦尔说：“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受着歧视。我们被白人、土地掠夺者和投机者认为是野蛮人，被认为不比野兽好一点。”“许多整个印第安村庄被消灭，男人、妇女和儿童被任意枪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垒起来烧掉。之后，那些作了这些事情的人被授予奖章。”^②美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实行着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

二

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罪恶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和歧视，而是那个民族中的一小撮剥削者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和歧视；至于那个民族中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则是

一切被压迫、被歧视民族中的劳动人民的阶级兄弟，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一致的。所以，种族歧视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歧视和压迫，是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一种阶级政策。

我们只要对被歧视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一番阶级分析，就可以透过一层薄薄的种族外衣看到种族歧视的阶级实质。

以美国黑人的情况为例，今天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十一的两千万黑人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残酷压榨的对象。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属于收入低微的贫困阶层。随着美国垄断资本的日益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黑人的景况还在继续恶化。美国黑人原来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南部各州的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现在则愈来愈多的离乡背井，纷纷进入劳动力市场，由农业劳动者变为无产者。据统计，原住在美国南部农村的黑人已由本世纪初的百分之七十五降至现在的百分之二十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头三次经济危机中，黑人失业比例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点七和百分之三百二十六。目前美国黑人的失业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五点三。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以种族矛盾去掩盖阶级矛盾，离间白人和黑人中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团结，支付给白人工人的工资高于黑人；但从这种种族歧视的工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只是白人中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据美国经济学家佩洛在五十年代初期统计，仅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8—949页。

② 见1963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3版。



仅由于黑人平均工资和白人平均工资之间的差额，美国垄断集团每年就可以从雇用的黑人那里（不包括女佣）获取超额利润四十亿美元。现在则已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仅一九六二年，美国公司和雇主从黑人身上榨取的超额利润竟达一百四十亿美元。

在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实质上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歧视，而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正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得对：“使美国黑人成为残酷剥削、狠毒压迫和暴行的专门目标的，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①

不仅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种族问题，同样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帝国主义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常常打着“全民族”的旗号，实际上，向外发动侵略和战争的只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从殖民地掠夺大量财富的也是他们。在殖民地遭受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种族迫害的，主要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劳动人民；殖民地的买办阶级同殖民主义者虽属于不同的种族或民族，但阶级利益的一致，促使他们相互勾结，压迫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帝国主义者需要殖民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充当他们的走狗和代理人；殖民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也需要帝国主义作为靠山。

种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在非洲表现得更为明显。自从帝国主义者瓜分了非洲以后，白人殖民主义者就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民头上称王称霸。而当地的绝大多数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都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在农业中，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非

洲人的大量土地被掠夺，他们不得不去殖民主义者的农场充当雇工。在工业中也设置了种种肤色限制，非洲工人不得担任专门技能的工作，只能干一些最繁重、工资最低的粗活。采矿业中井下作业是最危险和最繁重的工作，而在南非，井下作业的工人总数中，非洲人占了三分之二。在肯尼亚，非洲工人的工资只及白人五十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殖民主义者付给白人工人较高的工资，并不是白人工人与白人统治者有着什么共同的利益，殖民主义者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以种族的壁垒去阻挠被压迫阶级的联合。

种族歧视政策，是一切侵略者和帝国主义所采用的。

在历史上，一切侵略者向外实行扩张的时候，总是自称为“优等种族”，而把被侵略者说成是“劣等人种”，认为“劣等人种”应当受“优等种族”的统治和奴役。“古罗马帝国把德国人和法国人鄙视为‘劣等种族’，‘野蛮人’，认为他们应该永远服从‘优等种族’，服从‘大罗马帝国’”^②。到了现代，帝国主义者为了向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总是大力宣扬反动的种族主义。一九〇〇年，英、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就宣扬“文明的欧洲人”向“野蛮的中国人”播种“文明”，消灭“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德国法西斯强盗希特勒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就竭力宣扬德国日尔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

① 罗伯特·威廉：《毛泽东的美国黑人解放宣言》。
见1963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第4版。
②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2页。



他们理所当然地应当统治其他“劣等”民族，统治全世界。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也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具有“最高文明”的人种，优越于其他一切种族；他们无耻地说什么全人类的命运将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安排。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必然要引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这时候，帝国主义者就往往诬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是“种族主义”者。例如，一九〇〇年，由于帝国主义豺狼们入侵中国，中国人民自发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帝国主义者硬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帝国主义强盗们把这次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对侵略的战争，说成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的战争。

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叫嚣和谬论，列宁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他说：“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

帝国主义者所以把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反抗说成是“种族主义”的行为，就是为了在本国人民中煽动种族仇恨，转移人民的革命视线，掩盖阶级矛盾和斗争，以便动员国内劳动人民为侵略战争充当炮灰。很明显，帝

国主义者这样做，是他们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需要的。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代言人把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对侵略的斗争说成是由“种族仇恨”所驱使，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用这个谎言来掩盖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本性，抹煞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种族歧视，归根到底，起源于阶级剥削制度，起源于帝国主义制度。不把阶级剥削制度消灭，不把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种族歧视是不能消灭的。这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只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帝国主义的‘文明的’奴隶和‘不文明的’奴隶之间的那堵墙就被推倒了。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②

目前，在美国，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高涨，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反映。美国最近几年来，黑人斗争此起彼伏，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本的高度集中，经济危机愈益频繁，企业建设经常开工不足，失业现象特别严重，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美帝国主义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它一方面策动和纵容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以种族仇恨来转移人民的视线；另一方面又对黑人许下一些空口诺言，作出一些欺骗性的姿态，以达到在国内麻痹黑人的斗志，在国外便于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目的。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页。

②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页。



的。尽管美国统治阶级呼吁黑人“忍耐”，但是，黑人的斗争仍然日益继续高涨。事实的真相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①。

三

一个世纪以来，不论在欧洲、非洲，还是在美洲，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在美国历史上就有过二百多次黑奴反抗和起义事件。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黑人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南非和美国都陆续出现了黑人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在领导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都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在领导黑人运动中，始终坚持执行了积极斗争的路线，同各种妥协投降的倾向作了斗争。

美国种族主义者面对着汹涌澎湃的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采取了种种欺骗手法，如通过立法允诺黑人的某些自由权利，或者经济上施以小恩小惠等等。他们企图用这些办法来麻痹黑人的阶级意识，转移黑人的斗争目标，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的“仁慈”上，把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宪法范围内，使黑人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早就教导我们，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宪法只能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绝不可能成为保卫黑人利益和解放黑人的武器。恰恰相反，剥削阶级正是通过宪法来推

行它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在南非，一切种族歧视和压迫，都是通过国家公开立法明目张胆地实行的。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虽然也有冠冕堂皇的“维护人权”的字眼，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宪法虚伪性的时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宪法总是“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②，“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③。所以，企图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的立法手段，来彻底消灭种族歧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在批判谢米奇企图引用列宁的话来说明民族问题是立宪问题而不是革命问题的时候指出：“这完全不对。列宁从来没有陷入而且也不可能陷入立宪的幻想。……列宁谈到过宪法，但他所指的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立宪道路，而是革命道路”④。

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信号。要彻底消灭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只有在消灭帝国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废除了剥削制度，也就在根本上消灭了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义务，没有歧视和

- ①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1版。
- 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5页。
- ③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88页。
- ④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



压迫别的民族的权利。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政策，就是主张一切民族自由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阶级斗争的现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种族、民族问题的理论，教育和鼓舞了全世界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黑人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地提高了，他们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逐渐懂得依靠谈判协商是消除不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祸根的，仅仅依靠法庭斗争和游行示威也是消灭不了种族主义的罪行的。愈来愈多的黑人逐渐认识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剥削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并且采用了武装斗争的方式。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要解脱压迫的绞索，靠乞求于压迫者的良心是做不到的。像种族压迫这种根本的问题，本身就需要用武力才能得到解决。”^①南非人民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已开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美国，近几年来，随着美国黑人的觉醒，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也有了猛烈的发展。这些斗争是反对种族歧视、争取人权的斗争，同时，这个斗争是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天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斗争发生在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心脏，其意义更为重大，它获得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

被压迫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

切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 and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于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都应该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而对他们的斗争采取热烈的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态度。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②

中国人民一贯以深切的同情，坚决支持美国黑人和非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把这种支持看做是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也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看做是对自己的支持。如果有人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

目前，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在不断地走向新的高涨，一切遭受压迫的种族和民族最后将得到彻底解放。毛泽东同志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③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伟大预言，鼓舞着美国黑人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科学预言一定会实现。

① 见196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第4版。

②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2页。

③ 见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1版。



介绍一本揭露美国控制加拿大的书

思慕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它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成了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不仅竭力向所谓不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而且加紧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兼并和控制。毛泽东同志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中说：“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一九六三年，加拿大北方书店出版的《他们怎样把我们的加拿大卖给美国》一书，具体地描述了被美国踩在脚下的加拿大的情况。作者（笔名拉摩里）用大量的事实材料，从各个方面揭露了美国垄断资本怎样渗透和控制了加拿大，使这个富饶的北面邻邦在“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以至军事上沦为美国霸主的殖民地”。在书中，作者对美帝国主义这

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进行了抨击和提出控诉，并对加拿大统治集团屈从美国、出卖加拿大民族利益的行为表示了不满。

我们知道，加拿大曾经是欧洲移民的殖民地，但到后来也发展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至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五十个最大的金融资本家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资产），资本输出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它参加了“援印俱乐部”、“科伦坡计划”等）。它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参加过美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加拿大在名义上又算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自治领），实际上处于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控制之下，变成了美国的附庸。

经济命脉掌握在华尔街手中

作者首先在历史的简单叙述中指出，美国垄断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便开始渗入加拿大，仅仅经过了十多年的光景，就逐步使自己在加拿大的经济势力凌驾于英国之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加拿大的价值五十亿加元（一加元合零点九七美元）的资产便落在美国人的手中。过了十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从一九五五年以后，美国在加拿大的资产每年约增加十亿加元。据一个加拿大经济学家的估计，一九五九年美国在加拿大全部资产达二百亿加元，所赚的利润占加拿大全部利润的一半。但本书作者认为，把今天美国在加拿大的全部资产估计为五百亿加元，恐怕还是保守了一点。



今天，加拿大国民经济命脉和所有最有利可图的投資場所，都完全为美国人所掌握。在关键性和新兴的工业部門，如石油、煤气、汽車、采矿、冶炼、机器制造、电机、化学等工业，美資公司所生产的份額，占加拿大这些部門全部产額的百分之六十至一百。另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对加拿大工业部門控制的比重是：采矿和冶炼业百分之五十三，石油和天然气百分之六十九，制造业百分之四十四，汽車工业百分之九十五，橡胶工业百分之七十七，电力工业百分之六十，化学工业百分之五十一，造纸工业百分之四十五。美国大工业企业在外国開設的数以千計的子公司，几乎有半数是設在加拿大。美国的大壟断組織，如通用汽車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等，在加拿大都設有分支机构。显然，美国私人資本近年所以涌到加拿大去直接投資，設立工厂，不仅是为了直接占領加拿大的市場，而且是为了钻英帝国特惠制的空子，使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制造的商品輸出到其他英联邦国家时，可以享受关税上的特惠。

为了掩人耳目，好些美国公司都挂羊头卖狗肉，在招牌上添上“加拿大”的字样，如什么“加拿大杜邦公司”、“加拿大通用汽車公司”等等，但实际上它們都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壟断企业。纵然有些美国大公司过去有点加拿大人的股份，近几年来这些“外国人”（指加拿大人）也一批一批地被“踢走”。过去原是加拿大商人開設的企业，只要有大錢

可賺，美国壟断資本便把它們收买过来。甚至像“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那样的大运输企业，今天加拿大人所占的股份也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十六了。

美国壟断資本迫使加拿大政府实行有利于它的賦稅政策，以便向加拿大大量輸出资本。作者列举了加拿大稅法中对于美国資本的十二項优惠待遇，如設在加拿大的美国公司向国内汇回利潤，事实上免征利潤稅，美国公司把所賺得的利潤在加拿大开設另一公司也免征利潤稅，在加拿大开采新矿山、新油田的美国公司，可以从攫取的利潤中扣回所有的开发費而不用納稅等等。这种賦稅政策实施的結果，阻止了加拿大人去开发或拥有美国人所需要的那些有价值的加拿大资源，而“美国人却由加拿大納稅人貼錢把加拿大的資源拿过来”。作者又說，加拿大資本家在美投資二十亿美元，每年要繳納利潤稅約一亿四千万美元。如果在加拿大投資逾二百亿美元的美国壟断組織也照样納稅，則渥太华政府每年就可收到十四亿美元以上的稅款，比現在从全国加拿大人開設的公司所征收的稅款还多。

不等价的貿易和对原料的掠夺

賤买貴卖的不等价貿易，是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进行掠夺的慣用手法。現在它也成为美帝国主义用来向加拿大这样的資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經濟擴張的工具。在美国的对外商品傾



銷中，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場，美国对加拿大的片面的不平等的貿易，是掠夺加拿大的重要手段。例如，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美国从加拿大輸入二百亿加元，而向加拿大輸出二百七十亿加元。这样，七十亿加元便流入了美国。一九六一年美国人平均每人向加拿大购买价值十六美元的商品，而加拿大人平均每人向美国购买二百零七美元的商品，也就是十三倍于前者之数。正因为加拿大人向美国买的多，卖的少，特别是因为加拿大向美国买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并且按照美国的壟断高价买，而卖给美国的却主要是原料，并按照壟断低价卖，加拿大的资源和加拿大人民的膏血，便最大限度地被榨取去化成了华尔街亿万富翁的惊人的壟断利潤。作者举例說，加拿大卖给美国的铁矿砂每吨不到十块美元，而从美国买回的汽車、机器等制成品每吨却价值一千美元以上。由于这种不等价交換，由于原料和制成品价格的这种剪刀差，美国壟断資本家所賺得的壟断利潤往往高达百分之一千以上。

作者还特辟一章来談美国掠夺加拿大原料——特别是战略原料的情况。加拿大是美国所需原料的最大供应者。“沒有加拿大的鎳、铁、鉛、銅、鋅、石棉、紙浆、紙、鋁——更不要說那些不好讲出来的原料——的大量流入，美国的惊人的富足的經濟就永不能建立起来，現在一年也維持不下去。”以鈾來說，自从原子时代开始以来，加拿大輸往美国的氧化鈾，至少达八万吨，每吨售价

約二万美元，共达十多亿美元，加拿大氧化鈾的大量供应，使美国有可能大量制造和囤积核武器。作者指出，如果这些氧化鈾留在加拿大并用来发电，八万吨的氧化鈾就可以发出价值十亿美元的电力。因此，根据他的計算，每个加拿大家庭由于大量氧化鈾輸往美国而遭受的损失达二百万美元。

談到这里，我們得补充指出一点。正是由于美国壟断資本要使加拿大永远成为美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基地，它在加拿大設立的許多工厂往往只是美国本国工业的輔助，甚至是装配厂的性质。也正由于这个緣故，加拿大的工业虽有了大規模的发展，却没有建成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好些工业品还是要从美国輸入，这就使加拿大在經濟上不能不从属于美国。

此外，作者向我們指出，美国壟断資本所以这样无孔不入地向加拿大渗透，并在加拿大开办这么多的厂矿，不单是因为这个邻邦拥有极其富饒的天然資源，而且因为它有着比美国低廉的劳动力可供剝削。尽管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資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国工人遭受着壟断資本的残酷剝削和压迫，但是加拿大工人的生活水平又比美国工人更低一些。二十年前，加拿大产业工人平均每周工资大約比美国工人少三美元，随着美国对加拿大經濟侵略的加剧，美国資本家成为加拿大工人的主要雇主之后，这个工资差距又增加了好几倍。这样，美国壟断資本在加拿大获得的利潤，就远高于在本国的壟断利潤。



魔爪伸到加拿大的銀行 和各級政府

作者还揭露，美国的金融資本不仅掌握了加拿大的資源和工业，而且控制了加拿大的銀行以至加拿大的政府。作者告訴我們，加拿大有不少叫做“基金”的新金融机构，而一些最大的“基金”却由美国人操纵。美国壟断組織假手这些新金融机构，购买加拿大的大企业、大銀行的股票，从而把它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美国人開設的“基金”还向加拿大人招股，目的在于搜刮加拿大人的儲蓄，加速美国資本的积累，以供购买加拿大之用。这种做法同美国大公司在国内以“人民資本主义”作幌子所搞的“股份資本民主化”的騙人把戏，如出一轍。

本来，經濟上的依賴总不免导致政治上的从屬，現在美国壟断資本更以債权人的身份进一步控制加拿大政府。为了弥补近年国际收支的巨額赤字，加拿大不得不向美国借債。根据作者的估計，截至最近，加拿大各級政府欠債达三百四十亿加元，而这些債券的大半数都直接或間接地落在美国金融机构的手中。美国人购买加拿大政府債券所获得的利息比购买美国公債的利息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加拿大各級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公債利息几达十亿加元，其中大部分是送到美国人的腰包里，而这笔利息当然最后是由加拿大的劳动人民負担。凭仗着債主老爷的地位，美国資本家已經能够向加拿大各級

政府发号施令，不容許它們頒布不利于美国人利益的法令和采取不利于美国人的財政措施。

作者还用一章的篇幅专談美国对加拿大的軍事控制。作者用事实說明，加拿大的“国防”，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防”，說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加拿大人民为了“美国的国防計劃”而被迫付出了二百亿加元的軍費。

总之，今天的加拿大，从經濟到政治、到軍事，都处于美国的全面控制之下。

美国壟断資本給加拿大 带来經濟衰退

談到加拿大被出賣給美国的后果时，作者指出，美国壟断資本的控制，絕不是像有些加拿大經濟学家所說的那樣，給加拿大带来“經濟进步”，而是带来衰退和危机。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加拿大的生产（按人口平均計算）下降了百分之四。最近两年，企业破产的数目大大增加，比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任何一年都多。按人口平均計算，加拿大的对外貿易曾占世界第一位，現在則跌到第八位。根据官方估計，一九六二年冬天，加拿大的失业人数达到五十五万人，但实际数字已超过六十二万，失业率几达百分之十，比美国差不多高一倍。农民也大量破产，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农民离开土地的达十四万人之多。

可是，美国壟断集团对在加拿大已有的



榨取并不满足，为了转嫁自己的经济危机，以邻为壑，现在正从两方面对加拿大加紧挤压。一方面，美国要缩减从加拿大的进口，从而更扩大加拿大的对美贸易入超，另一方面要阻挠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做生意，特别是猛烈反对同中国和古巴的贸易。美国还要进一步独占加拿大市场，把英国和英联邦的进口货排挤掉。美国的计划是要加拿大加入美国的关税同盟，实行所谓“经济溶合”，好让美国货完全免税涌入加拿大市场。据作者估计，如果这个计划实现的话，加拿大的次要的工业也会马上破产，失业人数将会骤增一倍半，生产将会倒退二三十年。

目前，美加“合并”之说甚嚣尘上，可是，在作者看来，美国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合并之后，加拿大变成美国一州，与其他五十个州同等待遇，那么，“美国霸占加拿大的殖民地利润结构马上就要坍台”，“美国金融资本单在贸易方面每月从加拿大榨取的近一亿加元的超额利润就会丧失掉。”因此，打打算盘，美国垄断集团还是愿意让加拿大继续停留在半殖民地的状态，而不把它合并过来。

反美情绪在发展

但是，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那里就有反侵略的斗争。加拿大也不例外。何况，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压迫加拿大的劳动人民、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挤压、控制加拿大许多大企业家，因而，美加两国

垄断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作者告诉我们，在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经济侵略和奴役之下，加拿大跟美国闹独立性的离心倾向，日益表面化了。这个事实，美国佬也不能不看到。一九四八年，美国《生活》杂志还可以有信心地说，“加拿大人是我们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到了一九六〇年，《美国新闻》报道说，“今天加拿大的最流行的政治话题或许就是‘反美主义’。”一九六一年，《时代》周刊也说：“民族主义和摆脱美国领导的潮流正在加拿大澎湃起来。”

以加拿大企业家反对美国垄断资本渗透和控制的斗争而论，近几年来确有了明显的发展。美国农产品竞争性的倾销和华盛顿干涉加拿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贸易，曾经激起了加拿大资产阶级强烈的反应。五十年代中期，在前加拿大国家银行行长柯恩的倡导之下，加拿大曾展开了限制美资流入和控制关键性企业的运动。一九六〇年，加拿大政府曾一度通过一项法案来限制美国人开采加拿大北极地区丰富的油田。一九六三年六月，加拿大政府在向议会提出财政预算时，又曾提出两项限制外资（主要是美资）的税收措施。加拿大不顾华盛顿政府的反对，继续同中国和古巴贸易，也加深了美加的经济矛盾。

诚然，美帝国主义对加拿大的箝制还是相当厉害，加拿大统治集团还不能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前加拿大国家银行行长柯恩因为提出维护民族经济，反对美国经济兼并的主张而被迫辞职，就是一个例子。迪芬贝克



政府因为不同意加拿大的火箭和飞机装上美国核弹头而被迫下台，又是一个例子。这说明，加拿大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将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但是，如作者所指出的，加拿大人民有过抗美传统，加拿大人民不会长期忍受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今天古巴人

民反美斗争胜利的光辉范例又加强了加拿大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心。随着美国对加拿大控制的加深，以及在世界人民的打击下，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中，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地位的日渐削弱，加拿大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将会日益发展。

两种姿态，一副肖像

郭方

六月三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了长篇演说，大肆吹嘘现在美国实力之强大，简直无可比拟。

无巧不成书。在约翰逊讲话前不久，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员李普曼也发表过一篇谈话，同总统的调子相反，他慨叹现在美国在世界上的处境糟糕透顶。

比较一下美国当今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言论，的确是很有意思的。

约翰逊说：“我们美国人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安全负有责任，而且对一切自由国家的安全负有责任，不仅对我们自己的社会负有责任，而且对整个文明负有责任，不仅对我们自己的自由负有责任，而且对全人类的自由负有责任。”

李普曼说：“美国的战后地位实际已经恶化了”，“我们有过这种幻想，世界的一切都应按我们的意图行事，美国现在得出一条一

般合乎人情的经验，即并不是一切都如我们所愿的那样进行”，“由美国领导的想法是愚蠢的”。

约翰逊说：“今天美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它比任何对手或者所有对手合在一起都要强。它比世界上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力量合在一起都要强。”

李普曼说：“美国的力量和世界上其他力量比较是缩小了。”

约翰逊说：我们“所抱的希望”，“取决于我们武器的力量”，美国现在的什么“核力量”，什么小规模“战争的能力”，“作战人员的能力”等等，都在“日益增长”。

李普曼说：“军事力量并不是一切”，“我们在南越从未占过优势”，美国的原子武器“在南越和桑给巴尔一无用处”。

以世界宪兵自居的这个美国总统，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样子，完全是在虚张声势，借



以吓人。据合众国际社叫嚷：“约翰逊显然是警告中国共产党人和亚洲其他共产党人的颠覆目的说，为了对付颠覆活动的美国特种部队从一九六一年一月以来增加了七倍”。把这段话翻译成普通人能听得懂的话，应当是，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制造了所谓共产党人进行颠覆活动的谣言，并且大大地发展了所谓“特种部队”，进行着罪恶的侵略的“特种战争”。“增加了七倍”的美国“特种部队”，到底有多么厉害，毋庸那么去认真对待，世界人民关心的有力事实倒是：在美帝国主义进行“特种战争”试验场的南越，三年多来，人民自卫武装力量歼灭敌人的数字，已经高升到了十八万多人，而其中美国军事人员就有一千多人。

约翰逊的虚声恫吓，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中的一段故事。据说，当时有一个叫马霞尔的美国准将，曾经十分得意地发现，动员士兵在战场上大喊大叫，对于鼓舞士兵向敌人开火是很有用处的。这个准将申述他的理由说：“大喊大叫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人一喊叫就会明白自己是一堆人中间的一个，而不再是可怜的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它能够激起连锁反应，这种反应是能在战场上把绵羊变成狮子的。”看来，约翰逊并不比马霞尔高明许多。同美国军队在战场上大喊大叫一样，约翰逊企图唬人的炫耀美国实力地位的叫嚷，除了充分暴露出美国帝国主义既好战又虚弱的本性以外，到底有多大价值，是不难得出结论来的。

至于那位评论员李普曼呢，他不得不承

认，当前民族解放运动声势浩大，是使美国统治集团最为头痛的一件大事，他疾呼要美国统治集团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出路。“我们面临……落后民族的革命，这次革命将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无法制止这种革命”，“我们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生活，开导革命并使它文明化”。鼓吹用更为狡猾的办法来遏止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不过是肯尼迪之流的故技，但这位评论员这一次总还算比较老实，承认“我们无法制止这种革命”，没有去胡吹什么美国今天比它的“任何对手或者所有对手合在一起都要强”之类的蠢话。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资产阶级报刊持有同李普曼一样看法的，并不是一家两家。例如，六月六、七日合刊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对他们总统的讲话就给了这样的评价：尽管约翰逊开列了一张吹嘘美国武装力量的“给人印象很深”的“清单”，但“它仍然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的问题”。这家报纸也明确地供认，美国政府的“军事决算表”上一桩“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核讹诈政策，不能吓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

一个哀鸣，一个恫吓，看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然而，它们却共同反映出了美国帝国主义日落西山的命运和力不从心的窘态。哀鸣——处境不妙，恫吓——黔驴技穷。人们把这两篇讲话对照来看，不正是看到了一副活生生的外强中干的美国纸老虎的肖像了么？



一件小事变成大好事

· 楊 春 旭 ·

前些时候，在西安市的一个商店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駐西安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位同志，在商店买了两个暖水瓶。第二天，这位解放军同志拿来一个暖水瓶要换，恰巧那位經手的营业员到别的柜台去帮助工作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营业员不熟悉情况，要他“等一等”。这时，旁边又来了一位顾客要买铁丝，营业员迎上去一看，铁丝上面沒有貼上价格标签，不知道该怎么卖，又告诉买铁丝的顾客“等一等”。换暖水瓶的解放军同志等得不耐烦了。連問“你是不是营业员？”营业员回答：“我不是营业员，我站在这儿干啥！”这样，你来我往，双方頂撞了几句。

当时，柜台外面有解放军的两位军官和两位战士，批評了换暖水瓶的解放军同志，并劝他回部队。这位解放军同志回去以后主动地做了檢討。部队领导机关两小时内就派人到現場調查。当天晚上，部队领导同志作了研究，第二天，带着那位同志一起到商店道歉。在短短的几天内，部队召开了干部大会，表揚了热爱集体荣誉、积极维护軍紀的同志，批評了有缺点的同志。这样，就使广大官兵受到了深刻教育，进一步認識到关心营业员、尊重营业员、帮助营业员是阶级友

爱的具体表现。这样，也鼓舞了商业职工为顾客服务的积极性。

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商店召开了党的总支会议，檢查了商店工作中的缺点，商店的领导人到部队驻地道了歉。随后，上级商业领导部門召开了党的会议和职工会议，号召全体职工进一步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作风，認識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缺点，进一步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由于双方都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发揚了共产主义风格，这件小事就变成了大好事。

这件事，是发人深省的。

首先，人民解放军駐西安某部的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們把这件小事，当作了尊重群众利益、密切軍民关系的大事。领导部門在发现和處理这件事上，严格地貫徹了革命軍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发揚了“三八作风”，发揚了拥政爱民的精神。他們这种通过自我批評、加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精神，严明的、自觉的、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善于抓活事、活思想、严格防微杜渐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于一切部門，都可以作为



榜樣。把這些東西統統學到手，就可以把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其次，西安的這個商店也值得學習。他們對待自己工作中的缺點，採取了認真嚴肅的態度。抓住這件事，採取了一系列改進工作的措施。包括加強基本功的鍛煉，熟悉商品，精通業務，決心克服“一問三不知”的缺點；加強基礎工作，貫徹政策，改進制度，堅持崗位責任制，對每一種商品都貼上了標籤，合理組織勞動力，千方百計地為顧客提供方便；加強基層政治工作，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教育營業員更自覺地為人民服務。

更重要的是，通過營業員和顧客的這種關係，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的關係是一種完全新型的關係。我們不僅要在營業員和顧客之間鞏固和發展這種關係，而且要在一切人們中間鞏固和發展這種關係。

社會主義商業是農業和工業、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橋樑，營業員是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的光榮戰士，是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每天都離不開的同志和戰友。營業員和廣大顧客之間的關係是社會主義互助合作的關係，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營業員和顧客儘管職業不同，工作崗位不同，但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都搞的是革命工作。營業員全心全意為顧客服務，顧客尊重和支持營業員，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新風尚。

當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營業員和顧客之間還是存在着矛盾的。這種矛盾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工業和農業、生產和消

費之間的矛盾在市場上的反映。營業員可以反映情況，提出意見，也可以向顧客作一些宣傳解釋，但是，這一矛盾是營業員本身所不能解決的，它要通過發展生產，通過國家計劃的安排和調整來解決。另一方面，是營業員和顧客雙方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在買賣手續、購銷方法等方面的要求不一樣。這一矛盾只要營業員提高服務質量，練好基本功，改進工作方法和服務態度，顧客體諒營業員的困難，積極幫助他們工作，是可以解決的。

營業員為顧客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政治覺悟高、業務熟練和基本功好的營業員，是能夠和顧客搞好關係，正確處理他們和顧客之間的矛盾的，即使有時發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也能夠立即採取正確態度和妥當辦法，適當地解決這種矛盾。

例如，沈陽市食品雜貨公司營業員李素文同志遇見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位老大娘向她買卷煙，給了五元錢，她給老大娘找回一元四角，當場錢貨兩清。不料，快下班的時候，這位老大娘氣沖沖地趕來說：“你這個人，心不好，為什麼沒有給我找錢，硬說找給我了呢？”這時，李素文同志很委屈，想跟老大娘分辯分辯。可是她覺得“為人民服務，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再說，真的爭辯起來也不會產生好結果”。想到這裡，她氣消了，很和氣地對老大娘說：“你老人家別着急，回家去再想想，要是真的沒有把錢找給你，我就再找給你。”這樣就避免了吵嘴。第三天，這位老大娘到商店來拍手打掌地說：“姑娘呀，我給你道歉來啦，錢沒有錯在你



这儿，那天我向你耍，这该多委屈你呀！可真太不对啦！以后若是从我门口路过的时候，千万到我家去串门子呀。”李素文同志说得对：“要是不想到毛主席的教导，真跟老大娘吵上架，把她气个够呛，她就是把钱找到了，也不会送信来呀。”

例如，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营业员徐炳富同志，有一次接到顾客的一封信。信中说，她买头巾时，因有急事，当时没有仔细挑选，买回去一细看，发现头巾上有毛病，很不满意。徐炳富同志看到信以后，感到这是一个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第二天，他乘休息日就去江湾访问那位顾客，由于信上地址不清，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就请邮局同志帮助，找到了发信人的家。但由于她们夫妇两人都上班了，扑了空。接着他又到顾客的工作单位把他们找到了，给她换了一条满意的头巾。那位顾客感动得说：“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会有对人民负责到底的营业员”。徐炳富同志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为顾客服务，纠正自己工作中的疏忽缺点，避免了不良的影响。他说：“宁愿自己麻烦千遍，不让顾客感到不便。顾客的满意，是营业员最大的愉快”。

在全国像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营业员是举不胜举的。这些营业员的共同特点，都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的有关指示当作“金钥匙”、“智慧的源泉”、“工作的动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平凡的工作中，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在旧社会里，地主、资本家是看不起营业员的工作的，一切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人，也看不起营业员工作，他们都把营业员的工作，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事情。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岗位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营业员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劳动和一切劳动一样，是光荣的。我国商业战线上营业员的劳动和热情，受到了广大顾客的尊重和支持。工人和城市居民称营业员为“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农民称营业员为农业生产的“参谋”和“后勤兵”，农民生活的“管家人”；少数民族人民称营业员为“毛主席派来的人”，“是给我们送幸福的人”。那种认为商业服务业低人一等的剥削阶级观点，已经越来越为广大人民所唾弃。

营业员和顾客之间的新型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有这种全心全意、忘我劳动、满腔热情为顾客服务的营业员。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这样以平等态度，尊重营业员的劳动，体贴营业员的困难，鼓励营业员辛勤劳动的顾客。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这种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促进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种风格是高尚的。我们不仅应该在营业员和顾客之间提倡和发扬这种风格，而且在一切部门和一切工作中，都应该大大提倡这种风格，大大发扬这种风格。

74



原則和規章制度

· 蔡 金 ·

有时听到某些同志有这样一种说法：“领导嘛，只要掌握原则就行了”。

这话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掌握原则确实是领导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没有正确的原则为指导，什么事也办不好的。说它不对，是因为单这样说，就把掌握原则片面理解了。所谓掌握原则，就是在解决具体问题和具体制度上掌握原则，完全不管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具体制度的执行，那么，掌握原则也就变成空话了。

比如，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是现阶段人民公社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怎样掌握这条原则呢？归根到底，还是要研究和确定有关劳动报酬的各种具体制度，生产队之间劳动力协作当中的换工制度，商品交换中的价格制度等。

比如，既保证需要，又节约使用，这是流动资金管理上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怎样掌握这条原则呢？归根到底，还是要研究和确定流动资金供应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处理产品积压，协调供产销关系等问题。

比如，先维修、后新建，先生产、后基建，这是处理维修、生产、基建相互关系必须掌握的一条原则。怎样掌握这条原则呢？

归根到底，还要研究和确定计划安排、物资分配次序、资金分配次序等具体制度。

总之，离开了具体制度，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原则，就无法掌握，难于贯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原则，都要通过具体问题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只空谈原则，只空喊掌握原则，而不亲自了解具体情况，不具体地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不把正确的原则用规章制度固定下来，即使是最好的原则，也不能在实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常注意具体问题和具体制度的解决，是否会成为事务主义者呢？事实恰好相反。把原则和制度结合起来，深入实际，抓住普遍性的、带关键性的问题，同群众一起，透彻地加以解决，就会把千头万绪的复杂事物理出个纲来，做到纲举目张。这不但不会使自己陷入琐碎事务，反而会从事务主义圈子中解放出来。否则，你越是空喊原则，而不深入实际解决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越要找你，越要缠住你不放。

我们办工业企业，既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又要走群众路线，这是极为重要的原则。但有些企业尽管经常讲这些原则，由于规章制



度不健全，由于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些原则，迫切需要严格管起来的事情，没有专人负责，职工积极性很高，想把事情管好，但又不知怎样管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同志，只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就到哪里去补漏洞，忙于应付，结果是事倍功半。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些企业的领导同志针对这种情况，便深入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他们从消灭无人负责的现象做起，把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日常生活中千万个具体事情联结起来，建立了一套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简便易行、紧密衔接的规章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设备维护保养制，质量检查负责制，班组经济核算制，等等。这样做了以后，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保持了严密而协调的生产秩序。群众说：“以往好像两只手抓鸡蛋，一次只抓几个，现在有了岗位责任制，就像把好多鸡蛋装进一个篮子里，一次就可以提走”。可见，有了原则，再根据原则订出规章制度来，就可以把千万个具体问题交给广大群众自己解决了。这样做，正是使领导人员摆脱事务主义，而决不是陷入

事务主义的圈子。

有人说，只要做好人的工作就行了，规章制度是次要的。这也不全面。做好人的工作，无疑是要放在第一位的，但这决不是否定规章制度。做好人的工作，就包括教育职工认真执行规章制度。只有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才能把广大职工的干劲和积极性组织起来，用到刀刃上，用到国家迫切需要的生产建设上，才能使思想工作收到更大的效果。

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这里讲的是任务和方法的关系，如果用之于确定原则和制定规章制度的关系上来，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做工作，光确定原则不行，还需要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来，动员组织群众来执行这些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原则的实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4页。

更 正

本刊今年第10期第27页第5—6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37页左栏倒数第18行“在十九世纪……”应为“在二十世纪……”，特此更正。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从一个化工厂三种试验田的故事谈起

陆魁宏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不仅存在于各种科学领域，也存在于各项实际工作中，它与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一项生产经验的形成、推广过程中，从一项政策、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通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一次比一次精确和丰富，一次比一次更符合于客观现实。原来经过实践证实的真理，经过新的实践的继续检验，越来越得到证实；原来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或理论的某些方面，则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证实它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这里有辽宁省魏子窝化工厂领导干部三次深入盐场种试验田的故事。他们通过三种试验田，对于同海盐增产有重要关系的卤水深浅问题前后作出过三次规定。这个故事我认为对于理解实践标准的问题有启发，我们就从这个故事谈起吧。

这个厂各盐场的盐池卤水深度，在一九五八年的晒盐旺季里，一般为一厘米半到二

厘米。当时，东老滩盐场第八组的盐工们推行了“深卤结晶”的办法，把卤水加深，提高了盐产量。但是，很多工人对深卤结晶却不同意，有的人说：“大海水深，从来不结晶，圈里（貯海水庫）水深，也从来不长盐。深卤结晶不中用。”

盐池里的卤水究竟是深些好，还是浅些好？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一般性的回答，当然比较容易。但是，盐池卤水具体应该深到多少厘米，浅到多少厘米才合适，当初，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还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种试验田，让实践的结果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这年的晒盐旺季，他们在东老滩盐场划出三十个池子作试验。其中，卤深二厘米、四厘米、六厘米，各灌十个池子。该厂的生产技术试验滩的技术员，也同时作试验。这时候，每天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卤水蒸发得快。不到一个月，试验田就扒了三次盐。计量结果，卤深四厘米和六厘米的池子比卤深二厘米的池子产盐多。生产技术试验滩也提出一份报告：卤深六厘米的池子比浅卤池多产盐百分之十四点五。根据这次试验，工厂规定，各盐池卤水深度一律由二厘米左右



加深到三至五厘米，实行深卤结晶。

第一次种试验田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实行深卤结晶能使海盐增产，这就经过实践初步证明了“深卤结晶好”这个认识的真理。

然而，“实行深卤结晶好”这种认识的真理程度究竟如何？求之于主观认识固然不能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光是第一次种试验田的实践也不能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出这种认识的真理程度和确定这种认识的真理界限，就必须继续实践，让新的实践去继续检验。一九五九年三月春晒开始，工厂召开了现场会议，大张旗鼓地推行深卤结晶。可是，推行的结果，三月份五个盐场都没有完成计划，四月份也产盐不多。许多盐工组长纷纷议论：咱们三月“剃光头”，四月也低产，就是吃了深卤的亏。

推行深卤结晶的经验，没有达到增产海盐预想的目的，主观精神没有转化为客观物质，这就表明深卤结晶的经验是有条件的。这样，就促使人们去思考问题：深卤结晶办法为什么能在第一次种试验田的时候带来增产海盐的效果，而在今天推行当中却使海盐减产呢？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经过研究，弄清了推行深卤结晶失败的原因。原来，在辽宁，三月份还没有到晒盐旺季，加以这一年三月春雨连绵，四月份也时阴时雨，卤水深了，结晶反而慢，盐产量不高。于是，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在一九六一年初春又开始第二次种试验田。他们划出二十个池子，一半灌四、五

厘米深的卤水，另一半灌二厘米半深的卤水。半个月后开始扒盐，浅卤池却比深卤池多产盐百分之二十五。这一次试验以后，工厂把原来的规定修改为：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

由“深卤结晶”的初步规定到“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修正规定，是认识在继续实践中的深化过程。由于实践的继续检验，因而使人们开始明白深卤结晶能增产海盐的特定条件，懂得把“深卤结晶”置于“旺季”的条件之下，而且以“淡季卤水适当减浅”作为补充。把“深卤结晶”置于“旺季”的条件之下，从认识论讲，这就是给深卤结晶经验划定适用范围，确定它的真理界限。这就使认识向符合本厂的海盐生产规律的目标前进了一步。但这个厂的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修正规定贴上永恒真理的标签，而是让它在继续推行的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修订后的措施在一九六三年三月晒盐淡季推行，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到同年四、五月晒盐旺季，天气反常，时而大雨，时而阴云密布，各盐场实行深卤结晶，又变成减产了。在反复实践过程中，修正规定又暴露出了一些毛病，促使人们又提出了疑问：“旺季深卤结晶”这种认识的真理，恐怕还不十分完全吧？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决定第三次种试验田。一天中午，厂长来到盐田，看到第四组的盐池卤水比邻组深，但池底长盐却没有邻组的厚。他找邻组组长李文家询问，李文家



二

望了望天色，說：“看天行事唄！像这样半阴不晴天，卤深吃亏，卤浅结晶快。”别的老盐工也介绍了自己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天晴卤深些好，天阴卤浅些好，应该根据天时，灵活掌握。

按照这些意见，厂长又作了一次试验，把卤水适当减浅。几天以后扒盐，每个池子比卤深时多产了半吨盐。于是他同大家一道，依据新的实践，又把深卤结晶的经验修改为：“以深为主，深浅结合，随天应变。”

上面这个经过再次修改充实的经验，同“深卤结晶”或者“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经验比较起来，显然完整得多，克服了前二者的片面性。全厂各盐场根据天时灵活掌握盐池卤水深浅，不论旺季淡季晴天雨天，都能增产，这标志着对于海盐生产规律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它更符合于本厂的海盐生产规律。

由“深卤结晶”的初步规定，到“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修正规定，再到“以深为主，深浅结合，随天应变”这个再次修改的规定，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反复实践、反复检验认识的过程。第一次试验的结果，证明深卤结晶好；第二次试验的结果，证明只在旺季才深卤结晶好；第三次试验的结果，证明即使在旺季搞深卤结晶也未必都好，而必须分别晴天雨天，根据天时灵活掌握盐池卤水深浅。这样，深卤结晶的经验通过不断实践和不断检验的过程，越来越接近于真理，它的真理性界限越来越精确，它的真理性程度越来越完善。

何祚麻同志在《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一文中，虽然没有像有些同志那样直截了当地认为真理可被推翻，然而他却主张在实践不断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对那些“不全面、不完善的相对真理”必须“不断修改”。如果何祚麻同志所说的“修改”是指补充、完善的意思，那就只是用词不当的问题，但是，仔细体会他的意思之后，可以有根据地认为，他所说的“修改”，乃是“否定”、“推翻”的同义词。例如，他在分别表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特征时指出，绝对真理“不会被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而相对真理则“要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改”^①。两句话是对称的，一个“不会被否定”，一个“要修改”，这意思很明显，就是一个“不会被否定”，一个“会被否定”（至少是部分地被否定）。

抱着真理需要修改的观点去看待上述深卤结晶经验不断修改的事实，也许何祚麻同志会认为，这恰好为他的观点找到了一个论据吧。然而，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真理不能被修改，不能被否定，不能被推翻。这个事实恰恰证明“真理需要修改”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就拿上面所举的那个事例来说吧。第一次种试验田的实践证明深卤结晶好，但这实际上并未证明在一切条件下都是深卤结晶

^① 《红旗》1964年第10期，第56页。



好，这从第二次試驗中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只是证明了在旺季才实行深卤結晶好；第二次种試驗田的实践证明，“深卤結晶”的經驗并未在淡季的条件下被实践檢证为真理。第三次种試驗田的实践进一步证明，“深卤結晶”的經驗实际上并未在旺季的阴雨天被实践檢证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实际上只是在“每天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卤水蒸发得快”的旺季的实践中得到过证明。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原有真理被推翻的問題，也根本不存在真理本身需要“修改”的問題。恰恰相反，从这三次种試驗田的实践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再修改技术規定的事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認識，只要是真正被实践檢证为符合客观实在的，它就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它就是颠扑不破、推翻不了的。实践檢驗真理的过程，是越来越精确地划定真理性界限，以及整个認識越来越深化、越来越趋于完善的过程。

何祚麻同志会問：“深卤結晶好”这个認識不是受到过一再的修改嗎？而这种認識当初不是被人們认为是相对真理嗎？因此它的被修改岂不是相对真理的被修改嗎？

我回答說：初次种試驗田的实践确实对“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真理性作过一定的檢驗，“深卤結晶好”这种經驗也确实受到过一再的修改，然而，我們看看，在“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中，被修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被修改了的东西并不是这种認識的經由实践檢证过的客观真理性。在“每天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卤水蒸发得快”的旺季的

实践中（或根据将来新的实践所发现的新条件的实践中）得到证明的“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真理性，是不能修改的，被修改的只是人們对“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适用范围的規定。当初人們籠統地认为深卤結晶好，因为彼时彼地他們还没有認識到“深卤結晶好”的特定条件，以致在淡季和在旺季的阴雨天实行深卤結晶时遭受了失敗。他們从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中，逐步明确了“深卤結晶好”的特定条件，从而逐步修改了他們对“深卤結晶好”这种認識的适用范围的規定。

在这里，我們必須明明白白地划清一条綫：一个是不能修改和不应修改的真理的客观內容；一个是可能修改和應該修改的真理的适用界限。二者不可混淆。真理可修改論者的失足之处，正是把不可修改的真理的客观內容当作可以修改的真理的适用界限。

同时，我們还有必要划清另一条綫：一个是被实践确证的真理；一个是被人們认为的真理。二者也不可混淆。馬克思說：“哲学是問：什么是真理？而不是問：什么被看做真理？”^①有些过去的确被人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后来实践的确把这种認識推翻了。然而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这种認識被推翻，并不是真理被推翻，因为这种認識本来就不是真理，它本来沒有被实践檢证为符合于客观实际，而不过是人們曾經把它誤认作真理罢了。

恩格斯在談到人們認識运动形态轉化的

^① 《第179号〈科倫日报〉社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6頁。



規律時說：“凭借新发现，我們可以給它（指規律）提供新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现的規律本身，我們是不能再增加什么的。”^① 列宁曾經举馬克思的貨幣流通理論为例指出，真理同对象之間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其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侖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个永恒的真理一样。”^②

我們必須牢記这个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真理是不可推翻的，不可由人們随意去“修改”的。新的實踐只能使認識愈來愈接近于真理，使認識的真理性和真理性界限愈來愈精確。在生产、工作、学习、研究中，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切行动中，我們必須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錯誤”，决不應該坚持錯誤，放棄真理。

三

认为在實踐檢驗真理的过程中真理可被推翻或可以修改，这实际上就是抹煞了實踐标准的絕對性。而认为某一科学原理已是絕對真理，它的真理性已达到完善得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实际上又是忘記了實踐标准的相对性。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是割裂了實踐标准的絕對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統一关系。

在这里，我們有必要重溫列宁对这个問題的提法。列宁說：“實踐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駁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識变成‘絕對’，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一切变种进行

无情的斗争。”^③ 列宁“同时”看到實踐标准的两种不同屬性，把實踐标准的絕對性和相对性辯证地統一起来，这就是在認識論中把唯物論和辯证法統一了起来，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在对待真理标准問題上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观点。

所謂實踐标准“不确定”，这是說的實踐标准的相对性，这是由實踐的发展性和具体性所决定的。實踐是不断发展着的，当它处于一定的具体历史阶段上，它不可能完全证实或推翻現存的一切理論观点；在任何知識領域中，都会存在着一些未經证实或未被推翻的假說。實踐是人們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它是通过各个方面人們的具体的實踐活动体现出来的，一种理論是正确或是錯誤，只能求证于社會實踐的总和；如果光凭个别孤立的偶尔行动，那是不足以确证理論的。

所謂實踐标准是“确定”的，这是說的實踐标准的絕對性。實踐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它能带来现实的成效。它还有“普遍性的优点”，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所进行的實踐能够檢驗一般性的理論知識。真理是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真理的标准既不能求之于主观認識，也不能求之于客观事物本身，而只能求之于作为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桥梁的社會實踐。實踐是唯一的、可能的和现实的真理标准，沒有、而且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7頁。

②③ 《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3、142頁。重点系引者所加。



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标准来檢证人类各种認識和理論的真假。这是絕對的、确定不移的。一种理論一旦真正被社会实践证实它是正确的，它就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以后的实践之任何发展，都不能否定它所固有的客观真理性；一种理論，即使一时的实践不能檢证它是否具有真理性，但实践的发展是无限的，任何一种一时不能得到檢驗的理論，在将来也只能靠实践去檢驗它，而且将来的实践一定能够檢驗它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也是絕對的、确定不移的。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絕對性，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彼此割裂，它們是辯证的統一。

还是拿魏子窩化工厂領导干部三次种試驗田这个事例來說吧。

从这三次种試驗田的实践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再修改技术規定的事实中，我們可以看出，实践标准是絕對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在旺季的晴天里）“深卤結晶”硬是能使海盐增产，新的实践材料总是繼續证明这个認識是正确的，而不能推翻或修改它所固有的客观真理性。正因为这样，所以魏子窩化工厂关于盐池卤水深淺的三次規定中，都把“深卤結晶”考虑了进去。与此同时，我們又看出了由实践的发展性所决定的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一項正确的認識，只有通过实践的反复檢驗，其真理性才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你看，只是通过第一次种試驗田的实践，人們还認識不到“深卤結晶”应置于“旺季”的条件之下，即使通过第二次种

試驗田的实践，人們也还認識不到“深卤結晶”应置于“晴天的旺季”的特定条件之下，因为“深卤結晶”經驗的真理性那时还未充分地显示出来；只有人們經過成功和失敗的多次試驗，从正面和反面檢证之后，才比較清楚地認識到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一种理論的真理性界限将得到越来越精确的划定，正因为这样，所以該厂每总结出一經驗之后，总不把它看成是穷尽了一切的終极真理，即使已經找到了“以深为主，深淺結合，随天应变”这样一个比較完整的經驗，也沒有到此止步，而是让新的实践去繼續檢驗這項經驗的真理性界限和真理性完善程度。

实践标准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对的，这种情况，从一个生产队的生产实践对一項农业生产計劃的檢驗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比如說，一个生产队，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对生产指标、作物品种、播种面积、密植規格、施肥数量、劳力安排等等，作出了計劃，由于这个計劃的付諸执行，結果获得了丰收。丰收的事实证明这个計劃是訂得正确的，切实可行的。从認識論讲，这就是生产实践檢证了这一农业生产計劃所具有的真理性。这是真理的絕對性的具体表現，也是实践标准的絕對性的具体表現。但是，我們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計劃所具有的真理的相对性和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就是說，虽然这个計劃符合本队的实际情况，但它只是近似的符合，它不可能完全地反映本队的一切情况，特别是随着季节的更替，各



种生产条件的变化，人們新的需求的提出，前所未料的情况的出现，新的实践会表明原计划的局限性，证明这个计划还需要补充、修改，或者另外制订新的生产计划。

我们必须如实地全面看到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而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忽略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看到一个经由实践验证的计划、方针、政策的相对真理性和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就会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固步自封，不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同样，如果我们不看到一个经由实践验证的计划、方针、政策的绝对真理性和实践标准的绝对性，那就会对任何计划、方针、政策都失去信心，认为任何计划、方针、政策都没有制订的必要，这样下去，就会使工作无所遵循，只能消极盲目地任凭自然界去摆布，而不能积极自觉地进行改造世界的斗争。

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一种正确的或是比较正确的理论，由于在执行方面发生某种偏差，因而一时一地的实践行动没有证明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后的实践纠正了执行方面的错误，终于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真理性。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就可能遇到这种情形。例如，一项正确的政策，如果执行得不好，在一个时候的具体执行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那么，彼时彼地的执行就不能证实这一正确政策的真理性；但是一旦纠正了执行中的错误，保证它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这时，这一正确政策就可以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从

而閃发出真理的光辉。

上述同样表明，实践标准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一项政策本来是正确的，但因执行错误而证实不了它的真理性。这就是说，个别孤立的偶尔的事实和行动，不足以确切证明理论、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也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的一种表现。但是，纠正了具体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一项正确的政策就一定可以化为物质力量，这就是说，社会实践的总和、全体以及各个具体实践活动的联系，是能够确切证明一项认识的真理性的。由此，我们又看出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我们了解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的这种表现，懂得了社会实践的总和、全体以及各个具体实践活动的联系是能够确证一项认识是具有真理性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把社会实践的个别现象，当作判断某一理论的依据，而会自觉地去以“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①。

总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确证并发展真理和不断揭露并克服错误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精确地划定真理性界限和使真理性趋于完善的过程；而决不是“修改”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浅知到深知的过程，实践标准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以上意见未必正确，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6页。



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总页码)

毛澤东主席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談話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2-3·40)

毛澤东主席就最近日本反美大示威发表談話 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偉大的爱国斗争..... (2-3·42)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2-3·44)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八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6·220)

附件: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
..... (6·246)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9·344)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9·349)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9·351)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9·353)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9·362)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9·367)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9·370)

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經濟的蜕化
..... 施东向 (10·379)

沿着資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南斯拉夫农业..... 施东向 (11·452)

南斯拉夫有着怎样的“創作自由”?
..... 牧 惠 (5·205)

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党校的报告
..... 維·乔·威尔科克斯 (5·167)

发揚革命精神, 粉碎现代修正主义
..... 迪·努·艾地 (11·447)

以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来贏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
..... 約 多 (12·499)

学习毛泽东思想 学习人民解放军

我軍指战員怎样学习毛澤东著作
..... 肖 华 (10·405)

論人的因素第一 本刊評論員 (10·398)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綫
..... 本刊評論員 (6·258)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
..... 本刊評論員 (5·180)

从实际出发, 进行思想工作... 本刊評論員 (7-8·279)

“四个第一”的辯证法 郭力軍 (4·140)

学习理論的目的全在应用 王承放 (10·413)

挤和钻 苏思本 (10·414)

国内政治

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赵 汉 (2-3·71)

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
..... 顾大椿 (1·13)

做好工业企业車間的思想政治
工作..... 李 野 (5·187)

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車間
党支部..... 張 高 (5·189)

根本問題在于“思想变样” 張 凜 (7-8·290)

当前我国国内民族問題和阶级
斗争..... 刘 春 (12·510)

正确認識和处理宗教問題
..... 游 麟 刘俊望 (4·156)



經 濟

- 人民公社在前进陶 鑄 (4 · 123)
 花县真正变成了“花县”張汉青 (4 · 135)
 試論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途徑
 和步骤 陶鼎来 (7-8 · 328)
 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
 楊 均 (5 · 200)
 論我国农业的集約經營問題 赵天福 (2-3 · 84)
- 論我国社会主义銀行工作的几个
 問題 段 云 (1 · 23)
 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
 运动 韓哲一 (10 · 417)
 科学技术的中間試驗 楊朝霞 (7-8 · 323)
- 改旧創新 李智盛 (7-8 · 293)
 一件小事变成大好事 楊春旭 (12 · 534)
 原則和規章制度 蔡 金 (12 · 537)

学 术

- 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 关 鋒 (4 · 148)
 加强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 东方明 (5 · 195)
- 学会“一分为二”的方法 卢国英 (4 · 151)
 評比是正确处理先进和落后矛盾的
 方法 郭力軍 (7-8 · 285)
 伯恩斯坦攻击馬克思主义的一个
 无聊伎俩 长 貴 宝 鈞 (7-8 · 318)
 破产了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經濟
 “理論” 郑天倫 宛 樵 (6 · 248)
 美帝国主义者們的囈語 黄范章 (7-8 · 305)
 美帝国主义者們的又一堆囈語 龙 經 (7-8 · 312)
- 关于实践标准問題討論的情况 (10 · 425)
 实践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客观
 标准 杜 雷 吳俊光 (10 · 428)
 再談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
 問題 何祚麻 (10 · 433)
 怎样理解絕對真理、相对真理和
 实践标准? 陶德麟 (11 · 483)
 关于实践标准的絕對性和相对性
 陆魁宏 (12 · 539)

文学 · 艺术

- 詩詞十首 毛澤东 (1 · 3)
 七律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七律 到韶山
 七律 登庐山
 七絕 为女民兵題照
 七律 答友人
 七絕 为李进同志題所攝庐山仙人洞照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卜算子 咏梅
 七律 多云
 滿江紅 和郭沫若同志
- “百万雄师过大江” 郭沫若 (1 · 9)
- 社論：文化战綫上的一个大革命 (12 · 495)
 提倡現代劇 何 明 (2-3 · 96)
 現代劇与艺术趣味 王朝聞 (2-3 · 99)
 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闊步前进 賈 濟 (6 · 264)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 姚文元 (6 · 266)
 贊勇敢的山鷹 張 穎 (6 · 269)
 在建設新农村的理想下团結前进
 袁文殊 (6 · 271)
 劳动熔炉鑄新人 艾克恩 (6 · 273)
 階級斗争的生动教材 黃秋耘 (11 · 478)
 大写社会主义英雄譜 宋 爽 (11 · 480)

国 际

- 把美国侵略者从巴拿馬赶出去 沙 丁 (2-3 · 103)
 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的
 偉大胜利 刘克林 (7-8 · 295)
 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必定胜利
 林文山 郑公盾 (11 · 469)
 种族問題实质上是階級問題
 張春汉 施哲敏 (12 · 520)
- 战后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
 国家之間的货币斗争 項 冲 (2-3 · 109)
 介紹一本揭露美国控制加拿大的
 书 思 慕 (12 · 527)
- 不可救药的“肌肉僵化”症 洪 谷 (5 · 212)
 爬不出死胡同 秋 阳 (5 · 213)
 美元 · 鏈条 · 朋友 涂 林 (5 · 214)
 美国“調解人”的真面目 丁 岱 (7-8 · 339)
 两种姿态，一副肖像 郭 方 (12 · 532)



红旗



13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 ★

目 录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2)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6)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11)
驳所谓“全民国家”	(15)
驳所谓“全民党”	(19)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23)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27)

☆ 七月十四日出版 ☆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論系統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謬論，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綱領，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綱領，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綱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設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鋒队的党，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談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报刊强詞夺理地为自己辯解，并且指責我們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批評是什么“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論断”，是什么“脱离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



要他們“向后倒退”。

好吧，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究竟是誰远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苏联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究竟是誰要苏联向后倒退的吧。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階級专政

怎样認識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階級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階級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問題，必須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給以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發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階級社会向无階級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經過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階級专政代替了资产階級专政，生产資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无产階級由被压迫被剝削的階級变为統治階級，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剝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級阶段。它还不是在經濟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馬克思在談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說：“我們这里所說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經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 列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經濟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②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間、城乡之間的差別，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之間的差別，资产階級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③ 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別。要使上述这些差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頁。

^{②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7、452頁。



別和現象归于消失，要使資產階級法权归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經過一个很长的时期。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这些差別已經消失，只有資產階級法权完全消失，才能實現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完全的共产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訴我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貫穿着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階級斗争，存在着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誰战胜誰”的問題，存在着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中說：“在无產階級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階級斗争的繼續，仍然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只是階級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產階級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 1, 被推翻的剝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們被夺去的‘天堂’。
- 2, 小資產階級自发势力經常产生新的資本主义分子。
- 3, 在工人階級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職員中，由于資產階級的影响和小資產階級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蝕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 4, 国际資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階級斗争繼續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論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反动階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們同国际資產階級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还要頑强地同无產階級繼續較量。他們在各方面同无產階級进行隱蔽的或者公开的斗争。他們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維埃、共产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資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們作为对抗无產階級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產階級专政。他們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經濟和文化教育等部門，抗拒和篡夺无產階級的領導权。在經濟方面，他們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資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們用資產階級世界观对抗无產階級世界观，用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无產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經濟的殘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資本主义自发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① 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②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5页。

②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2页。



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①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③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阐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④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⑤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有名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

① 马克思：《致约·卫登费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2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

③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4页。

④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⑤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页。



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离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



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經驗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規律的认识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①“没有阶级冲突”，^②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这无论在理論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赫魯曉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們就看到許多事例，說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許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們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設立“地下車間”，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財。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軍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們私自进行非軍用品生产，三年內，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③

烏茲別克一个絲織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會計、供銷科长、車間主任等人結成一

①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②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③ 1962年5月19日苏联《紅星报》。



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吨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①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織車間”，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②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織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③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織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④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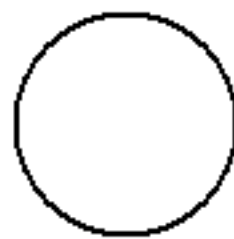
① 1963年10月8日苏联《东方真理报》。

② 1962年5月18日苏联《乌克兰真理报》。

③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消息报星期副刊》。

④ 1963年8月9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⑤ 1962年1月9日苏联《苏维埃吉尔吉斯报》。



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①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②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账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③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克兰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升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④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

① 1962年6月26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② 1963年第35期苏联《经济报》。

③ 1963年8月14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④ 1962年1月14日苏联《真理报》。

⑤ 1961年2月6日苏联《真理报》。



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还有許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①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②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③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④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棧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⑤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吨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厘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⑥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〇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⑦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

① 1963年4月9日苏联《消息报》。

② 1960年10月9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

③ 1960年10月18日苏联《消息报》。

④ 1963年7月17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⑤ 1963年第27期苏联《经济报》。

⑥ 1963年7月27日、8月17日苏联《文学报》。

⑦ 1961年1月27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



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①

^① 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1页。



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衷于



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①这是毫不奇怪的。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① 赫鲁晓夫1963年8月28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对外国记者的谈话。



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卫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赢得了拯救人类的伟大胜利。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继承着列宁和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和向往共产主义。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集团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有许多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坚决反对的。苏联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抵制和反抗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迫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伟大的苏联人民，正在为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而斗争。

駁所謂“全民国家”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①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不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

^①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97页。



說成是“全民的”、“超階級的”，企图欺騙人民群众。

赫魯曉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謂“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說。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們的謬論遭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評以后，急急忙忙出来作辯解，竭力为“全民国家”制造“理論”根据。他們說，馬克思和列宁所說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指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他們还說：“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① 在无产阶级专政結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

这是彻头彻尾的詭辯。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著名原理。对于馬克思的这个原理，列宁曾經有过明确的解释。

列宁說：“馬克思在批判哥达綱領时写道：‘在資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現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說来，还是无可爭辯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轉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②

列宁还說：“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資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領会了馬克思国家学說的实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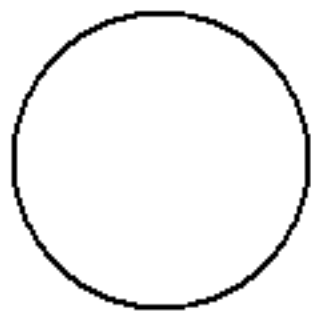
很清楚，馬克思和列宁所說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說的仅仅是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指的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的时候。

同样很清楚，馬克思和列宁所說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列宁說：“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結論：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④

① 苏联《真理报》編輯部文章：《建成共产主义的綱領》，1961年8月18日。

② 列宁：《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7頁。

③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418頁。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可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根本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捏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辩护，还费尽心机地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硬说成“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②他们颇为得意地说，中国人是不敢援引马克思这句话的。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马克思的这句话，似乎真的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列宁仿佛早就预见到修正主义者将会怎样利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了精辟的说明。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是，马克思接着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就是说，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制度！！这不是矛盾吗？”列宁回答说，“不矛盾”。他接着用列表的方式，说明了从资产阶级国家到国家消亡的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

列宁说：“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十分清楚！！”

在列宁的表式里，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消亡。列宁正是用表式说明，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制度了。

可笑的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时候，竟然也引用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书中的这一段话。他们在引用了列宁的话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说：“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③

如果列宁所说的前两个时期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在他们那里，国家就应当消亡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② 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③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1964年第8期。



了，又何来一个“全民国家”呢？如果国家还没有消亡，那么，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自己的“全民国家”辩解，还竭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他们宣扬，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赫鲁晓夫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竭力发展民主的路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①

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一窍不通，并且加以恶意的歪曲。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

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不允许他们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②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劳动人民中实行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发扬民主，只有取消对敌人的专政和镇压，实行什么“全民的民主”。

这种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是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说：“‘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话，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③

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

① 赫鲁晓夫1961年10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和《总结报告》。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页。

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页。



級民主到无产階級民主；从无产階級民主到沒有任何民主。”^①这就是說，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階級消灭了，无产階級专政消亡了，无产階級民主也就随着消亡了。

拆穿了說，赫魯曉夫大事吹噓的所謂“全民民主”，同所謂“全民国家”一样，不过是一堆騙人的鬼話。赫魯曉夫拣起資产階級和老修正主义者的破烂，修修补补，加上他自己的印記，无非是用来作为欺騙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幌子，掩盖他的背叛无产階級专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赫魯曉夫的“全民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赫魯曉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階級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資产階級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謂“全民国家”，的确确不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魯曉夫集团的統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資产階級分子的民主。赫魯曉夫的所謂“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資产階級民主，也就是赫魯曉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現在，在苏联，誰要是坚持无产階級立場，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說話，敢于反抗，敢于斗爭，誰就会被監視、釘梢、传訊、以至逮捕和監禁，或者硬被說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瘋人院”。最近，苏联报纸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一点不滿情緒的人“进行斗爭”，即使仅仅对赫魯曉夫的农业政策說了几句“俏皮話”，也要当作“敗类”，給予“无情打击”。^②尤其駭人听聞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鎮压。

“取消无产階級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內心的秘密：无产階級专政，他們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們是死也不肯放弃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們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們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資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魯曉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駁所謂“全民党”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魯曉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階級性质

① 列宁：《馬克思主义論国家》。

② 1964年3月10日苏联《消息报》。



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是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有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①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这些都是“死板的公式”，而他们那个“全民党”，却符合“党的发展的现实的辩证法”。^②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煞费苦心地想出了几条为“全民党”辩护的理由。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所谓“全民党”，是由于：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②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1964年第8期。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想出的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表明他们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

列宁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人严肃地谈话呢？同志们，难，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谈论的问题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对这种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①

现在，我们也不妨分析一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作的显然极不严肃的回答。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說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說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說，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說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說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全民党”以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說法，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

^① 列宁：《首先要有明确性》。《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52页。



那么，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应当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样，共产党岂不是从它建立的头一天起，就成为“全民党”了吗？

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列举的这种种“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赫鲁晓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党”，并且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①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②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③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④他们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列宁，说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

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门徒。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⑤

事实很清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所谓“全民党”，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党。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列宁说过：“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的。”^⑥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把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重新提到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面前。

① 赫鲁晓夫1962年11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 苏联《经济报》社论：《研究、了解和行动》，1962年第50期。

③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共产党人和生产》，1963年第2期。

④ 赫鲁晓夫1963年2月27日在莫斯科加里宁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⑤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页。

⑥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5页。



赫魯曉夫的假共产主义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說，苏联已經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时期。他又說，“在二十年之內我們將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①这完全是騙人的。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把苏联引上資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着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險，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談得上什么建設共产主义呢？

赫魯曉夫挂起“建設共产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的眞面目。可是，这种騙人的把戏是不难拆穿的。明珠不容許魚目来混杂，共产主义不容許修正主义来冒充。

科学共产主义有它确切的涵义。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別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馬克思說：“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从而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經不仅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資产阶级法权的狹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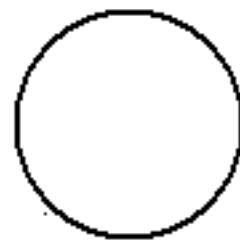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向共产主义发展。列宁說，“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須經過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別的道路”。^③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在苏联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資本主义倒退。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別的方向发展。絕不能設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剝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魯曉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資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剝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資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經占据党、政、經濟、文化等部門的統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① 赫魯曉夫1961年10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綱領》的报告。

②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頁。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頁。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正在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逐步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逐步蜕化成为富农经济。这又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一小撮人富裕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基础上。伟大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祸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鲁晓夫经常在重重矛盾中挣扎，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从这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所走的路，也是背向共产主义的。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为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国家消亡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存在着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机器，而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机器。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使国家重新成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苏联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正在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论什么共产主义，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只要拿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使苏联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因而距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赫鲁晓夫打起共产主义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利用这块招牌，欺骗苏联人民，掩盖资本主义复辟。他还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背叛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块招牌的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不仅自己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而且还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服从它的私利，不许反对帝国主义，不许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听从它的摆布，实际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赫鲁晓夫集团又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服从它的私利，放弃革命斗争，不去打扰它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的清梦，听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宰割。

总之，赫鲁晓夫提出的在苏联“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①这种欺骗苏联人民、挑拨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们从不怀疑，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破坏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反对和抵制赫鲁晓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②这种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我们衷心祝愿苏联人民的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赫鲁晓夫鼓吹的“关心人民福利”，“让每个人都过美好的生活”，完全是假的，骗人的。广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被赫鲁晓夫折磨得已经够苦了。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③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在赫鲁晓夫的心目中，科学共产主义连影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

① 苏斯洛夫 1964 年 2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③ 赫鲁晓夫 1960 年 7 月 7 日在奥地利的广播和电视演说。



階級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國策的地位。他說，他對美國的成就“十分尊重”。他“為這些成就高興，有時候也有一些羨慕”。^①他大肆吹捧美國大農場主加斯特宣揚資本主義制度的信件，^②實際上把這封信作為自己農業方面的綱領。他不僅要在農業方面學習美國，而且要在工業方面學習美國，特別要學習美國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原則。他很羨慕美國的生活方式，硬說在壟斷資本統治和奴役下的美國人民“生活得不壞”。^③他還指望用美帝國主義的貸款來建設共產主義。赫魯曉夫在訪問美國和匈牙利的時候，還一再表示願意“從魔鬼那里獲得貸款”。

由此可見，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就是“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就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共產主義”，就是“向魔鬼要貸款的共產主義”。難怪赫魯曉夫常常對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說，一旦實現了這種“共產主義”，“不用我來號召，你們就會走向共產主義”。^④

這樣的“共產主義”並不稀奇。這樣的“共產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這樣的“共產主義”，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商標、招牌和廣告。列寧在嘲笑老修正主義政黨掛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的時候說過：“這種‘資產階級工人政黨’，在馬克思主義受到工人歡迎的一切地方，都會拿馬克思的名字來賭咒發誓。要禁止他們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個商號使用任何一種商標、招牌和廣告一樣”。^⑤

這就很容易了解，為什麼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受到帝國主義和壟斷資產階級的賞識。美國國務卿腊斯克說：“隨着‘土豆燒牛肉’和第二條褲子以及這一類問題在蘇聯變得更加重要，我認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經出現了一種起溫和作用的勢力。”^⑥英國首相霍姆也說：“赫魯曉夫先生還說過，俄國牌的共產主義是把教育和土豆燒牛肉放在第一位的。這很好。土豆燒牛肉共產主義比戰爭共產主義好，而且我高興的是，這證實了我們的觀點：肥胖和舒適的共產黨人比瘦弱和飢餓的共產黨人要好。”^⑦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完全適應美帝國主義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說：“有迹象表明，在蘇聯內部有要求較大的自由主義的力量，如果這些力量堅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蘇聯內部發生基本的變化”。^⑧杜勒斯所說的自由主義力量，就是

① 赫魯曉夫1959年9月16日與美國國會領袖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的談話。

② 赫魯曉夫1964年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講話。

③ 赫魯曉夫1959年9月24日同美國實業界和社會人士的談話。

④ 赫魯曉夫1960年3月25日同法國議員的談話。

⑤ 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6—117頁。

⑥ 腊斯克1964年5月10日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中答記者問。

⑦ 霍姆1964年4月6日在英國東部諾里季的講話。

⑧ 杜勒斯1956年5月15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



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赫鲁晓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可见，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啊！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啊！

我们奉劝帝国主义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同样是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保佑帝国主义长寿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曾经发生过反复和曲折。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①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尝试算起，还不到一个世纪；而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已经有过巴黎公社的例子，有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在当代，也发生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政权几乎遭到覆没。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容易看得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6页。



到的，是比較注意的，是比較警惕的。

对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們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謂“和平演变”的道路。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提供了这样的教训。但是，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們充分的重视。人們会说，这也許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

可是，現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設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們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出現，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經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我們中国共产党已經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我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錯誤，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錯誤，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結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論上、政策上、組織上和具体工作上，都告訴我們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经过历次整风运动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资本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們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們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級领导机关寻找他們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們决不应当有絲毫的麻痹大意，而必須引起充分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絕不能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們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認識这个問題，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問題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國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經驗，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提出了系統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統一的規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对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证法的最根本的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許多人承认对立統一的規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規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問題。他們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問題。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綫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須还有一个政治战綫上和一个思想战綫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時間才能解决。几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問題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較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



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机构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中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



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

^①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归于自己，把一切錯誤归于別人。

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鍛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上面所說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宝庫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們防止資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則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階級专政，使我們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順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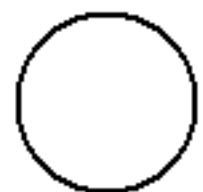
对于苏联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尽管我們不願意，尽管我們反对，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經出現了，这也沒有什么可怕，沒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轉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絕不会因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終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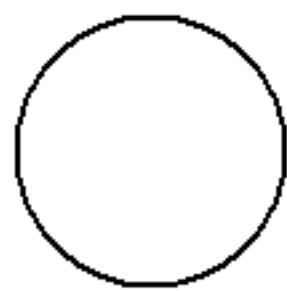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經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們坚决相信，无产階級专政的光輝，社会主义的光輝，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必将普照苏維埃的大地。无产階級必将贏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红旗

HONGQI



14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四期 ★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1)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11)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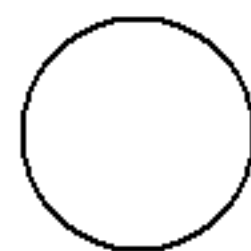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彭 真 (18)

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十年 朱其文 (25)

社论：培养接班人是革命事业的千年万年大计 (34)

读者与作者：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40)

☆ 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这封信，是在六月二十日才交给我们的。在此以前，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透露了。

你们的来信，对我们五月七日信件中的合理建议加以歪曲和拒绝，对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意见置若罔闻。你们在来信中，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就暴露了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

(一)

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坚决反对召开分裂会议。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坚持这种立场。你们在来信中说我们“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完全是用谎言代替事实。

事实是怎样的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倡议，主张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来消除被你们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分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来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如果



是忘記，这就表現你們的記憶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沒有看懂，这就表現你們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們不是明明写着，要使會議取得成就，“有賴于事先克服許多困難和障礙，有賴于進行許多准备工作”嗎？

我們採取這樣的立場，是為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共同對敵。而你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拒絕了關於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倡議。接着，你們就採取了一系列進一步惡化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步驟，並且在一九六二年冬先後舉行的歐洲五個兄弟黨代表大會上，掀起了一个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新的逆流。

儘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派代表團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到莫斯科，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我們原來希望這次會談能夠取得積極成果，從而有利於準備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而你們對於中蘇兩黨會談毫無誠意，並且在會談期間，發表了蘇共中央給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擴大和加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進一步堵塞了召開國際會議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春，為了克服你們設置的重重障礙，爭取召開一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大會，我們又一次做了重大的努力。由於你們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我們的信中只是空喚團結，而沒有就召開國際會議提出任何具體措施，所以我們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給你們的信中提出了關於籌備和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四項建議。這四項建議是：“（一）停止公開論戰，必須經過中蘇兩黨和其他有關兄弟黨，進行各種雙邊的和多邊的會談，通過協商，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辦法，達成共同的協議。（二）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並且積極支持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舉行這次會議之前，應當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難和障礙。我們願意同其他兄弟黨一起，盡一切努力，使這個會議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大會。（三）中蘇兩黨繼續舉行會談，是开好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準備步驟。我們提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談。（四）我們提議，在中蘇會談之後，舉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亞、日本、意大利、法國十七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會議，以便為各國兄弟黨代表會議作進一步的準備。”

你們在最近幾個月里，干了些什麼呢？

你們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背着我們向兄弟黨發出一封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件，策劃對我們採取“集體措施”。我們過去多次請求你們把這封信送給我們，你們至今不給，還欠着我們的賬。

你們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蘇共中央全會上作了反華報告，通過反華決議，叫嚷要“公開地、堅決地反擊中共領導的不正確觀點和危險行動”。



你們在今年四月三日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接着就发动了新的反华运动。仅仅四月份，据不完全的统计，你們的中央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报刊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兄弟党大肆施加压力，在兄弟党内部大搞颠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进一步同变节者、叛徒、托洛茨基分子、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相勾结。例如，你們策划志贺、铃木等人的叛党事件，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你們积极联合印度尼西亚的反动势力，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你們积极准备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們在今年三月七日給我們的信中，为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要在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六、七月召开二十六个兄弟党筹备会议，秋天举行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就暴露了你們要加快公开分裂的步骤。

我們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你們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看穿了你們要开的是一个分裂会议，所以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給你們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們在这封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并且指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总之，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們始终主张“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过去，当你們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具体建议的时候，我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提出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具体建议，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现在，当你們决心要开分裂会议的时候，我們在五月七日的信中，主张用更长的时间，克服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为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們始终反对匆匆忙忙地开会，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开来，因为这不利于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对敌。

你們过去也说过，在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之前，是不能够召开国际会议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说，如果仓促开会，“有导致分裂的危险”。现在，你們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用闪电战的方式筹备和召集国际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你們大概认为，你們的所谓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人們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們的所谓准备工作，不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准备工作，而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准备工作。你們不是为召开一个团结大会做准备，而是为召开一个分裂会议做准备。

很明显，你們的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多，你們为召开一次团结大会所设置的障碍也就越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克服这种障碍而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就越艰巨，需要的时间也就



越长，离开举行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大会的日期当然也就越远。

你們今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主张匆匆忙忙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分裂会议，这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召开一个团结大会的共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二)

你們的来信表明，你們已經为国际会议准备好了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

你們在来信中说，你們在国际会议上准备“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集中力量来找出“共同的东西”，以便“制定共同的立场”。这些话完全是骗人的。

你們的来信狂妄地声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表示要沿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坚定地前进”。你們还用威胁的口吻说，谁要是不赞成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那就是“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这就是说，你們明目张胆地要把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完成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們所说的要“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就是要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宣言和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

从你們多年以来一贯的主张和行动来看，你們来信中提出的准备强加于国际会议的主要观点，它们的修正主义实质是十分清楚的：

你們所说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設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就是要搞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大门。

你們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这就是要兄弟国家服从你們的指挥棒，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变成你們的附属国，变成你們的殖民地。

你們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这就是“议会道路”和“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你們所说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这就是取消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你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这就是不要反



对帝国主义，不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你们用“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概念，偷换了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这就是要联合被你们称为“明智派”的美国统治集团，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你们所说的什么“消除分歧”啊，什么寻找“共同的东西”啊，什么要“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啊，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强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在两次兄弟党会议的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一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在一九六〇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必须指出，你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根源。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对，并且日益破产。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就必须对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你们硬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三)

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非法地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是一整套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部署。

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你们的这一套，浸透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气味。

第一，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曾经建议由十七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你们不同意。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又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你们这次来信仍然不考虑我们的合情合理的意见，硬要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



你們想必記得，成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是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會談前夕，中共中央在給你們的信件中建議的；起草委員會的二十六个成員，是由各兄弟黨協商確定的。这二十六个兄弟黨，只是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並沒有世襲權，並不是籌備各次國際會議的常設機構的成員，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常設機構。

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已經說過，現在的情況同一九六〇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二十六个國家中，有些國家已經出現了兩個黨，究竟由哪個黨參加，我們同你們之間是有分歧的，許多兄弟黨也有不同意見。

關於國際會議籌備會議的召開和參加的成員的問題，必須由兄弟黨通過協商取得一致的意見。否則，不論召開什麼樣的籌備會議，統統都是非法的。

第二，關於中蘇兩黨會談。中國共產黨和許多兄弟黨都認為，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是召開國際會議的一個必要的準備步驟。你們過去也是這樣說的。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你們在來信中還說：“必須繼續蘇中兩黨代表雙邊會談，然後再籌備和召開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

現在，你們在來信中把中蘇兩黨會談和兄弟黨國際會議的籌備工作分割開來，對於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關於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的具體建議避而不答，只是含糊其詞地說什麼中蘇兩黨會談“可由蘇共和中共隨時協商解決”。你們分明是把中蘇兩黨會談看作是可有可無，企圖撇開中蘇兩黨會談，在中蘇兩黨沒有通過協商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來籌備和召開國際會議。這不是決心要開分裂會議，又是什麼呢？

第三，關於兄弟黨國際會議的成員。你們的來信說，參加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會議並簽署文件的黨，都可以參加這次國際會議。這是什麼意思呢？大家知道，叛徒鐵托集團參加過一九五七年會議，簽署過《和平宣言》。你們顯然是要把一九六〇年兄弟黨會議一致譴責的鐵托集團拉進兄弟黨國際會議。這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你們的來信，還在國際會議的新成員問題上提出了一個荒謬絕倫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只有擁護你們的修正主義“總路線”的黨才可以參加，同修正主義宣布決裂而重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不准參加。老實告訴你們，這是絕對行不通的。如果要召開一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團結的兄弟黨國際會議，這些重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當然有權利參加，誰也沒有權利拒絕他們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一個修正主義者的分裂會議，你們要指望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同你們一道搞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陰謀，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第四，關於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召集者。你們的來信說，蘇共負有召集國際會議的“特殊責任”，並且引證了一九五七年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但是，你們所引證的這個決議明明寫着：“委託蘇聯共產黨在和各兄弟黨協商的條件下負責召集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這就是說，必須同各兄弟黨協商，才能召集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提到由蘇共負責召集國際會



議的時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黨協商為前提的，絲毫也不意味着你們可以獨斷專行。我們還要指出，一九六〇年兄弟黨會議確立了兄弟黨協商一致的原則。因此，召集國際會議必須得到兄弟黨的一致同意，絕不能把一部分兄弟黨的意志強加于另一部分兄弟黨，硬要它們同意開會。如果你們胆敢破壞這個原則，不同所有的兄弟黨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協議，你們就根本沒有權利召集國際會議。

在上述有關籌備和召開國際會議的程序和步驟的所有問題上，世界各國兄弟黨，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都會有這樣的或那樣的意見，這些意見都應當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慮。對於這些問題，各國兄弟黨必須根據平等協商的原則，通過雙邊的或者多邊的會議，達成一致的協議。如果你們以霸主自居，下令強行籌備和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那是完全非法的，那同樣的只能表明你們決心召開一個公開分裂的會議。

(四)

幾年來，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世界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普遍地、迅速地發展壯大起來。許多國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修正主義者的分裂活動面前，挺身而出，在短短的時間里重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或小組，表現了共產主義戰士的偉大革命氣概和英勇的戰鬥精神，使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在這個鬥爭中，現代修正主義者日益暴露了自己的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面目，許多黨的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已經被革命人民拋到一邊。這一切，都同你們的願望相反，使你們感到焦慮不安，感到無限恐懼。

你們在來信中大肆攻擊我們什麼“加強派別活動和分裂活動，盡量使論戰尖銳化”，這只能表明你們被強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吓破了膽，已經到了神經錯亂、胡言亂語的地步。

目前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錫蘭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出現的分裂，都是你們推行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猖狂地進行顛覆活動和派別活動的結果。正是你們，揮舞指揮棒，硬把修正主義路線強加於一些兄弟黨，並且指使這些黨的修正主義領導者，橫蠻地排斥和迫害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甚至把他們開除出黨，造成了這些黨的分裂。既然這些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被剝奪了在黨內進行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權利，那麼，他們就只能重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來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下去。你們越是堅持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就越會有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重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同你們進行鬥爭。鬥爭的邏輯必然是這樣，也只能是這樣。

你們擺出一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法官的架勢，說重建和新成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小組和政黨都“置身于共產主義運動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們拉進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里來”。好像一切事物只要你們不承認、不批准，它們就在地球上不存在似的。這是一切



腐朽势力对待新生力量的哲学。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新生力量，都是在腐朽势力死也不肯承认的情况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不承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美帝国主义过去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现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能够阻止它们的发展。你们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照样在全世界存在和发展。你们越是恶毒地咒骂他们，就越是证明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同你们相反，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于这些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表示极大的钦佩。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不可推诿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过去我们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不管你们怎样咒骂，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们还必须警告你们，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兄弟党所进行的干涉和颠覆活动，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你们这种卑鄙的行动，只能暴露你们同反动派同流合污、破坏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丑恶面目。你们最近片面地公布了给日共中央的信件，悍然发动了对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斗争前线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的公开攻击。你们勾结美日反动派，支持日共叛徒志贺和铃木等人，颠覆日本共产党，破坏日本革命运动。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行。我们坚决支持日本共产党反对你们的干涉和颠覆活动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反对你们的破坏活动的斗争。

说到公开论战，谁都知道，那是你们自己挑起来的。想当初，你们一心要搞公开论战，怎样劝你们，你们都不听，越劝你们不要搞，你们搞得越起劲。你们满以为，只要这样搞下去，就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压倒，把他们从地球上灭掉。谁知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走向你们愿望的反面。在这场大辩论中，你们的修正主义面目很快地、有些是彻底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则是迅速地壮大了。这场大辩论，变成了清除修正主义渣滓的熔炉，预示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高涨的必将来临。现在你们怕也没有用了，扑也扑不灭了。火既然已经由你们放起来，公开论战的火焰已经燃遍了全世界，你们现在又想用纸把它包起来，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你们在来信中指責我們要“无止境地進行公開論戰”。我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對於你們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還沒有答復完，對於你們今年二月全會的反華報告和反華決議還沒有開始答復，對於你們一年來發表的三千多篇反華文章和材料保留答復的權利。只要你們堅持修正主義路線，不肯公開承認錯誤，我們就一定要把大論戰繼續進行下去。既然你們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並且堅持要把它強加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那麼，我們，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一個嚴肅的黨，理所當然地要徹底揭露和批判你們的修正主義。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對於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不徹底弄清是非，兄弟黨還有什麼團結的基礎呢，又怎麼能夠开好兄弟黨國際會議呢？



你們的來信，又一次拒絕了我們提出的雙方在自己的報刊上發表對方論戰文章和材料的建議。看來，我們的建議使你們吓得發抖。你們辯解說，你們不發表我們的材料，是為了不破壞蘇聯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誼”。這真是奇怪的邏輯。你們發表了幾千篇文章和材料，惡毒地誣蔑和謾罵中國共產黨，極盡造謠惑眾之能事，難道不是破壞中蘇友誼嗎？你們咒罵我們是什麼“假馬克思主義”、“現代托洛茨基主義”、“赤裸裸的小資產階級烏托邦主義”、“直接反蘇主義”、“反共主義”、“好戰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大漢族主義”、“霸權主義”、“北京變節者”、“現代的革命工賊”、“假革命分子”、“現今右翼社會黨人的教父”、“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結成一伙”、“同不可救藥的殖民主義者結成一伙”，等等，你們這樣大罵特罵，難道是維護中蘇友誼嗎？顯然，你們拒絕我們的建議，不敢在你們的報刊上發表我們擺事實、講道理的文章和材料，是因為你們心里明白，廣大的蘇聯人民和蘇共黨員是珍惜中蘇友誼的，是能夠明辨是非的，一旦他們看到了我們的材料，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們的日子就更加混不下去了。

你們在來信中，為了給自己壯膽，聲稱越往後越會證明你們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又為什麼這樣沉不住氣呢？為什麼這樣聲嘶力竭地咒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生力量呢？為什麼這樣迫不及待地要求停止公開論戰呢？為什麼這樣匆匆忙忙地要開國際會議呢？你們讓時間來證明我們的路線是錯誤的豈不很好嗎？說穿了，時間並不在你們方面，你們對於自己的前途喪失了信心。形勢逼人，你們的來信，理不直，氣不壯，色厲內荏，胆小如鼠，正好反映了你們的這種心理狀態。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切都是你們自己造成的。你們搬起了石頭打了自己的腳，這又能怪誰呢？

(五)

中國共產黨堅持主張召開經過充分準備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團結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堅決反對你們開分裂會議。

中共中央莊嚴地聲明：我們決不參加你們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會議和它的籌備會議。

誰都能夠看到，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是這樣嚴重，爭論是這樣劇烈，如果急急忙忙地召開國際會議，只會開壞，不會開好。如果你們不顧我們的嚴正警告，拋棄協商一致的原則，一定要非法地、片面地召開國際會議，那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公開分裂。

自從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到一九五七年，一共有十四年。在這段時間里，一直沒有開過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國際會議。這並沒有妨礙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相反的，在這十四年中，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東歐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各種類型的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他國家的革命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經驗證明，對於各國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是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



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使本国人民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凡是不这样做的，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一九五七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已经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一九五七年的兄弟党会议，制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但是你们在这次会议以后不久，就把宣言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大肆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綫，并且把它强加于兄弟党。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我們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綫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但是你们仍然毫不悔改，又把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坚持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召开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呢？

所以我们說，“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說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來說，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們，十分不团结，意見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轉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謂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像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謂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說了話不算数，岂不貽笑千古嗎？这叫做騎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設了陷阱，自己滾下去，落得个一命嗚呼。不开吧，人們会說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絕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絕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嗎？我們坚信，你们的所謂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們：我們願意再一次誠懇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虛伪的无用的所謂“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絕路，那就請便吧！那时我們只好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归来”。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六月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倡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



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議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綱領。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問題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問題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見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迴避誠实而直率的談話，避免把自己的錯誤綱領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进行对比。

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只会“吵架一場，无結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問題，才会事先預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綫，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誰进行譴責，給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負責任的指責，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終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议的兄弟党，坚决拒絕这种路綫，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來說，会议問題是同维护和加强我們运动的团结問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們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須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經产生的困难的途徑。各兄弟党沒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換意見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場，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的路綫。

共产主义运动中熾烈燃起的給它带来了不少損失的分歧和爭論，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討論和解决各項迫切問題，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貢獻。正是会议將給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見，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綫和共同決議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議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則，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們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認真討論爭論問題的路綫，这种討論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則基础上的团结。我們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碼的誠意，准备善意地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見，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徑。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像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願望，带着建設性的綱領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轉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論战过程中，各党之間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問題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問題上出現了一系列原則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因此，不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結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預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問題达成協議：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見，在发现立場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領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階級敌人高兴的行动。試問，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們认为，我們建議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則和原則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



的。問題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议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来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议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像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



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特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议。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



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诋毁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願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願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



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谣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你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代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



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商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一九六〇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而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彭 真

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祝贺这次京剧改革的胜利，祝贺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的胜利。

现代戏有好多种，好莱坞演的也是“现代戏”，现代修正主义者演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是“现代戏”。我们演的是革命的现代戏，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现代戏。

过去京剧的很多戏老是演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等等，美化剥削阶级，丑化劳动人民，只是很少地演一点革命的现代戏。京剧过去长期基本上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京剧改革，过去搞过多次，也有一部分戏是改得成功的。但是，像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这样全面、系统、有丰富内容、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改革，还是第一次。这是京剧的革命。

现在，研究京剧要从两方面来看。从内容上讲，过去很多戏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这类戏是占统治地位的，非改革不行。也有一小部分内容较好的历史剧和现代剧，要继续加工。从艺术形式上讲，京剧是一个历史比较久、艺术水准比较高、程式比较严格的剧种，改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改革好了，又是很有前途的。现在这么多同志、朋友下决心来改革它，来革命，革命的结果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判断这个革命是胜利的。把京剧这个过去基本上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艺术，改革成为一个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情，是一场大革命。这个革命，现在已经取得初步胜利。我们祝贺这次改革的胜利，并且向诸位表示深切的感谢。

今后的问题是：如何把京剧革命坚持到底，如何把京剧改革好。

在京剧应不应该改革和怎样系统地、全面地把京剧改革好的问题上，还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善意的，是建设性的。也有一小部分意见是根本不赞成改革的。他

* 这篇文章是根据彭真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整理而成的。



們說：“這叫什麼京戲？水袖沒有了，髻口也沒有了，這簡直是胡鬧。”所以，問題還不少。同志們不要以為這樣一次觀摩演出，問題就都解決了，革命就完全成功了，沒有那回事。所以，對於一些問題，還是得讲讲，提出來商量商量。

第一個問題：京劇需不需要改革？怎樣改革？

一定要改革，非改革好不可。從五個方面來談談。

一、**為社會主義服務，還是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服務。**文藝要為政治服務，要為生產力的發展服務。現在我們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我們的京劇，應該為誰服務呢？應該演什麼戲呢？是為社會主義服務，即演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戲，還是演有利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戲？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問題很清楚，如果不是想要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復辟，或者對它們留戀，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怎麼能老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這些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戲呢？皇帝佬是什麼？皇帝佬就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地主頭子。皇后是什麼？就是地主婆頭子。當然，過去京劇里也演一點勞動人民，但是大部分是被歪曲、被丑化了。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里，怎麼能夠允許京劇這麼一種重要的劇種，藝術水準比較高的一種劇種，我們藝術上一項重要的遺產，老這樣帝王將相的演下去？繼續演那些不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東西？那不行。那樣，客觀上就是幫助封建勢力進行封建主義復辟活動，幫助資本主義勢力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所以，京劇非改不行。京劇要就是滅亡，要就是主要演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兩條道路選一條，沒有第三條道路。

二、**為多數人服務，還是為少數人服務。**京劇是為工農兵（包括革命的知識分子）服務，還是為舊社會的“遺老”、“遺少”服務，為地富反壞右服務？是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服務，還是為百分之几的人服務？是為六億几千萬人服務，還是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几的几百萬、几千萬人服務？過去，統治舞台的總是那百分之几的人。現在，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樣的國家里，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工作者，京劇藝術戰綫上的戰士，究竟站在哪一邊？是站在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這一邊，站在工農兵這一邊，也就是站在社會主義這一邊，還是站在我們的敵人地富反壞右那一邊？我看在座的人中間想站在那一邊的人，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是絕大多數人總是不願意站在地富反壞右那一邊的。

工農兵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對京劇老演帝王將相而不演革命的現代戲很不滿意，早已表示了態度。表示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不買你的票。舊京劇的上座率不如若干地方劇種，就



是因为这些剧种演了革命的现代戏。那些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京剧剧场，经常是冷清清的。京剧的艺术水准不是比较高吗？不是有些全国闻名的演员吗？不是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吗？但是，卖票却卖不过有些地方戏。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群众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京剧非改革不可，不改革我就不看了。那么多群众不看，那么多青年不看，只有少数五、六十岁的人和一些京戏迷去看，照这样下去，京剧二十年不亡，四十年会亡；四十年不亡，六十年也要亡个差不多。工农群众、青年都表示态度了，你还不改，老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不是让京剧坐以待毙么？再说，我们的戏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可是人民群众又不看，不改还等什么呀？我看非改不可，不改就没有出路。

三、演死人还是演活人。京剧演活人少，并且有那么一种理论：京剧演活人演不像，或者说很不容易像；演死人，时代离现在越远，就越演得像。这很奇怪。演《霸王别姬》，你见过霸王，还是见过虞姬？你怎么知道像呀？说演古人那么像，横直你也没有见过，我们也没有见过，你说像就算像吧！为什么一定要说京剧演工农兵就不能演得像呢？演现代人至少有个模子，工人、农民、战士，就是个模型，哪里不像再去看看、学学，总有像的可能。说京剧演活人不像，只有演死人才像，这种反对京剧改革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六亿几千万工农群众(包括革命的士兵，即拿枪的工农)的伟大革命斗争，这么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么雄伟的建设事业，还不值得我们表演？就是那么几个死人值得我们表演？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你不去演，老演封建主义的死人。难道我们的革命英雄人物，英勇的革命群众，值不得我们反映？值不得描写？值不得写在笔下？值不得搬上舞台？值不得谱入音乐？值不得画入图画？对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感兴趣，可是，对那么几个谁都没有见过的已经死去很久的古人，——地主头子、地主婆头子，或者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才子佳人”，倒是那么有兴趣，这岂不是怪事？其实也不怪，这里边牵涉到一个为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服务，还是为百分之几的人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问题。现在，想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的人确实也有，但毕竟是少数。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提倡为封建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会马上遭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打击，不见得有多少人有那么大的胆量。于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变一个相，专演古人。也有从事过话剧的个别入这样说：你看，我演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可是那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死资产阶级；我演的虽然是封建主义的人物，可是那是死了很久的封建主义人物。有极少数人企图用这样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来腐蚀我们人民的精神，毒化我们的青年。客观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当然，演这类戏的绝大多数人是不自觉的，因为原来在科班或者跟老师学戏的时候，就是学的这些戏，现在纵然心里不想演，又不会演别的。至于极少数人，你说他一点不自觉，我怀



疑。如果他不自觉，为什么对京剧改革那么仇视？咱们不是有个歌子叫《社会主义好》吗？他说不是， he 说是“封建主义好”、“资本主义好”。他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你看舞台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多好啊！他是要唱那个歌子的。所以，演死人、演活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死人、活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是个反映阶级性、反映政治方向、反映道路的问题。这话说得不对吗？有些人喜欢多演洋人、古人的戏，列宁是洋人、古人，为什么关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戏，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好的外国戏，演得也很少呢？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笼统地反对演历史剧。我们反对演死人，是反对演那种鼓吹封建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美化剥削阶级的死人。至于那些长劳动人民志气、灭剥削阶级威风、有利于人民事业、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剧，代表中国人民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戏，当然可以演。但是，问题是，重点应该放在演革命的现代戏上，放在演在斗争中的人民群众的活人，演在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活人上。前两年，我曾向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提过，你们拿百分之几的时间演死人、演洋人，百分之九十几的时间演中国的革命现代戏好不好？建议他们考虑一下。我不是说历史剧一概不能演，而是说重点要放在演活人，演工农兵，演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对敌斗争的现代戏上。

京剧界有人说，演革命的现代戏是一阵风。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阵风很大，刮起来没有头。除非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现代修正主义者当家，这股风绝不会过去。京剧界的同志们、朋友们，我想你们最近可以把那些古人戏稍微拦一拦，集中精力突破现代戏这一关比较好。你们搞了那么多年，搞成习惯了，总觉得演那些戏顺手得很，一演现代戏就感觉手足无措，觉得困难得很。问题是还没有摸出一套，还不熟，熟了就好了。索性搞那么一段时期，把现代的革命戏演顺了手，那时，再同时演一部分古代人的戏也好。我看不这样搞一个时期，革命的现代戏巩固不了。

四、内容和形式问题。京剧的内容应该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前面已经讲过。但是，革命的内容应该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统一起来。改革的困难也在这里。京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演古代有它的一套了，演现代的工农兵还没有形成一套。这次创造了一些，但还只是取得了初步经验，还需要继续总结经验，继续创造，继续改进。

革命的内容要和京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统一起来，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京剧的程式要不要改革？京剧的程式原来是演古人的，而现在主要是要演现代人，演工农兵，那么势必要有所改革。无论音乐、唱、念、做、打，都要改革。拒绝改革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工农兵。

另一个问题是，对别的艺术的好的东西要不要吸收？京剧原来就是吸收别的剧种的好东西创造发展起来的。原来就是那么起家的，现在为什么连好的东西也不学习不吸收了呢？应该吸收。当然，吸收的结果，仍然应该保持一个统一的京剧艺术的风格。就是说京剧还是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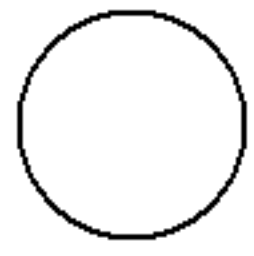
剧。不要搞成个“四不像”。譬如，人吃东西，只要有营养的，什么都可以吃，吃了以后，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骨肉等。如果京剧改革的结果，爱好京剧的人都不喜欢了，那总不能說我們的改革是成功了。

五、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问题。所谓战略上藐视，就是我们坚信京剧一定能改革好，要藐视那些反对京剧改革的人。有些人不是反对京剧改革吗？这种人背对着社会主义，面向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群众就看不起他们，是完全对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他要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六亿多看戏的人喜欢看演活人的戏，他却专爱演死人。他脱离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有什么了不起？

战术上，同志们可就不要马马虎虎，必须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以至于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就连每一句唱、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十分重视。演工人就要像工人，演农民就要像农民，演兵就要像兵，演什么就要像什么。又要像京剧，又要演什么像什么，这就困难了，不重视就搞不好。京剧改革这么一个大的文化革命斗争，必须注意质量，不要粗制滥造。京剧改革不能像糖炒栗子，倒在锅里现炒现卖。也不能像吃爆肚，把羊肚往锅里一爆拿出来就吃。这件事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得尽善尽美的。就拿现存的一些传统戏来说，你晓得经过多少人的手，经过多少次改革，多少次加工。我们现在搞的是崭新的事业，是演工农兵。过去京剧舞台上不演他们，而现在我们要演他们并且要演好，会那么容易吗？所以，必须要重视。不要以为一下就能够改得那么合适。不可能。改得基本上好，就很好了。只要是革命的就好。至于内容上艺术上有些不够的地方，再继续不断地加工就是了。

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可能不发生争论。有不同意见，有争论，这是合理的。原来都是演古人的，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一改革，忽然一下子演革命的现代戏，什么意见都没有，那才奇怪哩。

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怎么办？应该同志式地进行讨论研究，互相帮助把它搞好。不要因为革命的现代戏有那么一点毛病，就一脚把它踩死，一棒子把它打死。我们大家要爱护这朵新开的鲜艳的花。有争论不要紧，只要是真正赞成改革的，各种善意的意见，大家应当彼此倾听，共同讨论。有意见要当面说清楚，不要放冷箭。要养成这么一种作风。过去京剧界你一伙，我一伙，“班子气”、“行会气”是相当重的。这种恶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现在一下子都搞光了？也不见得。你演一个戏，我背后拆你的台；我演一个戏，你背后拆我的台。反正各有各的一伙，就是不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大伙，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一大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快七亿人口了，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大家搞一个大团结不好吗？有些人对这个大团结不过瘾，非要搞他的小团结才过瘾。我劝这些同志、朋友，



把圈子搞大一点。

这就是京剧要不要改和怎么样改的问题。我提出以上几点意见，请大家考虑。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

第二个问题，要保证京剧改革好，有些什么事情必须要做？有些什么前提？

前提有两条：

一、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这就是说，京剧的改革也要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这样，才能有好作品，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才能演得好。你根本没有跟工农兵在一块生活过，不熟悉工农兵，就想在舞台上塑造他们的英雄形象，那怎么行？你光跟工农兵一块生活还不行，还要把工农兵中间的那些英雄人物的优点集中起来，在舞台上塑造出他们的典型形象。所以，京剧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工农兵，要到工厂去，到生产队去，到连队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有些同志，有些朋友，到工厂、生产队、连队里去了一个短短的时间就觉得收益不小，如果你搞上一年、两年或几年，收获岂不更大？首都作家、剧作者很多，可是出的剧本不多。为什么？主要的就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机关里一蹲，不下工厂、生产队、连队，怎么会有好的作品？好作品怎么会多？当然不可能多。有些戏，角色表演得还不大像，导演得还不大像，主要是因为导演、演员没有跟工农兵在一块生活过，或者生活的時間很短。

要深入工农兵并不那么简单。短短地下去那么几天，作作客，比较容易，真正要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建立血肉联系可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跟工农兵一条心，跟无产阶级一条心，跟贫下中农一条心，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大家都必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但你们，就是我们党的工作者，党的中央委员，如果下去，一开始就指手划脚，不是先当群众的小学生向大家请教，那么农民、工人也是有话不肯讲的。许多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虽然他们跟工农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还是要尽可能地下去蹲点，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甘心当小学生，那么京剧工作者下乡，下工厂，下连队，不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行吗？也要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当然，年老的、体弱的，不要勉强他们去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有机会参观参观也好嘛。青年、壮年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和我们党的工作者一样，和其他方面的工作者一样，跟工农兵一起生活。

京剧改革要成功，这是一个前提。

二、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就是要革命化，要无产阶级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一



致，这叫做“化”。必须要内心革命化。不但革命化那么一段段，要彻头彻尾都革命化。这可不容易呀！你演的是革命的现代戏，如果你的思想没有革命化，没有无产阶级化，怎么能编得好？怎么能导演得好？怎么能演得好？如果你的思想没有革命化，也不可能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建立血肉联系。你一脑袋封建地主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怎么能跟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呢？怎么能跟他们建立血肉联系呢？所以，要演革命的现代戏，首先思想必须革命化。要下决心改造和提高自己。只要下决心革命，就好办了。今天变一点，明天变一点，革命思想就越变越多，到时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得很清楚。我建议同志们再去好好读一读这个讲话。

老实说，有一部分人现在是很矛盾的，身子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可是脑袋还留在封建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里。身体和脑袋处在两个地方，把脖子扯得那末长，你看难过不难过？吃的社会主义的饭，穿的社会主义的衣，一切生活都是社会主义供应，工农兵供应，可是就是不演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戏，思想还是封建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所以矛盾得很。他自己这样也就算了，可是他还按照他的面貌，企图利用京剧来改造世界，反对我们演革命的现代戏。这就很不好了。怎么办？还是劝这样的人，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连脑袋一块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来好。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要“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为什么重新教育人呢？就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重新组织什么样的革命队伍呢？重新组织社会主义的革命队伍。很多人过去对民主革命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得不够，甚至根本没有准备。我们过去也没有在全国系统地、全面地在一切方面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全国城乡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要这样一直地抓下去，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地前进，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越搞越好，而且可以真正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们这里不会出修正主义。如果不好好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义。老实讲，文艺界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决不比其他方面少。所以，在文艺战线方面，要进行整风，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家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自己检查清理一下过去几年自己写了些什么作品，演了些什么戏，拍了些什么电影，唱了些什么歌子，奏了些什么音乐，画了些什么画，有哪些作品，哪些东西，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带有资产阶级残余影响的，或者是封建主义的。发现错误、缺点，改掉就好了！文艺界都要这样做，京剧界也不例外。大家都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统统肃清掉。只要这样，我敢断定，京剧改革一定能够改革好，京剧一定有光辉的、伟大的前途。



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十年

· 朱 其 文 ·

从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以来，整整十年了。十年前，当越南国土上刚刚恢复和平的时候，呈现在越南人民面前的，是一幅经历了殖民主义者长期的侵略战争破坏的经济衰竭、疮痍满目的景象。当时，胡志明主席向越南人民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我们已胜利，但和平还没有巩固，统一、独立和民主还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以便达到上述目的。同时，我们要时刻警惕提防敌人破坏我们共同事业的阴谋”，“我们的工作虽然繁重和困难，但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因为我们有决心，因为世界进步人民支持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胜利。”十年来，英雄的越南人民为实现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号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取得了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使越南北方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和平恢复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即进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越南人民医治了战争创伤，农业生产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工业生产接

近了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水平。在此期间，也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一千多万劳动农民分到了土地和耕牛。越南北方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成为自己的生活的

主人。当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年尾完成后，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领导越南北方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而斗争。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的三年中，越南北方一千一百万劳动农民自愿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基本上组织了起来；根据“使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断地壮大并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占了绝对优势。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从根本上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基础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三年多来，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光辉照耀下，根据正确的路线和快、猛、稳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一九六一——一九六五）而奋斗，使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到一九六三年，越南北方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点五一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高级社占三分之一。从一九六一年以来的三年多时间内，越南北方建设了各种水利工程，使灌溉的土地达到二百四十三万四千五百公顷，开垦了三十万公顷以上的荒地，发展了各种肥料和改良农具的生产。国家加强了对农民的支援，努力增加合作社资金来源以建设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尽管三年来风、水、旱灾害频繁，农业生产仍然全面、稳步地发展。与一九三九年比较，粮食产量增加了两倍多，畜牧业增加了将近一倍，经济作物总产值增加六倍。越南北方的农业正在迅速地发展着，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牢固基础。

在工业方面，越南北方的工厂企业，已经从一九五四年只有四十一个残破不堪的工厂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个（其中有二百一十七个大工厂）。重工业部门的机器制造、电力、冶金、化工、采矿等各个重要生产单位也逐步建立起来，国内所需要的大部分消费品已能自己生产，根本改变了解放前连火柴、钮扣都要依赖进口的落后状态。到一九六二年，国营工业的产值占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四，国营运输量占总货运量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二，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零售额占纯商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

八十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居于领导地位。

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同过去比较，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职工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越南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是文盲，今天，在越南北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已经能读会写。与和平恢复初期比较，普通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倍半；大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十四倍。一些少数民族有了本民族的文字，大批少数民族的青年已经在大学毕业。医务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控制了許多疫症和旧社会的流行疾病，增进了人民的健康。儿童日益获得周到的关怀。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愈来愈进步，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性的文学艺术日益蓬勃地发展。

越南民主共和国过去的十年，正如胡志明主席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越南第一次特别政治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迈出了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巨大步伐”，“是进行艰苦斗争和取得辉煌胜利的十年”。

* * *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北方人民在建设中国一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革命精神。在和平恢复后，越南人民面对着一个饱经战争破坏，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怎样开始进行恢复和建设的步伐呢？是主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还是主要依赖外援？越南劳动党从越南的具体情况出发，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地主张依靠广大群众，继承



过去在战争年代中越南人民依靠自力更生击败敌人的革命传统，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同时正确地运用兄弟国家的援助，大力推进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在和平恢复初期的一九五五年，胡志明主席在一次报告中就明确地指出：“像在抗战时期一样，我们当前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接受各兄弟国家的援助为辅。”

越南劳动党根据自力更生、依靠群众的原则，正确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国民经济中，工业占主导地位，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胡志明主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越南劳动党三届五中全会和七中全会上一再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供给充分的粮食和原料来发展工业，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农业是个极其重要的工作。”一九六三年四月，越南劳动党三届八中全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也指出：“必须进一步贯彻全面、猛、稳地发展农业的方针，集中力量努力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有更好的转变，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中农产品的消费数量，同时进一步增加为工业、出口等服务的农业商品数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更有利的基础。”这一决议同时指出，必须“使工业有新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更好地满足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越南劳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安排了工农

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保证了工农业获得迅速的发展。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越南北方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八，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三，粮食产量(折合稻谷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这种速度在越南历史上是空前的。

越南北方人民在自力更生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祖国，到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在生产中发挥出了无穷的智慧和创造性，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事迹。如工业战线上的“沿海”机器厂和农业战线上的“大丰”农业社，成为全越南北方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的两面红旗，整个越南北方都在掀起“学沿海、赶沿海”，“学大丰、赶大丰”的群众运动。

由于越南北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广泛地动员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加快了越南北方的建设速度，锻炼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的意志和能力。越南北方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愈来愈坚信党所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引导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繁荣富强的最正确最可靠的道路。

越南劳动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并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认为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场为彻底解决谁战胜谁、消灭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尖锐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这个



斗争中，党为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及其对社会生活和生产习惯的影响作斗争，同时，时刻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阴谋提高警惕。越南劳动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干部和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把提高人的政治觉悟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工作。胡志明主席曾经指出：“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的人。……要想成为社会主义的人，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精神，必须反对个人主义，必须有当家做主的思想”，他还强调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应该使社会主义思想完全胜利，个人主义思想完全失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在传达越南劳动党三届八中全会决议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争取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不懈地进行深刻的、彻底的思想工作，目的在于以坚定的革命立场武装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无产阶级观点，进一步加强党和群众的革命组织的战斗力。”在这一讲话中，黎笋同志全面阐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关心群众物质利益和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他强调指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就不应该以物质利益、以享受来作为革命动机，用它来代替自己的理想。党员和劳动青年团员目前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透彻领悟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是，为全体人民创造温暖、幸福的生活，为建设一个富强的越南而奋斗，更加需要发挥战斗的先锋作用，发扬革命品质和革命道德，坚决不让个人打算的思想作祟，使我们的革命热情衰退，战斗意志低落。”

越南劳动党正是本着这种原则精神，不

断坚持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去年十二月越南劳动党在三届九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几项任务：（一）使干部和党员深刻认识和领会党的路线。（二）继续坚定干部和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特别要反对个人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根子。（三）加强干部和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同时尽力健全支部，使支部日益成为党的坚固堡垒，成为经常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培养共产党人道德品质的地方。（四）组织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积极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党内生活中，越南劳动党经常通过组织学习、整训、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实际斗争中和生产劳动中进行锻炼等，来提高党员思想和政治上的觉悟，向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在工农群众中，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通过各种组织形式，结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经常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越南劳动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向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教育人们不要忘记对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仇恨，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热爱社会主义，为北方的建设和支援南方而坚持革命斗争。目前，越南北方工业、国营经济各部门都热火朝天地准备开展“三立三反”（即提高责任感、改进管理、改进技术和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农村中开展“改进农业社管理，改进技术，全面、猛、稳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运动；最近，越南北方人民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一个人做两个人



工作”的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群众运动。

越南劳动党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保持了党在过去长期的战争年代中所树立起来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传统和风尚，经常教育干部和党员保持革命者的本色。在和平恢复初期，当越南北方广大干部、军队人员深入农村进行土改和进驻接管城市的时候，胡志明主席就及时地向进行土改工作的干部指出，要不怕吃苦，不躲避最艰苦的任务，要“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的心理”，“老老实实地做到三同”；同时，也谆谆告诫进城市的干部认清长期为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城市的复杂情况，警惕那些“诱人的、使人腐化堕落的因素”，正确执行十项纪律。十年来，越南劳动党和政府经常在干部和人民中展开各种宣传运动，使干部和人民永远记住过去艰苦岁月的生活，记住祖国尚未统一，南方人民正在进行异常艰苦的斗争，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保持革命品质和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俗。

越南北方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刻骨铭心地记取了党的这些有益教诲，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和各个工作岗位上，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了艰苦朴素、兢兢业业的革命风尚。从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政府的领导干部直到基层工作的干部和党员，在个人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都十分俭朴。为了加速国家内部资金的积累和集中资金、物力用于建设事业，对于一切非生产性的建设都力求从俭。广大干部还经常参加各种劳动和组织机关生产，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些作法，博得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密切了党和政府同广大群众的关系，使全北方人民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贡献力量。

* * *

十年来，越南北方人民，在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破坏日内瓦协议、加紧侵略越南南方和对越南北方进行颠覆、破坏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它所走过的道路，不是宁静和平坦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达成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履行了有关规定，并为实现日内瓦协议关于保证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奋斗。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开始就疯狂地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并且悍然对越南南方人民发动了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直以种种办法如派遣间谍、别动队和土匪潜入越南北方，同北方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尤其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和各种剥削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勾结，在北方进行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企图把越南南方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变成美国侵略越南北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基地，企图在越南北方恢复过去的殖民制度和封建制度。

由于自己的祖国还处于被人为地分裂、领土遭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蹂躏和威胁，越南北方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支援苦难深重的南方同胞的爱国斗争。胡志明主席多次申明：“我国一天还未统一，我国全体同胞就必



須坚决斗争一天，以实现南北一家，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越南革命，负有两个互相密切联系、互相推动的战略任务：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促进南方的民族、人民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两个任务是为了解决全国的总的矛盾——人民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实现当前总的目标：和平统一祖国。

十年来，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维护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它不断地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越南南方人民施行的残暴统治和战争罪行进行坚决的揭露和谴责。它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称之为“祖国的铜墙铁壁”。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常组织北方人民开展以支援“南方骨肉”同胞为内容的生产竞赛运动和各项政治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并经常教育北方人民提高警惕，保卫北方的建设事业，对入侵的美伪别动队进行了坚决的惩处，给予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阴谋以沉重的打击。

现在，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南方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越战越强，越战越胜。他们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民动员，军民合作，胜利地粉碎敌人的“扫荡”，不断地袭击敌人的据点，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南方军民进行了近六万四千次大小规模的战斗，使三十二万三千

多名敌军（其中包括二千二百八十一名美国侵略者）被消灭或丧失战斗力。越南南方人民的艰苦斗争已获得丰硕的果实，在全南方，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四分之三的土地获得了解放，并且已有一百五十万公顷的耕地分给了农民。今年七月二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主席团就日内瓦协议十周年发表告人民书指出：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战争，目前“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力量对比正日益朝着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告人民书又指出：“我国人民十年来在反对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挑拨者的坚强不屈的斗争中取得的辉煌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时代的伟大真理。在当前的世界条件下，尽管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但是当它们站起来，团结一致，并按照正确的路线来为独立和和平而奋斗的时候，它们就会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卖国走狗的强大的军队，击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一切侵略阴谋，不管它们是老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我们亲爱的南方定将获得解放，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定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力地鼓舞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特别是东南亚被压迫民族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意志，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贡献。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越南南方的败局，曾不断更换走狗和侵略越南南方的美国军政人员，叫嚣要加强侵略战争。对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



出了严正的警告。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公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十年来为执行日内瓦协议，争取和平统一越南而斗争的声明”，声明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粗暴地破坏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严重罪行，指出美帝国主义极力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企图长期分割越南，把越南南方变为美国的新殖民地军事基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强挑衅和破坏，威胁要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把战争扩大到北方”的阴谋。声明严正指出，如果美国好战集团及其走狗敢于冒险侵犯越南北方，越南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坚决起来粉碎它们对越南北方的侵略，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击败它们。声明提出：“面临着当前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所造成的极其危险的局势，解决越南南方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曾经明确指出的以下三点：一、美国政府以及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参加国政府应当正确履行日内瓦协议，尊重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越南的内政。南越政权应当像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样地严正履行日内瓦协议中关于军事方面的十分重要的条款，即：不同外国建立军事同盟，不准许外国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不准许外国军事人员进入越南。二、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它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必须撤出它在越南南方的军队和武器，让越南南方人民按照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自行解决越南南方的事务。这个纲领包括越南南方人民关于民族民主和民生方面的权利的一切重大政策以及和平和中立的对外政

策。三、越南的和平统一问题是越南民族自己的事情。这个问题将根据越南祖国战线的纲领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的精神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越南劳动党中央就日内瓦协议十周年发出指示，决定从七月十四日到七月二十日在越南北方各地举行反美斗争周，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斗争，粉碎美国扩大战争阴谋，号召越南北方人民努力建设和保卫北方，积极支援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

* * *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和对外活动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在印度支那、东南亚有着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哨，对于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以及维护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起着重大的作用。胡志明主席在越南首次特别政治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坚决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斗争；实行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支持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从这一正确的外交政策出发，坚持维护和实施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立场和政策，为维护印度支那和平而采取一系列



的正确措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基础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亚洲、非洲一系列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日益增强，国际威望日益增长。

越南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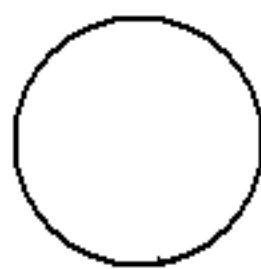
越南劳动党一贯坚决揭露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叛徒面目，指出在“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狗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勾当中，“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扮演了一个极其卑鄙的角色。”

越南劳动党三届九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两条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和进行的剧烈阶级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密切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为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事业的前途。现代修正主义歪曲和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声明的革命原则；它们主张实行阶级妥协政策、同帝国主义无原则的合作政策，抹煞我、友、敌之间的界限，破坏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分裂社会主义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黎笋同志在越南劳动党三届九中全会上所作的《我党国际任务中的若干问题》讲话中，阐明了越南劳动党对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立场和主张。他指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为了大力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为了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党，保卫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但如何才能有效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呢？如何才能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致于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呢？这就是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进行的思想斗争，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的发展来击败现代修正主义。因为这个革命斗争事业的发展将会最有力地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毫无根据的、反科学的和有害的论调，使这些论调破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团结，对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相信，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历史的客观产物，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摧毁的。因此，我党的态度是：第一，分清是非，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第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团结。”

黎笋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越南劳动党为在国际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也要十分注



意在越南劳动党内防止现代修正主义影响和侵蚀。他说：“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是长期、艰苦、复杂的。我党必须高度警惕。为了有效地抵制现代修正主义对我党的侵蚀，我们必须做到，无论情况发生什么变化，都不能使修正主义获得生长的土壤”。他强调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革命运动中的严重祸害，因为它一旦侵入我党内，就会腐蚀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它将变成敌对阶级的得力走卒和帝国主义的客观同盟军。我们不能不像仇恨帝国主义那样来仇恨现代修正主义”。

越南劳动党的这种对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正确主张，赢得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各国革命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 * *

越南劳动党从它诞生以来的三十四年间，领导越南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八月革命的历史性的光辉胜利。自一九五四年和平恢复以来，又领导越南北方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是一个久经革命斗争锻炼、富有革命斗争传统，一贯保持艰苦朴素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作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不断引导越南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英雄的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将会获得更加辉煌灿烂的成就。

中国人民由衷地钦佩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热烈地欢呼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坚决支援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始终把兄弟的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和建设事业中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都看作是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和援助。长期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我们中越两党、两国的这种亲密关系，正如胡志明主席所说的：“恩深，义重，情长”。也正如刘少奇主席所指出的：“我们两国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是经得起任何风暴的考验的。”我们坚信，今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的这种战斗友谊，必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更 正

本刊今年第12期第6页倒数第6行“罗兰、霍尔斯特和亨里特”应为“亨里特·罗兰·霍尔斯特”；第21页左栏第8行“某些少数民族……”，“某些”二字应删去，特此更正。



培养接班人是革命事业的 千年万年大計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着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担负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的，必须作长远打算。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决心。就是说，为了搬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共产党人准备像愚公那样，一代搬不完，下一代接着干。在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比民主革命更伟大、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这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在国际上，我们还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这个任务，当然不是一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能完成的，它需要许多代人的相继努力，需要由革命化的年轻一代来接替。

从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来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把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的蜕化变质上。谁能够说他们的这种想法一点根据也没有呢？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既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一种前途，而是有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革命事业由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接替，坚持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能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进而实现共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页。



产主义。如果让那些滿腦子剝削階級意識、修正主义思想、不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領導权，或者由于我們不注意教育和培养，让那些受了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侵蝕的年輕人來接班，那就会使革命半途而廢，使社会主义向資本主义“和平演变”，出現資本主义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經有了这样的教訓。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腐蝕年輕一代的革命意志，使他們成为只知道追求个人享受、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小姐貴妇。这样的人，当然只会接剝削階級之班，而不可能接无产階級之班。

在我們国内，在各个領域中，都还存在着階級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階級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資產階級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他們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样，也千方百计地同我們无产階級爭夺年輕的一代，竭力要把年輕的一代拉到不革命和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去。有些基层单位的領導权被篡夺，或者干部蜕化变质的事实告訴我們：一个单位的領導权如果不是掌握在无产階級革命家的手中，而是被新旧資產階級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所篡夺、所掌握，这个单位就势必要成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出没猖獗之地，成为贪污盜窃、投机倒把、生活腐化等等丑事的藏污納垢之所。資本主义的泛濫，必然使社会主义經濟遭到破坏，必然使这些单位中一部分年輕人走上腐化墮落的邪路，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損失。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們的严重警惕。

在我們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導。毛泽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經驗，并且研究了其他国家正面和反面的經驗，提出了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系統的理论和政策，坚持要在經濟战綫上、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巩固无产階級专政。这是我們能够防止資本主义复辟，使年輕一代永远革命、永不变质的最根本的保证。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了保证我們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顏色，我們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綫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断地做好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使各地区、各部門所有单位的領導权，一代接一代地，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階級革命家手中，才能确有把握地杜絕修正主义的感染，使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由此可知，培养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一条重要經驗，是保证我們党和国家不改变顏色的一項帶根本性的革命措施。正如《关于赫魯曉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訓》一文中所指出的，“培养无产階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問題，从根本上来說，就是老一代无产階級革命家所开創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



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正因为这样，对于我们革命者来说，重视还是不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有没有政治远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和这种观念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有没有革命责任感和这种责任感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有好多基层单位的干部，由于他们具有政治远见和对革命的负责精神，已经认真地抓了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分析了情况，发现了问题，采取了办法，使党员和干部队伍增添了新血液，领导班子补充了生力军。例如：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七名支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有四十一岁。北京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生产大队，六十一名党员中，四十岁以上的有三十三名，占百分之五十七。鉴于这种情况，何屯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提出了再过十年、二十年怎么办，由谁来接班的问题；一渡河大队党支部提出了补充新血液，培养支部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及时，并且具有普遍意义。

因为，像宇宙万物要新陈代谢一样，我们的革命队伍，也要由年轻的一代接替年长的一代，才能永远保持和提高战斗力，才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革命者应该自觉地遵从这一自然规律，积极培养年轻一代中的优秀力量，使党员和干部的队伍、使领导力量不断补充新血液，新骨干。现在我们许多基层单位，也像何屯大队和一渡河大队一样，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已经是四十岁以上；党员的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的，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当然，四十多岁，还是壮年，工作的潜力还很大。但是，从“再过十年、二十年怎么办？”来考虑，培养接班人、增添新血液，就是应当引起重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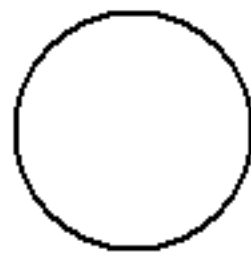
老一代的革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为革命事业尽了自己的力量，受到群众的尊重。他们在过去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下，经受过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他们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比较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懂得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老一代的干部一定要有“老当益壮”的精神，争取为人民多做工作。同时也要看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革命的路程却极其长远，必须从长计议，把革命工作看作是长途的接力赛跑，准备把革命事业移交给年轻的一代。毛泽东同志曾对青年说：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归根結底是你們的。”^① 這句話，指明了年輕的一代負有掌握世界命運的光榮使命，同時也意味着老一代革命者負有培養新人的重大責任。老一代的幹部，要高瞻遠矚，多為革命事業的前途著想，為十年、二十年以後以至更遠的將來著想，把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工作看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把艱巨的革命任務，把光榮的革命傳統，把豐富的革命經驗，及時地傳授給年輕的一代，親自幫助他們成長起來，看著他們高高地舉起了革命的紅旗，挑起了革命的重擔，才算是盡了自己最後的責任。

我們不是常說，領導者要善於做人的工作嗎？做人的工作，主要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調動廣大群眾的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保證各項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按照黨的方針政策順利發展。在這項工作中，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應該占著重要的位置。毛澤東同志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幹部和領袖。”^② 只有不斷地從年輕一代中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材，加強和充實各個基層單位的領導力量，使它們真正成為健全的、精干的、富有革命朝氣和旺盛戰鬥力的司令部，才能持久不懈地調動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保證各項工作不只是在目前而且在將來都能順利發展。一個單位，如果其他工作都做了，而唯獨沒有做培養人材的工作，從目前來看工作取得了成績，但是從長遠來看，卻沒有可靠的年輕人來接班，那就是沒有做好人的工作，沒有做好黨的建設工作。

革命接班人的培養，不是幾天、幾個月就能做好的，需要長期的教育和鍛煉。因此，所有從事領導工作的同志，都應該嚴肅地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是在自己還能夠工作的时候，就及早著手培養、選拔後起之秀，看著、幫著、帶著他們成熟起來呢，還是等到自己年老體衰、失去工作能力之後，再“臨渴掘井”，從而冒後繼無人的危險呢？對革命事業有高度責任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採取前一種態度，反對後一種態度。在這方面，我們要向山西省絳縣南樊公社南柳生產大隊前任支部書記王長修同志學習。南柳大隊黨支部和王長修同志，早在土地改革結束後就著手培養支部的接班人。王長修同志說：“人還能沒有一死？可是革命不能斷了弦，村里工作總得有人管，要找人接班。”黨支部看准了貧農的兒子周明山，先送他去讀高小，又派他當民校教員，然後培養他入黨，讓他領導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過長期的教育和鍛煉，周明山長大成人了，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大大提高了，成了一個優秀的革命接班人。一九五七年，他接任了支部書記的職務。到一九五九年，革命老前輩王長



① 《毛主席在蘇聯的言論》，人民日報出版社版，第14頁。

② 《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67、268頁。



修同志病故了，而南柳大队的革命事业，却仍然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在党支部和周明山同志的领导下，南柳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根本改变了大队的落后面貌，使南柳成为全省由穷变富的一面红旗。山西省委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曾经指出：王长修等同志，是摆脱了资产阶级名位观点的束缚，具有无产阶级远大政治眼光和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的人。他们早在土地改革实现之后，就着意物色、培养革命接班人。他们把未来的“帅才”，放到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去锻炼。当看到接班人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就满心欢喜地说，“你比我强，你来领导”，一片诚心地让出领导岗位，并且在让出领导岗位之后，他们又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帮助自己的接班人，坚决地服从领导，出色地完成党支部分配给自己的一切任务。

有一部分同志，他们对待革命接班人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恰恰和王长修等同志相反。他们还缺乏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缺乏共产主义的觉悟和风格，没有及早注意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有些同志总觉得年轻人不太懂事，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们锻炼和成长。少数同志甚至还在单纯地论资格，排辈数，生怕后起的人顶替了他们的位子，因此，不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不愿意选拔和培养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这种只看目前不看长远，只考虑个人的得失，不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这种态度如果不改变，将会严重地阻碍新生力量的成长，给革命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不错，年轻干部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的。但是，他们的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斗争的锻炼中逐渐克服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这就是他们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对于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只要他们肯努力，肯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向老一代的革命者学习，就会很快地长进，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赶上老一代的干部。因此，对于年轻干部，决不能只看他们的短处，不看他们的长处；只看当前的现状，不看他们正在发展和进步。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如果这是说，青年人经验不足，锻炼不够，工作难免出点差错，因此需要多加关心，给予帮助，那是对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青年人靠不住”，不能把重担子托付给他们，把这句话作为轻视新生力量、阻碍他们成长的借口，那就完全错了。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才干，任何高明的领导，都是从实践中学习、锻炼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①不放手让青年人经受实际工作的锻炼，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他们就永远不能取得经验，就永远不会成熟。我们不应该用“办事不牢”这类泄气话增加他们的顾虑，而是应该切实帮助他们，使他们增强在实际工作中挑担子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8页。



的勇气和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培养出成千上万的革命接班人。

为了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优秀的革命接班人，需要进行长期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时，必须让他们长期在基层中、在群众中工作和锻炼。基层单位，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战斗阵地，它要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联系，接受群众的直接监督，是最能锻炼人、改造人的地方。老一代的干部，一般都是从长期的基层工作中、从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工作本领，主要是从基层工作中、从群众中学来的，他们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也主要是从实际斗争中，从同群众的紧密联系中，锻炼出来的。要使年轻一代更快地成长，成为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必须使他们长期在基层中锻炼，在群众中扎根，去经风雨，见世面，受考验。这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最基本的道路。因此，应该注意在基层中培养和提拔年轻的干部，并从机关中定期地轮流地抽调年轻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一般都应该先到基层去经受斗争的锻炼，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当前城市和农村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有的干部，都应该积极参加。没有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年轻同志，当然更不应该错过这一最好的锻炼机会。

有志于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年轻同志，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参加基层工作的重要，自觉自愿地、意志坚强地、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基层单位中去，深入实际，同群众密切结合，积累实践经验，经历各种艰苦困难、特别是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温室里的花朵，往往经不起风吹雨打；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干部，也往往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不下决心到基层中去工作和锻炼，要想成为优秀的革命接班人，那是不可能的。

在革命接班人的成长过程中，老一代革命者的耐心帮助和指导是不可少的。年轻一代应该自觉地主动地学习老一代革命者的长处，争取他们的帮助，把他们的指导看作是自己迅速成长和进步的有利条件。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全党的共同任务，也是所有基层单位都要普遍重视的迫切任务。我们各个地区、各个战线、各个部门，都有成千上万的基层单位。党的政策，必须经过基层单位的宣传贯彻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变为群众的行动。基层单位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效果如何，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层单位，又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党和国家的大批干部，要靠基层单位来造就和输送，要从经过长期实际工作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干部中来选拔。因此，培养革命接班人，必须面向基层。各级党委应当帮助和指导所属的基层单位，包括各人民公社、各生产大队，各工厂，各机关，各学校，把培养革命接班人，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及早把它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



讀者
與
作者

农业向集約化方向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編者按：这里发表一封讀者来信，和作者給讀者的复信。今后，本刊准备陸續选登讀者、作者和編者之間的一些通信。

一、寇来义的来信

編輯同志并轉趙天福同志：

讀了《紅旗》杂志一九六四年二、三期合刊上赵天福同志的《論我国农业的集約經營問題》一文后，使我学得了一些知識。但是，有一个問題尚未弄清楚，請你們抽出時間給以解釋。

赵天福同志在闡明了什么是农业的集約經營以后，提出：“农业生产朝着集約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由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农业集約化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根据赵天福同志在文章中提供的一些材料和我个人的一些認識，我觉得农业生产朝着集約化的方向发展，只能是由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特点决定的，它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規律。因为，不論在小农經濟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經濟的条件下，或在社会主义經濟的条件下，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資料的特点，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地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如經濟、技术和文化条件等），对农业集約化只不过起影响或限制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論》中說：“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資料，而这种生产資料作为一种自然体，是不能用人力增加的（即不能創造出新的土地来）。这样，一定限度的土地和人們日益增加的对农产品的需要之間，就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必須依靠集約化的方法。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合理使用的条件下，不仅不会变坏，不会磨損，而且会变得更好，生产能力更高，为依靠集約化的方法来实现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这两条就是农业生产要朝着集約化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

为了論证自己的論点，赵天福同志引用了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規律的新材料》一书中的一段話：“在理論上，把任何数量的資本投入任何数量的土地都是可以設想的，自然，‘这要取决于’現有的經濟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等等，全部問題正在于这^①个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关于这一段話，我认为是这样的。赵天福同志的文章中已經說过，列宁“还把单位耕地面积上投放的劳动力数量、肥料、农具、机器和牲畜的价值作为反映农业集約化程度的指标”。因此，資本投放的多少，它只能反映出农业集約化的程度。列宁說的“全部問題”，也只能是集約化发展程度的“全部問題”，而不能是农业要朝集約化的方向发展的“全部問題”。“农业集約化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也不能是“取决于現有的經濟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等等”，也不在于“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总之，應該說：农业生产朝着集約化的方向发展，是由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特点决定的；它发展的程度，受着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只有这样解釋，赵天福同志所举的在小农經濟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經濟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經濟的条件下的一些例子，才能讲得通。

寇来义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



二、赵天福的复信

《红旗》编辑部转寇来义同志：

来信提出的问题使我对原文中的提法进行了很久的考虑。现在我觉得把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作为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是正确的。

您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的，即不论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在任何技术、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农业总是向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的。所不同者，只是集约化的程度。在这个前提下，自然也就要把社会历史条件排除于决定农业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的原因之外，而把农业向集体化方向发展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点。

我认为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事实上并非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在任何条件下农业都是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的。例如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更加经济有效地开垦时，它完全可能向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向发展，而不向农业集约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在国内和国外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论及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时，就曾经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某些地区应当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如果把农业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点，这种情况就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点，在任何地区、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

我的看法是：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特点，只是从土地的方面一般抽象地说明了农业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的原因。但是仅仅从土地的特点看来是可能和必要的事，并不一定就会在经济上变为现实。例如说“土地有限”，但是如果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例如，没有发展到像你所说的一定的限度的土地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农产品的需要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土地有限”就没有经济上的意义，因而在经济上就不会发生促使农业集约化的作用。又如说“土地的经济肥力可以不断提高”，但是如果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技术、文化条件在内）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土地经济肥力可以不断提高的可能性也就不会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因此，社会经济条件才真正是各个历史时期农业实际上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原因。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农业之所以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归根到底都是取决于经济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社会历史条件是农业集约化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说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影响集约化的程度或快慢，而应当说它决定农业是否实际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来信说，社会经济条件只是农业集约化的外因，我认为这是由于把农业集约化当作一种自然现象，而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经济现象。而实际上集约化正是一种经济现象，因为集约化不只是由于自然界或一个国家的土地有限，而是由于在既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被利用的土地有限（即能被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有限），同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这里是否“有限”和是否“需要”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人们不会根据自然界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土地面积不能增加和土地的肥力能够不断提高就去从事集约化的实际活动，而只是当在经济上可被利用的土地不能增加和在经济上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时才去这样做的。经济上的有限和经济上的需要都是随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因而不能认为它是集约化发展的外因，而必须把它看作决定集约化的内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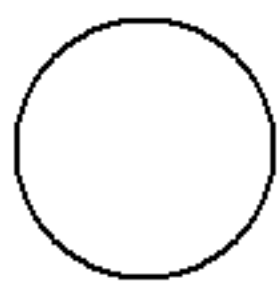
我的答复很不系统，可能解决不了您的问题，甚至还有错误，希望您能进一步提出问题讨论，以便我们可以共同提高。

赵天福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红旗

HONGQI



15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五期 ★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1)

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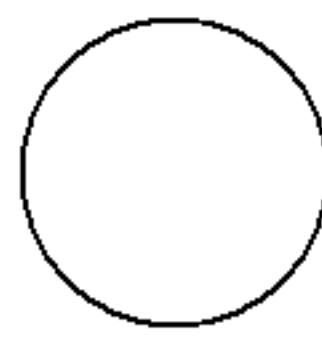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柯庆施 (3)

为革命的京剧现代戏欢呼陈其通 (23)

坚决将京剧革命进行到底李 琪 (27)

评周谷城艺术观的哲学基础汝 信 (32)

美国垄断资本与原子军事工业佟维仁 (43)



☆ 八月十五日出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新华社六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蓄谋发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是美帝国主义跨过了“战争边缘”，走上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步。声明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越南民主共和国遭受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

八月五日，美国海军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突然袭击，连续轰炸了越南的义安、鸿基和清化地区。这样，美帝国主义就跨过了“战争边缘”，走上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步。事态极端严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严正立场。

必须指出，美国的侵略行动完全是预谋的。八月二日，美国军舰侵入越南领海，越南人民当然有权采取自卫行动。尽管在这次事件中，美国方面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是，美国政府却乘机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大叫大嚷，说什么美国海军遭到了挑衅。接着，美国就调兵遣将，从台湾海峡和香港调了大批舰艇，云集在邻近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面。八月四日夜，这一带天气很坏，连美国的报道也承认能见度很低。突然华盛顿发出了消息，说是美国军舰在远处发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舰艇，于是就发生了一



場所謂交戰。美國總統約翰遜隨着不斷召開會議，製造了所謂又一次東京灣事件的神話。美國總統發表聲明，並且要求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緊急會議。這就成為了美國空襲越南民主共和國、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借口。

其實，所謂八月四日的第二次東京灣事件，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在這一天的夜晚，在美國軍艦所在的海面上沒有一隻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艦艇。美國政府說，美國海軍打沉了兩艘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艦艇，可是他們竟然連一點證據也拿不出來。越南民主共和國發言人指出，所謂第二次東京灣事件是徹頭徹尾的捏造。事實證明，而且還將繼續證明，這是美帝國主義為了要擴大印度支那戰爭而蓄意編造出來的一個道道地地的謊言。

美帝國主義企圖拿所謂第二次東京灣事件作幌子來一手遮天，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實上，在此之前，美帝國主義就已經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了多次的武裝挑釁。七月三十日，美帝國主義的軍艦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國北部的領海，對屬於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湄島和宇島進行了炮擊。八月一日和二日，美國飛機轟炸了靠近越老邊界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邊防據點和村莊。八月五日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沿海城鎮的轟炸，是美帝國主義逐步擴大戰爭的一個預定步驟。世界人民是欺騙不了的。美帝國主義蓄意擴大戰爭的罪行是掩蓋不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鄭重聲明：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戰火是美國點起的。美國既然這樣作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動權利，一切維護日內瓦協議的國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國反侵略的行動權利。越南民主共和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坐視越南民主共和國遭受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人民是中國人民親如手足的兄弟，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美國對越南人民欠下的血債是一定要償還的。美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神聖領土、領空和領海的武裝侵犯和挑釁。否則，美國政府必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



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服务

(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华东地区話剧观摩演出会上
的讲话，发表时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柯庆施

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使戏剧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服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项极为重要、艰巨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必须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进行戏剧改革，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革命现代剧。改革旧戏，提倡新戏，这不仅是戏剧界、文艺界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是一场“兴无灭资”和移风易俗的革命斗争，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彻底改造那些长期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旧戏，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历次指示精神，华东地区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話剧观摩演出。参加演出的有华东地区各省、市和部队的十九个話剧团，共演出了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內所创作的十三个多幕剧和七个独幕剧。这些戏的内容，都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丰富多样，主题一般也都是革命的健康的，它们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新事和新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工农兵中的新人新事和新的精神面貌，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好评。在这些戏中，《激流勇进》、《一家人》、《龙江颂》、《丰收之后》、《第一与第二》、《母子会》、《柜台》、《年青的一代》和《小足球队》等比较优秀的剧目，不仅成了話剧的保留剧目，而且为其他剧种移植。在这次观摩大会上，我们还组织到会的戏剧、文艺工作者，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检查了这几年的工作，总结交流了经验，制订了今后工作规划，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收获也是很大的。所有这些，都是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次华东話剧观摩演出，不仅为华东地区話剧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而且对华东地区整个戏剧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和激励作用。现在，在华东地区的戏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演革命的现代戏的朝气蓬勃的局面。不仅话剧，而且包括京剧和其他许多地方剧种，以及音乐、舞蹈、评弹、说唱等等，都开始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圈子里走出来，努力地反映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总之，我们的戏剧事业和整个文艺事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正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进一步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形势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现在，我想就华东地区的戏剧工作和整个文艺工作的情况，谈谈有关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文艺的若干问题。

（一） 我们的戏剧，一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戏剧为谁服务，如同整个文艺为谁服务一样，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①他又说：“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是我们无产阶级戏剧和整个文艺的根本方向，是无产阶级戏剧、文艺区别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戏剧、文艺的分水岭。戏剧、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革命人民服务的问题。革命的戏剧、文艺是为绝大多数的革命人民服务的，决不是为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遗老遗少等少数人服务的。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这是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戏剧、文艺唯一正确的方向。无论在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方向。

戏剧、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戏剧、文艺是上层建筑之一，在阶级社会里，它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而归根结底是，上层建筑必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符合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5、857页。



务。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們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 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这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中的戏剧、文艺，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戏剧、文艺来说，必然是这样。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建立为本阶级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戏剧、文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他们的戏剧、文艺，为他们服务；我们无产阶级也必须有自己的戏剧、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的文化是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虽然那时的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文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戏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② 不能设想，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而戏剧、文艺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或者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戏剧、文艺还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保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这是我們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在社会主义阶段，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方面，代表着社会主义力量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正在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向前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日趋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还存在着阻碍、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虽然在经济上，我们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在国内没有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以前，在没有根除产生资本主义的一切根源以前，在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总之，在进入共产主义以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比在经济上的斗争更为复杂和曲折。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方法，包括“和平演变”的方法进行复辟活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使复辟的可能变为现实。这种斗争必然要尖锐地反映到戏剧、文艺战线上来。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力量、共产主义因素对将要最后死亡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只有进行长期的、不断的、反复的斗争，才能逐步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对于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这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每一个革命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6—657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作者，包括戏剧、文艺工作者在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都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你是积极参加到这一斗争中去，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去战胜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还是与此相反？我们的戏剧、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革命者，你就要积极参加这一斗争，而不能回避这一斗争，你就要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能宣传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你就要站在新事物这一边，而不能站在旧事物那一边。但是，对于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们的戏剧、文艺工作者中间实际上是有不同态度的。有积极的态度，有消极的态度，还有反对的态度。采取反对的态度，固然是不能容许的；采取消极的态度，也同样是不对的。消极的态度，就是：既不去反对旧的东西，又不去支持新的东西。既不反对又不支持，结果是旧的东西泛滥，新的东西受到压抑。这样，新的东西怎能迅速成长，旧的东西又怎能被彻底打倒？我们如果不从根本立场上、态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谓为社会主义服务，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

那末，我们文艺、戏剧工作者用什么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要用文艺这个武器来参加现实斗争，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作用，通过艺术形象潜移默化的作用，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启发和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鼓舞他们的革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武器的戏剧、文艺，不但要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而且要进行革命的前途教育，鼓舞人民群众立革命的雄心大志，坚决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积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列宁）^①。这是革命戏剧、文艺的党性、阶级性所决定的。可是，有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是把戏剧、文艺看作是继续进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武器，而是认为它只是供人玩赏的消遣品。显然，这种看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革命的戏剧、文艺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戏剧、文艺不去为无产阶级服务，那末它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会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成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上层建筑。现代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现代修正主义的戏剧、文艺，不是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了吗？他们以“急先锋”的姿态，大肆散播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福利主义，传播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竭力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工具。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一严重的经验教训。

戏剧是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它通过舞台形象，对千百万观众起着强烈的影响。好戏有好的影响，坏戏有坏的影响。因此，每一个戏剧工作者都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以对革命负责，对群众负责的精神，认真写好演好革命的现代戏，在实际行动中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同一切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

^①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页。



建国以来，华东地区的戏剧工作，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能低估的。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相适应。在我们戏剧界，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他们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这种情况却熟视无睹，对于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痛心、不干涉、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封建道德有人民性”等等；相反地，对于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戏，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而是冷漠无情。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戏剧、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斗争。只要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文艺战线上的这个斗争总是要存在着，总是要坚持下去、要斗争到底的。

(二) 社会主义戏剧，必须以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斗争， 以表现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群众为其主要任务

我们要使戏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就一定要大力提倡反映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剧，积极地表现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热情地歌颂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上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当然，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斗争的戏剧也是需要的，但是要以更大的力量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戏剧。只有这样，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表现工农兵群众的革命现代剧，才能成为我们戏剧舞台上的主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着力地、精心地去塑造出更多更高大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写出他们怎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使更多的英雄模范人物迅速地成长起来。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①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戏剧创作的原则，而且是我们社会主义戏剧的光荣责任。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群众是新生活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无产阶级戏剧、文艺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在戏剧、文艺中表现自己的历史，是他们用戏剧、文艺这个武器为争取自己解放而斗争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戏剧只有以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为主，以表现工农兵群众为主，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才会有伟大的发展前途。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必须塑造出更多完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美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热情地歌颂他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高尚品德，并且有力地批判那些反面人物，充分发挥革命戏剧的战斗作用。我们的戏剧工作者，也只有以表现工农兵群众为方向，才有利于自己投入现实生活和斗争，熟悉工农兵群众，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戏剧工作者，使戏剧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戏剧。这样说，是不是别的戏就不可以演了呢？不。只要是正确地反映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的戏，揭露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丑恶面目的戏，一切能够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戏，一切有革命意义的戏，都可以上演；其他一切经过改编可以古为今用的传统剧目，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戏，只要不违反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也是允许上演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上，必须以反映社会主义的生活和斗争为主，以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群众为主，这是必须加以肯定和明确的。

对于为什么要提倡革命的现代剧，至今还有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提倡现代剧是因为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既能表现古代人的生活，又能表现当代人的生活；既能表现这一阶级的人物，又能表现那一阶级的人物”，才能“弥补”戏剧的不足，才算是“完整、丰富、有力”。显然，这种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是对我们为什么要提倡革命现代剧的曲解。我们提倡现代剧，决不是一个什么弥补不足的问题，而是戏剧的根本改造问题，是使戏剧端正方向，使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使戏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问题。如果现代剧，要“既能表现古代人的生活，又能表现当代人的生活；既能表现这一阶级的人物，又能表现那一阶级的人物”，才算“完整、丰富、有力”，那末你是以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群众为主，还是以表现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你是歌颂工农兵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人物，还是与此相反？持这种论点的人，表面上也赞成戏剧革命、赞成表现工农兵，实际上却保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最多给工农兵一个陪衬地位而已。看来，同样是提倡现代剧，仍然有革命的、不革命的 and 反革命的分别。我们所提倡的是社会主义的戏剧，而不是别的什么戏剧，是革命的现代剧，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剧。

正因为这样，对于我们提倡现代剧，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帝国主义者胡说我们以“枯燥无味的”现代剧取代“非常受欢迎的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题材的”旧戏。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一唱一和，大肆攻击我们的现代剧是什么“修行”和“束缚在许许多多的条条和框框里”的创作，是什么“恶劣的庸俗教条”。这种攻击和诬蔑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戏剧，什么是革命的现代剧。在他们那里，不仅革命的现代剧，而且真正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活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被指责为是“修行”，是“恶劣的庸俗教条”。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不仅不能伤害我们一根毫毛，而且恰好说明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戏剧、提倡革命现代剧，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人民的生活，工农兵的生活，是我们创作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生活，是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当中，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光辉的生活和斗争；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反动统治下，受压迫、受剥削，生活是悲惨的。现在呢，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了，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推翻了，政治上翻身了，不再受压迫；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不再受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在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无限的创造力，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的理想而奋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在工农兵学商各个战线上，人们在改造着世界，也改造着自己。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有敌我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民，是在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和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在现实生活和斗争中，我们的工农兵群众和他们的干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条战线，各个方面，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大量涌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英雄模范人物越来越多。仅就华东地区的部分材料来看，新人新事到处都有，时时都在发生。

他们有的是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不为敌人威胁利诱所动摇，不为旧思想、旧影响所侵蚀，永远保持着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如《老贺来到小耿家》所报道的党支部书记，《南京路上好八连》所讴歌的解放军战士，就是这样。扬剧《夺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这些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品质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山东曲阜县陈庄公社陈家庄大队，在党支部书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以梅的领导下，从一九五二年就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年内增产了百分之六十七。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称赞它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是，这个大队在一九六一年一度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生产受到破坏，产量由亩产四百五十斤下降到三百斤。但是陈以梅仍然紧紧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斗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组织了贫下中农委员会，树立了贫下中农优势，打退了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夺回了领导权，现在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每亩产量由三百斤翻到六百斤。又如上海市三轮车工人程德旺，他不但以平凡的劳动，全心全意为乘客服务，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送给别人，而且他在工作中，积极帮助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社会主义利益，坚决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一九六二年以来协助政府破获了十一起违法案件。

他们有的是在工业生产当中忘我地劳动，为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节约成本、革新技术、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創造发明而苦钻苦研，作出巨大的貢獻。如上海永鑫无縫鋼管厂，原来是一家弄堂小厂，在老工人潘阿跃等人的帶領下，用自己的設備和技术，制造了一批精密度較高的优质无縫鋼管，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积极钻研，改进了制造异型鋼管的机器，解决了大量生产异型无縫鋼管的問題。上海酒精厂职工，奋发图强，自己武装自己，几年来，通过不断革新，把一个破烂小厂改造成为一个采用国际上先进工艺生产的工厂，这个工厂的生产，現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四倍多。有許多工人为了解决一个技术关键問題，搞技术革新，可以废寝忘食，到处奔走，不感到疲劳。

他們有的在农业生产中，一心一意搞好集体生产，艰苦奋斗，改变很坏的生产条件，钻研农业技术，变低产为高产，使高产更高产。江西有一个生产队叫火箭队，队长叫丁长华，是个女青年。她那个地方原来很穷，沙土地，产量低。她有志气，有干劲，带头劳动，一心一意领导社員办好集体生产，几年来，每亩地收到的粮食总是在一千一、二百斤以上，皮棉在二百斤以上。养猪也很多，一亩地将近养两头。要問她为什么能把生产领导好，經驗有四条：一、大公无私，二、以身作则，三、走群众路綫，四、科学实验。江苏有个泗阳农場，是个国营农場。它在废黄河的边上，也是沙土地。場长张学同，原来是个农民，参加过游击战争。他去之后，把那个农場建設好了，皮棉也是亩产二百斤。地瓜折成粮食，人家每亩是三百斤、四百斤，他那地方，我一九六二年去看的时候，尽管受了灾，还收了五百多斤。不但如此，他还把附近的生产队带动起来，落后队交給他一带，一年功夫生产就有很大增长。山东泰安縣有个徂徠公社，这里的社員和干部，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愚公移山的气概，将山岭整修成梯田，将洪水拦蓄在水庫里，改变了貧穷山区的面貌，粮食达到亩产六百斤。

他們有的是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具有全局观点，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英勇頑强的革命意志。福建一九六三年抗旱斗争中就有很多动人的事。多少个月沒有下雨，河里的水干了，再把河挖深，这个河里沒有水，从那个河里調过来。話剧《龙江頌》所写的龙海县榜山公社龙江大队的干部和社員“丢卒保車”的风格，就是福建省抗旱斗争的縮影。又如，一九六三年河北大水，从山东分洪，也是一个牺牲局部保全全局的壮举，仅在恩县注一个地方，就自觉地让洪水淹沒几十万亩地，保住了其他地方更大面积的地。为了拦蓄洪水，当地临时突击筑堤，堤造起来啦，人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一样，經不住大风大雨冲击，有的地方决口。怎么办？我們的解放军，我們的干部和群众，大家手挽手組成一条人牆，站在水里，擋在堤的前面，和大风大雨搏斗，同时采取了其他有效措施，终于保住了大堤。

他們有的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当中，站得高，看得远，先国家，后集体、个人。如江西彭泽县棉船公社江心大队的党支部，领导社員种好棉花，几年来都超額完成售棉任务。他們提出的口号是：“站在家門口，望到天安門”。这一口号，已在各地产生深刻的影响。还有，各地都有許多公社和社員群众，不仅积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支援国家建設，而且当外地有灾时，宁可自己少吃点，也要将余粮超額卖给国家支援灾区。《丰收之后》就是人



民群众的先国家、后集体的高尚精神的写照。

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和民兵中，更是英雄、标兵辈出。南京部队某部连长郭兴福所创造的先进教学方法，已在全军推广。海军某部水兵赵尔春，济南部队某部战士王永才，他们在救火和抗洪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浙江平阳县民兵连长苏旺巢，带领全家上阵，痛歼蒋匪武装特务。山东崆峒岛渔民吕志玉，一家三代民兵，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他们一手握橈，一手握枪，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着祖国的海防。

我们有不少科学家、医务工作者，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是很高尚的，他们孜孜不倦地攻钻科学的难关，苦心孤诣地为病人服务，抢救不治之症。像上海广慈医院的医生护士抢救烧伤工人丘财康的事迹，第六人民医院医生护士为王存柏断手再植的事迹，都是世界医学史上难以找到的先例。

在学习雷锋运动中，各地都出现了许多雷锋式的人物，雷锋式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动人事迹。如，福州部队通讯部公务员、共产党员张文根，看到两个社员正在淘粪的时候，掉下粪坑去了，眼看就有生命危险，他不顾自己有病，不顾生命安危跳下去，竭尽全力把两个人救出来。这样，他自己也中了毒，昏迷过去，后来经过抢救才脱险。群众见他这种舍己救人的高尚精神，同声赞扬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上海市邮件转运处市内运输科工人高长富，结婚不久，爱人祁秀章不幸瞎了双眼，他想到他们俩都是穷苦出身，是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阶级姐妹，不仅不因此嫌弃她，而且更加同情她、关心她、体贴她，积极帮助她进步。不少的人知道后，也都以高尚的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他的爱人。上海第四师范学校深夜失火，学生们不仅临危不惧，全力救火，而且丢开自己的东西不管，奋不顾身地抢救学校的物资，减少了公共财产的损失。

随着群众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斗争。如上海普陀区锦绣里原来有一百二十家供神敬佛，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苦乐根源，从迷信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现在已有一百十几户自觉地搬走和销毁了迷信物像。他们说：“我们被神鬼欺骗了多少年，今后再不许让它害子害孙了！”又如徐汇区东庙桥路堂生里，有八户职工家庭，从一九五二年共同建造房屋、开始邻居相处以来，八户如一家，一贯团结互助，相互关怀，提倡朴素，勤俭持家，被人们誉为“稳固的生产后方”。他们还经常忆苦思甜，教育孩子牢记过去苦，珍惜今日甜；他们还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孩子热爱劳动，助人为乐，教育孩子捡到东西归还原主，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像以上这样一些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到处涌现，到处风传。这里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如果尽我们所知道的谈下去，几天几夜也谈不完。我们知道的还有限，在现实生活中，新人新事更是大量的，不断涌现的。总之，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正在进行着翻天覆地、前无古人的革命事业，创造着无限壮丽宏伟的历史诗篇，他们有着高尚的理想和革命感情，创造着可歌可颂的英雄事迹。他们的形象既平凡而又伟



大。讲起来，听起来，扣人心弦，使人激动。我们革命的戏剧、文艺工作者，怎么可以不尽情地歌颂这样伟大的时代，怎么可以不精心刻画这样伟大的工农兵群众，怎么可以不塑造这样伟大的英雄人物？我们不这么做，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吗？

但是，在这样丰富多采的生活、这样崇高的英雄人物面前，有的人却说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斗争的戏“题材狭窄”、“简单枯燥”，说工农兵的生活“粗”，“没有味道”，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这种看法，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这些人的错误，归根到底说来，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感情问题。不愿写现实生活，不愿写工农兵，认为这里没有戏，感情不丰富，那末是不是只有写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写出鸳鸯蝴蝶式的那种“委婉纤细”、“缠绵悱恻”的感情，这才有戏，才有人情味，才有味道，才有丰富的感情？在我们看来，所谓工农兵的“粗”，正是一种革命坚定性的表现。只有用贵族老爷的眼光来看，才会觉得工农兵“愚昧粗野”，缺乏所谓“细致复杂”的思想感情。在无产阶级看来，剥削阶级的感情是最最粗野低级，最最腐朽野蛮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姑且不去说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现在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值得表现呢？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虽然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走到它的反面。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腐化堕落，荒淫无耻。资产阶级是最残酷无情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①。资产阶级的这种人情味，这种感情，有什么值得写呢？如果我们写资产阶级，决不是歌颂它，而是在斗争中暴露它；我们写它不是为了让人民欣赏它，而是批判它，拿它做反面教员。现在我们有些青少年，不知道资产阶级到底是怎么回事，写一点这样的戏倒也可以。我们也不是为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使大家认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衬托出劳动人民的崇高，共产主义的伟大，教育大家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将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者。至于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稳定的、逐步分化的阶级，就其阶级地位来说，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不是依附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就只有投降无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为无产阶级服务。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是空虚的、脆弱的、低级的、庸俗的，他们总是由幻想到破灭。有些人由于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就是喜欢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认为这样才算有丰富的感情，才算有人情味，其实那也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感情罢了。只有无产阶级的感情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伟大、最纯洁的感情，因此也是最值得我们讴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8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敌我矛盾仍然很尖锐、很复杂，写敌我矛盾的戏，比较容易形成尖锐的戏剧冲突，帮助群众认识敌人，正确地进行敌我斗争。这是大家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戏，能不能写出戏剧冲突，能不能写好戏剧冲突，不少人还存有疑问。这次话剧会演中，一些好的剧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首要的问题是怎么样去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去写。你如果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写，就会写得好；反之，你就写不好，就会歪曲现实。有些人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往往以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看待生活，因此看不见现实生活中光明的、积极的一面，而只看见现实生活中落后的、消极的一面，他们对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缺乏革命的热情，而对所谓“暴露”生活“黑暗面”却感到莫大的兴趣。他们自以为反映了现实生活，其实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他们的所谓“暴露”，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描写。当然，我们也可以写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有缺点、错误的劳动人民，但是，这是为了使人们从中得到教育，而不是什么“暴露”。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他说：“对于革命的艺术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①另外还有一些同志，由于满脑子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将一切想得尽善尽美，完好无缺；但是，当一接触到实际后，看到和自己原来的想像不一样，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好写的，灰心丧气了。这些同志应该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实际出发，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区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正在成长的新东西和正在死亡的旧东西，善于抓住主流的、本质的东西，善于发现正在成长的、哪怕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用阶级观点看人民内部矛盾，具体分析各种人物、各种矛盾，加以概括、提炼，在艺术上精心地构思，一定可以把人民内部矛盾写得非常深刻并且有分寸，使人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很好的教育。我们已经有不少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好戏，它们写得很有冲突，很有戏剧性，很有分寸，很符合实际。它们的经验，可以回答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疑虑。

此外，在我们华东有人说，抗日战争以前，即三十年代电影、话剧好得很，似乎现在反而大大不如过去了。这种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我们是不是有革命的文艺运动？肯定是有的。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包括苏区和白区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当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高潮中，出现了鲁迅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伟大旗手，这是不容否认的。毛泽东同志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但是，难道那时的文艺工作方向都对头了？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没有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嗎？这是不可能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召开文艺座谈会，就是因为文艺界，不论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还是四十年代初召开座谈会的时候，这个问题都没有明确、没有解决。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讲了话，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得到解决，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才走上了康庄大道，才在正确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二十二年来，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的指引下，随着革命不断深入和发展，革命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取得了新的成就。尽管在华东地区的文艺战线上，并不是任何部门、任何时候都贯彻执行了党的文艺路线，因而还存在各种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大大地超过了三十年代。由此可见，在今天不加分析地把三十年代的文艺说得那么好，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无异是否定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就，无异是拉着革命文艺倒退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状况，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永远不跨进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根本不需要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向前迈进了。这是我们的工农兵和人民群众不能允许的。

(三) 在社会主义时代，一定会产生出更多更好的、 既有高度思想性又有高度艺术性的戏剧

社会主义戏剧，不但在政治内容上可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在艺术质量上也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那末，对于社会主义戏剧来说，什么才是好戏呢？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①又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②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以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之间的辩证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我们对于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要根据上述要求去检查、去衡量。无产阶级对于政治标准必须具有更加明确的要求；无产阶级的戏剧，必须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按照政治标准来说，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曾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0—871页。



經具体指出：“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①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又提出六条政治标准，其中又以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根本的两条。这六条标准，就是我们今天衡量戏剧好坏的政治标准。按照艺术标准来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差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把艺术的高低、好坏看作是什么抽象的东西，把它架空起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艺术要以更好地适应群众的斗争要求、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目的。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在文艺问题上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优秀作品的产生有它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完全是个人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任何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革命旗帜鲜明，人民斗志昂扬，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我们这种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生活，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出优秀的革命作家，写出不但在政治内容上，而且在艺术质量上都很好的作品。这是时代决定了的。这个人不去写，必然有另外的人写；这个人写不出优秀作品，那个人必然写出优秀作品；这个作品不成为优秀作品，那个作品必然成为优秀作品。在今天，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那些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文艺家就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只能产生反映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生活和意识的作品。在修正主义当权的国家，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作家也只能写出颓废、没落、空虚、反动的作品，腐蚀人们的战斗意志，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

当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采，还只是出现优秀作品的客观条件。要产生优秀作品，还有待作家的主观努力；如果没有作家的主观努力，不付出艰巨的劳动，优秀作品仍然是产生不出来的。一部优秀作品的产生，是一个艰巨的创作实践的过程，是我们的作家深入生活、熟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0、870页。



悉生活、不断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过程。特别是戏剧，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更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地进行修改、加工和提高，精益求精，才能成为群众所喜爱的优秀戏剧。

华东话剧观摩演出的所有剧目，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加工的；这些剧目今后还要继续不断修改、加工，使其日臻完善，成为保留剧目。可是，有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戏剧这一新生事物开始不可避免出现的某些粗糙现象，不是采取热情支持和积极帮助的态度，而是进行种种挑剔和刁难，到处指手划脚，吹毛求疵，大有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味道，实际上是对革命的现代剧采取否定的态度。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态度。那末，现代剧能不能批评呢？不但能批评，而且批评对于搞好现代剧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带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恶意的、破坏性的批评。只要批评的态度是对头的，即使批评错了也不要紧。我们承认有不少现代剧还很粗糙，需要提高。这是我们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的工作中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我们对于那种不负责任、粗制滥造的一般化、概念化的戏剧，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那种戏剧有碍社会主义戏剧的声誉，得不到群众的欢迎。但是，必须弄清楚，我们所说的提高是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是沿着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提高，而不是脱离工农兵群众的什么“提高”，违背为工农兵服务、违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什么“提高”。

我们戏剧工作者，要写出演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戏剧，就一定要彻底改造思想和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为什么有些人面对着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而写不出东西来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解决好。为什么有些人热衷于提倡和编写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戏剧，而不热心于提倡和编写社会主义戏剧？为什么有些话剧演员因为没有能演上外国古典戏剧中的角色而感到不胜遗憾，而不是因为没有能演出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的戏剧于心无愧？这就说明他们的立场态度是有问题的，思想感情是有问题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思想感情不同，爱憎也就不同。如果不进行思想改造，让旧思想堵塞自己的头脑，就会像鼻子伤风、眼睛色盲、耳朵聩聩那样，对大量存在的新事物嗅不到、看不见、听不清，也就写不出、演不好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的戏剧。我们有些戏剧工作者，包括其他方面的许多同志，就是没有能真正深入生活，深入斗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此，在他们的脑子里只有旧的东西，没有新的东西，或者只有抽象的新东西，没有具体的新东西。如果这样，即使想下决心改造自己，想写出好的作品来，也是改造不好的，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所以，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我们的立场、态度、思想、感情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尾巴才能彻底割掉。这样，思想活跃了，眼界开阔了，知识丰富



了，可写的东西就多了，写好的信心也就大了。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我们每一个戏剧工作者都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去做。

我们戏剧工作者，要写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戏剧，还要敢于同一切旧的艺术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敢于打破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艺术框框。要能够充分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生活，深刻地表现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生动地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人物，就必须打破那些不适合今天需要的陈旧的艺术框框。我们有些戏剧工作者，由于长期受到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艺术观念的影响，往往被许多框框束缚着自己，不能突破，成为艺术革新中的保守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②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戏剧，要进行戏剧的改革，就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政治观念和艺术观念，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和艺术观念。

这样说，当然不能理解成为对于中外文学艺术的优秀遗产不要继承。凡是中外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继承；问题是对继承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既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也不膜拜于遗产，而是对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这样，才能创造出全新的自己的东西。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一次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③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④ 又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③ 《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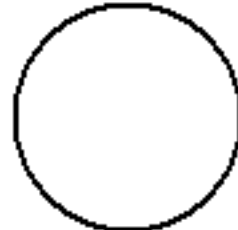
④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替代自己的創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①。这就是說，我們对于优秀的文学遗产，要批判地继承，而继承是作为我們从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和斗争出发进行創造的借鉴，不是囫圇吞枣，全盘接受，更不能代替自己的創作。应当承认，中外历史上有許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十八、十九世紀的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曾經揭露了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的罪恶，有它的时代意义。但是我們要看，这些遗产都是封建时代和資本主义时代的东西，它們的基本思想是宣揚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态包括它的道德观念，宣揚资产階級的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些东西，和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必須和它实行最坚决、最彻底的决裂。我們对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包括戏剧在內，都要进行批判，对那些越有影响的，就越要彻底地批判，才会对社会主义、对今天的人民起有益的作用。可是，我們有些人对十八、十九世紀的文艺作品，推崇备至，五体投地，就是不加分析批判。这样盲目地崇拜遗产，实际上是借继承遗产之名，行宣传封建主义、資本主义思想之实。

从艺术的形式上来說，一些古典的优秀文艺作品，有它独到之处；传统的戏剧有它长期形成的一套表演形式。在适当的条件下，經過努力，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这是可能的，必要的。但是，内容和形式是密切联系的，新的内容总是要求新的形式来表现它。新内容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来表现自己，已經不是純粹的旧形式了，在某种意义上說来，在实际上說来，这已經可以說是一种新的形式了。传统剧目的表演形式，是适合表演古代人物的；不經過适当改造，不能很好地表现今天的新人物。我們要表现今天的工农兵，就要有今天工农兵的形象、語言、动作，就要用新的形式来表演，而这些东西是过去文艺作品和戏剧中很难找到的。我們要表演工农兵群众中的英雄人物，总不能把它的語言、动作、风格等等搞得像封建階級、资产階級那样矯揉造作、装腔作势吧！随着内容的改变，必然在表演形式上要加以突破。过去传留下来的某些艺术技巧，經過认真的改造以后，可以用来表现現代人物，这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一个方面；但是，主要还是要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适合表演今天人物的艺术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語言、动作，經過提炼、加工，就能成为很好、很美的艺术形式。这就是說，在戏剧工作者更好地和工农兵群众結合以后，在大演現代剧、表现工农兵群众的艺术实践中，經過长期的摸索和积累，終究要找出适合表演社会主义生活的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必然是更加民族化、更加群众化的。可是，我們有些人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有所突破和創新，一味地硬搬和模仿。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誡我們：“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② 我們各种戏剧，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推陈出新，推封建主义、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頁。



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新。否则，它们不但在政治上不行，在艺术上也不能发展，最后必不可免地要为时代和群众所抛弃。

总之，我们要相信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不要抱残守缺，厚古薄今，迷信过去。这在科学上是如此，在戏剧艺术上也是如此，在其他一切事业上都是如此。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遇到困难，社会主义戏剧可以一帆风顺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戏剧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戏剧本身必须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无论封建主义的文化艺术，还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都是经过了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艺术，经历了几千年的兴衰史；西欧各国资本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也经过了好几百年。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才有短短十五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的戏剧艺术毕竟是一个新生的幼芽。建设社会主义的戏剧，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深刻的革命。要使社会主义戏剧巩固地占领阵地，把散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毒素的戏剧完全排除出舞台，这需要我们的编剧、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齐心协力，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和斗争。我们决不能碰到困难就泄气，就不敢前进。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不断的努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戏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们就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戏剧，在舞台上开放出无限光辉灿烂的艺术花朵。

（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 为社会主义戏剧的发展和繁荣而奋斗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时代的风雨表。阶级斗争必然要在文艺上反映出来。我们的文艺要不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文艺战线上一场严重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阵地，修正主义思想就会泛滥，就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社会主义戏剧不去占领舞台，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戏剧就会去占领舞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障碍。我们要时刻记住，现在还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存在，一刻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一切革命的戏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更鲜明，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戏剧、文艺事业斗争到底。我们所有的戏剧、文艺工作者，都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认真学、反复学，真正学到手，以提高认识，改造思想，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戏剧、文艺，更加坚定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奋勇前进。

要坚定不移地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必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



陈出新的方针。这个方针，是改革和发展我国戏剧艺术的根本方针。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来的，又是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个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和繁荣的方针。它决不是保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学艺术的方针，决不能被人利用来发展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我们只允许在社会主义方向下，艺术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决不允许在内容上宣传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必须组织革命的戏剧队伍，加强戏剧队伍的建设，建立一支能够正确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红又专的戏剧、文艺队伍。戏剧、文艺工作者，包括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工作者、舞台美术工作者在内，首先要下决心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使自己不断革命化。戏剧队伍的革命化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革命化，也就是要真正无产阶级化，共产主义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可是，对于我们戏剧队伍来说，不少人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在他们的头脑中无产阶级思想还很少，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乃至封建主义思想还很严重，而他们天天要演戏，要宣传，对群众的影响很大，那末就发生一个问题：他们究竟用什么面貌来改造世界呢？是用无产阶级的面貌，社会主义的面貌，还是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面貌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①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如果我们不去认真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就不可能实现革命化，社会主义的戏剧也就不可能在我们手里真正建设起来。所以，一切革命的戏剧工作者，都必须投身到沸腾的生活和火热的斗争中去，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感情，割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名利思想的尾巴，和一切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我们的戏剧工作者，能不能真正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是他们能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



民众相结合。”^①这对我们戏剧、文艺工作者同样适用。我们有些戏剧、文艺工作者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或者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他们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某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遗毒；而我们有些年轻同志，则没有经受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苦难，缺少阶级斗争的锻炼和体会；加之，他们都没有很好地经常地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他们和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总是有一段不小距离的。他们必须有自知之明，正视自己的弱点，不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转到工农兵群众方面来，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地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地去表现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写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来。

在加强戏剧队伍的建設方面，又需要重視創作队伍的建設。剧本創作，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的一个关键問題。沒有剧本，社会主义戏剧是不能迅速发展的。戏剧工作的领导部門，应当把剧本創作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来抓。除了导演、演員和舞台工作人員外，各地都必须建立一支精干的創作队伍。专业的創作人員要認識到自己的重大責任，自觉地深入生活，努力进行創作。与此同时，还要特別注意培养业余的戏剧队伍，发现和帮助业余剧作者，使专业創作和业余創作結合起来。业余的戏剧作者散布在各条战线上，投身在现实斗争中，人数众多，潜力很大，只要我们精心帮助、培养，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我們的戏剧队伍，包含着一切願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家、艺术家、戏剧家，要团结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进步，为他們的創作提供良好的条件。我们相信，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願意进步的文艺家，經過革命斗争和艺术实践的锻炼，不断地改造自己，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可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为社会主义的戏剧、文艺，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建設革命的戏剧、文艺，建設革命的戏剧、文艺队伍，要求我們在文艺界中严肃地开展思想斗争。加强文艺批評，就是开展思想斗争的一种方法。我們要加强評論工作，来指导和推动創作和演出，总结創作和演出的經驗，开展文艺思想斗争。我們一定要发展革命的文艺批評，积极提倡、扶持、鼓励一切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批判那些坏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这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不可缺少的一件工作。华东話剧观摩演出，是通过会演，总结交流經驗，提高思想認識，开展比学赶帮，进行群众性文艺批評的生动活泼的方法。事实证明，这对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來說，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今后可以适当采用。

加强党对戏剧的领导，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的根本条件。各級党委一定要加强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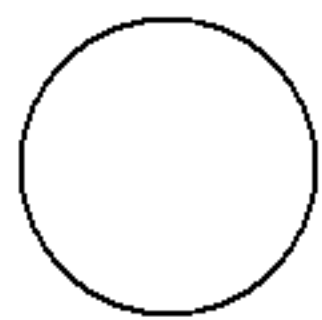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頁。



戏剧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戏剧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地进行戏剧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戏剧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来抓。这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放松不得的。过去有人以“反对领导干预创作”为名，否认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这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别有用心地说，现代剧“都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与参加下写的”，“与其说是某些剧作家写的……不如说是党委写的”。他们这种攻击，实际上是妄图使创作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接受他们修正主义党的领导；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走上他们的修正主义方向。如果上了他们的当，就必然要使我们戏剧、文艺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我们的戏剧、文艺工作者也就要滚进修正主义的泥坑。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点，一定要把戏剧、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戏剧、文艺是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是抵制和逐步肃清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防止修正主义侵蚀的强有力武器。我们的戏剧、文艺，一定要紧紧掌握在党的手里，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党就不能不去“干预”一下那种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人民的创作，不能不“破坏”一下他们的创作情绪。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① 我们所说的加强党的领导，决不是修正主义所蔑视的去包办创作，而是去正确指导如何进行创作。实际情况是：在今天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作家、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水平和所见所闻，毕竟是有限的。党的领导，掌握时代的脉搏，了解革命的动向，从政治上、思想上、题材选择上帮助作家、艺术家，这不仅不妨碍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能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明确方向。事实上，只有遵循党所指明的方向，充分吸取群众的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才可能产生出成功地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和斗争的戏剧来。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很好。戏剧、文艺工作者必须赶上时代的潮流，加速社会主义新戏剧、新文艺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的革命戏剧、文艺，不但要为中国革命服务，而且要为世界革命人民服务，担负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应该担负的任务。我们的一切戏剧、文艺工作者，都要立革命大志，树远大理想，高高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用戏剧、文艺的武器，支持和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876页。



为革命的京剧现代戏欢呼

陈其通

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犹如一声春雷，漫天震响，全国惊动。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革命的人要求看革命戏，革命的时代要求革命戏来反映。以前的京剧舞台上，演唱的是千百年前的旧人旧事，是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广大工农兵群众没有那种撇开人物、故事，专门去品尝某个演员的唱腔、韵味的雅兴，所以，京剧的观众越来越少。在部队里，旧戏曲不受欢迎。有些干部、战士到戏院里看了旧戏回来，常常提出问题：为什么京剧和戏曲不可以多演点新东西？

京剧演现代戏，是时代的要求，是人们长期以来强烈的愿望。我国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早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出现了千万件模范事例，涌现出千万个英雄人物。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戏剧，特别是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戏曲艺术，也必须跟着时代一同前进，把表现这些英雄人物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否则，正在进行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的人民，一走进剧场，看到的、听到的，却和自己的生活现实完全没有关系，净是些古代的人，古代的事，王公大

臣，公子小姐，甚至还有牛鬼蛇神，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呢？怎么能够没有意见呢？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亲手培育下，在革命的武装斗争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英雄人物辈出，好人好事无穷。这是革命的戏曲艺术无限丰富的创作源泉之一。可是，在过去的京剧舞台上，我们武装斗争的工农，我们革命的士兵，却没有地位，没有活动的场所。一进剧场，在舞台上看到的士兵，不是蹦蹦跳跳的无名小卒，就是呆若木鸡的四八龙套。这种情况，和我们活生生的现实怎么能够相称呢？

戏剧，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从来都是反映现实的。不反映现实，就没有生命。旧的戏曲，有的尽管是假托前朝，写的是三皇五帝，但它反映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上仍然离不开当时的现实。在京剧发展的历史上，这种现象也是毫不例外的。京剧如不随着时代前进，就会成为时代的绊脚石，就会为人民群众所抛弃。

这次观摩演出，满足了人们的要求，实现了人们的愿望，所以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



迎和拥护。观摩演出大会为部队组织的几次慰问演出的专场，场场客满，座无虚席。看了演出之后，人人满意，个个称赞，认为京剧革命化获得的初步成果，异常振奋人心。

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必然会带动整个戏曲艺术的革命化，甚至推动整个文艺工作的革命化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人们看到，京剧、戏曲，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一经革命，就焕然一新，获得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赞许。那么，其他艺术形式就更没有理由不加速前进了。不进则退。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踟躇不前，就会落在后面。我们的一切文艺工作者都需要警惕这一点。

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使我们特别高兴的是，有很大一部分剧目写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和现实斗争生活。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大约有十三四个剧目是写我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的，写部队或写军民关系的，占了全部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一以上。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有所反映。这里有描写中国的劳动人民，由于得到了党的领导，从自发斗争走向自觉的武装斗争的《杜鹃山》和《节振国》等；有描写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著名战斗之一、十七勇士敌前强渡大渡河的《强渡大渡河》；有表现海南地区革命武装部队中女战士的斗争事迹的《红色娘子军》；有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我地下工作者巧妙掩护新四军伤员的《芦荡火种》；有描写我剿匪部队以少胜多的《智取威虎山》；有表现著名的

延安保卫战的《延安军民》；有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侦察部队敌后歼敌的《奇袭白虎团》；有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兄弟民族进行翻身斗争的《黛诺》、《苗岭风雷》。此外，还有表现军民血肉关系的《红嫂》和《掩护》。其他像《革命自有后来人》和《红灯记》，虽然没有直接写部队，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送密电码给部队的红线，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为武装斗争而献身的高贵品质，也是和部队的斗争密切相关的。这些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振奋人心的力量，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我们。通过这些戏，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士，以英勇豪迈的姿态，走上了京剧舞台。在中国的戏曲史上，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如此大量地出现于京剧舞台，这还是第一次。革命的士兵和革命的工人、农民一起，真正成了京剧舞台的主人。我们怎能不欢欣鼓舞！对于部队来说，这些戏也是很好的政治课，它会帮助我们起到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大作用。革命的京剧工作者积极表现革命武装斗争和部队生活的热情，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精神，以及在反映革命武装斗争方面所提供的好经验，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京剧工作者积极表现武装斗争和部队生活，等于给部队的文艺工作增添了大批生力军。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这次观摩演出的事实证明：革命武装斗争和部队生活，是京剧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重要源泉。我们热烈欢迎京剧界的同志们到部队里来，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写兵，演兵。我们一定全力支援



你們。今后，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和京剧工作者，要进一步加强联系，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在文艺革命的大道上，向前迈进。

关于如何搞好京剧的革命化，我在这儿谈几点粗浅的意见，就正于京剧界的同志和其他同志们。

京剧要革命化，首先从事京剧工作的人必须革命化。这是京剧能否真正革命化的决定条件。演工农兵，创造英雄人物，首先要有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要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否则，你就演不像，更不可能演好。所以，人要革命化，除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外，就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加速思想改造，充实创作源泉。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强烈地热爱工农兵，然后才会满腔热情地去写他们、演他们；写起来、演起来，才会得心应手，才会像、才会好。因此，人的革命化，是当前京剧工作者最迫切的课题。这次演出告诉我们：生活问题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问题是一点也做不得假的。即使有表演经验的演员，如果他的生活底子不厚，缺乏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对于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演不好的。

其次，我觉得应该重视剧本创作。这次演出的剧目，大多是从其他文艺形式改编，或从其他剧种移植。这样做是必要的，今后也仍然是戏曲剧本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京剧还应该有自己的创作。其他戏曲亦然。因为各个剧种都有自己不同的特长，有了自己的创作，本剧种的特长就更容易

发挥。我建议，为了帮助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戏曲艺术更快地革命化，更快地使现代戏成为戏曲艺术的主流，作家、艺术家，特别是戏剧家，都要动员起来，多写或学写戏曲剧本。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积极投入这个工作。

戏曲演现代戏要想演好，不但要有剧本，还要有好剧本。有量还要有质，剧本和演出都要过得硬。对于现有的剧本，要反复修改加工，精益求精，努力提高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次演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生活的剧本《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芦荡火种》等，都是很好的剧本。这些剧本所以比较好，就因为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和一再加工，在创作上下了功夫。就以《智取威虎山》为例。上海演出团为了参加这次观摩演出，他们运用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对原剧本进行了仔细的修改，从主题思想到细节，甚至一字一句，都经过了缜密的推敲、琢磨。因而主题思想更加鲜明了，正面形象更加突出了，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的力量增强了。演出上，也力求从生活出发，从加强正面力量出发，去塑造人物，力求掌握京剧的特点去运用程式。因而这个戏给我的印象是崭新的、革命的，是很好的京戏。

再次，要努力保持和发扬京剧艺术的特点。我以为搞京剧革命化，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顽固不化，见了新东西就摇头，听说改革就叹气。这种人生怕演现代戏会损害京剧艺术的所谓完整性。他们对京剧现代戏评头论足，处处都不以为然；或者原则赞成，



具体反对。这是保守派。对这一派我們是不同意的。此外，还有另一种人，他們是贊成改革的，可是他們所主张的改革，不是使京剧革命化，而是取消京剧的特点。他們认为京剧原有的一切技巧都沒有用了，必須重来一套。这一派我也是不贊成的。

随着内容的革命化，京剧的形式必須有所改革，但是，改革也要注意保持京剧的特点。什么是京剧的特点呢？我想了四句話：載歌載舞，大笔写意，依美塑型，以惊扣心。这四句話可能既不完全，也不准确。但我以为它是京剧艺术和其他文艺形式重要的区别所在。京剧是一种既从生活出发，又經過高度提炼了的民族歌舞艺术。它的表演离不开歌舞，而且大多是載歌載舞。我們不能把它改得歌而不舞，舞而不歌，甚至歌舞俱无，只剩了对話。京剧反映生活的方式，主要是据实写意，而不是以自然主义的办法去写实。例如京剧的表演程式，就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加以美化了的一套写意化的动作。这套动作如果运用得好，加以发挥，对于现实生活仍有很大的表现力。《奇襲白虎团》的武打、舞蹈动作，就是活用程式的范例。我們搞改革，假若不重写意，而处处求自然主义的实，景物、道具一切必真，形体动作照話剧演員那样要求，就会使写意和載歌載舞不能发挥作用。京剧的造型要求美，要求神似貌合。比如，穷人穿的衣服也并非破烂不堪，赤胸露膊；人物的对話讲求韵味；語言讲求修辞和节奏；动作讲求舞蹈化；上場下場都有一定的亮相等等。因为它有个依美塑

型的原則，所以整个舞台上协调、和諧的。它既反映了生活，又把生活美化了。最后，我所說的以惊扣心，是指在京剧的表演中慣用一些使人惊异的动作或唱腔，去振奋、感染、打动或抓住观众。例如，一句高亢的唱腔，一个奇特的亮相，一种精采的道具使用，一个技巧很高的舞蹈动作和一段惊险的武打……等，都是使人一惊而扣动心弦。这些表演手段，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财产。用得恰当，变得适度，同样可以表现现代生活，如《智取威虎山》里楊子荣的走边，《奇襲白虎团》里偵察兵从悬崖上下翻的动作，都是用得成功的例子。总之，我們搞京剧的推陈出新，既要革命化，也要民族化（即京剧化）。这次观摩会演，两个方面基本上都做到了。有的做得很好。如《智取威虎山》和《奇襲白虎团》为部队演出时，观众也正是在这两方面报以热烈的掌声。

京剧艺术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观摩演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胜利的开端。我要为之热烈祝贺，大声欢呼。

毫无疑问，京剧这个革命化的运动一定会遇到一些人的抵抗。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阶级敌人，都在攻击我們。但是，他們的攻击，正說明我們的正确。我們要坚定方向，毫不动摇，擦亮眼睛，整齐步伐，朝着既定的目标，勇敢地走去；为社会主义戏曲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出我們的一切力量。



坚决将京剧革命进行到底

· 李 琪 ·

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关键步骤，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京剧演现代戏这一关突破了，不仅京剧发展的方向和前途问题解决了，而且会推动所有戏剧以及整个文化艺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使之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成功，证明了京剧演革命现代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它用生动的事实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对京剧演现代戏的无耻攻击和谰言，也回答了京剧革命的对派和怀疑派的各种责难。它的初步成果已经足以证明：京剧演革命现代戏，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标志着京剧社会主义革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也要看到，这只是京剧革命化在前进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在迈开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是继续前进？还是停止不进？采取后一种态度，正是一切反对派所欢迎的。革命派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将京剧革命进行到底。

继续深入地开展京剧社会主义革命，目前的形势是十分有利的。

第一，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是人民的迫切需要。京剧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但这个上层建筑，长期以来以表现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和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脱离了广大人民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这种旧内容的京剧和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如果再不及时地彻底地加以改革，京剧这个古老艺术就必然会遭到广大人民的遗弃，而日益走向衰亡。北京是京剧的发源地，拥有较多的好演员和较多的京剧爱好者；但近几年来，著名演员上演传统戏，能连演两三场而场场满座的，已属少见。一般只能上三五成座。去年有个剧团一次在音乐堂演出，只卖出四五十张票，不得不中途停演。过去有些同志分析这种现象，往往归咎于季节不好、演员阵容不整齐等次要原因，而看不到京剧表现内容不适应今天人民需要这个根本问题。经过最近以来连续上演许多优秀的革命现代戏，观众骤然增加很多，许多同志思想豁然开朗了，认识到要不要表现我们伟大的时代，要不要为我们时代最大多数的人民服务，的确是关系到京剧的生死



存亡問題。

第二，通过对革命现代戏的排练演出，京剧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社会主义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演革命现代戏有了新的认识，加强了自己的政治责任感。了解到，演革命现代戏不是个简单演现代戏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要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人民服务的問題。也开始认识到，表现现代工农兵斗争生活，是一切革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也是京剧发展的方向。任何文学艺术离开了这个方向，就会丧失它的艺术生命力，京剧也不例外。二是自觉革命的要求加强了，京剧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为了演好革命现代戏，许多同志积极要求深入工农兵生活，积极要求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这种愿望和行动，对京剧工作者来说，的确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由于排演革命现代戏，不断体验和学习戏中英雄人物的先进思想和高贵品质，京剧工作者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已经出现互相促进、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新风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人相轻、争角色、留一手、斤斤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封建师徒关系等旧思想、坏习气，得到进一步的克服。人与人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建立和发展起来了。三是艺术创作态度更加严肃认真了，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京剧工作者的这些精神面貌上的变化，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却是很可贵的。随着京

剧革命的深入发展，这种变化会越来越显著。我们应当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推进京剧革命的动力和思想基础。

第三，党对京剧革命的领导加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十分重视这次京剧改革。党把这次京剧改革当作整个文化革命的重点来看待，当作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来看待，这是京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说明了京剧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些主客观的有利条件，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总结过去成功的和失败的經驗，努力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就一定能够推动京剧革命大踏步地前进。

京剧如何演好革命现代戏，还需要不断摸索經驗。根据北京市前一阶段的实践看来，我觉得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下面几个问题，对京剧演好革命现代戏和京剧革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敢不敢坚持京剧演革命现代戏的方向，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场斗争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立场问题。两者常常是掺合在一起的。但从总的来说，这场斗争是阶级斗争在京剧改革问题上的反映。我们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中，就曾遇到某些人的反对。国际上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曾经就此进行无耻攻击，咒骂说京剧演现代戏是对传统艺术的“摧残”。我们国内也有些保守分子公开写文章，认为京剧只能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演工农兵，只能演



死人，不能演活人，即所謂“絕對分工論”。按照这种意見去办，其結果只能是取消了京剧，因为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京剧还有什么前途呢？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排演現代戏，必須“大胆突破”，“只要是現代戏就行，不管他是不是京剧”。京剧要演革命現代戏，需要“大胆突破”；但把“大胆突破”同新的形式的創造对立起来，那就錯了。按照这种意見去办，其結果也是取消了革命的京剧現代戏，最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还得回来。

贊成京剧革命或反对京剧革命，这场斗争今天还未結束。在这里使我們深深感到，京剧革命的确是一场尖銳的、复杂的斗争，要使京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完成改革京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文艺方向，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絕不后退，絕不动摇，对一切錯誤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敢不敢用高标准来要求京剧演革命現代戏，是京剧革命化道路上另一重大原則問題。过去京剧也演过一些現代戏，为什么保留下来的很少？这里有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用什么标准来要求革命現代戏的問題。經驗告訴我們：用低标准来要求現代戏，认为今天能演“話剧加唱”就“好得很”了；或者片面地追求数量，不讲求质量，粗制濫造，結果上演几場就沒人看了，最后必然是敗坏革命現代戏的声誉，挫伤京剧工作者演現代戏的信心和积极性，并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

什么是高标准？那就是革命的内容和尽

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也就是說，內容必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而艺术形式必須保持京剧的风格和特色。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特別演現代戏經驗还不多的时候），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創造性的劳动。从北京市这一时期排演的几个現代戏来看，只要认真对待，虚心听取各方意見，反复修改排练，不断加工提高，高标准，高质量，即内容和形式的統一，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在这方面缺乏信心的各种說法和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京剧改革为的是发展京剧，不是消灭京剧，也不是改成另外什么剧。因之决不能借口內容的改革而取消京剧的特色。内容和形式是辯证的关系，前者决定后者，但后者反过来又影响前者。京剧內容变了，必然要带动艺术形式的变化。在內容已經改变之后，艺术形式的运用就具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因之，京剧要演好革命現代戏，不重視內容是不对的；同样地，輕視形式也是不对的。只有做到内容和形式的諧和一致，才能創造出受广大群众欢迎的高质量的革命現代戏。在京剧的继承和革新問題上，馬克思主义者反对任何抱殘守缺、頌古非今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反对一切不尊重京剧特点的簡單化的、主观主义的作法。

北京市最近演出的《芦蕩火种》等戏，坚持了高标准的要求。既要求它有革命的思想性，也要求它有較完美的艺术性；既要是現代戏，又要是京剧。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有的人看了五



六次《芦荡火种》还愿再看。虽然这些戏还有某些缺点，还需要在今后演出中不断修改和提高，但现在看来，对革命现代戏的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利于京剧革命和发展的。

三、敢不敢创造我们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典型的人物，特别是正面的英雄人物，是演好革命现代戏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京剧过去演过的革命现代戏，很多都没有保留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戏中的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创造的还不够好。我们革命的文艺作品，必须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①。文学艺术是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感染人、教育人的。我们社会主义的舞台上，如果没有创造出我们时代的各种典型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那么用什么来教育人民？用什么来推动历史前进？京剧产生于封建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大量的经过美化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他们服务。我们今天京剧舞台，既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阵地，为什么不创造更新、更美、更高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来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必须大力创造各种各样的正面的典型人物，写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②的作品。在这方面，我们今天许多文艺作品都还很不够，还不能把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地反映出来，在京剧舞台上更是这样。另外，有些正面人物也还存在有某些概念化、

简单化的缺点。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文艺工作者不蹲点，深入工农兵生活不够的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些问题是会得到逐步解决的。

在我们舞台上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时，当然不能把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放在同等的地位，甚至把反面人物放在喧宾夺主的地位。这决不是说反面人物并不重要。英雄人物只有在和反面人物作斗争中才能显示他们的光辉形象。把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放在首要地位，同时也注意演好反面人物，才能在舞台上树立英雄榜样，启发和帮助人民去和一切反动的落后的事物作斗争，发挥革命现代戏的战斗作用。

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了许多优秀的剧目，在创造正面英雄人物形象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很好总结、学习、推广这些经验。北京市的几个京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箭杆河边》、《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等戏，在创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当然，有的还不够理想；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把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作为我们创作的首要任务，我们京剧舞台就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典型、更理想的英雄人物艺术形象，从而使革命现代戏真正地、巩固地占领京剧舞台。

四、敢不敢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也是使京剧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一个重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363页。



大問題。任何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总是在和旧事物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应当说还是一颗新生的幼芽，我们必须热情地帮助它成长，对它在开始出现时难免产生的某些缺点，采取譏笑和打击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用京剧传统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时，肯定是有矛盾的。在解决这种矛盾时，既要改造旧的，又要创造新的。在这批判继承和创新之间，有的可能运用得好，有的就可能运用得不好。凡是从工农兵生活出发而又尊重京剧特点的任何革新尝试，我们都应当热情鼓励，善意地提出改进意见。不能因为一招一式、一字一腔运用不好，而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采取“摇头派”的态度。一种艺术形式要形成完整的一套程式和表现方法，需要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京剧艺术发展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了创造一种完整艺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文艺界也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我们有的支持了，但有的还支持不够，我们应当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坚决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坚决做京剧革命的促进派！

五、敢不敢深入工农兵生活，是京剧演好革命现代戏的关键。深入工农兵生活，对一切文艺工作者都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但对京剧工作者来说就更为重要。因为京剧工作者过去很少接触工农兵，对工农兵了解的很少，甚至根本不了解。现在要演革命现代戏，要创造出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不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岂

不一切都成为空谈。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把了解工农兵、熟悉工农兵的工作当作“第一位的工作”。京剧工作者要演好革命现代戏，现在应当是把下去蹲点、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的时候了。深入工农兵生活，对于作家、导演、演员，对所有的京剧工作者都是十分重要的，是演好革命现代戏的根本关键。

京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在这场阶级斗争面前，除了国内外敌人还要继续进行反对和咒骂外，在人民内部也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思想阻碍和斗争。运用传统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内容，也还存在许多具体困难需要解决。特别是京剧工作者本身还存在许多弱点，主要是思想革命还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工农兵生活还不熟悉，对培养京剧红色接班人还注意不够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京剧革命的方向，既要看到京剧革命的大好形势，也要看到自己的弱点，努力改造思想，努力深入工农兵生活，虚心学习，戒骄戒躁。一方面要蔑视困难，不受一切反对派或摇头派吹来的冷风所动摇；另一方面也要十分重视解决京剧改革中可能发生的具体困难。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胜不骄，败不馁，冷热结合，稳步前进。只要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现在，京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凡是有出息的京剧工作者，都应当投身到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来，坚决将京剧革命进行到底！



評周谷城艺术观的哲学基础

汝信

周谷城先生在近年来接连发表了一些美学文章，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中的意见分歧，是在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上的根本性的分歧，有必要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分清是非，辨明真理。

我们认为，周先生在这些文章里尽管口头上也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甚至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实际上却在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理论中借取武器，拼凑出一套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艺术论，妄图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相对抗。许多同志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周先生的这套错误的艺术论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本文只就周先生的哲学世界观的一个方面，进一步揭露他的艺术论的本质及其必然产生的后果。

周谷城先生的艺术论是以他的错误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他的哲学世界观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抹煞矛盾、回避矛盾、调和矛盾，宣扬矛盾调和论和矛盾熄灭论。所谓“无差别境界”或“绝对境界”，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

根据周先生的解释，“无差别境界”就是“没有矛盾的境界”，就是“心身统一”、主客观“融为一体”的境界。关于这种“无差别境界”的存在，周先生自己就有自相矛盾的不同说法。他时而认为这种境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着的”，时而又说“这境界在生活上是少有的，但亦不是绝对的”。但是，不管怎样，在他看来“无差别境界”是确实存在的。为了论证这种境界的存在，周先生也用了许多意义很不一致的概念：时而把它和对立的同一混为一谈，时而把它解释成旧矛盾得到解决、新矛盾尚未出现之前的“空隙”，时而又把它说成是事物的“相对的、静止的、矛盾解决了的状态”。所有这些说法都暴露出周先生的诡辩，暴露出他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的普遍规律，用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去对抗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

周先生对“无差别境界”的论证，没有一条不是直接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对立统一规律的。

第一，根据对立统一规律，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无论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自始至终



存在着矛盾。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都是特定的对立的统一，而矛盾的统一性只能理解为矛盾的两方面互为存在的条件以及依据一定条件而相互转化。

这样看来，对立的统一正是说明矛盾的普遍存在，说明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周先生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曲解对立的统一，把矛盾的统一性硬说成没有矛盾、没有差别，以此来论证他的“无差别境界”的存在，这只能证明他所说的所谓矛盾统一是和辩证法所理解的对立统一毫无共同之处的形而上学的同一。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同一中，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和相互转化都被一笔勾销，融合成为一个没有差别、没有矛盾的所谓“统一体”，矛盾被调和了。这实质上就是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法针锋相对的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论。

第二，如果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整个世界的矛盾发展过程，那末我们就必须承认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正是矛盾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构成事物发展的前进序列。矛盾发展是不间断的，一个旧矛盾的解决就是另一个新矛盾的开始。“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① 马克思主义者既承认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具体矛盾过程有着质的区别，又承认事物发展的总的矛盾运动是不间断的。

与辩证法根本相反，周先生硬要在新、旧矛盾过程之间插入一个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把新旧过程人为地截然分开。照他说来，“生活上的问题是一个又一个的来，矛盾是一次又一次的来。但来了，就逼着我们去解决；问题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上必有无差别的境界出现。”因此，无差别境界使矛盾过程暂告中断，要等到新的矛盾出现，发展才能继续进行，而新矛盾的出现和旧矛盾的解决没有任何关系，它产生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别有所在”。这就是他的所谓“断而相续”论。他用这种观点去看一切事物的发展，把历史也说成是“断而相续”的“一段一段的斗争”。这种“断而相续”论，完全否认对立面双方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旧统一体的破裂和新统一体的产生、旧事物必然为新事物所代替的矛盾发展规律，断言矛盾运动是可以中断的，因而事物发展的动力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之外。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和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相对立的庸俗进化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而事物运动则采取两种状态，即相对地静止的状态（量变）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质变），“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②，因而矛盾的斗争始终存在于这两种状态中。周先生则把事物的相对地静止的状态曲解为没有矛盾，为他的“无差别境界”寻找论据，这样他就既抹煞了事物的量变状态下的矛盾斗争，又否认事物的矛盾发展由量

①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5、320页。



变到质变的飞跃。这也仍然是一种庸俗的形而上学观点。

从上面可以看出，周先生的“无差别境界”说的实质，就是企图用形而上学去偷换唯物辩证法，特别是阉割掉辩证法的革命的灵魂、即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承认“无差别境界”的存在，就必然导致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就会在矛盾的表现还不明显的时候（如在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新矛盾刚刚发生的情况下）抹煞矛盾，鼓吹矛盾熄灭论，或者在无法否认矛盾存在的时候调和矛盾，把对立的统一硬说成对立面的融合为一，宣扬矛盾调和论。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和革命的辩证法相敌对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必然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抹煞矛盾、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是周谷城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当他在抽象思维中进一步虚构出一个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并且把这样一个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主观臆造作为他的全部“理论”的基础时，他就陷于主观的幻想而走向了赤裸裸的唯心主义。

但是，周谷城先生的错误不止是断定“无差别境界”的存在，而且还在于把这种境界奉为“令人羡慕”的最高生活理想。这就涉及到他究竟提倡什么样的人生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截然对立。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对矛盾抱怎样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分为二是世界发展的根本规律，矛盾不仅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泉源。正如毛

泽东同志所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①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把矛盾看做最正常的现象，承认充满矛盾斗争的生活是唯一现实的生活。他们决不回避矛盾斗争，决不幻想遁入什么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而是勇敢地去正视矛盾，揭露矛盾，研究和掌握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转化，通过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去不断地解决矛盾。把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运用于当前社会生活，就必须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就必须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因而就要坚持进行阶级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革命者所应有的处世态度，是一种战斗的人生观。

相反，在周先生看来，矛盾的存在虽然无法否认，甚至生活中的矛盾对立是主导的现象，但是矛盾的生活本身却是令人痛苦的、叫人“不好受的”。用黑格尔批评某些形而上学论者的话来说，矛盾“好像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一种暂时性的病态的发作”^②。据周谷城说，矛盾斗争本来只能算作“生活的反面”，只有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才是所谓“生活的正面”，才是值得向往和祈求的理想的生活。

那么，所谓“无差别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用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没有波澜或震动，没有问题或矛盾的宁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页。



静生活，像没有微波的秋水一样：既没有客观的任何变动，也没有由这变动引起的任何主观的要求；主观客观云云，完全统一于一体”。为了使这种生活境界更富于蛊惑力，周先生还不厌其烦地用种种美妙的词句作了动人的描写，什么“自自在在，无罣无碍”呀，什么“大乐与天地同和”呀，什么“心情舒畅”、“消魂大悦”呀，如此等等。说来说去，无非是想说明在斗争的生活中是没有幸福的，阶级斗争是叫人心情不舒畅的，只有避开矛盾，取消阶级斗争，远离革命，才能享受到生活的清福。显然，周先生所鼓吹的这种腐朽的生活理想，正是反映了社会上少数人千方百计地妄图抵制阶级斗争的反动心情。

“无差别境界”之说虽然是周先生的精心“杰作”，却决不是什么新创造。历史上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曾经鼓吹过这种境界，而这种唯心主义的虚构也总是适应于不同时期的剥削阶级的某种需要。处于没落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当他们看到社会矛盾尖锐地展开，历史车轮明显地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前进时，总是希望在革命风暴里麻痹人们的斗志，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避难所。周先生在今天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还要搬出这套理论来向人们推销，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散布对阶级斗争的厌恶情绪，诱使人们逃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应该指出，周先生的这套理论只是用来麻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至于他自己，却并不逃避阶级斗争，不想遁入什么“无差别境界”，而是积极地参与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所谓“无差别境界”无非是叫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放弃阶级斗争、让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恣意散布而已。

当我们对周先生所宣扬的这种人生哲学提出批评以后，他不仅没有接受批评，反而教训我们说：不要“为斗争而斗争”，前人栽树为的是后人乘凉，不是为了叫后人 also 去栽树。言下之意实质上就是说，前人斗争成功，后人就可以袖起手来享福，树既然已经栽了，躺下来乘凉就行了。什么“不断革命”、“世界革命”，什么“把革命进行到底”，都可以置之脑后。如果用这种思想去教育无产阶级接班人，那会把人们引导到哪里去呢？帝国主义者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和平演变”的希望，岂不就是寄托在这种只知道“乘凉”、不想革命的蜕化变质分子身上么？

周先生不仅把“无差别境界”说成个人的生活理想，而且甚至还用它去解释整个历史的发展。照他说来，“历史前进云云，即斗争过程中的矛盾一次一次的获得解决，无差别的境界一次一次的获得接近”。在他那里，“无差别境界”成为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那样的东西，矛盾的调和被当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而历史无非就是不断地接近于这个目的的过程。不用说，这种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毫无共同之点的。

二

周先生既然虚构出“无差别境界”这个人间的极乐园，当然还要设计一条通往这个极乐园的道路。在他看来，艺术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艺术怎样使人达到“无差别境界”呢？按



照周先生的说法，这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欣赏者通过艺术欣赏。

让我们先看第一种途径。周先生认为，在“无差别境界”之内是没有艺术创作可言的，艺术创作开始于生活的宁静遭到破坏、生活发生波澜或震动的时候。这时艺术家陷入了困境，“主客观的矛盾，心身的不统一”，于是就有了创作的要求，经过主客观的斗争，把主观表现为客观，完成了艺术作品（他又把这叫做什么“理想的虚拟的实现”），艺术家就又复归于“无差别境界”。他说：“创作开始之先作者有强烈的主观要求；创作进行之时，主观与客观有尖锐的冲突对抗；创作成功之后，主观应已被表现为客观了。主观被表现为客观之时，作品完全出现之时，作者应已斗争胜利，完全由矛盾中解放出来；如有所谓绝对境界，作者此时应已一度进入绝对境界；如有所谓绝对自由，作者此时应已一度获得绝对自由。”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艺术创作只是艺术家为了克服“主客观的矛盾，心身的不统一”，从矛盾中解放出来而进入“无差别境界”的一种手段，而艺术的本质则是自我表现。

在这里，周先生的错误在于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否认艺术必须反映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把艺术创作单纯地说成是主观表现为客观的过程，而且把艺术创作看做艺术家个人克服“主客观的矛盾”的手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艺术首先必须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而社会生活

则是艺术的唯一源泉。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这种反映当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在这反映过程中，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因此要克服这种矛盾，艺术家就必须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客观的社会生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人民群众这一边，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使主观尽可能符合于革命的客观现实，去正确地反映客观。正是为了在艺术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深刻地描绘出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和他们之中的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所以革命的艺术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参加火热的实际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明的这条正确的道路，艺术家就必然会走到脱离现实斗争或者歪曲现实生活的泥淖中去。

周先生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艺术源泉的表述，公然声称，“不能说生活就是艺术源泉”，只能说情感是艺术源泉。在他看来，艺术仅仅出于人的主观，而与客观世界无涉。他在《礼乐新解》一文中明明白白地说：“乐出于主观，礼出于客观”，“客观斗争是礼所涉的范围”，“主观的感情则是乐所涉的范围，扩大一点说，也是一切艺术所涉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2页。



的范围”。总之，艺术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情感的体现（即所谓“使情成体”）。谁都容易看出，周先生所鼓吹的是一种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主义的艺术论。根据这种艺术论，艺术家只须把自己的情感表现于物质，使主观表现为客观就行了，根本不必去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不必去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当然也就不需要去深入生活斗争和改造思想了。而他所说的用“主观被表现为客观”的办法去克服主客观之间的冲突对抗，不承认主观本身首先必须在革命的实践中加以改造，然后去正确地反映客观，而以主观作为出发点，通过狂妄的“自我扩张”去征服和吞并客观，其结果必然使艺术创作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狂热的“自我表现”。这种“理论”和臭名昭彰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反映着反动资产阶级艺术家反对思想改造，竭力想按照自己的主观世界去歪曲客观现实的强烈愿望。显然，这是一条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走这条错误的道路，除了造就出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的资产阶级艺术家和鼓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文艺作品之外，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周先生既然排除了社会生活的矛盾斗争在艺术中的反映，那末在他看来艺术家所面临的矛盾就只有自己“主客观的矛盾，心身的不统一”这一种矛盾了。他所谓的“主客观的矛盾”，其实说的就是艺术家个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他对于个人和社会

环境又都没有阶级分析。他笼统地认为，正因为社会环境使艺术家个人感到“不好受”、“痛苦难安”，所以艺术家要在创作中把痛苦和不满发泄出来、表现出来，然后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重新达到“心身统一”。这样，艺术创作就完全变成艺术家的自我解脱的手段。似乎艺术家进行创作不是为了替阶级斗争服务，倒是为了自己尽量倾吐对社会的不满，以便进入什么“无差别境界”、得到什么“绝对自由”。

周先生的这种艺术创作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错误的，而对社会主义的艺术创作实践来说则是特别有害的。在以往剥削阶级所统治的社会里，真正革命的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达的首先和主要地是反映广大的被压迫人民群众的痛苦和不满，而不单纯是他私人的痛苦和不满，他进行创作更不是为了自己得到精神解脱，而是把它作为揭露和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手段。在这里，如果说什么“主客观的矛盾”的话，那就是革命者的主观，同剥削社会的客观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艺术创作完全应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歌颂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鞭笞一切反对革命改造的保守的反动力量。艺术家如果是一个革命者，他的革命的思想感情，即他的主观世界，必然使他在客观现实中热烈歌颂革命的、新生的事物，反对腐朽、没落和反动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笼统地、抽象地鼓吹什么艺术家和社会环境的冲突使艺术家“痛苦



难安”，因而产生创作，那就是要艺术家对主观和客观都不作阶级分析，只是在创作中去发泄个人对社会环境的不满，这只会使艺术创作成为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的手段。周先生的这套理论正好表现出这样一些在灵魂深处保留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艺术家们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思想改造的反动情绪，他们憎恶阶级斗争，把艺术创作当做逃避现实斗争的防空洞，在创作中肆意发泄个人基于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苦恼不满。这并不能把他们引导到“无差别境界”中去，只能把他们引向与革命的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地位。

归根到底，我们和周谷城的分歧在于，艺术创作要不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要不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提出一条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根据阶级斗争的逻辑，资产阶级在文艺创作的领域内也像在其他思想领域内一样，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周先生恰好就充当了它的代言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通往所谓“无差别境界”的第二种途径。根据周先生的说法，人的生活境界无非有两种，即科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科学境界即是差别境界，艺术境界即是无差别境界，而无差别境界是在艺术欣赏中达到的。他说：“无差别的境界，从正面说又叫绝对境界……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如听音乐或听京戏的人，听到入神之时，自我和音乐，和唱腔完全融为一体，可以说超越了差别，进入了绝对。”由于

艺术品是以情感人的，只诉诸人的感情，而不诉诸人的理智，所以当欣赏者处于艺术境界时，他的“全人格受到震动，而不自知所以然”，这种情况“颇近乎一般所谓直觉”。

在这里，周先生的错误在于把艺术看做使人忘却矛盾斗争的单纯的娱乐品，根本否定了艺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社会作用，抹煞了艺术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艺术带有一定的娱乐性，但是，这种娱乐性绝对不应当被夸大为艺术的主要作用。艺术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论哪个阶级的艺术，它的政治作用和思想作用总是占第一位的，而它的娱乐作用则始终是次要的，并且是从属于前者、为前者服务的。的确，有些资产阶级美学家如叔本华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纯艺术论者”，是把艺术欣赏说成使人摆脱矛盾斗争、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那种方便手段的。但是，他们所鼓吹的这套理论本身就是反动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它的目的在于用颓废的艺术来毒害人民群众，麻痹他们的革命意志，诱使他们脱离现实的斗争，以维护剥削阶级所统治的那个“有差别的”社会。周先生在今天贩卖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也同样只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

我们也不否认，艺术和科学是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作用的，但却不能说艺术的作用仅在于动人情感而排斥理智，使人受到感动“而不自知所以然”。革命的艺术要起



思想教育的作用，就不仅需要诉诸人们的情感，而且也要诉诸理智，要求人们思考，而它的特点在于不是以逻辑的论证、而是以鲜明、生动、丰满的形象去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因此，它不仅要感动我们，而且也要提高我们的认识，使我们理解它所要说明的东西。周先生用反理性的观点片面夸大作品“以情感人”的作用，根本不谈作品应该用什么阶级的什么样的感情去感动人，并且把受感动的状态说成“无差别境界”。这只会使人迷失方向，被各种非无阶级的不健康的感情以至反动的感情所迷惑，哪里还谈得上艺术对人民群众的有益的思想教育作用呢？

其实，艺术究竟应该起怎样的社会作用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已解决了的。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革命的文艺首先必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目的决不是要使人民群众忘却矛盾斗争，进入什么虚无缥缈的“无差别境界”中去，而是要通过艺术手段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矛盾，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激起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生活和矛盾斗争中去。

周先生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的提法，偏要提出自己的一套不伦不类的讲法，说什么艺术的作用在于“填补不足”、“纠正错误”、“发扬优点”。这些说法虽然十分荒诞可笑，但它们却是另有含意的。

凡事要看本质，他既然断定“无差别境界”的存在，又把艺术看做达到“无差别境界”的手段，那就必然会得出否认艺术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否认革命艺术要为无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结论。这是周先生把他的“矛盾熄灭论”和“矛盾调和论”的哲学观点运用于艺术而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

由于周先生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艺术，因此他在解释许多具体现象时就必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矛盾熄灭论”和“矛盾调和论”仍然是周先生的所有观点的基础，它们就像古罗马门神雅努斯的前后两副面孔一样，轮番出现。当他觉得可以抹煞阶级矛盾的时候，他就否认阶级区别，鼓吹超阶级观点；当他觉得阶级矛盾难以轻易抹煞的时候，他就力求调和矛盾，企图使对立的阶级“汇合”成所谓“统一整体”。他关于所谓“真实感情”和“时代精神”的说法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的标本。

周先生声称，艺术所体现的必须是“真实感情”，而不能是“阶级感情”。照他说来，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阶级感情”这个概念过于“含糊笼统”，因此不能使用，真实感情的范围大于阶级感情，讲艺术理论“当取范围较大者”。在他那里，是否体现“真实感情”乃是衡量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他说：“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情感的，都是可以动人的……一件作品存在几十年，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只要它所体现的情感还是人类中可能有的，其感人的作用亦必随着存在，是日不朽。”

周先生的这套理论一点也不新鲜，它正是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拙劣的翻版。资产阶级人性论者离开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抽掉人的社会性去谈论抽象的、“一般的”人，他们把“人性”看做人所共有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本质，并且用这种共同的人性去观察和衡量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现象。他们也非常喜欢宣扬所谓人的“真实感情”，在他们看来，“真实感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因而也是任何时代、任何人所必然具有的。艺术正应该去体现这些“真实感情”，它们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而艺术之所以不朽，也正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人性中的普遍的、永恒的东西。人性论者的这套谬论得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热烈响应，他们也同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模一样地高唱什么“人类有共同感情”的滥调，并且要求艺术去体现这种所谓全人类的感情。在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汹涌澎湃地展开、阶级斗争极度尖锐化的今天，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普遍人性论的用心是昭然若揭的，他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取消阶

级矛盾和对立，否定阶级斗争，以达到取消革命、反对革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当前关于人性论的说教具有特别反动的性质。周谷城在这个时候出来公然附和这种反动谬论，事实上是充当了可怜的应声虫的角色。

“人性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每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共同人性”，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共同感情”，有的只是带阶级性的人性和带阶级性的感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代替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①，从而得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一伟大的科学结论。存在决定意识，人的思想感情是由人的社会生活决定的，而在阶级社会里，人总是作为一定的阶级的一分子参加社会生活的，他的思想感情也就不能不带有阶级的烙印，哪里会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呢。至于艺术要体现真实感情，那是谁也不反对的，但所谓真实感情也同样是具有阶级性的，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真实感情，也总是要求艺术去体现本阶级的真实感情。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超阶级的、共同的“真实感情”是从来也没有的。无产阶级艺术所体现的革命的、真实的感情，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眼里就是“矫情”，就是不合乎“人性”；而现代资产阶级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版，第31页。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页。



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藝術中所宣揚的所謂“全人類的”感情，實際上也無非就是稍加偽裝的反動資產階級的真实感情而已。

周先生覺得階級感情的範圍太小，仿佛階級感情一定是不“真实”的，因此硬要把範圍從階級擴大到“人類”，用超階級的“真实感情”去代替“階級感情”。这样就使他所說的“真实感情”成為真正“含糊籠統”的東西。什么样的感情？哪一個階級的的感情？這些叫周先生煩惱的問題都在不分階級、不分敵我、混沌一片的“真实感情”面前自然消失了，于是周先生也就當然可以欣然進入沒有矛盾的“無差別境界”了。

如果說周先生在有關“真实感情”的問題上根本抹煞階級矛盾和階級區別，鼓吹超階級的資產階級人性論，那末在有關時代精神的問題上，他就採取調和階級矛盾的手法。

周先生表面上並不否認在特定的時代里同時存在着不同階級的不同的思想意識，甚至後來還不得不承認它們是相互鬥爭的；但他堅持時代精神是由同一時代中不同階級的思想意識所“匯合”成的所謂“統一整體”，而藝術所應該體現的正是這樣的“統一整體”。當我們批評他調和階級矛盾，把不能調和的東西硬要“匯合”成統一的、超階級的時代精神後，他不僅毫不承認錯誤，反而還振振有詞地詭辯說為什麼部分不能構成整體。

但是，周先生的詭辯不僅不能證明他的說法的正確，反而越加暴露出他對辯證法的無知。他把時代精神解釋成由部分相加而構

成的“統一整體”，這恰好說明他所理解的所謂“統一整體”完全不是辯證法所說的對立的統一，而只是形而上學的“合二而一”。在辯證法看來，對立的統一只能意味着矛盾着的雙方互相依存、互相鬥爭和互相轉化，它們之間的統一永遠是相對的，而它們之間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因為這樣，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互相矛盾的事物是不可能“匯合”成“合二而一”的那種“統一整體”的。像周先生那樣把“統一整體”說成各種矛盾着的事物的機械的“匯合”，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矛盾調和論。

其實，馬克思早就尖銳地斥責過諸如此類的矛盾調和論。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針對黑格爾調和矛盾的錯誤說道：“真正的極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調和，就因為它們是真正的極端。同時它們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為它們在本質上是互相對立的。”^① 後來他在批判英國經濟學家穆勒時又曾指出，凡是“在經濟關係……包含對立性的地方，在矛盾和矛盾的統一存在的地方，他總是把對立物的統一強調，而把諸對立物否定。他把對立物的統一，化為對立物的直接的同一。”^② 馬克思的這些一針見血的批評對周先生來說也是完全適用的。周先生的錯誤也正在於企圖用他所理解的時代精神作為中介去調和極端對立的各階級的思想意識，並且在各階級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5頁。

②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3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99頁。



思想意識构成对立統一的地方，強調它們的統一而忽視对立，从而把这种統一理解为它們的直接“汇合”。

周先生所鼓吹的这套“汇合”論不仅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們根据一分为二的辯证法观点去理解当前的时代精神，那末超階級的、无所不包的統一的時代精神是不存在的，当前的时代精神只能是指推动現時代历史前进的无产階級的革命精神，而决不能指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階級的反革命精神，因此只有体现前一种革命精神的艺术才称得上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但是，根据周先生的錯誤观点，上述的两种精神却应该“汇合”成一个“統一整体”，無論体现哪一种精神的艺术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有同样的存在权利。这就必然导致对当前时代精神的严重曲解。試問，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动的帝国主义思想、現代修正主义思想怎样能“汇合”成一个“統一整体”呢？統一的時代精神怎么能既包含无产階級的革命意識，又包含資產階級的剝削思想以至殘余的封建迷信思想呢？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这些对立面怎么能够調和呢？很清楚，在无产階級目前已經居于統治地位的情况下，出来公开否认无产階級的革命思想意識是不可能的。于是周先生伪装“公正”，要求給予那些已經喪失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反动思想意識以同样的一席之地。这正是处于劣势的沒落階級的一种新花招，实际上是妄想在各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平共处”的幌子下，用各种非无产階級的反

动思想意識吞并掉无产階級的革命思想意識。如果我們听信了周先生的这种謬論，那末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思想的批判就可以根本取消了，資產階級思想、以至封建迷信思想（如“鬼戏”之类）也就可以任其在我們的文艺中“合法地”泛滥了，因为照他說来，那些牛鬼蛇神般的东西岂不都是构成当代时代精神的“部分”嗎？拆穿了說，他的理論在客观上是适应反动階級的需要，为反动文艺开辟道路的。它只能起取消国际和国内的文艺战綫上的階級斗争的作用，为我国文艺領域中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階級思想和反社会主义思想保留地盘，为它們爭取“合法地位”制造理論根据。这是他的矛盾調和論所必然引向的实际結果。

* * *

从上面可以看到，在周谷城的錯誤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产生了怎样錯誤的艺术論。我們今天生活在階級斗争空前剧烈的伟大革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企图推銷矛盾調和論和矛盾熄灭論，虛偽地叫嚷什么躲到“无差別境界”中去，用魯迅的話來說，“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①，是注定不能實現的幻梦。我們要正告周谷城先生，你想把人們拖进“无差別境界”中去是絕對办不到的，你自己不从这个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噩梦中觉醒过来，也必然会在革命的現實面前碰壁的。

^① 《論“第三种人”》。《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頁。



美国垄断资本与原子军事工业

修 維 仁

規模庞大的原子军事工业

“現代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結果。”^①远在四十多年以前，列宁就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軍事化已經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②。从那时起，軍国主义、經濟生活的軍事化又有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目前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美国的許多工业部門都深深地卷入了扩軍备战的漩渦，而像原子工业这样的部門，更是一誕生就是为战争服务的。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广島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时起，核武器就成为美帝国主义用以实现它奴役世界的野心計劃的法宝。战后十多年来，核备战、核詭詐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国策，杜魯門、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約翰遜等大垄断資本的代理人，在他們执政期間无不疯狂地进行核扩軍，力图保持美国的核垄断和取得核优势。迷信新式武器的美国垄断資本集团早已建立起一个規模庞大、在軍事生产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原子工业部門。

美国的原子工业是“国防机密”，生产裂变物质和核武器的厂房設備、試驗室及有关設置都是“国家财产”。自一九四〇年六月

起，美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陆軍工程兵团曼哈頓工程区和战后的原子能委员会等机构，以負責这一軍事工业部門的管理和发展。二十多年来，随着原子工业的成长和核武器的囤积，美国政府所耗費的資財达到惊人的地步。截至一九六四财政年度，政府对这一部門的投資总额已达三百五十八亿美元之巨，这个数字比通用汽車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等美国五个最大工业垄断組織的资产总和还大。現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各种工厂和設置至少遍及美国二十七个州，占用土地二百一十万亩以上，建筑面积达七千六百七十万平方英尺，拥有职工約十四万人，其中仅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有二、三万人。原子工业每年耗用电力占全国发电总量的十分之一，相当美国全部家庭用电的半数。

誰是控制者？

原子工业是垄断資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

① 《好战的軍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軍国主义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6頁。

② 《論“廢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6頁。



体、国家机构进一步从属于大垄断组织的典型。这个由国家兴办的巨大工业实际上完全操纵在少数最大垄断集团之手，成为它们攫取垄断利润的重要来源，所谓“国家所有”不过是用来掩盖垄断组织盗窃国库的行为、欺骗美国人民的幌子而已。

众所周知，原子能是一个最新的科学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原子能的利用还处在研究探索的初级阶段，从生产裂变物质到制造原子武器是相当复杂的工艺过程；在需要垫支巨额资本而能否迅速获得厚利尚未可知的情况下，美国大垄断组织就要国家出面创办，替它们承担一切风险。因此，原子工业一开始完全由国家投资设厂、经营管理，像第一批原子弹就是在田纳西州奥克里季和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政府工厂中制造的。当时，一些大垄断组织通过承包原子试验室和原子工厂的建设工程（包括设备），委派重要代表和科技人员参加和领导原子弹的研究、发展工作，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这一新兴部门。

根据一九四六年原子能立法，美国政府决定把所有原子工厂和原子实验室都交由“可靠”的私人承包商经营，这意味着取消国家对原子工业名义上的控制。而所谓“可靠”的私人承包商，正是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原子弹制造各种过程的一小撮最大的电气和化学垄断组织，像摩根财团的通用电气公司、杜邦财团的杜邦德尼莫公司、洛克菲勒和梅隆财团都有巨大影响的联合碳化物公司、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共同控制的桑迪亚公司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子公司）等四家公司，现在就包揽了美国“原子能计划”全部工作的半数以上，前三家大垄断组织（在原子工业中有三大家之称）所使用的政府厂房设备就占政府原子工业全部固定资产的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而政府其余的原子项目也大部分由与上述财团有关的巨大公司、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所分担。到一九五四年，美国政府进一步把原子工业向私人企业“解禁”，在同一年通过的原子能立法中规定：私人企业可以根据原子能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生产、使用和输出制造裂变物质的反应堆以及建设原子发电厂等等，至此可以说原子工业的非国有化彻底完成了。而摩根、杜邦、洛克菲勒、梅隆等这些在原子工业中久居特殊垄断地位的大财团和它们的十余家巨型公司就成为总揽官方、私人、军用、民用、国内乃至很大一部分国外裂变物质、核武器及核设备的最大制造商，是美国原子工业的真正控制者。

无本万利的生意

在国民经济高度军事化的美国，军事工业是最有保证、最能赢利的部门。同一般经营民用的大企业相比，军火公司的利润率通常要高出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尽管原子商人的获利情况极为保密，但是我们从下面一些极不完全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子工业确是一宗无本万利的生意。

在美国，原子承包商和其他军火承包商不同，后者一般是按照政府订货合同生产，然后把产品卖给政府，基本上还是买卖关系



(当然和一般商品交易不同)；而原子工业从原料、设备到产品都是国家财产，原子承包商只是按照合同计划“代为加工”，这里没有买卖关系。美国政府对原子工业的监督一般只限于投资方面，而在日常经营、供应物资的采购等方面一向任凭承包商为所欲为。这些承包商现在每年得到的补偿费达二十五亿美元之巨，相当他们所使用的政府厂房设备总值的三分之一，或原子能委员会每年全部开支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肯定地讲，补偿费中很大一部分变成了利润。虚报成本是原子商人的巨额利润来源之一，如通用电气公司曾承包一项估价六百三十万美元的工程合同，几年中一再加价，最后成本估计要到二千五百万美元，超过原估成本三倍以上，而且据透露，每次加价都是在没有设计图纸和数据的情况下进行的。据估计，原子承包商全部生产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一以上是以成本加固定手续费为计价基础的，固定手续费一般约占完成工作总值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六(有人估计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由此可见，虚报成本愈大，手续费就愈高，利润也就愈多。同时，由于美国政府与原子承包商没有买卖关系，因此原子承包商的手续费不列入“公司利润”的范围之内，不征税，而是垄断组织的净赚(即纯利润)，在这一方面，原子商人比一般军火商更为优越。原子承包商还享受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诸如所谓“总部费用”、“经常费”、“自选”研究津贴等等，以“自选”研究津贴(研究项目由承包商自定，不受政府监督，但由后者提供经费)

而论，联合碳化物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每年只在奥克里季和汉福德两地就白白收入近千万美元。

对原子工业的大承包商来说，最大的好处可能还是掌握和垄断了这一新兴部门的科技情报和操作经验，从而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越的地位并为自己发展新的有利经营开拓了途径。它们利用政府试验室做出的发明都受到国家立法的特别保护，如政府规定原子工业的特别专利权在五年以后办理注册的办法，使有关原子的生产技术牢牢控制在几个最大承包商之手。像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梅隆—洛克菲勒共同控制)之成为世界上核动力设备的最大供应商，联合碳化物公司、杜邦化学康采恩之高踞世界同位素生产的首位，显然都是作为政府原子承包商垄断技术和工艺的结果。总之，垄断组织利用原子工业的“国有”招牌，所得到的实际好处虽极为隐蔽，却是大得难以估计的。

原子工业的发展自然也给从事铀矿开采的美国大公司带来了“金雨”。美帝国主义不仅大量掠夺国外的核原料，自五十年代初起在国内也掀起采铀的“狂潮”。国内生产的铀全部由政府以惊人高价收购，例如一九五一年原子能委员会对氧化铀的保证收购价格规定为每磅三点五美元，而同年实际成交的平均价格却高达十二美元以上；政府在国外采购的氧化铀则一般实行低价，一九五一年国外成交的平均价格每磅只有四美元左右，通常国内外价格也相差一至二倍。十几年来，



尽管铀矿开采和提炼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政府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购买氧化铀的合同价格仍然保持在每磅八美元的高水平，就连国会总会计局都承认定价过高，说这会給生产氧化铀的企业带来三千四百万美元的“非法的超额利润”（其实何止于此）。政府除了高价统购铀以外，还給予采铀工业以资源枯竭津贴、加速折旧、贷款、补助等优惠。利之所在，趋之若鹜，远在一九五五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第十七次年中报告就指出，采铀工业现“已成为国内有色金属开采中的首要部门，不论就产值或就业工人人数都是如此”。但正像裂变物质、核武器生产一样，铀矿开采和加工的大部分也由摩根、洛克菲勒等大垄断巨头的工矿公司所控制，如属摩根财团势力范围的美州钒公司、肯涅考特铜公司、霍姆斯泰克矿业公司；洛克菲勒财团的阿特拉斯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与梅隆财团共同控制）；属第一花旗银行财团而与摩根、洛克菲勒均有联系的安纳康达铜公司；杜邦财团有影响的菲利浦斯石油公司等巨型公司实际上就是美国铀原料的主要垄断者。

核裁军还是核扩军？

美国政府无休止地生产和储存核武器、裂变物质、铀原料，对大垄断组织意味着财富成倍增长和侵略扩张手段的进一步加强。当然，加紧进行核扩军的同时，由金融寡头控制的美国政府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有时也会装出一副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姿

态，像提出部分停止核试验建议、宣布削减一些裂变物质的生产和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等等，其实，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骗人的鬼话。这里，针对着这种骗局，进行一些分析。

（一）美国政府有意裁减核军备，停止核武器生产吗？

肯尼迪去年八月就莫斯科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向参议院提出的特别咨文早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肯尼迪反复地说，莫斯科条约“并不能确保世界和平”，“并不能禁止核军备竞赛”，“并不禁止美国……进行一切核试验”，“并不制止核武器的生产或减少现有的核武器储存”，“并不消除战争的威胁或禁止使用核武器”。今年四月二十日，约翰逊在宣布美国打算削减裂变物质生产时，再次毫不隐讳地说：“这不是裁军，这不是和平宣言”，“我已经重新肯定了我们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采取的防止削弱我们的核力量的一切保证措施”。麦克纳马拉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在最近给约翰逊的一份报告中供认，在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实施后的八个月内，美国执行了一项全面的、积极的和连续不断的地下核试验计划，“在内华达州地下进行了美国大陆上所爆炸的爆炸力最大的核装置”，并“已取得了关于新武器设计和武器效果的重要情报”。据统计，仅在一九六四财政年度，美国用于改进核武器试验室设备的费用，就达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

可见，穷凶极恶、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绝不会停止核扩军，相反却正在全力以赴地改善作为政治讹诈手段的战略核武器，以



越来越大的规模积极发展、制造战术核武器，并为潜艇、战舰、各式军用飞机和导弹火箭的载运工具配备核动力。这不仅是迷信武器的美国垄断资本力图保持核垄断、推行核讹诈所必需的，而且也直接关系着最大垄断集团的军火生意。例如原子商人只要为一艘航空母舰配备核动力，政府就得多付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还不用讲向“盟国”高价提供由美国控制的各种核武器、核动力设备、专利权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了。有些人竟认为垄断资本会摒弃“利润至上”的原则，改变扩张、奴役的本性，口口声声称道美帝国主义的“和平诚意”和“裁军愿望”，这除了存心为美帝国主义辩护以外，不能做别的解释。

(二) 美国政府能停止原铀的采购、裂变物质的生产吗？

垄断原料和原料产地是金融资本的根本特点，是它借以挫败竞争对手、获得垄断利润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像铀这样的战略原料，对企图依靠核武器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更是万万少不得的。美国垄断资本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各种手段早就渗入到资本主义世界藏铀最富的国家，如加拿大、刚果（利）、南非、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它们的铀的矿藏和开采。一九五八年以前这些地区生产的原铀全部运往美国，现在美国收购的比重也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原子工业用铀全靠加拿大、刚果（利）供应，自五十年代初美国国内采铀业虽已迅速发展起来，但每年仍从国外大量收购，如在

一九五七——一九六三年期间政府购买的原铀中约有一半来自国外。事实表明，没有对加拿大、刚果（利）和其他国家的铀的独占，就没有美国的庞大的原子工业和核武器垄断。

美帝国主义目前尽管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铀资源（已开采和未开采的）的绝大部分，但它掠夺、霸占、储存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时至多不过把购铀计划略微压缩一点。而美国政府这种做法有它特殊的目的，首先这是一个企图欺骗本国和世界人民的和平烟幕，实际上丝毫也不意味着停止核原料的继续掠夺和储存。其次，美国政府减少铀的采购给国内采铀部门中实力较弱的企业带来了致命打击，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卡特化的一种措施。仅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春天，美国就先后关掉七个大型炼铀厂，西方核公司的经理罗勃特·亚当斯哀叹说：“在六十年代内可能只有这一工业的半数企业得以生存。”在此同时，一些大垄断组织如安纳康达铜公司、美洲钨公司、阿特拉斯公司等则乘机收购破产企业（包括矿藏、加工设备和与政府签订的购铀合同），把国内采铀事业更加高度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此外，它们还积极勘探新的铀矿以适应“未来的需要”。再者，美国政府这一措施对那些一向大量供应美国原铀的国家更是严重的威胁，它们发展起来的采铀工业，饱受美国垄断资本的掠夺剥削，而本国根本无法利用，现在又面临销售困难的问题，这无疑会使它们的国际收支危机进一步恶化，同时却给美国垄断组织提供更加



狠毒的榨取的可能。

裂变物质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政府暂时削减核物质生产的计划，除了像美国资产阶级报刊所说的，约翰逊宣布的“削减核物质生产的计划在军事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并不影响当前的原子储存”，从经济角度来看，它不但不影响控制原子工业的大垄断组织的根本利益，相反地为它们创造了更能获利的前提。在一九六三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就已透露，现在美国生产裂变物质的原子反应堆中有一些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货，效率不高，需要进行设备更新和发展所谓“多种经营”。因此，在拥有巨额核物质储备的情况下，陆续关闭一些旧厂，在一个短期内减少一些生产，是不足为奇的。像通用电气公司曾欣然表示将在今后几年内逐步放弃汉福德的一些核物质工厂，原因就在于此。

美国政府把削减裂变物质的计划大事宣扬，显然别有用心。从表面上看似乎美国朝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主动地”迈了一步，实际却在愚弄世界人民，企图制造社会舆论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限制和解除别人的武装，从而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以便肆无忌惮地推行核讹诈政策。约翰逊竭力宣扬削减裂变物质计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欺骗国内广大人民。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尖锐，广大人民对政府搜刮民财扩军备战的政策极为不满，约翰逊提出的削减裂变物质的计划，正像他提出的所谓“向贫穷宣战”的方案一

样，不过是笼络民心，骗取选票的一个手段罢了。

(三) 美国政府能大力发展民用原子工业吗？

近年来，美国政府极力吹嘘所谓“和平利用原子能”，然而在垄断资本统治的美国，在国民经济高度军事化了的情况下，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现实前景并不光明。

美帝国主义掠夺、囤积的巨量原铀和裂变物质，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于国内人民，而是用来制造大规模屠杀的核武器。据美国铀研究所负责人戈登·韦勒估计，现在美国每年用于“和平”目的的铀只占国内生产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以政府大肆宣扬的原子能发电为例，截至一九六三年八月，美国已投入生产和正建设中的原子电厂共拥有一百一十余万瓩的发电能力，还不到同年美国总发电能力的百分之一（但原子工业本身每年却耗用全国电力生产总量的十分之一，真是莫大的讽刺！）。美国《幸福》杂志承认，“如果美国铀工业被迫依赖于原子电厂现在的购铀量，那几乎所有开采和加工铀的企业都得关闭”。就是仅有的一些原子电厂也大都供应交通不便地区的军事基地使用，或者为五角大楼生产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钚，所谓“和平”目的、所谓“民用”不过是一句空话。

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真正障碍是美国大垄断组织。原子能作为新的动力资源出现，首先给石油、煤炭、煤气等部门的垄断组织带来致命的威胁，对利用这些原料发电的电力垄断组织也是可怕的竞争死敌。这是洛克菲



勒的石油帝国和摩根的全国性电力蜘蛛网所不能容忍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早就占领了原子工业，采取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阻挠、拖延民用原子工业的发展。像一九五八年电力垄断组织和原子能委员会曾达成“协议”，决定在一九六八年以前不把原子能用于一般民用工业；南方采煤业主联合会写信给国会，要求政府停止发展民用电力原子反应堆等等就是例证。

当然美国垄断资本内部的利益并不一致，如石油、煤炭和电力垄断组织之间、电力和使用电力的垄断组织之间、主要垄断集团（如美国八大财团）和地方垄断势力之间以及两类垄断集团各自的内部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原子能发电究竟是未来动力发展的一个趋势。取得较为廉价的电力，首先是工矿垄断组织和一些拥有较少动力资源和设备能力的地方垄断势力所热中的。石油、煤炭、煤气的主要垄断组织则坚决抵制这一发展趋势，而电力垄断组织一方面极力阻止原子能发电的实现，一方面又企图获得价廉效高的动力原料，参与一些官方和私人的原子电厂的发展和建设工程，以便一旦原子发电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时捷足先登。在这种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民用原子工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此外，目前从赢利角度来看，原子电厂也还不能和普通电厂竞争，就是设计最新、效率最高、预期在今后几年完成的原子电厂的生产费用，据最乐观的估计，也要比普通电厂高出三分之一。一九六三年底，美国大

电力垄断组织之一——纽约统一爱迪生公司曾宣布计划建设一个一百万瓩发电能力的原子电厂，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大卫·李连塞尔就竭力劝阻，反复说明办原子电厂是“一个非常冒险的生意”。现在美国已建成的少数原子电厂绝大部分是试验性的，由国家负担全部或大部建设费用，并享受政府免税、加速折旧、提供研究费等等补贴和优待。在政府按着一小撮金融寡头的意志把很大部分国库收入送给军火商人（当然也包括原子商人）的情况下，又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原子发电，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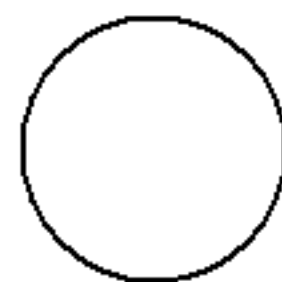
美国的原子工业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军事化了，它的发展是和美国垄断资本极力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妄图奴役世界各国人民、攫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密切不可分的，是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掠夺奴役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帝国主义更加腐朽、更加虚弱、更接近死亡的明显表现。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世界范围的剥削统治，就必然要更加疯狂地进行核扩军、核备战。那些完全不顾事实、蓄意把美帝国主义制造的核骗局美化成“符合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上又迈进了重大的一步”，并且一味迎合这种假和平、真扩军的阴谋的人，显然是甘心同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与世界人民为敌。



红旗

1964

16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1)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4)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本刊报道员 (7)

放手发动群众, 正确地领导农业的技术改革 ... 王任重 (12)

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李成瑞 (21)

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许辛学 (26)

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 施经纶 (29)

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

——读《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 孔 繁 (40)

坚持革命方向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节目观后 王朝闻 (44)

☆ 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来信。你们的这封来信，根本不理睬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愿望，关死了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协商的大门，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号令。

我们在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给你们来信中指出：“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你们已经“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只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我们在信中还向你们说明利害，指出你们召开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并且诚恳地劝告你们悬崖勒马。

你们在七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完全不理睬我们七月二十八日给你们来信的信。对于最近许多兄弟党反对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的呼声，你们也一律当作耳边风。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是你所指定的二十六个党，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再无商量之余地。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赶紧向你呈报代表团的名单，并且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去莫斯科报到，不得有误。

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



你們片面召开的国际會議都要如期举行。

这样，你們在今年十二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記載在历史上。

你們的来信，为了欺騙輿論，說了許多花言巧語。你們說，你們要召开国际會議，是为了“維護”和“加强”團結，而不是为了搞分裂。如果真是这样的話，起碼应当在有关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的程序和步驟的所有問題上，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則，通过双边的或多边的会談，达成一致的協議。但是你們現在彻底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則，根本不考虑兄弟党反对匆忙开会的意見，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都要开会。这哪里有一絲一毫要團結的影子呢？这不是明明白白要搞分裂嗎？

你們說，你們要召开国际會議，是为了“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这更是騙人的鬼話。兄弟党共同的东西是有的，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你們早就把这些共同的东西撇在一边，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們現在不仅絲毫沒有表示要放弃你們的修正主义路綫，而且执意要把这条路綫强加于国际會議，那么，你們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間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共同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你們却一心一意地勾結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們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你們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們要从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綫脱身出来。当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們不但沒有明白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略，反而助紂为虐，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在你們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綫的情况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同你們达成什么協議、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你們还使用了种种威胁的手段，来恫吓我們和其他兄弟党。你們所仗恃的，无非是勾結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利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变节者和叛徒，放肆地对兄弟党进行顛覆和破坏活动。你們这样作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你們过去已經作得够多了。你們越是这样作，就越是走向你們自己願望的反面。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是你们顛覆不了、破坏不了的。它們只会在同你們的斗争中更加坚强和壮大起来。而你們这种卑鄙的行徑，只能进一步暴露你們背叛革命的眞面目。“蚍蜉撼树談何易”，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加上修正主义者，总共也不过是将被抛进历史垃圾箱的一小撮人。



我們已經多次說过，关于国际會議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員等所有問題，必須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見。否則，不論你們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員會，什么样的国际會議，統統都是非法的。

我們決不受你們花言巧語的欺騙，決不向你們的威胁恫吓屈服，決不能當你們的分裂勾當的同謀者，決不能分擔你們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責任。如果我們去参加你們的分裂會議，就等于使你們的非法活动合法化，就等于承認你們有权撕毀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則，就等于承認你們是老子党。我們对原則負責，对历史負責，当然絕對不会这样作。

我們重申中共中央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給苏共中央信件中的立場：

“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經過充分准备的、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團結的兄弟党国际會議，坚决反对你們开分裂會議。

“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們决不參加你們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會議和它的筹备會議。”

你們片面決定在今年十二月召开起草委員會，明年年中召开国际會議，你們必須承擔由此产生的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后果。

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决心更高地举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更高地举起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團結旗帜，更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把反对你們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們已經警告过你們：你們召开分裂會議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們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表明，你們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刻，究竟是自走絕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們权衡利害，善自抉择。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七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已经把六月十五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发给了所有的兄弟党。在那封信里，阐述了有关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主要问题的立场，并且提出了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措施的具体建议。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

苏共中央认为，兄弟党的这种立场再一次证明它们非常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再一次证明它们意识到了当前局势赋予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闭眼不看这样一点：四年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分歧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趋严重了。思想分歧已经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如果不采取措施，这种公开冲突就会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所有这一切，对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非常不利，危害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会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我们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打算利用共产党人队伍中的不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加紧活动，力图加强自己的阵地，对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展开进攻，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剧战争威胁。

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的党对于事态的这种发展都不能无动于衷。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们共产党人去解决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单独地去解决涉及整个运动的利益和命运的各种问题。在这里需要所有兄弟党、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同地集体努力。各国兄弟党正是由于得出这种结论，才坚持主张组织新的国际会议，认为它是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立场的经过考验的方法。



大家知道，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关于召集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问题已经足够详细地和全面地讨论过了，所有共产党的立场也都清楚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集国际会议的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已经看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一九六〇年会议时的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即由下述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英国、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美国、叙利亚、苏联、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日本。

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以便开始筹备国际会议的实际工作。

如果起草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能在全体成员参加下投入工作，那无疑是符合共同的愿望的。但是，我们认为，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按照前几次会议的经验，起草委员会将准备提交国际会议讨论的主要文件的草案。委员会可以讨论与举行国际会议有关的所有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应该把它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提建议发给所有的兄弟党。

苏共中央表示相信，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复杂的局势，现在仍然有一切理由使起草委员会顺利地完成任务。在委员会完成必要的筹备工作以后，应该在它所规定的期限内召开国际会议。

关于会议的目的和前景，苏共中央已经在六月十五日的信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想再一次强调，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进行谴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这样的话，可以取得的将不是加强团结，而只是进一步分离。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

苏共中央认为，每一个兄弟党都可以坦率地和认真地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共同的决议时得到考虑，并且听取其他党的意见。



看来，前几次会议的决议，即规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将成为新的会议开始工作的起点。而且，新的会议在确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的同时，可以对所走过的阶段进行总结，交流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集体地分析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以来四年中所发生的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来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我们认为，这就是新的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任务。

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样，完全清楚地了解，在存在尖锐分歧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是件困难而又复杂的事情。不论所有一贯主张团结的人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分裂“肯定下来”，并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制造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试图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会议的参加者承担义务考虑所有兄弟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

我们希望，所有兄弟党都将以应有的注意来研究这些建议，利用会议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来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并且对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年中，而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参加过一九六〇年会议的所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实行业已成熟的措施的理由，而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则在于制定加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途径和方法。

苏共中央相信上述建议是符合世界共产主义的最高利益的，是符合加强现时代一切进步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利益，相信这些建议反映了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意志，期望已经拟定的各项措施将及时得到实行，并且取得成功。

为了使你们能够让所有兄弟党都了解会议的筹备工作情况，请你们把你们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的代表团成员通知我们。

致共产主义敬礼

苏共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关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报道

本刊报道員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場新的激烈的論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論战的双方陣綫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論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論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場論战，本刊编辑部在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谈会，参加者有高级党校的干部和学员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访问。

现将座谈和访问的情况报道如下。

这场論战是由楊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說，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早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忆近几年来情况說，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我们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面，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



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谓“新概念”，指出他们的所谓“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增强了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们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向党大唱对台戏。

杨献珍同志的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说，“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杨献珍同志对调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时，公开地把他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的时候，便进一步地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讲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

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五月十四日，黎明讲课时说，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黎明所谓“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辩证法讲多了，杨献珍同志的反辩证法观点讲少了，应该多写文章宣传反辩证法的观点。

艾恒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杨献珍同志商量。杨献珍同志帮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作了修改。艾恒武说，当他们听到有人说“合二而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去询问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说：“谁说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说：“‘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



分为二’是方法論。”不久，楊献珍同志又給艾恒武、林青山鼓气說：“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

这样，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就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級党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爭論，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

这场哲学上的論战是由楊献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

对楊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論的批判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級党校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則問題的爭論，是革命辯证法同反辯证法的爭論，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討論這個問題。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訴楊献珍同志。楊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討論大为不满。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文章。

这时候，高級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内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討論会上发言批駁“合二而一”論。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論。

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爭論。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論。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論給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討論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許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理論工作者，还举行了多次座談会。

目前这场論战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对立統一規律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規律，承认不承认唯物辯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高級党校大多数學員和工作人員，从楊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認識到楊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辯证法的世界观。

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說，楊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統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在他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見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見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结果导致旧統一体的破裂和新統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見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辯证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辯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統一又斗争，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辯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轉化，达



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

但是，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制定的。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辩护的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有所用心地说什么不要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有的同志还说，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世界观，把“一分为二”说成是方法论，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其实，杨献珍同志一再强调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论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①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正是把矛盾双方的联系“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类观点，企图迷惑许多人，起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

在争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大同小异的说法。例如：有的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语之争、词句之争，并且说什么在课堂上讲课，谁不能说一句半句错话。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方面，说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说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综合方法，说它们都是辩证的认知方法的组成部分。这些说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而已。

许多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有确定的含义；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一分为二”这个术语，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而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则是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8页。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这场哲学论战的重要意义。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即阶级性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总是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在哲学战线上就表现了对立的党派的斗争。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一些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现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国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现这场论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锐化起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拚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经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则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个思想领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在继续进行。就这场大论战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这场论战，看来，离开结束的时候还很远，论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场论战，辩证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辩证法思想，人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放手发动群众，正确地领导农业的技术改革

王任重

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的集体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是这一条路线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实现集体化，才能够实行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改革。只有实行技术改革，农业的集体经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巩固和迅速的发展。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所证明。

一九六三年，湖北省的粮食继续增产，棉花大幅度增产，其他许多农副产品，比一九六二年也都有较大的增长。一九六三年的大丰收是怎样得来的呢？这当然不只是一九六三年一年工作的结果，而是多年来高举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伟大红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工作的结果，

是广大农民在集体生产中进一步发挥劳动积极性的结果。从领导方面来说，正如广大社员所反映的，丰收的得来是由于：党的政策好，社会主义教育好，干部作风好，技术改革好，国家支援好。

社员群众把农业技术改革作为取得丰收的基本原因之一，不是偶然的。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积极地进行了农业技术改革的工作。社员群众从他们的实践经验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技术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同一九五七年比较，一九六三年全省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保证灌溉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化肥增加了二点一倍，绿肥面积也扩大了很多；排灌动力增加了二十倍（按马力计算），拖拉机增加了六点八倍（按标准台计算），脱粒、加工等机械也都有很大的增长。稻、麦、棉等主要作物的良种，已经大面积推广。农药和农药器械已经大量使用。主要作物的栽培技术，也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棉花栽培技术的革新更为显著。一九六三年湖北省的农业生产获得丰收，气候条件比较好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改革，即使气候条件较好，也不可能获得这样大的增产。一九六三年全省还出现了一批稳产高产的队、社、区、县，它们不仅战胜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而且使农业生产大大超过了以往丰收年的水平。在这些地方，技术改革的好处就更加显著了。

例如，浠水县望城公社十月大队（前身即饶兴礼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湖北省农村中坚持技术改革的一面红旗。十月大队人多地



少，平均每人不到一亩耕地。单干时期，作物以一季中稻为主，亩产一般四百多斤，好的也不过六百多斤。一九五二年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只两三年的时间，中稻平均亩产就提高到六百多斤，显示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生产的进一步提高遇到了困难，中稻单产总是突不破七百斤的关。一些怀疑动摇的思想出来了，说什么“生产到了顶”，说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的优越性”等等。饶兴礼同志和大队党支部，在这个困难面前没有退缩，他们坚决按照党的指示，领导群众走上了技术改革的道路。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们排除万难，实现了水利化和排灌、脱粒、加工的机械化。改造了低产田，改良了水稻品种，化肥和农药也大大增加。随着这些生产条件的改善，他们成功地推广了双季稻，实行了高度的精耕细作，创造了全大队水田全年平均亩产粮食一千三百多斤的高产成绩，使粮食总产量在最近八年内增长了一倍。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他们还利用技术改革所创造的条件，发展多种经营，使经济收入也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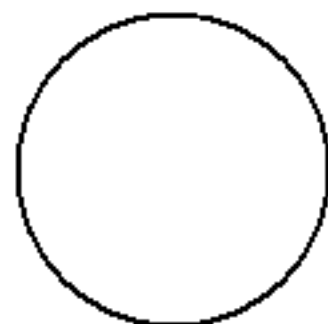
又如，沔阳县过去是洪涝灾害频繁的地区，是湖北省有名的“十年九不收”的县。一九五四年大水灾以后，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沔阳县在国家的扶植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初步实现了河网化，同时在耕作技术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使农业生产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保收，并且出现了稳定增产、大幅度增产的局面。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三年十年当中，除一九五四年遭受

了特大水灾外，其余九年连年丰收，由原来没有多少余粮的县变成了每年能上调七、八千万斤粮食的余粮县，棉花总产量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点二。

这些由于进行农业技术改革而大增产的典型，有的在平原地区，有的在丘陵地区或大山区。有的人多地少，有的人少地多。有的条件比较好，有的条件很差。它们有的是经过三年、五年，有的是经过八年、十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面貌。它们的经验证明，不论什么地区，不论条件好坏，只要有高度的革命干劲，又有科学的态度，扎扎实实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工作，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就能够做出成绩来。

我们从农业技术改革工作的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基本经验：“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乱改就减产。”大改是根本性的改革，也就是逐步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技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大改，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小改是非根本性的改革，但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要集小改为大改。湖北省现在已经出现的一批稳产高产的队、社、区、县，就都是“大改大增产”的典型。“乱改就减产”，也是我们总结一些地方、一个时期改得不好的经验中得来的一条教训。我们把“乱改就减产”作为基本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了使大家记住这条教训，把坚持改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加强领导和贯彻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

我们的农业技术改革工作并不是一帆风



順的，而是走的曲折的道路。我們的認識，是在不斷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過程中，逐步提高起來的。我們的工作，是在不斷發揚成績、糾正缺點的过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湖北省過去幾年的農業技術改革工作中，有過一些缺點和錯誤，但是總的來講，成績是主要的，並且取得了許多正面的經驗，而一些反面的經驗在經過總結之後，也就變成了寶貴的財富。特別重要的是，這些經驗不僅是少數領導人和技術專家的經驗，而且已經成為廣大幹部和群眾共同的經驗。這一點，正是我們前進的基礎，也是我們奪取新勝利的最可靠的保證。只要我們堅決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並且善於總結自己實踐的經驗，就一定能夠使農業技術改革的工作多快好省地向前發展。

現在，在農業生產已經出現了新的高潮的形勢下，如何進一步做好農業技術改革工作，對於發展農業生產、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有着更加重大和迫切的意義。一九六二年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明確指示我們，要動員和集中全黨全國的力量，積極地、尽可能地支援農業，支援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實現農業的技術改革。正是從這一個要求出發，我們感到很有必要再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把農業技術改革工作提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怎樣正確地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從湖北省十多年的經驗來看，我們體會比較深的有以下几个問題：

第一，以穩產高產為目標。

農業技術改革必須有明確的目的，講求經濟效果。

最近，黨中央提出了在種好十六億畝農田、全面增產的基礎上，分期分批地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的任務，並且指出這是發展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向。把穩產高產作為農業技術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完全符合湖北省的情況的。

穩產，就是要達到旱澇保收，穩定增產。農業生產的最大威脅是自然災害，主要又是旱澇災害。不擺脫這個威脅，農業生產就不能順利地向前發展。因此，穩產是高產的基礎。實現了穩產，旱澇保收，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高產。

高產，就是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增加總產量。總產量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種植面積的多少，一個是單位面積產量的高低。增加總產量，也不外乎從擴大種植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兩個方面來努力。這兩個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從湖北省的實際情況來看，總的特點是人多地少，大部分地區可開墾的荒地已經不多或者沒有。因此，就全省來說，增加總產量的主要途徑只能是在保證種植面積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力求大面積平衡增產。

湖北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潛力是很大的。水稻，高產田的單位面積產量達到七、八百斤以上，而占水田總面積將近百分之十五的低產田，單位面積產量還在三百斤以下。棉花，高產田的單位面積產量達到八十斤（皮棉）以上，而占棉田總面積將近四分之一的低產田，單位面積產量還不到三十五斤。大力改造低產田，提高全省的單位面積產量，就可以使總產量得到很大的增長。

低產田增產有很大的潛力，高產田繼續



增产也有很大的潜力。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通过技术改革改善了生产条件，就可以突破原来的限度，使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更高的水平。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的高产田是七、八百斤，突出的高产田就突破了一千斤，十月大队还达到了一千三百多斤。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的高产田是八十斤(皮棉)以上，突出的高产田就突破了一百斤，有的大队还达到了一百五十斤。这种高产水平既然已经出现，而且是大队范围的平均水平，就证明它是能够做到的，可以作为大面积增产的努力方向。

强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以保证种植面积为前提，必须同大面积平衡增产相联系。如果用缩小种植面积的办法来保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或者因为追求小面积的高产纪录而影响了大面积的生产，一部分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虽然提高了，但是总产量却减少了，那就不仅失去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意义，而且是对生产的损害了。

同样，就是增加总产量，也不能只顾一季或一年，而要顾到全年的增产，几年持续的增产。有些技术改革的措施，只对一季或一年的增产有利，而对下一季、下一年的生产不利，结果上一季、上一年增产，下一季、下一年减产，增减相抵，甚至蚀了本。这就需要从全年增产、几年持续增产的要求出发，全面权衡利弊得失，作出正确的安排。

第二，以水、肥、机、土为基础，全面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农业增产“八字宪法”，为农业技术改革提出了一个正

确的纲领。我们的农业技术改革，就是按照这个纲领进行的。

“八字宪法”的各个方面，即水（兴修水利）、肥（增施肥料）、土（改良土壤）、种（选用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工（改革工具）、管（培育管理），是有机地互相关联着的，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必须全面地实行，才能保证稳产高产。

十月大队的水稻技术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月大队水稻技术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行和扩大双季稻的种植，增加复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那里的气候条件可以种植双季稻。经过反复的试验，品种和栽培技术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在改种双季稻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种双季稻，就得有双季的水，还要有双季的肥。抢割早稻、抢插晚稻的季节很短，又必须解决“双抢”期间劳动力和耕牛不足的问题。除此以外，还要改造落后田，消灭螟害，提高栽培技术，加强田间管理。他们正是全面地进行了这一系列的改革，才取得了水田亩产粮食一千三百多斤的优异成绩。相反，有一些地方在改革耕作制度上的成绩不够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孤立地进行一个方面的改革，而其他有关的许多项目没有能跟上去。

当然，全面贯彻“八字宪法”，并不是要求我们无重点地齐头并进。“八字宪法”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平列的。而且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在全面贯彻“八字宪法”的过程中，每一时期都应当有其侧重的方面，也就是说，必须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抓主要环节。从湖北省的情况来说，水、肥、



机、土这四个方面是基础。这几个方面的改革，都属于生产条件的改革。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就要着重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从湖北省目前的情况看，在水、肥、机、土四项当中，水利和肥料又是当先的两项。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农业生产能不能稳定，主要看水利，能不能增产，头一条也要看水利。水利条件不改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方面的许多重大改革，如旱地改水田、一季改两季等就不能进行。而且由于车水抗旱要占去大量的劳动力，势必要影响精耕细作。湖北省从一九五二年至现在，一直对水利工作抓得比较紧，经验证明这是抓得对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全省水利建设基本过关。

增加肥料，除了农家肥、绿肥之外，还要增加化肥。近年来，国家供应的化肥不断增加，这是湖北省获得农业丰收，特别是棉花大幅度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几年来使用化肥的经验证明，要把化肥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增产效果。

水、肥当先，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的。从长远来看，改革生产工具，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是农业技术改革的基本问题。湖北省各地农业机械试点的经验证明，不仅土地多劳动力少的地方需要机械，即使是土地少劳动力多的地方也需要机械。因为有了机械，就能抢住耕种季节，扩大复种指数，实行精耕细作；就能解决抗旱、排涝同田间管理的矛盾；就能抽出劳动力大搞积肥和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一句话，就能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所以说，农业要最后过关，还是要靠机械化、电气化。问题是在发展机

械的时候，必须注意把机械化所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去扩大生产的范围和规模。同时，在机械化的内容和步骤上，要注意从生产的需要和条件出发，不要一谈机械化就是要搞机耕。从湖北全省大部分丘陵地区、山区和水田地区来说，首先是解决排灌、脱粒、加工和运输机械化的问题，其次才是解决耕作机械化的问题。在逐步实现机械化的过程中，还要重视改良农具，开展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有了机械以后，还要把机械管好用好。

第三，全面规划。

从根本上改变自然面貌，改造农业生产的条件，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要依靠农业和工业、商业、文教等各方面共同的努力，有一个全面的规划作为指导，才便于统一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技术改革主要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有一个全面规划作为奋斗目标 and 行动纲领，就有利于引导群众看清前途，树立雄心壮志，使技术改革真正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

有人说，农业生产不稳定，技术改革牵涉的方面又复杂，规划很难搞准确，有没有必要搞全面规划、长期规划？应该承认，他们反映的一些困难确实存在，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困难，就否定全面规划。农业的技术改革，没有国家的支援不行，没有集体经济单位自己的努力更不行。全面规划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把国家的支援和人民公社自己的努力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国家的统一规划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自己的规划衔接起来，使国家的力量和集体经济的力量



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样的全面规划，的确不可能搞得很准确，而实际上也不需要很准确。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规划。实践证明，规划越细越死，就越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如果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和群众讨论，在一些主要的方面提出指标和措施，同时把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结合起来，一面以计划为指导，一面又在实践中对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那么，我们是完全能够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全面规划来的。

全面规划要具体体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和要求。干劲要鼓足，措施要落实，而规划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措施落实上。为了达到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的要求，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在全面规划当中，必须根据这一原则，从全局出发，抓住重点，分期分批地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国家的投资和领导的重点，首先要集中用在那些生产条件较好，又是出产商品粮和工业原料较多的地方。从每个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来说，都要学习大寨，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使用自己的力量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抓住重点，分别轻重缓急，避免力量分散，战线过长。

对于技术改革的各项措施，还要从生产的总体利益出发，权衡利弊得失，进行全面安排。事情往往是有利有弊。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利多弊少的事情就办，利少弊多的事情就不办。例如围垦湖荒，从多种粮食的角度来看是件好事，可是如果把芦苇都砍光了，影响到工业需要的原料，或者影响了排涝，影响了蓄洪，就得不偿失。究竟哪些湖荒可以围垦，哪些湖荒要保存芦苇，就要具

体调查和分析比较。至于像山区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这种肯定是利少弊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干。

在制订全面规划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到发展农业生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农业生产搞得好不好，要看五年、十年，不能只看一年。在目前条件下，农业生产还不稳定，比一年是不容易看出高低来的。争先进、争上游，也不要争一时的高低，要扎扎实实地把基础打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真正达到稳产高产的目标。

第四，学习先进，因地制宜。

实行技术改革，必须努力学习新技术，推广新技术；努力学习先进经验，推广先进经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就不能前进。

但是，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地区差别。由于这种差别，在这一个地方是高产的作物，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是低产作物。在这一个地方是增产的措施，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造成减产。在这一个地方的这一个季节进行种植是适宜的，在另一个地方的同一季进行种植就可能误了农时。在这一个地方是办得到的事情，在另一个地方就可能行不通。因此，农业技术改革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律化，一刀切。学习、推广任何一项新技术和先进经验，都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机械模仿。同样是解决水利问题，随县主要靠水库，沔阳主要靠河网化，武昌主要靠电动排灌，办法不一样，可是都适合当地的特点，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样是推广双季稻，黄冈专区的沿江地区，人多地少，气候、水利、肥料等条件也比较适宜，大力推广双季稻就得到了成功，开辟了



一条重要的增产途径。而荆州专区有一部分地方如荆门县，虽然也可以种双季稻，但是人少地多，劳动力不足，水利和肥料也有困难，在这些問題没有得到解决以前，双季稻就推广不开。不因地制宜，就是违反科学，就是主观主义，就会给生产造成损失。

强调因地制宜，是要求我们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认真总结当地的生产经验，摸清当地的生产特点，更好地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技术改革。如果把因地制宜作为拒绝采用新技术新经验的挡箭牌，那就是保守思想在作怪，也会给生产带来损失。

第五，鼓足干劲，量力而为。

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必须鼓足干劲。在这个前提下，又要注意量力而为，有多少力量就办多少事，在计划安排上还要适当留有余地。凡是需要办而又能够办到的事情，一定要努力去办。凡是办不到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勉强去办。几年才能办到的事情，不要抢着在一年办完。当然，一年能办到的事情，也不要拖上几年。

技术改革的基本建设，要全面地衡量人力、物力、财力，正确处理当年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尽可能地集中更多的力量到基本建设上去，加速技术改革的发展。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在保证当年生产开支的基础上去安排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大型水利搞得过多过急，既不能很快受益，又影响小型水利的修建，结果反而减少受益面积。基本建设把木材、竹子、钢铁用得太多了，农具、船只的修理和制造就会缺少材料。劳动力抽调得过多，就会影响抢

季节。如果当年生产都不能保证，必然反过来又影响基本建设的进行。要注意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既增加积累，又增加社员的收入。不增加积累，吃光分光，就不能进行基本建设。但是，积累过多，使社员不能增加收入、甚至减少收入，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还是不能搞好基本建设的。

从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的改革来讲，量力而为就是要按照客观条件的可能去办事。当然，农业生产的许多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我们首先应当鼓足干劲、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改变条件，不应当消极等待。但是，在条件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就只能采取与这些条件相适应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特别是耕作制度的改革，如夏秋两季的安排、早中晚稻的安排、粮棉的安排、茬口的安排等等，都要实事求是。如果条件还不具备就贸然改变，打乱了原来的耕作制度和茬口，就会在生产上造成损失，不仅不能增产，反而会减产。

第六，一切经过试验。

农业生产上的一切新技术，都必须经过试验，试验成功了再逐步推广。

任何一项技术改革，在试验当中要有冲锋陷阵、百折不挠的精神，碰了一两次钉子就收兵，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领导技术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广泛开展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大力支持技术改革的试验活动。当然，也必须注意试验和推广的界限，绝不可以没有试验成功或者效果还不稳定就贸然推广，那样就很可能造成重大的浪费和损失。

在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改革和继承的关系问题。改革是主导的一面，但又要继承的基础上去进行。我们在进行改



革的时候，要采取经过试验、逐步推广的办法，来正确处理这个关系。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新办法试点，老办法搞面，试验成功了，新办法代替老办法。”因此，在大力提倡革新的同时，还要教育干部和社员，特别是青年社员，认真继承一切有益的传统生产经验，练好农业生产的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技术改革，也才能搞好当前生产。

进行技术改革的试验，要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三结合的办法，种试验田，办试验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尊重技术人员和老农的意见，并且帮助他们提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历年的经验证明，农村工作干部善于向农民请教，向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请教，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努力钻研生产知识，才能对技术改革工作有比较正确的领导，减少错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当学生，才能继续当先生。没有甘当一辈子小学生的精神，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就都会变成一句空话。

第七，放手发动群众。

农业的技术改革，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依靠群众，就会势如破竹。离开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

放手发动群众的目的，是要启发群众对农业技术改革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要积极加以支持，对于他们的好经验，要虚心学习，认真总结。为了组织群众自觉地进行技术改革，就要向群众进行深入的、耐心的宣传教

育，同群众一起调查研究和商量办事，并且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推广任何一项新技术，都要采取宣传的办法，示范的办法；都要发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己讨论决定。他们对本队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情况，了解得最清楚。他们自己决定了，就实行。如果他们不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强制推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使农业的技术改革成为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

应当看到，增产是群众的迫切要求，真正能够增产的改革，群众是没有不欢迎的。有人说：“只要是为群众办好事，强迫命令也不要紧。”有人说：“强调群众自愿，技术改革就改不成。”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表现。而其结果，往往是好心办了坏事。

还应当看到，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生产队又是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队的收入和社员的生活。农民群众对于自己还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肯轻易去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农村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认识到，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利，这是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滥用自己的职权，瞎指挥生产，使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而自己又不承担其后果，是极其恶劣的作风，是根本没有群众观点的表现。

第八，正确处理先进和保守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要教育农民，引导农民实行技术改革也要教育农民。

农业的技术改革，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场革命，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先进和保



守的矛盾。农民群众一方面迫切要求发展农业生产，有进行技术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小农的守旧心理和习惯势力，又束缚了他们的革新精神。因此，为了保证技术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坚持不懈地向他们进行技术改革的教育，不断地发扬先进思想，克服保守思想，帮助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小农的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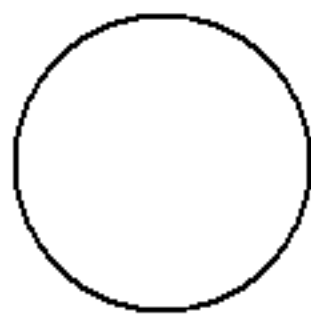
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先进和保守的矛盾，一般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思想上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划清是非界限，弄清楚究竟是合理的意见还是保守的思想。特别是要有听取反面意见的精神，决不可以把和自己不同的意见都说成是保守思想，更不可以把纯粹是技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轻率地提高到政治倾向的问题上来。

其次，对真正是保守的思想，也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即说服教育、宣传示范的方法来解决，决不可以借口克服保守思想而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即使是正确的改革，如果群众一时不接受，也要耐心等待，用更大的力量去做好宣传和示范的工作，启发群众提高认识。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推迟了改革的时间，对生产不利，实际上是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不仅有利于当前的生产，而且可以推动今后的技术改革更好更快地进行。如果群众思想还不通的时候强迫群众去改，群众不积极，就是好事也不会办好，甚至办成坏事，造成减产，给今后的改革增加许多困难。离开了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任

何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再次，要采取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方法，给后进者以切实的帮助。实践证明，这是提高后进的基本方法。歧视后进，是错误的态度。片面地“将军”，也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对思想作风确实不好的人应当给以批评，这种批评也是对他们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帮助还是要同他们一起找出落后的原因，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学习先进经验，并且帮助他们克服实际困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改进工作，改变落后面貌，向先进看齐。在同一个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也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我们要支持先进分子的革新精神，又要耐心帮助落后的人，提高他们的认识。对待落后的人，不能采取讽刺打击的错误方法。

几年来，我们曾经多次总结过农业技术改革的经验。每一次总结，在认识上都有新的提高，都发现一些过去的认识当中的片面之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我们对技术改革的认识，是在实践当中逐步提高的。我们现在的经验，同过去比较，应当说是多一些了，但是仍然很不完整、不系统，还有许多问题要在今后的实践当中去进一步解决，感性的认识也有待于上升为理性的认识。我们应当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加努力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认真总结经验，永远保持敢想敢干而又谦虚谨慎的作风，把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精神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农业技术改革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李成瑞

在革命和建設工作中，我們做計劃、訂方案、办事情，都应当坚持这样一个方针：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同志說过：“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①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就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群众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充分动员起来，按照事物的客观規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实现多快好省的要求。“气可鼓而不可泄”。一切干劲不足、強調困难、安于现状、甘居中游的傾向，都是革命者所不取、所反对的。

在鼓足干劲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留有余地。計劃必須訂得积极，必須充分估計到一切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有利因素，但也必須切实可靠，决不可以无根据地把不可靠的“潜力”放在計劃之內。計劃确定以后，必須全力以赴，力爭全面和超額完成，但也要考虑到执行当中可能遇到的某些意外困难，准备在某些計劃指标不能全部完成时所能采取的措施。对物力、财力的分配，必須有利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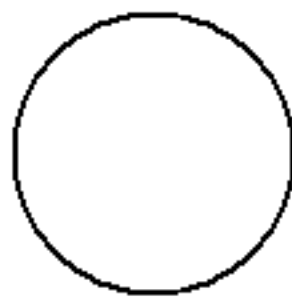
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但是，分配計劃必須留有余地，不能打得太滿，必須逐步增加国家的后备力量。这样才能使我們經常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要求。

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計劃工作的任务，就是根据經濟发展的这种規律，发现不平衡的問題，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必要的調整，实现新的平衡。这种自觉的調整，是社会主义計劃經濟优越性的表现。要做好这种調整，条件之一，就是国家計劃在财力物力的分配使用上留有一定的余地，保持一定的后备力量。为了促进經濟的发展，积极地組織新的平衡，必須留有余地，此其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們能够自觉地認識和运用客观規律，推动社会經濟的发展。但是，在主观和客观之間，常常还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距离。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論》中說：“一般地說来，不論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頁。



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 当我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加重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加重调整的必要性。为了准备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出现不一致的时候，能够应付裕如，也需要保留一定的余地和后备力量，此其二。

我国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年度间的丰歉是不平衡的。丰收的时候，要想到歉收的时候。“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平时就应当作好准备，蓄积力量，以便在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以丰补歉，使国民经济不致受到过大的波动，能够比较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必须留有余地，留有后备，此其三。

在我们面前还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还有蒋介石匪帮。有帝国主义，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蒋介石匪帮还在妄想重返大陆。对他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丝毫不能麻痹。我们平时就要蓄积力量。不管他们在什么时候向我们发动袭击和进攻，保证能够予以彻底粉碎。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决不能有任何忽视。为了应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突然进攻，必须留有余地，留有后备，此共四。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曾经说过：“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② 把这三件事进一步做好了，国家预算就更加巩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鼓足干劲和留有余地，是相辅相成的。干劲鼓得越足，生产发展越快，劳动生产率越高，财力、物力的消耗定额越低，就越能为留有余地创造有利的基础。这是基本的、主导的方面。同时，也必须看到，留有余地，可以保证生产更顺利地发展，可以使各项指标经过努力超额完成，这就可以更好地鼓舞人们的干劲。留有余地，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应当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都应当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都应当争取最好的前途，同时也作好最坏的准备。准备好两手，就有了主动权。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归根到底，是一个尊重客观规律的问题，是一个掌握主动权的问题。

二

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这个原则，大家都是拥护的，坚持这个原则的道理，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怎样把这些原则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2页。

② 转引自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见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第20页。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财力、物力分配上怎样做到留有余地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要使财力、物力的分配留有适当的余地，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一系列的矛盾，包括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局部与整体的矛盾，生产与基建的矛盾，“长线”与“短线”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处理好了，才会真正留有余地。

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解放以来，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的发展，但整个说来，我们的生产水平还比较落后，国家还不富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国防需要加速现代化，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逐步提高，在这里，需要同可能存在着矛盾。“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少花钱多办事”——这是处理需要与可能这个矛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克勤克俭，开源节流，力求以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建设事业的安排上，需要同可能相结合，需要同可能受可能的制约。不仅要考虑一般的正常的需要，而且要留下余地，以便应付意外的临时的需要。

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局部同整体的矛盾。处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部门的同志，总是对本地区、本部门的需要体会得深些，总是对本地区问题的迫切性了解得具体些，总是希望本地区、本部门的建设发展得快些、更快些。这种心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就不能不分别轻重缓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最重要、最迫切的方面，而推迟或者减掉某些可以推

迟和减掉的事情。有些要兴办的事情，从局部看是合理的，从全局看，从轻重缓急的排队次序看，就成为不合理的，或者在某段时间内是不合理的。全局应当照顾局部，但首先应当是局部服从全局。如果不是这样，不分轻重，齐头并进，那就不可能做到统筹安排，不可能留有余地。

在各地区、各部门建设发展的需要中，有生产的需要，有基建的需要；有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按照客观事物的规律，总是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自觉地首先保证简单再生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劳动手段即机器、设备、房屋的更新，当人们首先着眼于扩大再生产、着眼于扩建和新建企业的时候，某些原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就有可能暂时被挤到后边。原有企业进行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同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原料、材料之间，流动资金同基本建设投资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果不很好地注意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这样的客观要求，就不一定能够自觉地得到遵守。过了一段时间，简单再生产中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得不去解决，但是财力、物力已经被扩大再生产占用去了，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缺口”。“缺口”是留有余地的反面。我们要留有余地，就不应当留下这种“缺口”。

在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中，各部门之间、各个建设项目之间，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之



間，也存在着矛盾。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統籌兼顧、适当安排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則，是解决这一問題的重要方針。如果基本建設战线过长，就会出现財力、物力的过分紧张，就說不上留有余地。而且兴办的項目过多，资金使用过分分散，一定期間内能够修建完成投入生产的項目，就会相对减少，这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經济也是不利的。

在留有余地的問題上，还常常遇到“长綫”和“短綫”的矛盾。“长綫”是有余的物資，“短綫”是不足的物資。基本建設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設備，常常是发展不平衡的，有的增长得快些，有的增长得慢些。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的建設規模，对“长綫”物資來說，已經留有很大的余地，但对于“短綫”物資來說，却存在着相当的“缺口”。怎么办呢？我們的經驗是：第一，应当尽最大可能，千方百計地增加“短綫”物資，包括提高这些物資的产量、发展确实可用的代用材料、增加这些物資的进口等等。第二，在尽量拉长“短綫”的基础上，在正确地估計到这些物資增产潜力的基础上，应当按照这些物資增产的客观可能性和现实性，来安排建設的規模，不应当再留下“缺口”。因为任何一种建設工程，如果缺少某些重要材料，缺少某些关键性的机器設備或关键性部件，那就不可能投入生产，而只能暂时閑置起来。这是不以人們的主观意志为轉移的。

必須把上面所說的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若干有关的矛盾都处理好了，才能真正地留有余地。

三

要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必須从思想認識、計劃安排、規章制度三个方面进行努力，采取措施。

首先要解决思想認識問題。对于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方針，要反复讲，到处讲，把道理讲透。仅仅讲还不够，还要通过各項矛盾的处理，各項問題的解决，結合实践来进一步提高对这一方針的認識。处理矛盾、解决問題的过程，同时也是提高思想認識的过程。处理需要与可能的矛盾，执行“有多少錢办多少事”的方針，这就意味着要下决心推迟或者减掉一部分不可能兴办的、非急需的項目。解决局部与整体的矛盾，实行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則，就意味着要把某些从本地区、本部門看来很需要而从全局看来应当推迟的項目，坚决加以推迟。处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就意味着为了首先保证简单再生产，要把扩大再生产的規模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如此等等。总之，必須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

第二是計劃安排問題。社会主义的一切經济活动都要服从国家計劃的指导。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原則首先要体现在計劃之中。計劃的安排，要估計到一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要对需要与可能、重点与一般、生产与基建等等，进行全面的綜合平衡。在財力和物力的分配計劃当中，既要留下当年的預备費和机动物資，又要列入增加长期后



备的资金和物资。劳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常常是难以预料的创造力。在计划执行过程中，经过努力，生产和收入比原定计划超过一些，是一种常见的、正常的现象。对于计划执行过程中超产超收的物资和收入，不要在沒有把握的时候过早地安排和使用，应当等到下半年，一部分超产超收已经实现，另一部分超产超收也确有把握的时候，再安排和使用。超产超收的部分，不要在当年全部用掉，应当留出一个适当的部分，用来扩大国家的长期后备。

第三是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是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是实现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首先注意从思想上和计划安排上解决问题，固然十分重要，规章制度上的“硬杠子”也是不可缺少的。比如，收支平衡而不出逆差，留有余地而不留“缺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不能拉长战线，等等原则，都要尽可能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必要的纪律来保证和适应它。如果有人单纯从局部的需要出发，在计划安排时先把一般性的“软”项目站上队，在执行中再追加必不可少的“硬”项目；或者在年初安排建设项目时，先提一个较小的投资数，争取先“上马”，留下一部分投资到执行中再要求追加；或者把本年已经安排但实际无法动工的建设项目投资保留下来不交回，而又要求追加其他新的建设投资等等，对于这样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应当从制度上加以防止和限制，使它的发生成为不可能。

总之，规章制度要促使计划的安排和执行能够比较地符合客观规律，要力求限制计

划安排和执行中的主观随意性。这样，才能使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方针更好地实现。

四

留有余地的方针，必须正确地执行，防止和反对保守主义的偏向。

正确地留有余地，必须是了解情况、心中有数地留有余地；必须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留有余地；必须是以鼓足干劲为基础，有利于发挥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留有余地。反之，如果不对客观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心中无数，情况不明；如果把生产和收入的指标订得过小，把开支和消耗的定额订得过宽；如果不按统一的计划和国家的制度办事，层层留余地，处处留余地，势必要分散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影响国家建设的速度。这是应当坚决防止和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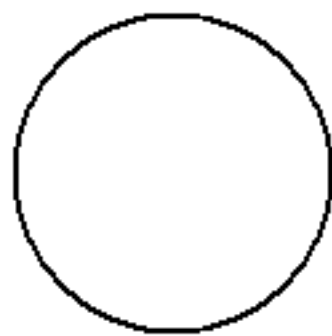
在财力、物力的分配上留有多大的余地，应当有一个适当的界限。这个界限，从原则上说，就是兼顾当年建设的需要与建立长期后备的需要，兼顾当年一般正常需要与当年临时的意外需要。如果对建立长期后备和应付临时意外需要的部分安排过少，余地留得不足，就会使我们在发生某些意外情况时陷入被动，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如果对当年正常需要的建设资金和物资安排过少，余地留得过大，就会人为地减缩生产建设的规模，把一些本来能够兴办的事情延搁下来，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发展。余地过小或过大都是不好的。

为了使留有余地的“火候”恰如其分，应当不断地总结經驗，规定若干具体的政策界限。例如，每年国家預算中应当留有百分之几的預备費，物资分配上应当留有多大比例的預备物资；每年的財政支出和可分配物资中，应当有多大比例用于增加长期儲备，其

中生产资料占多大比例，消费资料占多大比例等等。当然，这样一些比例数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过一个时期，情况变化了，比例数字也要变化。在同一时期內，各年的农业丰歉不同，生产发展速度不同，用于增加后备的比例也应当有所不同。在这里，做好长期规划，做到瞻前顾后，是很重要的。



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 許 辛 学 ·

最近，讀了有关上海嘉丰紡織厂的一个材料，是叙述他們怎样正确处理增产节约运动中所发生的矛盾的。觉得很有启发。

这个工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一个时期，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增加产品的产量。在这时候，有的干部提出，采取加快机器的轉速的办法，来增加生产。但是，这样做，可能引起产品质量的下降，也可能使原料、材料的消耗增加，使設備损坏。就是說，当时在增加产量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这个工厂的领导干部认为，不能貿然采取这种办法。他們提出的办法是：必須要保证质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努力增产节约。于是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員深入車間，同工人一起，进行研究，并且派人到兄弟厂参观学习，找寻既增产又优质、消耗又少的途径。下了这一番功夫以后，他們决定改善設備状况，练好基本功，并且先在重点机台上試驗，取得經驗，然后采取稳步地加快車速的办法。这种办法很有效。結果，既增加了产量，又保证了质量，原料、材料的消耗也沒有增多，反而节约了許多，設備的状况也很好。

又有一个时期，这个工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这时候，有的干部想用降低梳棉機車速的办法，来提高产品的质量。而根据本厂的



毛泽东同志說：“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經濟落后的穷国”。^①坚持从我国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好地安排經濟計划，更恰当地分配我国的人力、財力、物力，是加快我国建設速度的重要条件。

目前，我国各个战綫上都是一片大好形

势。我們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勤儉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国的建設事业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頁。

具体条件，如果采取这种办法，不但会加大前后工序設備不平衡的矛盾，影响后道工序生产能力的發揮，减少产量，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而且会丢掉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套宝贵的技术管理的經驗，打乱生产管理的正常秩序。这就是說，当时在提高质量同增加产量、节省人力、物力之間又产生着新的矛盾。针对这种情况，厂的领导认为，产品的质量必須提高，但是，应当在不降低車速、不减少产量、不浪費原料、不增加劳动力、保持生产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的条件下进行。因此，他們沒有采納这种降低車速、提高质量的意見，而决定用“三結合”的办法，改进工艺設計、加强設備維修，提高操作水平。通过对梳棉机进行几十种不同車速、不同工艺、不同机械条件的測定，終于找到了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梳棉机的車速。結果，車速沒有降低，产量沒有减少，原料、材料沒有多費，人工也沒有增加，而产品的质量却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嘉丰紡織厂在处理两个时期产量和质量的矛盾中，都是按照

全面地貫徹执行多快好省的原則办事的。

若問嘉丰紡織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是怎样全面地实现多快好省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发动群众，科学实验，实事求是，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嘉丰紡織厂所提出和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人們經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強調增加产品产量或者強調降低产品成本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提高产品质量；在強調提高产品质量的时候，又往往容易忽视增加产品产量或者忽视降低产品成本。也有的时候，要增加产品产量或者降低产品成本，就难以提高产品质量，甚至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或者相反，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难以增加产品产量，降低产品成本。

这样的矛盾，怎样解决呢？

解决这种矛盾，必須紧紧地抓住保证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这个中心环节。

工业产品的质量，是指工业产品适合一定的用途，滿足国民經济一定的需要的属



性。不具备满足一定需要的属性的产品，是没有效用的，或者是效用很低的。因此，当增加产品产量、降低产品成本，同保证产品质量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防止和克服降低质量的倾向。也就是说，要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处理多快好省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里所说的质量第一，是同“质量唯一”的那种片面思想根本不同的。质量第一，并不是不惜工本地去追求那种脱离实际的质量标准。

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全面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的运动，当我们抓增产工作或者抓节约工作的时候，要加倍地注意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产品质量。当然，我们抓提高产品质量工作的时候，也要认真地注意增产和节约。

没有质量，谈不上数量，也谈不上节约。只有在产品质量完全符合标准的条件下，生产才能够正常地进行，才能够真正地增加产量，才能够真正地节约。

质量的提高，不但在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产量，而且会节约原料、材料，节约人力。比如，同样的电灯泡，质量好的同质量差的相比，一个可以顶两个用。而制造电灯泡所用的原料、材料，所费的劳动时间，大体上却是相等的。

在某一个时候，针对着当时的具体情况，工作的重点，可能是提高产品质量，也可能是增加产品产量，或者是降低产品成本。一般

说来，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当产品的质量还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或者还不能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集中力量，努力提高质量，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求数量，求节约。当产品的质量已经达到标准并且相当稳定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应当是，在严格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努力求数量，求节约。但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片面地追求一个方面，都不能忽视提高质量。

如果增产节约同提高产品质量发生了矛盾，怎样处理呢？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对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于产生这种矛盾的各种原因，进行客观的分析，发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解决矛盾的办法，要经过反复地科学实验，肯定成绩，改正错误，使自己的措施符合于客观实际。这些办法，必须是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地求得多快好省，而不是相反。

有人说，处理这种矛盾困难太多，很不容易处理得好。

我们说，困难固然有，但是，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关键就看你能不能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切实地解决问题，就看你能不能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嘉丰纺织厂已经提供了一个正确处理这种矛盾的好例子。别的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呢？



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

施 經 綜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产地。自从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开采石油资源以来，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了帝国主义掠夺最大限度利润的源泉，而留给这个地区人民的却是日益加深的贫困与苦难。随着石油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扩大，它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性的增长，特别是由于攫取了石油就意味着攫取了巨大的利润，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掠夺便愈益带有疯狂性。美帝国主义，在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激烈的厮杀中，对亚非拉美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扩张中，发展成了亚非拉美地区最大的石油掠夺者。美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石油的横暴掠夺，充分地暴露了它的新殖民主义者的凶残面貌，也充分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当今最大的国际剥削者这个无可掩盖的事实。

千八百万吨，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四，其中又以亚洲所占比重最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七十一·二（西亚地区占百分之六十七·二），拉美占百分之八点九，非洲占百分之三点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地区的原油产量不断增加。这个地区的原油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也显著提高，由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二，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百分之六十·三。

亚非拉美地区的原油出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日趋重要。世界的原油出口，来自亚非拉美的比重，由战前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八，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一百一十三。亚非拉美地区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石油的主要供应基地。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国进口的原油绝大部分来自亚非拉美地区，它们的进口原油占国内消费量的百分比是：英国为百分之九十九·七，法国为百分之九十五，西德为百分之七十，意大利为百分之九十四，日本为百分之九十八·五。

长期以来，美国是大量输出石油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资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九六二年，这个地区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为三百二十六亿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石油的净进口量才大量增加，到一九六三年已达九千六百八十五万吨，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来自亚非拉美地区。美帝国主义是目前帝国主义国家中进口石油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国内目前消费的石油有百分之二十点一需要依赖进口。

战后美帝国主义加深对亚非拉美地区石油的掠夺，并不像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所喧嚷的那样，是由于美国石油资源日益“枯竭”，恰恰相反，美国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美国垄断资本加强对亚非拉美地区石油的掠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决定的。

首先，美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扩军备战，需要在国内封闭一部分油井作为战略储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专家华莱士·普拉特就主张限制国内的原油产量，鼓励由西亚输入原油。他甚至主张保存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以防在战时无法利用西亚石油。《纽约时报》也公开承认：“美国国防部的首脑们也是如此想法，他们着眼于委内瑞拉和它的石油在战略上对于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性”。

其次，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生产成本低、利润高，一些在亚非拉美地区占有油田的美国垄断组织，便竭力多开采亚非拉美的石油，以榨取更多的利润。

再次，美帝国主义需要通过对于亚非拉美

地区石油资源的掠夺去加强它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

美帝国主义成为亚非拉美地区最大的石油掠夺者，经历了一个野蛮地兼并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用种种手段霸占了这个地区许多国家的大片领土和石油资源，残酷地进行掠夺和剥削的过程；同时，也是美国垄断资本不断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利益的尖锐斗争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帝国主义除了在墨西哥占有石油产地之外，在国外没有任何油田。一九一〇年，美国在除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原油生产中只占百分之零点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石油垄断组织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很快地对英国和英荷资本所控制的石油公司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在美国垄断组织方面领导这场进攻的，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当时的董事长贝德福。^{*}贝德福用简短的一句话说明了进攻的办法，他说：“现在所需要的唯一措施，就是美国的侵略的对外政策”。美国国务院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的一项备忘录中，提醒它的工作人员说：“为了美国当前和将来的需要而取得充分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要

^{*} 美国垄断资本掠夺亚非拉美地区石油资源的公司，最大的有五家，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其中之一，其他四家是：纽约美孚飞马牌石油公司（以上两家公司属洛克菲勒财团），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属洛克菲勒财团和芝加哥财团），得克萨斯公司（又称德士古，属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海湾石油公司（属梅隆财团）。



視。現在許多国家的国民正在全世界各地全力以赴地开采已被探明的油田并勘探新的油田，正在积极地寻求石油租借地。我們必須有关于这种活动的最完整和及时的情报……我們还指出你們对正在搜寻租借地或租让权的可靠和負責的美国公民或企业給以一切合法的帮助。”

一九二二年，委內瑞拉的巴魯索第二号油井投入生产，日产原油十万桶，这就使帝国主义在国外掠夺石油的注意力从墨西哥引到委內瑞拉。但是，当时委內瑞拉的石油生产处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绝对控制之下，美国的新泽西美孚、印第安納美孚和海湾石油公司利用了委內瑞拉的戈麦斯贪污政权，掠取了丰富的石油租让地。到一九二九年，美帝国主义在委內瑞拉原油总产量中已經占到百分之五十四，超过了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到一九五六年，在委內瑞拉的全部外国石油公司的租让地中，美国公司占了四分之三，在石油开采量方面，一九五八年美国公司占百分之七十二。

現在，美帝国主义不仅在拉丁美洲最大的产油国委內瑞拉居于石油垄断地位，而且在阿根廷的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外国垄断資本控制的石油租让地中，占了十二万平方公里。在哥伦比亚，美国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五的石油开采业。在秘魯，美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垄断了秘魯百分之八十的原油生产。就整个拉丁美洲而言，美帝国主义一九六〇年初控制了全部原油儲量的百分之六十。在一九五九年控制了开采量的百分之五十七。美帝国主

义是拉丁美洲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

一九二七年，美国石油垄断資本开始打进西亚。在这以前，西亚石油产地完全处在英国控制之下，美国垄断資本在西亚沒有任何石油产地。一九二七年，伊拉克发现了大油田，次年，美国垄断資本就打进伊拉克，新泽西美孚和紐約美孚飞馬牌石油公司一共取得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百分之二十三点七五的股份。

一九二九年，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打进位于波斯湾上的英国的保护国巴林島，几年后，得克薩斯石油公司也进入巴林島，从此这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就平分了巴林島的全部租让地和石油开采权。

一九三三年，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出了一笔巨款給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于是取得了一项为期六十六年的租借地，后来得克薩斯、新泽西美孚和紐約美孚相继进入沙特阿拉伯組成阿美石油公司，控制了沙特阿拉伯全部石油资源。

在科威特，埋藏着的石油比全部南北美洲还要多，是目前世界上原油儲量最多的地方。科威特原来是英国控制的，海湾石油公司在美国政府帮助下，于一九三四年进入科威特，同英伊石油公司（后改称英国石油公司）組成科威特石油公司，控制了科威特全部石油资源，海湾石油公司取得了科威特石油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伊朗的石油，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以前，全部由英国資本所独占，一九五四年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在美、英



帝国主义干涉下失败后，以美、英为首的石油垄断资本组成的国际石油财团接管了原由英伊石油公司控制的财产，美国石油公司占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这样美国垄断资本就插进了世界第六大产油国的伊朗。

在整个西亚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石油公司控制了原油储量的百分之十二（一九三九年）和开采量的百分之十三点一（一九三七年），而到一九五九年，这个比例已分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和百分之五十五点二。由于西亚的石油资源占了亚洲的绝大部分，所以美帝国主义既是西亚也是亚洲石油的最大掠夺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帝国主义在非洲几乎没有任何石油租借地和开采权，二次大战期间，它利用老殖民主义者地位的削弱，乘机渗入非洲。二次大战后，美国在非洲的投资迅速增长，一九六二年，已达十二亿四千六百万美元，其中约有一三分之一投在北非，在全部北非投资中，有百分之九十二点四是石油投资。

一九五六年，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撒哈拉发现了艾杰勒大油田，美国同法国之间争夺撒哈拉的斗争就激烈起来。到目前为止，虽然阿尔及利亚的油田及石油开采主要仍控制在法国石油公司手中，但以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为首的八家美国公司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地区取得了大片租借地，租借地面积仅次于法国，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居第二位。

一九五九年，美国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埃索美孚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泽

尔登找到了大油田。目前在利比亚取得租借权的二十一家外国石油公司中，美国就占了十四家。利比亚的原油产量，一九六三年末开始超过阿尔及利亚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利比亚原油产量已经相当于阿尔及利亚原油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八，占非洲原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利比亚的原油产量的百分之九十，被美国的埃索美孚石油公司和绿洲石油集团所控制，另外，美国在非洲的其他产油国还控制着许多石油资源，所以总的来说，美帝国主义在非洲控制的租借地和掠夺的原油产量，目前已经超过法国，成为非洲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

美国石油垄断组织在亚非拉美地区的租借地的面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最多的，一九五七年已达五百一十九万三千八百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目前领土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四，超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亚非拉美地区占有的租借地面积的总和。根据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亚非拉美地区各产油国所占的股份计算，一九六三年一年内，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亚非拉美地区直接掠夺开采了约有三亿六千万吨原油，这是一个巨大数字，它相当于一九六二年美国国内的原油产量，它等于亚非拉美地区当年原油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美国石油垄断组织在亚非拉美地区霸占的租借地相当于半个多美国的领土，在这些领土上，美帝国主义组成了自己的石油王国，美国石油垄断组织这种不断扩大租借地的办法，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



手段对外扩张领土推行侵略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帝国主义代言人宣扬的所谓美国没有什么殖民地因而也就没有殖民利益的骗人的鬼话。

二

美帝国主义从掠夺亚非拉美的石油中榨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美国国外石油投资的利润，是美国垄断资本国外利润的最重要的源泉。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一九六二年美国垄断资本从国外榨取来的石油利润即达十七亿一千六百万美元，占当年美国国外私人直接投资净利四十二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四。在美国全部国外石油投资利润中，亚非拉美地区占百分之八十三。

从主要石油公司的利润来看，更是惊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六三年，美国五大石油公司的净利如下：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百三十一亿六千万美元；海湾石油公司四十六亿二千三百万美元；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五十六亿二千九百万美元；纽约美孚飞马牌石油公司四十一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四十八亿美元。仅在一九六三年一年之内，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净利就高达十亿美元以上。这五家大的石油公司的利润总额中约有百分之四十八到百分之六十六系来自国外的子公司，五家大石油公司占美国二十五家大公司国外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百分之六十九。

美国的五家最大石油公司同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合资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七家石油公司，他们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市场的国际卡特尔，号称“七姐妹”。一九六〇年，“七姐妹”的净收入达到二十五亿三千一百万美元，但美国的五家石油公司占了百分之七十三点五，其中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家的净收入就超过了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净收入的总和。

美国石油工业国外投资的利润率，一般都大大超过国内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一九六二年，美国石油公司在国内的投资利润率为百分之八点八，而它的国外石油公司的投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四点六。这还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在西亚地区，投资利润率更高。这一年，美国在西亚地区石油工业中投资总额累计共达十一亿四千八百万美元，而当年从西亚获得的净利为八亿四千五百万美元，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三。按成本计算的利润率则更骇人听闻。例如，在科威特，原油的成本每桶不过零点二美元，而它的卖价却高达两美元，成本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九百。据一九五七年美国大通银行的调查报告，一九五五年西亚地区原油售价是每吨十四点四美元，而成本只有一点八——二点五美元，即每吨获利十一点九——十二点六美元，成本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六百六十。难怪美国《新闻周刊》沾沾自喜地说过，在中东，“对外投资的利润就好像是《天方夜谈》中的数字”。

美国在亚非拉美石油工业投资的超额利



潤，喂肥了美国石油垄断資本。在美国一百家最大的非金融企业中，有十五家是石油公司，一九六〇年底，这十五家石油公司的资产总额达到三百七十二亿美元，占上述一百家最大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五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所拥有的资产高达二百五十七亿美元，占一百家最大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十五。到一九六二年，仅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一家的资产就高达一百一十五亿美元，居美国五百家大公司的首位，也是資本主义世界所有公司的首位。

美帝国主义从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家掠夺的巨额利潤，是建筑在对这些国家石油工人的残酷剝削的基础上的。在委内瑞拉，一个石油工人，每小时生产七十一个波利瓦的价值，但每小时只能得到六个波利瓦的工资。如果說，美国石油垄断資本在国内每年从一个石油工人身上要剝削四千五百美元的話，那末，以美国为首的石油公司，每年从委内瑞拉的每一个石油工人身上榨取的淨利高达二万一千八百美元。在科威特，石油工人遭受剝削的程度更是惊人，每一个科威特石油工人每年要为美国石油公司提供四万美元的利潤。

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人不仅工資低，而且工作条件差，工作時間长，經常遭到失业的威胁。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人工作時間长达十六至十八小时，但所得的工資仅等于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石油工人工資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在伊朗，全部石油工人所得工資只等于美英为首的国际石油財团所

得利潤的四十分之一。在科威特，工人的实际工資只及美国工人的十八分之一。許多石油工人实际上过着半饥饿的奴隶般的生活，居住条件极差，疾病流行。但这些国家石油工人的苦难还远不止于此。近年来，随着帝国主义在石油工业中采用新技术，失业的阴影籠罩在亚非拉美地区主要产油国家的石油工人的头上。一九四七年，委内瑞拉石油工人有六万四千人，目前工人人数下降到三万五千人，减少了近四万人。在沙特阿拉伯，一九五五年石油职工有二万人，一九六〇年减少到一万四千八百三十四人，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四分之一。

美帝国主义在亚非拉美地区掠夺性的开采石油，加深了这些产油国家的国民經济的畸形发展。例如，委内瑞拉过去是一个农牧业产品能够自給的国家，自从帝国主义在那里开采石油以来，国民經济起了重大变化，出口的产品百分之九十九是石油，农业生产日益衰落，目前不仅每年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而且連蔬菜、土豆和牛奶都要从美国进口。至于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則根本得不到发展，帝国主义反对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采油工业，很多国家廉价出口原油，可是却要高价进口石油产品。

由于經济的单一发展，使产油国家的財政收入依賴石油的程度很大，石油收入成了产油国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委内瑞拉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科威特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沙特阿拉伯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伊拉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伊朗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来自石油。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涨落、石油产量的升降、石油公司与产油国利润分成比例的变化，甚至石油公司造会计假账方法的改变，也都会影响到产油国的财政收入。而这些因素恰恰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石油垄断组织控制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也就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能够从各方面来干涉和控制产油国的经济和政治。

三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亚非拉美地区的石油进行了紧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斗争更加尖锐化，其中美、英两国之间的斗争规模最大和最为激烈。美国参议院国防计划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曾公开提出，美国在战争期间以“本国资源供给盟国以战争所必需的全部石油”，因此，在战后“向盟国、特别是向英国提出要以勘探出来的国外资源来补偿美国，那是很公平的”。

为了支持美国垄断组织的对外扩张，还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机构“石油储备公司”，替美国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猎取石油租借地，排挤英国的势力。中东是美英石油资本争夺的焦点，因为这个地区石油资源最丰富，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像杜勒斯曾经野心毕露描绘的那样：“自由世界中

许多国家的经济直接依赖于中东的天然物产和经过中东地区的交通。而且，间接说来，自由世界的全部经济都是与中东攸切相关的”。在殖民利益的驱使下，美、英帝国主义为着排挤竞争对手，除了通过扩大投资、控制石油运输管和加强“援助”等方式来夺取势力范围而外，还采取了破坏、暗杀和军事政变等最卑鄙的手段。美、英帝国主义的这些斗争都带有强烈的石油气味。美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东的控制权，甚至支持以色列同阿拉伯联盟进行公开的武装冲突，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进一步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中东推行侵略扩张和排挤英国势力的工具。

美、英帝国主义争夺中东石油的最激烈的斗争，是对伊朗石油控制权的争夺。一九五一年以前，伊朗石油全部控制在英国的英伊石油公司手中。一九五一年三月，伊朗政府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宣布实行石油国有化，从这一天起，美国从外交官到当时的总统杜鲁门都公开出面进行了紧张的活动，企图夺取伊朗的石油控制权、取代英国的地位。英国工党议员克罗斯曼当时惊呼：“美国传统上的石油政策如此严重地损害着英国的民族利益”。英国《泰晤士报》也抨击说：“美国的石油利益同英镑区石油是互不相容的”。这场斗争的结果，英国在伊朗的石油独占地位被打破了，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取得了伊朗百分之四十的石油控制权。

一九五六年，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石油资本竭力想插足进去，美、法之间争夺撒哈拉地区石



油资源的斗争激烈起来。但由于法国垄断资本的严密控制，直到一九五九年美国在撒哈拉的投资还只占全部外国投资的百分之六点五，法国资本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等公开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涉以扩大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和勘探面积，而法国垄断资本对此并不让步。美国垄断资本在夺取撒哈拉石油资源的计划遭到抵制以后，便采取种种手段来挖法国垄断资本的墙脚，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美法之间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英法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失败后，美国乘机排挤英法势力，企图独揽中东的石油利益，夺取对中东的控制权。当时，美帝国主义排挤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的重要一着，就是以“援助”为诱饵，以武力威胁为手段，推行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在致美国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毫不掩饰地说明美国实行这一新扩张的目标之一，是中东“那里的石油蕴藏量占已发现的世界蕴藏量三分之二左右”。美国在中东排挤西欧老殖民主义的行径遭到英法帝国主义的不满和抵制。一个名叫特里布列的法国部长愤怒地指责美国的目的是：“英法滚蛋，让我一个人来！”英国工党已故的领导人之一比万当时也心酸地说：“在英国在军事上或在经济上表现出太软的地方，美国的势力就接受过去”。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对帝国主义争夺石油的斗争作了如下的论断，他说：“现在世界列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石油问题。……拿全世界两大石油公司——代表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和代表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公

司’——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在全世界一切出产石油的地方都在进行斗争。这是美英两国之间的斗争。因为石油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①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对分析战后帝国主义争夺石油的斗争，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帝国主义为争夺石油而进行的斗争，使许多产油国家的政治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和扩大对石油的垄断，经常使用金钱收买、暗杀和颠覆破坏等等手段在产油国扶植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以执行有利于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政策。

早在二十世纪初，为了争夺墨西哥的石油，美帝国主义就在墨西哥不断地搞颠覆活动。一九〇一年，墨西哥总统迪亚斯给了美国人在墨西哥开采石油权，后来又给了英国石油开采权，于是美国同英国就为掠夺墨西哥的石油而展开了斗争。美国首先通过贷款和供应武器策动迪亚斯的对手马德罗制造政变，结果马德罗取胜并于一九一一年就任总统。英国不甘心失败，又利用墨西哥的威尔逊将军进行政变，一九一三年二月在墨西哥街上展开了激烈的浴血战，马德罗被捕并遭杀害，威尔逊就任总统。不久以后，美国又援助墨西哥的卡兰萨将军推翻了威尔逊政权，卡兰萨当了总统。卡兰萨为了保护墨西哥的权益，于一九一四年建议通过立法程序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0页。



确立国家对地下矿藏的所有权，一九一八年他接收了維拉克魯斯北部的油井，这样就妨碍了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美国石油公司在一九二〇年收买沃普雷孔將軍，暗杀了卡兰薩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在巴西也一再搞顛覆活动。一九五三年，巴西总统赫士略·瓦加斯頒布法令，申明只有巴西人有权开发本国石油和在巴西开设炼油厂，一九五四年初，巴西正式成立“巴西石油公司”，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石油国有化运动。这就引起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极大不满，在美帝国主义的壓力下，瓦加斯总统被迫辞职后自杀。前不久，在巴西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古拉特政府加紧石油国有化的步伐，下令征收私营炼油厂，直接触犯了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帝国主义就策动巴西反动派进行政变，顛覆了古拉特政府。

在中东，美英帝国主义为了争夺石油利益，不断地制造暗杀和政变事件，造成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例如，亲英的約旦国王阿布杜拉和伊朗首相拉茲馬拉都是被美帝国主义暗杀了的。在叙利亞，单是一九四九年一年中就发生了三次政变。一九四九年三月，泽伊姆上校在美国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宣布同美国阿拉伯石油公司签订的油管过境合同生效，八月，亲英的兴那維上校又发动政变，废除了同美国的油管过境合同，到十二月，施舍克里中校再次发动政变，重新宣布油管过境合同生效。

在伊朗，美国利用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来排挤英国之后，一九五三年八月，美国又反过来同英国勾結，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反动的陆軍顛覆了执行石油工业国有化政策的摩薩台政府，镇压了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扶植原納粹分子、后来变成美国走狗的薩希迪上台，为美国后来插足于伊朗石油业創造了条件。一九五七年，洛克菲勒給艾森豪威尔的秘密报告中就赤裸裸地說道：“我們终于能够取得伊朗石油，并且我們現在在这个国家的經濟中地位已經相当巩固。我們在伊朗的經濟地位的加强使我們能够控制它的整个外交政策，并且特别是使它参加了巴格达条約。目前，国王沙阿未經征求我們的大使的意見甚至不敢更动一下他的內閣。”

除了上述种种破坏手段以外，美帝国主义还使用軍事手段来扩张和保持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帝国主义不仅使亚非拉美的产油国家成为它的原料基地，而且使一些产油国家变成美帝国主义的軍事基地。在委內瑞拉、伊朗、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美国石油公司掠夺大量石油的国家，美国都建立了軍事基地。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美国的空軍基地就建立在重要的石油矿区达兰。在有些地方，美国采用了先建立軍事基地然后开采石油的手段，如一九五四年美国同利比亚签订协定租借了惠德勒斯空軍基地，一九五五年，美国四家石油公司就从利比亚取得了石油勘探权。美帝国主义除了在一些产油国建立軍事基地外，并对这些国家采取签订双边軍事协定，提供軍事“援助”，派遣軍事



代表团，训练和装备军队，拉拢亲美军人等手段，力图加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委内瑞拉、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家的军官大都是美国训练的，使用的大都是美式装备。无论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培植起来的当地军队，它们打的都是反共的旗帜，但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扩张与保护美国的石油企业和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

四

亚非拉美地区各国人民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掠夺石油资源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斗争声势越来越大，斗争的方式也在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比较普遍的是为争取实行或提高利润分成的比例而斗争。在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家中，第一个取得石油利润对半分成的国家是委内瑞拉。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人曾经举行了总罢工，总罢工得到全国学生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这是委内瑞拉人民有史以来公开反抗外国石油公司的第一个信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委内瑞拉工人阶级日益强大的压力下，美国石油垄断组织被迫与委内瑞拉政府谈判，接受了石油利润对半分成的原则。一九四三年在委内瑞拉开始执行的利润对半分成办法，从一九五〇年起逐渐扩大到西亚地区各国，在有些产油国，利润分成已超过半数以上。在实行利润分成办法以前，各个美国石油公司在产油国得到的利润高达产油国家的收入的五至十倍；实行利润分成办法以后，

美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将一些利润分给产油国家，从而使产油国家增加一些收入。

但是，按照这种办法分给产油国的利润，只是帝国主义的残羹剩饭。因为石油公司的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员担任，产油国不能参加管理，因而公司的财务状况，例如，开采了多少原油，利润的实际数字共有多少，产油国都无法知道。所以即使实行利润分成或利润分成比例有所提高，也由于帝国主义的弄虚作假而不能给产油国带来多大好处。例如：利比亚政府与美国石油公司实行利润对半分成，但是一九六二年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公司共获利一亿四千万美元，而利比亚政府的石油收入仅有一千九百万美元，利比亚政府的石油收入仅为当年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公司的利润的七分之一。事实表明，在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人民斗争的压力下，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际石油卡特尔不得不被迫在表面上作有限的让步，实行利润分成办法或提高利润分成比例，但是这种办法有很大欺骗性，从根本上说，它更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作为亚非拉美石油资源的掠夺者和垄断者的地位。

亚非拉美地区的产油国家，从长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中知道，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石油垄断组织的垄断和控制。一九五九年，在开罗召开了第一届阿拉伯石油大会，接着，大会附设的石油专家委员会开会，会议建议今后在没有阿拉伯国家分享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情况下，不再给予新的租让权，会议敦促所有成员国实行标准化的石油法，并收回租让地区中尚未开发的部分。在一九六〇年十月



第二届阿拉伯石油大会开会的前一个多月，亚非拉美地区主要石油出口国家成立了由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和委内瑞拉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后来，卡塔尔也参加了。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石油政策，特别是在石油价格政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抵制帝国主义垄断石油价格。现在，产油国的联合组织的成员，已由阿拉伯国家扩大到亚非拉美地区的主要产油国家，亚非拉美地区产油国家的联合，为在更大范围内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掠夺、剥削和控制，亚非拉美人民纷纷要求把美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石油企业实行国有化。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墨西哥人民强烈的要求下，墨西哥首先实行了石油工业国有化。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国有化法令，成立了国营墨西哥石油公司，一九四〇年全面控制了墨西哥国内石油的生产和销售。墨西哥人民在美、英帝国主义破坏了油田的基础上，克服了资本短缺和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困难，发展了本国的石油工业，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锡兰政府不顾美帝国主义停止“援助”的威胁，接管了美国和英国三家石油公司的全部财产、设备和业务，并将石油制品进口和销售业务全部交由锡兰石油公司经营。从此结束了许多年来外国石油公司垄断锡兰石油市场的局面。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就这件事发表的文告中指出：“除非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组织对

我们经济的控制，否则我们的政治自由就没有什么意义。”

近年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保卫石油主权的斗争，在人民要求石油国有化的运动的推动下也正在向前发展。在伊朗和巴西，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的武装颠覆和破坏下，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它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从反面教育了这些国家和亚非拉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活动必须保持严重的警惕。

亚非拉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石油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这一斗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过程。事实证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垄断和控制的 国家，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地办好本国的石油工业。英勇的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古巴政府把地下的石油资源全部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一九六〇年又把美孚和得克萨斯两家美帝国主义的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尽管美帝国主义疯狂地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来扼杀古巴石油工业，但是古巴人民通过对美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使古巴的石油工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迈进。古巴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在古巴的石油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办法，沉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古巴人民的英勇行为给目前仍然受到美帝国主义掠夺、剥削和控制的亚非拉美地区各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

——讀《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論集》

孔 繁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我国以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曾經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佛教哲学成为我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唯心主义思潮之一。研究中国哲学史，如果不重視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就将难以清楚地了解中国哲学史上較长时期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发展綫索。因此，我們今天应当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加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虽然出版了一些有关佛教等宗教問題的著作（其中有些是解放前旧著的再版），但是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成的著作是很少的。任继愈同志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論集》，可以說是近年来我国哲学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批判中国佛教思想的尝试之一。論文集收集了作者的七篇論文和几篇附录。作者在这些論文中，试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佛教哲学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及其社会政治作用；并对隋唐时期重要佛教宗派的思想体系，作了初步的剖析，对我国佛教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方法，例如，胡适在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进行了批判。

作者是从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考察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的。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經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佛教虽然是外来的宗教，但它在中国生根发展以后，便和印度的佛教不同了。从我国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以看出，凡是与中国当时社会条件相适应建立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禪宗），就得到发展，生搬硬套的外来学說（如法相宗），就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我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是和过去我国社会政治、經济关系的变化、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因此，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况，不能脱离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綫的斗争。

佛教自传入中国时起，就一直是按照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解释和需要来传播其宗教学說的。佛教的唯心主义与中国固有的儒家唯心主义以及老庄哲学互相补充，互相发展，共同反对唯物主义。我国哲学史上反对佛教有神論的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行的宗教迷信是道术方士的神仙方术，当时佛教传入我国，即是被統治者当作神仙方术来理解和接受的，史书上有“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的記



載。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思想與為當時門閥士族地主政治服務的玄學唯心主義結合，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玄學唯心主義相適應，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學說引起當時社會的重視。當時“般若”學說的一些宗派，可以在玄學中找到它們的思想聯繫，如以道安為代表的“本無”宗和以支道林為代表的“即色”宗，即相同於玄學中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的“貴無”思想和以向秀、郭象為代表的“崇有”思想。玄學與“般若”的唯心主義，都是追求超越客觀世界的精神性的本體。佛學以玄學唯心主義對老莊的理解來解釋“般若”思想，而玄學也借助“般若”學說來豐富發展它的唯心主義。例如，魏晉以來，玄學唯心主義關於“有”“無”、“本”“末”（即最高的精神本體與客觀物質世界以及人們表現出來的精神活動）之間的矛盾，長期在理論上不能得到圓滿解決。而佛教的學者則用“般若”空宗的思想，把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及其運動變化都宣布為“假有”、假象，這樣做，雖然並未有真正解決“本末有無”的矛盾，但通過純粹思辨的方法彌縫了玄學唯心主義理論上的矛盾，從而發展了玄學唯心主義。

在南北朝門閥制度僵化、階級對立十分尖銳的社會條件下，佛教提倡“涅槃”佛性的學說，即通過宣揚人人都有佛性，宣揚靈魂不滅和因果報應，轉移人民對現實社會階級壓迫的鬥爭。當時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便集中在反對靈魂不滅和因果報應上。南朝齊、梁之際展開的神不滅與神滅的爭論，曾使唯物主義無神論與佛教唯心主義有

神論的鬥爭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佛教提倡的神不滅論，實際是對中國傳統的宗教有神有鬼論所作的進一步的理論發揮；而范縝的神滅論思想則把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形神關係的學說推到新的階段，肯定了精神是物質的作用，嚴重地打擊了佛教的宗教迷信。

隋唐時期，佛教形成各個強大的宗派，佛教發展到鼎盛時期。當時佛教各宗派為了建立獨立完整的唯心主義理論，都建立了判教的體系。判教，雖然也表現了佛教內部各宗派之間的排他性，但其主要的目的仍是為了加強佛教理論戰線的防禦力量，為了反對唯物主義。判教，使佛教唯心主義更向徹底發展，如法相宗以“阿賴耶識”為宇宙的本體，把客觀物質世界說成人的意識和感覺活動的產物。這種唯心主義已經很徹底了，而華嚴宗的宗密則認為把“識”絕對化，“識”有被理解為客觀實在的嫌疑，這種唯心主義還不夠徹底。各宗派都紛紛“侈大其宗，自名一家”，競相建立瑣瑣臆造的哲學體系。它們一方面竭力粉飾“天國”的美滿幸福，宣傳人世不能與“天國”相比；另一方面又竭力從理論上縮小人世和天堂的距離，更為廉價地大量出售進入“天國”的門票。如像天台宗提倡的“無情有性”，華嚴宗提倡的“理事無礙”，法相宗提倡的“三性”、“三無性”、“轉識成智”，禪宗提倡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都力圖從理論上掏空客觀現實世界的物質內容，通過對各種哲學範疇的歪曲，通過相對主義詭辯論的方法，把認識的某一環節加以絕對地夸大，妄圖用主觀精神去吞併客觀物質



世界，把客观物质世界看成是人的幻觉、假象，使人不再去积极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这样便在世界观上牢固地确立起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

当时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要反对佛教，是要在政治上冒很大风险的。唐初自然科学家傅奕，曾经依据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佛教有神论进行过尖锐的抨击。唐中叶重要唯物主义哲学家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学说，否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上有超越的神做主宰，这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对于包括佛教在内的一切宗教有神论的新的有力的驳斥。宋明时期兴起的“理学”和“心学”唯心主义，如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虽然排斥了佛教的宗教形式，却又继承了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客观唯心主义者主张有一个超越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性的“理”为世界的本原，世界万物均是这个“理”的体现，他们宣传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和华严宗的“理事无碍”的思想相接近。主观唯心主义者主张“心”为世界的本原，提倡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的“致良知”说，也即是吸收了禅宗的“顿悟”的学说。宋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陈亮、叶适、王廷相、罗钦顺、王夫之等人，他们在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都指出当时的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与佛教的唯心主义有着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他们批判理学唯心主义的同时，也继续深入地批判了佛教唯心主义。

佛教思想长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重要的宗教观念形态，被封建统治阶级用作压迫人民的精神武器，起了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作用。佛教唯心主义和科学是绝对不相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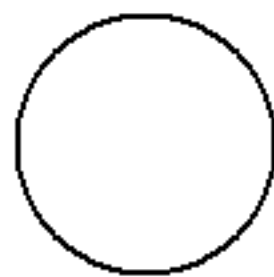
但是佛教思想也曾经在认识论的某一环节提出过某些较为深刻的哲学思想。佛教哲学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它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精致的烦琐的哲学体系，有时也歪曲地透露出辩证法的思想。作为思想资料，它的逻辑分析方法，它的某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也还有批判吸取的价值。我国历史上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在和唯心主义斗争中，也有批判改造佛教思想来丰富自己的体系的。如张载、王夫之等在反对唯心主义超越一切的“道”或“理”时，就曾经批判吸收佛教的某些泛神论思想和某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论证“道”不能脱离“器”，“理”不能脱离“事”。因为佛教哲学中包含有丰富的反面材料，所以过去凡是批判了佛教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通过对佛教思想的扬弃、改造，都曾使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曾经利用禅宗提出的不信权威的口号，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孔子的言论也提出过怀疑，发展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清末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谭嗣同，在建立他的“仁学”哲学体系时，也曾吸收佛教的某些思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章炳麟，亦曾试图把法相宗和华严宗的思想加以改造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相揉和，来建立适应资



产阶级革命要求的哲学体系。他还把禅宗的思想概括为“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用以鼓动人們不怕牺牲，勇于去进行革命斗争。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佛教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深刻影响。

从以上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加强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任继愈同志的论文集，对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批判中国佛教思想，还刚刚开始，作者还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因此，论文集不論在論述佛教思想在我国发展中的社会政治作用方面，或者对每一重要哲学宗派的体系的剖析及其作用的評价方面，都还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唐初是我国統一的强盛的帝国形成的时期，也是佛教哲学发展极盛的时期，作者对佛教各宗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經濟所发生的作用的分析，显得不够。对于佛教哲学体系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如泛神論思想的滋长（在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中都述及到）的原因，分析也不够充分。尽管对于各重要宗派思想体系的具体分析和評价，需要繼續深入研究，进一

步加以討論。但作者所坚持的研究方向，則是应当肯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解剖一切思想史（包括佛教思想史）的钥匙，离开这把钥匙，就无法探寻思想史的秘密，对某一时代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能作出正确評价。历史上有不少卓越的唯物主义无神論者，他們和宗教唯心主义进行过尖銳的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宗教迷信，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但他們都未能找到宗教发生的真正根源，他們在历史观方面的唯心主义不可避免地給宗教思想留下活动的地盘，他們反对宗教的斗争都不能是彻底的。近代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完全从外来的偶然原因，从佛教思想本身說明佛教思想在我国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唯心史观。像这样的錯誤，我們不能再重复。我們必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插到这一学术領域，使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为我們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佛教这种宗教迷信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中仍然保留有相当的影响，研究批判佛教思想，对于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論，克服人們思想中的宗教偏見，具有现实的意义。



坚持革命方向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节目观后

王朝闻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我从彭真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中，从京剧艺术家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言行中，从艺术家们的工作和学习态度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我所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论在艺术创造上、艺术评介和研究上，都必须经常地、一贯地、坚决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

回顾自己一九六二年夏季以前那些涉及戏曲的文章，对待传统戏曲的态度，出现过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不是从群众的革命利益和政治需要出发，实际是从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出发，对于传统戏曲加以不应有的赞扬。不仅赞扬过一些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需要相抵触的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曲，而且一再赞扬过川剧《焚香记》、《红梅记》、昆曲《钟馗嫁妹》、京剧（以及地方戏）《伐子都》这四个鬼戏，错误地肯定过其中的鬼魂敷桂英、李慧娘、钟馗、颖考叔和他的马童在形象的塑造上以至思想内容上的意义，产生了坏的影响。

概括地说，我在鬼戏问题上发表过的错误论点，有如下几方面：我把鬼的形象的塑造，和神话、寓言的形象的塑造，在手段上和效果上都混淆起来，把这种产生于迷信思想的鬼，不仅单纯地当成想像和幻想的产物，而且还认为它有利于矛盾的集中表现，有利于深刻、透彻表达反封建的主题思想；我把鬼的形象的塑造，当成因犯罪而心中有鬼的人的心理状态的一种具体描写，当成暗杀颖考叔及马童的子都特殊心理的形象化形式，忽视这种形象的鬼的特性对观众精神上的坏作用；我没有把鬼魂报仇

当成在封建势力压迫之下的人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的表现，而认为这种死后也要复仇的鬼的形象是反封建的人的性格的发展，是由不反抗到反抗的性格的质变和飞跃。总之，是把鬼魂和人混淆起来，把所谓好鬼当成现实中的好人来加以赞扬，把台上的鬼魂当成戏剧概括生活的一种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必要的方式，这实质上是为鬼戏在过去和现在的存在，从艺术形式上甚至思想内容上，提出了为它辩护的论证，为鬼戏的继续上演制造了“理论”根据。这就表明我完全忽视了存在于这些即使是经过整理的鬼戏中的迷信观念，宿命论思想，唯心主义思想对于群众思想上的毒害，没有严肃考虑过鬼戏在社会主义时代的舞台上出现，是不是会加深和巩固群众残留的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宿命论思想，是不是会引导人厌恶和逃避现实斗争，是不是会阻碍群众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严重错误的产生，是我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结果。

在无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复杂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革命形势之下，在群众要求进一步革命化和进行自我改造的革命形势之下，对于艺术家和评论工作者来说，一切文艺现象都必须摆在当前整个的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之下来理解，必须警惕地对待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包括有些人想利用鬼戏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即令是对于某些在封建社会中曾经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传统剧目，也不能不管历史条件，不根据当前的革命形势，严肃对



待；认真分析它在社会主义时代可能引起什么作用，认识它究竟是有利于革命还是不利于革命，它究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起巩固和发展的作用还是相反，这都是在评介包括传统戏曲的艺术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而我自己，却把鬼戏当好戏来称赞，支持了不利于革命的鬼戏，根本违反了革命的文艺评论工作的政治方向，损害了党和人民的革命利益。

这次京剧现代戏会演，特别是党关于坚持文艺的革命方向的指示，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也鼓舞了我彻底进行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大会教育了我。为了把社会主义新戏曲推向更高的高峰，为了京剧现代戏和其他革命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为了革命的艺术创作与革命的艺术评论在正确方向下的并肩前进，为了在艺术领域中战胜一切敌对思想的进攻，艺术创作、评论工作、研究工作都必须把坚持革命方向放在头等重要地位。在这里，我把参观京剧现代戏演出的一些体会，特别是它坚持党的革命文艺方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分四点加以表述。

革命的艺术

革命的京剧现代戏，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产物。京剧经过革命的变革，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农兵的革命艺术，成为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有力武器。我所看到的京剧现代戏，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不能互相代替的优点，也有不能混同的特点，却都一致地在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使京剧艺术起了质的变化。在反映各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中，都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着重点入手，歌颂工农兵群众，表现工农兵群众，代表工农兵群众的。这是这些现代戏革命化、群众化最有决定意义的标志，也是它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的决定性原因。

革命群众迫切需要的，是工农兵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且显示出他们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伟大气魄的现代戏。艺术的时代性不是抽象的概念，

如果不是主要表现工农兵，京剧的时代性的表现就丧失了最重要的依据。那些歌颂帝王将相、少爷小姐的京剧，是违反工农兵的政治利益的，对群众的思想感情起腐蚀和毒害作用，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根本违背了人民群众对艺术的要求。那些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内容，以反对贪官污吏和济困扶危的英雄为主角的戏曲，虽然和工农兵利益不是绝对对立的，可是它对封建的剥削制度没有彻底加以摧毁的要求，它宣传的不是彻底革命的思想，远远落后于当代工农兵群众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所以，如果不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整理和改编，从而明确显示历史的本来面目，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这样的戏曲也很难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

只有歌颂和表现当代的英雄，才最能代表工农兵，也才能更好地教育工农兵。尽管传统戏曲中也有正气凛然的民族英雄，在经受得住敌人威胁利诱的严重考验，坚持爱国主义信念而慷慨就义这一点，和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或《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的遭遇与态度有相近之处，但是后者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他那坚贞不屈的行为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是建立在自觉的无产阶级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作用远不是旧时代的民族英雄所能企及所能代替的。以战争生活为题材，以武生为主要角色的《三打祝家庄》，和《智取威虎山》或《奇袭白虎团》相比较，前者在思想内容上就显得大为逊色。虽然这种经过改革的优秀剧目对当代群众也是有益的，但是从人物精神面貌的高度看来，混进敌人领导部门的乐和，哪里比得上混进威虎山的解放军战士杨子荣？探庄时越过重重困难的石秀，哪里比得上深入敌人腹地的志愿军战士严伟才？这是因为后者的斗争遵循党的正确领导，他们那勇敢、机智的战斗行为，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

传统戏曲中的英雄，不能代替现代戏中的英雄的重要原因，也在于观众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新时代的英雄，是和群众生活、斗争在同时代的，奋斗目标和斗争对象都是共同的，和当代群众是同



呼吸、共命运的，所以，当他经过艺术的概括而出现在舞台上，使人感到无比亲切而受到鼓舞，成为观众愿意直接仿效的对象。

时代的英雄成为京剧的主角，关系政治思想上的教育作用，也关系艺术魅力的大小。《红灯记》所反映的生活和斗争，同我们的生活和斗争密切相关，所以，当我们看到李玉和同磨刀人将要接上秘密关系时所引起的兴奋，在心理基础上不同于看到旧戏里的好人和好人取得联系时所引起的兴奋。当我们看到李玉和同磨刀人的联系被突然到来的日寇所破坏，看到情急智生的李玉和从容不迫地把秘密文件放进饭盒，唱“打开饭盒把粥倒”时所感到的愉快，既是演员那种富于潜台词的演唱所引起的，也是观众自己对于同时代的英雄的命运和文件的关心所引起的。抒情性是京剧歌唱的特点和力量所在，也是观众自己的情感对象化的依据；但是只有当演员唱出了当代英雄一贯而又和具体矛盾冲突相结合的革命感情，观众自己的革命感情得到了相应的表现形式，表现李玉和的感情的歌唱才强烈地感动了自己，从而有力地影响了自己的思想。出现在舞台上的对象是同时代的英雄，所以当观众仿佛觉得不是演员在演唱，而体验着李玉和战胜了困难时的喜悦心情，这种演唱对观众产生了不是看见旧戏里的好人脱险时所能引起的感动，在精神上引起了看传统戏曲不能引起的影响。

在文学性较强的传统戏曲里，富于艺术魅力的双关语，不是找不到的。但是，我在《红灯记》里所听到的双关语，不论是李玉和在“赴宴”之前，接受李奶奶的送别酒时出现的双关语①，还是李玉和同鸠山舌战，辩论人生意义时出现的双关语，还是李玉和在临刑前叮嘱铁梅“……若有机缘回家转，你……与我投亲靠友到关山”这样的双关语，都是切合当代英雄的战斗生活的，是和这种斗争的时间、地点、条件分不开的，所以它的隐喻性的力量，在观众情感上所引起的激动，至少在程度上不是任何传统戏里的双关语所能匹敌的。

由此可见：京剧究竟应当主要是演今人还是演古人，究竟应当是歌颂新人还是歌颂旧人，究竟应

当为多数人服务和代表多数人，还是相反，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革命的京剧现代戏，是代表群众对当代的现实生活“发言”的，是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态度在戏曲艺术中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艺术都要表现本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宣传本阶级的思想，借此达到自己的胜利，巩固本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戏剧也不例外。那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利益的旧京剧，有时也描写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可是却把他们当成无足轻重的奴才，粗鄙可笑的丑角。要是我们容忍它占领社会主义时代的舞台，就无异于是帮助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对革命进行侵蚀。党对戏曲改革的领导，代表着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利益，代表千百万群众的欣赏要求，不仅为革命的京剧艺术家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也符合他们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因此，把舞台这一阵地夺回来，把那些对敌人有利对人民不利的旧戏赶出舞台，大力提倡革命的现代戏，是十分必要的。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它那革命性威力感到恐惧，看也没有看就破口咒骂它。但是任何咒骂都不能阻挠我们前进的步伐，只能证明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正确。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重大成就，是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胜利。这就不仅预示了京剧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而且一定会积极影响整个戏曲和其他艺术的革命化的发展。不论是依据小说、电影改编出来的剧本，还是从别的剧种移植过来的剧本，本质上也是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还处于前进过程中，所以它还不是十分成熟的。如果剧本修改得更成熟些，演员再创造的才能定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不少剧目在反复研究群众反应的

① 李玉和：……妈，您保重，我走啦。

李奶奶：慢！铁梅，拿酒来。

铁梅：哎！

侯队长：酒席上有的是酒啊！

李奶奶：哼！

(念)穷人喝惯了自家酒，

点点滴滴在心头。

……



条件之下，经过反复演出和反复修改，当它在思想上艺术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一定会成为很好的保留节目。经过反复加工而提高了思想性的新作品，又会被其他剧种移植过去，在适应其他剧种的特性的条件下，使它在艺术上得到相应的丰富和提高。一切文艺现象都不是彼此孤立的；正因为观摩演出的成就是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戏剧之外的其他艺术（例如中国画），也会得到如何革命化、群众化的借鉴，使它自身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根据许多优秀剧目和优秀表演的经验看来，保证剧本或表演内容的正确性、深刻性的根本条件，保证剧本或表演形式的创造性、借鉴性的根本条件，是艺术家自身的逐步革命化，是艺术家逐步与工农兵结合，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受到革命的教育。《智取威虎山》的革命化、群众化，不仅表现在剧本思想内容上，也表现在表演形式上，这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接受了党的领导的结果。“献图”一场戏很感人，它是按照革命群众对客观事物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态度来处理的。仅就场面调度看来，导演不是把匪首的座位安排在传统戏曲的排朝或点将的中心，而是安排在舞台的侧面。艺术家利用了座山雕迷恋“先遣图”这些生活的具体性，把他从高位上调下来，让英雄杨子荣转到场面的“制高点”引诱对方随着自己手中的那幅图打转转，像耍猴子那样耍弄着座山雕。在观众感受上造成了这样的特点：杨子荣处于有崇高感的“仰拍”镜头似的地位，座山雕处于有卑下感的“俯拍”镜头似的地位。这就避免了正不压邪的客观主义地塑造形象的毛病。演员李仲林的表演不偏于再现杨子荣冒充土匪的邪恶的生活特征，而是力图不因为表现杨子荣化装土匪而掩盖了人民英雄的本色。在情节上关于射击技术的表演，让角色欺骗狡猾的敌人，却力图避免客观上欺骗了观众。这种和自然主义根本不同的方法，不让任何丑恶的东西掩盖了英雄的美，使观众随时都感到自己面对着可以信赖的英雄那种崇高的精神面貌，是坚持艺术革命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要正确表现当代英雄，不仅必须掌握新时代群众发展了的审美趣味，而且自己必须首先具有革命

者的思想感情。演员李丽芳说，自己如果“不革命化，怎么能正确和深刻地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呢？”准备表现英雄的过程，就是向英雄学习的过程。把当代英雄演得又真又美的演员宋玉庆说过，他在《奇袭白虎团》里扮演志愿军侦察排长严伟才，开始为了突出表现人物的英雄气派，产生了不像革命战士的缺点，后来向抗美援朝的侦察兵英雄杨育才学习，学到了他那“既有平平常常，对自己同志亲切平易的一面，而当对敌斗争时，他又有机智勇敢、行动起来像生龙活虎的一面”等特点，才进一步解决了表演的真实感与京剧艺术特性的矛盾，得到观众的赞扬。许多演员成功的表演证明：艺术家的工农兵化不仅是为了利用戏曲形式在形象上把工农兵表现得既真且美，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给这种神圣的劳动创造最根本的条件，保证在思想上正确认识所要再现的对象，在情感上深刻感受所要再现的对象。

艺术的革新

京剧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和工农兵相结合，不仅使京剧的内容革命化了，而且使京剧的形式也丰富和发展了。

京剧现代戏不能脱离京剧艺术，同时却必须是京剧艺术的革新。从崭新的创作任务出发而革新了的京剧艺术，在某些方面不能不抛弃传统京剧艺术，在某些方面已经高于传统的京剧艺术。尽管传统的京剧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但是它受到内容的限制，在某些方面不能不落后于即使是新生的现代戏的艺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现代戏的新内容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形式，因而在角色行当上，在音乐设计上，在表演程式上，在舞台美术设计上，老一套的形式必须加以改革。经过改革以后，服从新内容的现代戏的艺术形式，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水平。

在《芦荡火种》里扮演阿庆嫂的演员赵燕侠，在《红灯记》里扮演李奶奶的演员高玉倩，从前都是演花旦的，现在，花旦行当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被突破。一个为了透过茶馆老板娘的身分而鲜明地显示出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一个为了从家庭妇女的身分中



鮮明地显示出坚定、穩健、沉着的革命老人的气派。这对演員自身說来，行当被改变了也被丰富和发展了。在《奇襲白虎团》里扮演志願軍团长的方荣翔，从前唱銅錘花脸；在《六号門》里扮演胡二的李荣威，从前唱架子花脸。两人在行腔上和做派上，都不受类型化的行当区分所拘束，有时簡直使人想不到他們原来的行当是什么。前者的唱使观众好像面对着一个沉着、穩健而充滿力量的老干部，后者在不唱不舞时，仿佛是一座造型样式化了的圓雕，使这个觉醒了的搬运工人显得全身都充滿了澎湃的革命热情。为了真实地塑造在傳統京剧中沒有表现过的新人物，为了使久經战斗考驗的指揮員的精神面貌不被歪曲，为了使从受压迫而轉化为自觉革命工人的性格和气质演得生动活泼，演員們不受自己原有的艺术素养所拘束，創造了新的艺术，这是符合艺术发展規律的。嶄新的内容突破了原有的角色类型，也就是扩充了原来很有限的行当，这不是很值得高兴的吗？

傳統京剧表演程式的产生，从属于旧时代的生活实际。現代戏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不排斥动作的样式化和美化；但是这一切不是套用旧程式，而是利用旧程式，創造新程式。在《奇襲白虎团》里，尖刀班偵察英雄在敌人腹地的夜行軍，那些在风雨、泥路、铁絲网、地雷、关卡、敌哨等重要障碍中行进の志願軍英雄，那些又好看又惊人的舞蹈和武功，不簡單是傳統京剧的“走边”等程式的因襲，可喜的是为了真实地塑造当代英雄的嶄新的創造，所以演員自己一时还叫不出这些新程式的名字。在《送肥記》里扮演錢二嫂的演員董芷苓，利用了她那花旦行当的艺术素养，在表演上很撒得开；但是不能以为角色一再“出門”或“進門”的时候，那些活泼、敏捷而节奏鮮明的身段、台步、手势、眼神，不过是花旦表演程式的因襲；因为这一切始終是以塑造勤劳而又沒有摆脱私有观念的錢二嫂的性格特征为轉移的。戏曲里的无声語言（做或舞），往往較之多余的說話更有表现力，更动人。《紅灯記》不仅創造了不少符合戏曲傳統的唱和白，而且設計了不少很有表现力也很优美的舞和做。当李铁梅为奶奶和爹爹盡完孝，提着紅灯，将要离开不再回来的家，那表现化悲慟为力量的心情变化的舞蹈，使观众仿佛

置身于阶级觉悟的具体过程之中，体验她那即将为新的艰巨的革命任务而有所作为时的内心生活。这些很好的設計和表演，符合戏曲艺术特点；虽然它在程式的利用上和傳統京剧有联系，可是这一切服从嶄新的艺术趣味，是从嶄新的生活实际出发的，所以，在程式上和傳統京剧表演程式很有区别。

不少由革命新内容出发，因而創造出来的又新颖又好听的唱腔，連行家也沒有回答我它叫什么名目。暂时沒有名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現代戏发展了京剧的歌唱艺术。对音乐我更外行；但是也能感到現代戏在行腔上和傳統戏曲有区别，感到音乐上的創造性。李荣威在表现胡二情緒激动时，唱得剛健，在情緒不那么激动时，唱得低沉，而不是一鼓劲地保持着粗豪的类型化的行腔規格。这种变化了的唱法，沒有妨碍人物性格的一貫性，也沒有妨碍形式上的和諧，而是使人物的心理和情緒的变化表现得更真实。我所听过的傳統京剧，沒有川剧帮腔式的幕后帮唱，只有角色在上場門內的干唱（叫做“悶帘”或“馬門腔”），可是在《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演出里，我听到了新东西。当李铁梅从敌人監獄出来，压抑着而又压抑不住滿腔悲憤的情緒，緩步行进着的时候，台后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帮唱。这段帮唱，使铁梅一定要把革命任务担起来的决心、信心的表现，得到了不是前台角色自唱所能代替的感染力。《节振国》这个出色地再现了矿工解放斗争的剧作，在帮唱上显得更有变化。当节振国掩藏在工人家里，期待着党的联系时，台上的独唱与台內的帮唱互相交織着，有的是互相补充，有的近似互相“交談”，运用自如，形式活泼，加强了这一个片紅心向着党的革命工人的精神面貌的刻画，加强了崇高的主题内容的充分表达。我不以为每个現代戏都要有这样的手法，我却在这些新的嘗試中，感到京剧艺术的新变化，新收获。这，也好像打击乐的适当利用；是加强表演与观众的联系的一种手段，它不只为角色心情創造了特殊的音乐化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也間接地表现了观众的生活經驗。这是促使观众体验台上角色的条件，借此加强了角色与观众的交流。

形式服从内容，現代戏对京剧艺术的改革，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京剧現代戏既然是一



种戏曲，不像戏曲当然会脱离群众的欣赏习惯；但是只求形式上像戏曲而在内容上脱离现代生活，也会脱离当代观众新的艺术趣味。现代男人没有一二尺长的头发，如果硬要内容服从形式，让情绪激动的胡二像情绪激动的林冲那样大甩其水发，即使做得到，那也是可笑的。如果是这样，观众不仅不会像看林冲受难时那样同情胡二的受难，而且会觉得艺术家是在和人物和观众开玩笑。髻口功、翎子功、帽翅功……这些使角色内心状态得到夸张的外形化表现的传统艺术技巧，体现着戏曲艺术规律，现代戏不拒绝加以吸收和融合，但是因为这一切具体形式已经丧失了它所模仿的具体对象，不可能在现代戏里保持它原有的地位。

这些只能在传统剧目中出现的東西，在现代戏里没有地位，是不是可惜呢？如果从一招一式看问题，这会感到很可惜。如果是全面地，从艺术发展规律看问题，相信新的生活一定会向京剧提出创造新技巧的要求，今后现代戏一定会不断产生新的戏曲艺术形式，那么，某些旧技巧在现代戏里丧失了地位，并不可惜。在艺术里，无例外地不能抗拒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新的绝招一定代替某些旧的绝招。革命的京剧艺术家，在唱、念、做、打各方面，今后更将为观众提供符合欣赏戏曲艺术的习惯和发展了的兴趣的新艺术。

对于把京剧当成战斗武器，敢于创造的艺术家的说来，又真实又优美的戏曲新形式，一定会随实践的继续深入而不断产生。传统戏曲艺术曾经有由烦琐到单纯，由简陋到丰富的发展过程，现代戏艺术也必然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包括处理布景与表演的主从、虚实关系，艺术家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可以预料，富于生命力的现代戏，在艺术的成长过程中虽然也不免不断出现各种困难，但是较之传统戏曲的成长过程，一定会迅速得多。

艺术家与工农兵结合，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为产生正确、深刻、新颖的主题创造根本性条件，同时为产生准确、鲜明、生动的艺术手段创造根本性条件。《节振国》、《六号门》、《黛诺》、《草原英雄小姐妹》……许多新京剧，在京剧艺术的创造上，主要不是首先依赖传统京剧艺术知识；即使接受传统京剧艺术知识的帮助，也是在艺术家结合群众、学

习群众、熟悉群众之后而起作用的。我们既要反对轻视传统京剧艺术知识的态度，更要反对脱离工农兵生活，夸大传统京剧艺术知识，以为有了这种知识就能把现代戏编好、演好的态度。因为：一切真正新的技巧的产生，不仅是由崭新的模仿对象所引起的，而且包括准确、鲜明、生动地再现生活这一要求本身，是发展了的艺术趣味所引起的。如果脱离工农兵生活，不仅一定得不到如何适当加以反映的对象，而且会丧失敢于大胆创造戏曲艺术的热情和勇气，丧失运用戏曲形式反映生活的艺术才能，丧失自由运用戏曲艺术知识的信心。

继承与创造

群众要求京剧现代戏表现工农兵，塑造新英雄人物，同时也要求它真正是京剧。因此，京剧艺术的革新，不能脱离传统京剧的艺术特性。这次观摩演出的许多新戏表明，艺术上的革新，既是以反映现实生活为目的，也是以传统京剧艺术为基础，既要打破和旧趣味密切联系的旧形式，也要从它那特殊的艺术形式中吸取营养。真正从群众要求出发而对待京剧艺术的艺术家的，在现代戏创造过程中，贯彻了既藐视又重视的原则，运用了既批判又非全盘否定的方法，正确处理着革新与继承的矛盾。

《芦荡火种》斗智一场，阿庆嫂同刁德一之间，正与邪的斗争，很尖锐，在形式上，却是戏曲的。

刁德一：这一个女人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刁德一：她甜言善语双睛亮；

阿庆嫂：他笑里藏奸有锋芒，

刁德一：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阿庆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刁德一：她使的什么风，靠的什么港？

阿庆嫂：他到底姓蒋还姓汪？

刁德一：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阿庆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这同《革命自有后来人》李玉和与鸠山之间的争论那样，是一种对唱。李玉和同鸠山的争论，是明来明往的唇枪舌剑的交锋。而阿庆嫂同刁德一的斗智，却是双方互相警惕，互相探索，因而这种我一句你一句的对唱，具有“背供”式的特点。这两出戏的



对唱都具备戏曲艺术的魅力，可是它们在观众精神上的作用，后者和前者大不一样。就情节而论，阿庆嫂和刁德一这正反双方，在斗争中都力图掩盖自己内心秘密，都唯恐暴露己方内心秘密。但是作为让观众接受的艺术品，却必须向观众暴露双方的内心秘密，所以双方都向观众直接唱出各人的猜测、判断等心理状态。这种为了明确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因而不拘于素材原始形态的形式，较之话剧里的旁白的形式，可能显得更自由，更有表现力，也可能就更动人。这是从新的内容出发，利用了传统戏曲艺术手法的许多可喜的收获之一。

现代戏不套用旧形式，却不拒绝利用旧形式所体现的艺术知识。我们从《六号门》卖子一场看到，在艺术手段上它和传统戏曲的相似之处，在于舞台空间的虚拟性和人物关系的真实性的对立统一。找不到工作的胡二，走到自家门口，愿意看见亲人，却老是逗留在门外。在门内的胡二嫂，看不见门外的丈夫，却一心盼望丈夫快快归来。这时候，两个演员你一句我一句地仿佛在对唱，而且唱词内容也仿佛是两人面对面地交流着他俩处于困境的痛苦心情^①。这种不受素材原始状态的限制，敢于打破空间条件的拘束，却也真实可信地表现了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的艺术手段，有革新也有继承，因而它符合观众欣赏戏曲的习惯、能力和兴趣，也加强了观众和舞台上的人物的交流，受到较深刻的感染，得到观众的赞赏。

京剧艺术家尊重和信任工农兵群众对戏曲的欣赏要求和接受能力，所以，当他们为了真实地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追求演谁像谁的时候，并不排斥继承戏曲艺术中那些有用的东西。譬如，在传统艺术形式里，虚构与逼真的对立统一，粗豪与细致、夸张与质朴、明晰与入神、重点突出与整体和谐的对立统一，作为戏曲艺术规律性知识，并不因为要适当表现起了根本性变化的现代戏的内容，就根本丧失了它那值得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价值。积极为工农兵服务的京剧艺术家，没有把大胆革新与批判继承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正确处理着社会主义内容与新的民族形式的关系。正因为革命的现代戏的形式具备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它那革命化群众化的新内容，才能够更强烈地影响广大

观众。

不少演员已经在现代戏的表演上，把民族艺术的革新和民族艺术的继承的矛盾解决得很不错。在《黛诺》里扮演正在觉悟过程中的景颇族姑娘的关麟麟，唱腔和表演都有新的、符合戏曲艺术的一般规律的创造。她在姿态、台步、手式、眼神的运用上，显得一气呵成而又节奏明晰，为观众塑造了在戏曲中才具有的样式化和美化的形象。当黛诺找到了“红星”，不愿意重返封建山官统治着的家乡，拉住解放军女医生的前襟，低着头，仰着脸，注视着对方，突然朝观众方面猛一转身，双眼直视前方，亮相般地“定住”顷刻，然后才道出她的决心：“我死也不回去”。这种不同于话剧的形体动作，配上了念白之后的打击乐“丝边一锣”，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也给观众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发挥了戏曲艺术的长处。这就既不脱离人物性格和环境的真实性，也适应了观众对京剧现代戏的欣赏要求。这种依靠夸张的形体动作，易于掌握地揭示角色内心状态的强烈和明晰的做派，也出现在《红嫂》里扮演解放军排长的演员李师斌的舞蹈上。演员表现英雄受了重伤却极力挣扎，利用了传统戏曲惯用的“劈叉”，使矫健的身段和人物困乏而又自持的特征和谐地统一着，解决了真实与优美的矛盾，成为主角红嫂的很好的配角。

不论是民族艺术的革新还是继承，为了现代戏

① 胡二：(同唱)年哪，逼煞人的年！
胡妻：.....

胡二：(同唱)天哪，杀了人的天！
胡妻：.....

胡妻：你为何不睁眼？
大宝他爹你为何不把家还？
可怜你几天来食不下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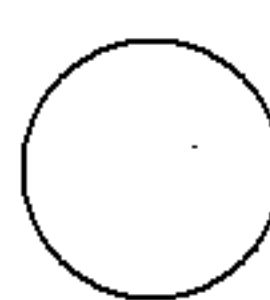
胡二：大宝他娘几年来苦受熬煎！
在我家从未吃一顿饱饭。

胡妻：你在外身无有四两棉！
速归来一处死我也情愿。

胡二：手空空家门难入我进退两难。

胡妻：你可知为妻我将你等盼？

胡二：你可知为丈夫徘徊门前？
.....



发挥教育群众的作用，相应地要求艺术形式适合群众的欣赏要求。戏是演给大家看的，一切艺术手段都是和观众的要求相联系的；哪一个阶级的欣赏要求，哪一个民族的欣赏习惯，都将反过来影响戏剧艺术。只从戏曲反映生活的任务着眼，不考虑戏曲怎样反映生活的特点与观众欣赏要求、欣赏习惯的联系，不能解释戏曲形式的形成和变革，也很难适当利用戏曲的艺术形式，为崭新的创造任务服务。作用于戏曲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变革的欣赏要求，是跟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着的，而群众对艺术的兴趣，却有民族性的继承性。革新与继承的关系是辩证的。不革新京剧艺术不能适应群众发展着的欣赏要求，不继承京剧艺术也不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京剧艺术的变革，表现了群众兴趣的变革；京剧艺术的继承，表现了群众兴趣的继承。革新以继承为条件，继承以革新为目的；没有革新要脱离群众，没有继承也要脱离群众。

艺术作为现实的反映，不必冒充现实本身。艺术之一的京剧，可以容许变形和虚构，可以容许唱词、道白、动作、服装、扮相的样式化和美化。在实际生活里，要是有人骂人时用歌唱，哭泣时讲究音调的好听，追赶特务时推敲步伐的舞蹈性，……那样，生活岂不变成了滑稽戏？但是，在戏曲里，这一切不仅是美化了的，样式化了的，同时它也是现实的，可信的。正因为观众不要求戏曲给现实作刻板的翻版，而要求以样式化、美化的形式反映它的本质；所以，念白讲究放收、缓急的表现力和悦耳的作用，出门人的行李包成了避免妨碍舞蹈的一巴掌宽的小布卷，吃饭喝酒只稍稍点醒，睡觉时往往是坐着以至于站着（《长坂坡》里赵云以站代睡）。任何艺术都不能也不必模仿现实中的一切，作为综合艺术的京剧，有配合也有分工地利用唱、念、做、打，有割舍也有着重地再现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一切方面）。例如用强烈的打击乐模仿角色各种情绪状态，表现人们由某种情绪所引起的特定反应的经验，不只是为了造成某种气氛，更不是简单地当效果使用，重要的是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和说服作用。这是符合群众对新京剧的欣赏需要的，所以京剧现代戏不排斥继承这些有用的传统艺术手段。

现代的生活和斗争，无产阶级的英雄，可以在

各种艺术样式中得到相应的形式的反映，京剧艺术样式也不例外。任何艺术样式都有它的特长和局限性，特定的艺术样式要求采取和它的特性相适应的生活内容，所以京剧如何反映现代生活，有它特定的着重点，在符合基本任务的前提下，对不同的生活侧面的再现，可以和必要有所选择。开始，《奇袭白虎团》在舞台上直接再现尖刀班在敌区的活动，包括有事实依据、捣毁敌人军车的惊险性情节；但是演员和观众都感到，这种在电影里可能是很能表现侦察英雄的果敢和智慧的情节，可惜这种明场处理在戏曲舞台上就显得很别扭，愈是符合事实就愈是显得表演不能令人信服。后来只得把这一情节改为暗场的处理，而在舞台上着重表现和歌舞艺术能够协调的其他情节（突破重重关卡）。这种改变，既不损害戏曲艺术的特点和优点，也不妨碍英雄形象的完整性，不妨碍歌颂英雄的主题的明确性。吸取京剧艺术规律性知识而使现实生活在作品里得到了创造性的反映，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艺术借鉴原则，符合工农兵群众对京剧的特定的而不是一般的要求。

坚持革命化

在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中，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京剧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的然而又是初步的胜利。京剧由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变成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具，解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装；就这一重大意义而论，它的胜利是伟大的。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长期表现旧的内容，因而形成了一套和旧内容相适应的严格的程式，也有区别于其他戏曲形式的特殊风格；我们既要利用它而对它进行改造，又要保持它特定的形式风格，这就需要继续付出艰巨的劳动，而且今后还免不了遭遇各种阻碍和迎接许多困难；就斗争的长期性这一意义而论，这个胜利是初步的。

正因为京剧改革是一场并非轻而易举的战斗，是一种不是轻而易举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所以，在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同时，难免存在着某些不够成熟的现象。例如某些戏在剧本上还显得主题不够深刻，人物还有待于进一步典型化，情节结构还显得



不够集中，不够严谨，包括文场戏打击乐的利用或念白的音乐化，某些戏在艺术手段上还显得受了素材原始形态的拘束，还应当把出现在舞台上的一切更和谐地统一起来，进一步把对于事物本身特点的模仿与人们对它的反应，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在京剧这一艺术形式中得到既真实又优美、既准确又夸张、既凝练又伸展的反映，从而在适应观众欣赏京剧艺术的兴趣时，使他们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利用京剧艺术反映新时代显得不很成熟的缺点，还有待于克服。

但是，从发展看，从长远看，从既得的巨大成就看，现代戏暂时还不很成熟，以至艺术上存在程度不同的缺点，既不足以淹没它那基本上的成就，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要是夸大它暂时还存在的缺点而抹煞它在主导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就，这就有必要考虑自己是不是真正和工农兵群众一条心，是不是真心拥护京剧革命化，不再迷恋旧戏曲。已经获得卓越成就的京剧现代戏表明，在反复加工继续修改过程中，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断地得到了提高。《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和其他许多现代戏的改编、移植、创造、修改的宝贵经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现代戏之所以暂时存在着缺点，同艺术家和工农兵的结合还不够密切，还没有充分掌握作为反映对象的工农兵的精神品质，还没有进一步把群众反映现实的能力化为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充分理解群众长期欣赏戏曲艺术而形成的接受能力，还没有充分理解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新的艺术趣味有关。所以，在怎样放手利用京剧艺术特性的时候，不免受到了一些拘束。当然，对于某些还没有充分掌握传统戏曲艺术的艺术家（特别是并非京剧方面的行家）说来，上述现象的产生，也包括戏曲艺术修养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数拥有京剧艺术实践的艺术家说来，这是次要的原因。如果把这看成主要原因，那就无从解释为什么有一些早已掌握了京剧艺术的演员，偏偏在现代戏演出中感到困难，迫切要求改造自己思想感情。

只要不对现代戏采取吹毛求疵的态度，不夸大它暂时存在和可以克服的缺点，那就一定会因为现代戏的出现而感到欢欣鼓舞。那些把传统戏曲看得

完美无缺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如果不是对传统戏曲的无知，就是对传统戏曲的偏护。如果传统戏曲只有民主性的精华而无封建性的糟粕，那又何必要对它进行整理改编？即使是在艺术上，传统戏曲必须改革的缺点也很不少。譬如，基本上是一出歌舞兼长的独角戏《林冲夜奔》，有些演员在唱到“英雄有泪不轻弹”的时候，偏偏配合了手指接泪、弹泪等动作。这种有师承的动作，作为唱词的造型化，脱离了特定的人物心理，经得起推敲吗？难道这不就是从唱词的字面出发，为抽象的文字符号作造型性的直译吗？我们没有因为这样的瑕疵而根本否认这种传统戏在艺术上的优点，为什么对于尚属童年的现代戏，偏偏要离开具体条件和具体过程，而提出苛刻的责难？

现代戏那些使人振奋的成就，不是次要的缺点所能淹没的。它怎样把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的出色成就，不是用短短的篇幅所能一一具体记述的。仅就怎样利用成段或成组的唱，从而强烈地表现新人物那种激动的不能自抑的情绪状态，现代戏设计了通俗易懂而不肤浅的唱词。即使没有听过关鹤鹑的演唱，只要能够读读先进的黛诺在她和落后的文帅发生了道路问题的尖锐冲突时的唱词，也会体验到角色的那种如火如荼的革命激情：

（叫头）李医生

（唱）为什么爷爷发了狠？

为什么爷爷打勒丁？

为什么爷爷要听山官话？

为什么爷爷与我不一条心？

一巴掌打出勒丁猎人泪，

一巴掌打得黛诺心儿疼，

一巴掌打得山官哈哈笑，

一巴掌打走了受苦受难的众乡亲！

这样的唱词，写得质朴和自然，写得感情充沛和性格鲜明。词的重复和对比，完全是戏曲的写法。这种写法和它所体现的内容，不只为演员演唱提供了发挥再创造的好基础，而且它自身也就是引起新的观众共鸣的重要条件。

在戏曲音乐里，唱、念都重要。《红灯记》里也有许多动人的念白、念对和歌唱。有一段众口称赞的



念白，是李奶奶向孙女儿李铁梅讲述一家三代的革命历史的七百多字的念白。演员高玉倩发挥了戏曲艺术的特殊修养，音乐化了的有节奏感的念白使李奶奶充沛的革命热情激励着革命观众。李玉和与敌人鳩山舌战时的三副念白，演员李少春、钱浩梁和袁世海都念得很有人物性格，一次比一次更显出斗争的尖锐和深刻。在歌唱方面，李奶奶回答铁梅“我爹死了以后，是谁把我救出来的”那一段的唱（二黄原板），演员唱得慷慨激昂，动人心魄。特别是唱到最后一句“你须要立雄心树大志要和敌人算清账，血债要用血来偿”时，腔往上翻，由沉着转向高昂，最后几个字唱得连贯而又斩钉截铁，好像被压抑的山泉的迸发，精神得很。这种表现了戏曲歌唱特点和优点的唱法，是发自特定条件之下的人物内心状态的，因而是既有审美特性也有认识作用的。

现代戏在艺术上的一切成就，主要是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的结果。同时，因为京剧艺术家的特殊素养服从了搞好革命现代戏的重大任务，所以京剧艺术大有用武之地，而不是特点和优点被埋没。许多过去不爱看传统京剧的观众，现在争取看京剧现代戏；许多过去爱看传统京剧，对京剧现代戏抱怀疑态度的观众，现在也爱看京剧现代戏；这表明现代戏使京剧有了新的生命，也表明它的观众扩大了。这些革命的现代戏反映了五四运动以来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了十五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塑造了代表时代、掌握时代命运的英雄人物，而且这一切是利用了京剧艺术这一特殊手段的，而不是所谓“话剧加唱”般地勉强拼凑的，所以，它就有了特殊的感染力量。有些观众说：在京剧里，李奶奶向李铁梅回述红灯的历史，因为利用了抒情的唱或念白，比看同一内容的电影更受感动。这是可能的。因为京剧这一艺术手段确有为话剧所没有的特殊的感染力，何况观众有各人不同的习惯和偏爱。内容和形式都很好的京剧现代戏，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有了较高的质量，能够引起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谁都抹煞不了的。

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反映，是

现代戏内容最主要方面，是今后还要格外着力的方面。旧时代的英雄人物（例如诸葛亮、穆桂英）为什么能够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也得力于戏曲的宣传。社会主义时代不断涌现的英雄（例如雷锋、谢臣、欧阳海等），在革命的各个战线上进行了伟大斗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精神品质上成为群众仿效的榜样；这样的人物应当是京剧现代戏大力反映的对象，也是在艺术上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从当前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的具体特点出发，把激动人心的情节和典型化的英雄人物形象统一地再现出来，使演出具备及时的教育作用，长远的艺术魅力。这，较之掌握京剧艺术，在新的要求之下练习京剧艺术的硬功夫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自己深入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进一步工农兵化。许多演员热情地表示：为了现代戏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艺术家自身彻底的革命化群众化。他们说：要说有什么“派”的话，首先应该是一个“革命派”；在京剧革命中，我们宁作现代戏的新兵，不作传统戏的老将。这是为京剧彻底革命化作了宝贵的思想准备。

京剧现代戏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革命任务。不论是为了进一步掌握京剧艺术，还是为了进一步掌握新人物崇高的精神面貌，都不会没有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障碍，都不会没有随时间的进展而出现的新困难。彭真同志在大会闭幕式上教导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京剧的革命路线时指出：“在我国，当前根本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在这种尖锐的斗争中，对艺术家和评论、研究人员说来，都是严峻的考验和必要的锻炼。可喜的是先进的也是正在自我改造的京剧艺术家表示，决心坚决贯彻大会精神，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同工农兵密切结合起来，继续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以及不可避免的困难作斗争，一定要把已经很好地开始了的京剧革命进行到底。只要有这种坚定的意志和行动，一切困难和阻挠，都一定会迎刃而解，使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在革命斗争中发挥愈来愈强大的威力。

